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二卷

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

我的学生时代　　今津纪游

创造十年　　水平线下

创造十年续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郭 沫 若 全 集

文学编 第十二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阳 门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frac{13}{16}$ 插页 5
字数 245,000 199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02-001435-6/Z·73
定价 16.95 元



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时摄



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师生合影（二排左二为作者）

寿昌：你近来做了些甚么新的事？还好么？你好久不写信与我了。你做的

[illegibl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也

全还未入目。你其所的一些计画已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

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作题材的。不久在《学

艺》杂志上当见发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你家中呢，

将来拟寄往[illegible]或在《民铎》上发表。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

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

和你商榷过没有？他来的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

在国内杂志界底文艺，几乎把我们的力都消尽了。我们应不急起

猛进，将不使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笑我们起来就

是一班新进而将自己坏了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极表同情，除

创刊新杂志我们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

多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朋友也有三四人加入，我

在前月拟往京都 —— 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仿吾

从内地来信，成仿吾君来有一封信来，我总知道他已经和你商

量过来。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

《南国月刊》二卷一期上刊印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致寿昌（田汉）函



一九二三年与成仿吾(左)、郁达夫(右)摄于上海

第十二卷说明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

《我的学生时代》写于一九四二年，最初收入一九四三年十月重庆东方书社出版的《今昔集》。

《创造十年》写于一九三二年，同年九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

《创造十年续篇》写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上海北新书店出版发行。

以上三集于一九四七年五月辑入《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二卷)，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今津纪游》写于一九二二年，最初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星空》。

《水平线下》中的《到宜兴去》写于一九二四年，《尚儒村》写于一九二五年，《百合与番茄》写于一九二三年，《原版序引》写于一九二八年；上述各篇最初收入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水平线下》。

以上五集和《山中杂记》、《路畔的蔷薇》以及《集外》合编为《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收入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七卷。《山中杂记》、

《路畔的蔷薇》以及《集外》今编入本编第十卷，本卷不再收录。本卷据《沫若文集》第七卷版本编入，并根据初版本及其它版本作了校勘，重大改动处加注说明。

第十二卷目录

学生时代（沫若自传·第二卷）

学 生 时 代

沫若自传·第二卷

序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所写的《我的童年》的《后话》里面有着这样的话："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

《反正前后》是写出了。"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便是在日本留学的时代。那可以分为大学以前和大学以后。大学以后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保留在《创造十年》里面了，只有大学以前的那一段，特别是在欧战期中的那一段，是脱了节的。我在这儿姑且把《学生时代》一文拿来补缺，使它成为《反正前后》和《创造十年》之间的桥梁。

《创造十年》及其《续篇》都没有把创造社的历史写完，所缺的就是北伐以后后期创造社的那一部分。那与其让我来写无宁是让仿吾、初梨、乃超来写，更要适当一些。

郭沫若 1947年5月8日稿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革命春秋》，收入《沫若文集》第七卷时，文字略有改动。

我的学生时代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桂林《野草》月刊第四卷第三期，原题《学生时代》。

自呱呱坠地时起，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①，《唐诗》，《千家诗》。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剌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

---

①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西)人。唐末诗人、诗论家。著有《司空表圣文集》。《诗品》，诗论集，一卷。分诗为二十四品，各以四言韵语十二句涌述诗的二十四种境界。

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①，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②，读段玉裁③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点读《御批通鉴》④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但我们的家塾

① 乾嘉学派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讲究训诂考据的经学学派，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其学称汉学，亦称朴学。

② 全名《说文部首读本》，又称《说文解字部首》，儿童启蒙读物，啸云主人编，湖北武昌书局校定。

③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清乾嘉学派著名学者之一。著有《说文解字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等。

④ 全名《御批通鉴纲目》，凡五十九卷，清康熙批，清宋荦校刻。

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我是乡下人，年纪轻，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老学生们嫉妒，发生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们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帅先生的讲义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印证，因此特别感觉兴奋。这种感觉在别的同学们的心里似乎并没有。

嘉定是适宜于读书的地方，环境很好，山水十分秀丽。星

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在凌云山上有苏东坡的读书楼，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题字，也还有好些遗迹，如洗砚池，载酒时游处之类。凌云山的岩壁上，正当着旧大渡河口，与峨眉山正对着，凿了一尊大佛。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汇为一个深潭，地方上的人说"是和海相通的"，虽然是荒谬的俗传，适足以表现其处之深。在那深处产一种鱼名叫"墨鱼"，全身黑色，这是因为水太深，罕与太阳光接近而致，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这些都觉得富有诗意，而墨鱼也确是可口。

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便颇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在学的后半期成为了最爱闹事的一个代表。第二年在端午节前后，我曾经被斥退过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学籍恢复了。原因是学校的处置遭受了学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对。

嘉定中学开设了，高小学生中成绩好和年龄大的便升入中学，我的高小学程于是一年半便告结束。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

但家里不肯让我们跑远，自己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是维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课。黄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欢我，在课外还借了好些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骂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学，这人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爱弄诡辩，异常的专制，我特别恨他。我醉了，骂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还是黄先生力争，又把我保全了下来。后来这位监学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别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第二年的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学校的课程虽然好得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张升楷① 先生的历史讲义比较感觉兴趣，但他不善讲授，详时详到无以复加，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他毕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林纾译的小说，梁

① 张升楷（1858—1928），原名家楷，后改名森楷，四川合川人。史学家。辛亥革命时任川汉铁路总经理。著有《二十四史校勘记》、《历代邦交录》等。

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欢读《庄子》的人，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论释》，他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

游山玩水、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都把课本丢在一边，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擅诗钟，和韵，联句，讲小说。

因是省会的关系，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比较活跃。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总每被选为学生的代表。头一年的年底便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风潮，当时是赵尔巽做四川总督，学生请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宪，闹到全省罢课的地步。起初学校当局大抵都是纵容的，但到后来赵尔巽下出严烈的命令，要学生复课，不然就要严办。分中的校长自然也就奉命唯谨。但要学生上课，却谁也不肯上课。他却想到了一个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课以为表率，我没有遵从他的命令，就在当天便离开了学校。学校说是要斥退我，但因种种原因，依然没有斥退。到第二年还让我补受了学年试验。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道国有的风潮。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结果和辛亥革命的大运动合流，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这在当时的学生界中也惹起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变革，有好些学生便借这个机会离开了正规学校，而转入了军界或政界。特别是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

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大家都想做官，几个月速成毕业之后便有考法官的资格，于是祖孙父子同学的佳话四处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种反抗，稍微严肃一点的学生，大家都讨厌学法政。我自己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但就留在正规的学校里罢，依然没有可学的东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时期，学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谐人意的教员也都转入了政界，剩给学生的便是焦躁、无聊、空虚。在当时有机会的人，便朝省外、国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资格了。我自己在当时真是苦闷到了绝顶，要考省外的学校或留学罢，起码要中学毕业资格，然而中学还没有毕业。因此便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在这样苦闷状态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赋诗、游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这时期还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毕了业。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校，熬了一学期，便考上天津军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了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

天津的军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费学校，民二的夏间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摊派六名，我被录取了。暑间离开成都首途，但到了重庆，便遇着二次革命爆发，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发，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记得经过黄河大桥时，已经在飞着雪了。

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到了天津之后，虽然经过复试，仍被录取，但却没有心肠入校，我便独自跑到北京去了。当时我的长兄橙坞先生在做川边驻京代表，虽然到日本、朝鲜

去游历去了，但早迟是要回来的，我有这样靠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个同乡京官家里住着，等到年底，长兄才从国外回来了。起初他对于我的求学也很感棘手，后来决定把我送往日本。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由火车经过山海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在釜山领事馆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因为那时的领事柯荣阶先生是长兄的同学。之后便又渡过日本，直达东京。在这儿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长兄送我离国的时候只给了我一条重六两多的金条，叫我到东京去变换成日币，作为学费。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费学校，不然将来的学费就难以接济。当时中国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契约，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的医学专门学校，山口的高等商业学校(这一学校因有一次发生事故，便无形中停止了收中国学生)，这五个学校都招纳中国学生，凡是考入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也就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这五个都是日本的国立学校，考上了又有官费，因此为留学生所竞争的目标，也就最难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还没有考进去。我是初去，想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那简直是没有把握的事。而且几个学校招生在那时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东京，要在当年的暑期应考，事实上还不足半年。但假使不考，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学费

便要成问题了。因此我在当时实在是拚了命，拚命地学日文，拚命地补习科学，结果我终竟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学校。这在当年听说是没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学校约略等于我们的高中，是大学的预备门。在当时是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学文哲、法政、经济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在应考时便得分科，因此便发生自己的选业问题。当时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样来拯救中国的。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应考第三部。这时的应考医科，却和在国内投考军医学校的心理是完全两样了。我在初，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然而终究没有学成，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后，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为最多，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须得学习。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如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微分、积分，以及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都须得在三年之内把它学完。功课相当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

我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

当时日本的大学其它各科都是三年毕业，只是医科是四年半。开始两年是基础学问，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后两年便是临床学问，即内外儿妇、皮肤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齿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所有一切的部门都要通盘学习。这四年也确是严重的四年。学问是严整的一套，你不能够躐等，也不能够中断。日本人的医学相当可观，在他们是很尽了心力的。

但我学医学终竟没有学成功，虽然大学是毕了业，我也得了医学士的学位，但我不曾行过医，我也没有意思行医。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觉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我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细菌的实习、医化学和生理的实习，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然而学到后两年的临床功课上来，我便感觉着无上的痛苦了。原因是我自己的听觉不灵，我不能够辨别打诊和听诊等微妙的基本医术。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那时还在嘉定中学读书，在中秋前后患过一次极严重的热症。后来回想起来，很明显的是重症伤寒。病了一个多月，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椎也受了波及。两耳因中耳加达尔①而重听，脊柱因腰椎加列司②而弯曲不

① 加达尔，即catarrh 的音译，意为粘膜炎。中耳加达尔，即中耳炎。

② 作者原注：加列司，即caries 的译音，指骨质破坏。一般多由于结核性损害。

灵。这两项缺陷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可能恢复。我的一生便受了这一次重症的极大的影响，我的学医终竟没有学成，就因为有了这生理上的限制。

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①、雪莱②、莎士比亚、海涅③、歌德、席勒④，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

我在大学的中途曾经休学一次，回到上海组织创造社，实际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约略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不必缕述。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又跑到日本去了。我把医学的课程是学完了的。是民国

---

① 太戈尔(R. Tagore, 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新月集》、《吉檀迦利》、《戈拉》等。

② 雪莱(P. B. Shelley, 1792—1856)，英国诗人。著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伊斯兰的反叛》、《诗辩》等。

③ 海涅(H. Heine, 1797—1856)，德国诗人。著有《诗歌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④ 席勒(J. C. F. Schiller, 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著有《强盗》、《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等。

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毕的业①，从此便和学生生活告了别。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医。我恨死一般不负责任的西医，不负责任的中医我也看成是一种罪恶。

形式上的学生生活虽然终结了，但我感觉着我一辈子都还是学生。天地间值得我们学的事体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别时，我的真正的学生生活是不会终结的，也不应该终结的。不过这篇文章，是应该在这儿终结的时候了。

1942年4月19日

---

① 据作者《五十年简谱》："民一二年(一九二三年)大学毕业，四月一日回沪。"

创造十年

(1918—1923)

发　端

创造社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闭以来，已经满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成立以来的经过追记出来，我也有那样的心事，但总迁延着，一直迁延了三年。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① 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号，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里来，谈到中国的文艺，谈到鲁迅先生。

他问我："鲁迅是怎样的立场?"

我说："鲁迅是一位用写实手法的作家，在前颇带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听说是转换到左翼来了。"

作者原注：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

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有《鲁迅全集》。

——"是的，"那朋友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①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

K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在临走的时候，那位朋友拿出了一本黄油纸封面的杂志来，递给我，我看时有似篆非篆的"古东多卍"的四个红字。旁边还有一行铅印标识：

佐藤春夫编辑《古东多万》第二号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发行

这"昭和六年"是民国二十年，西历一九三一年，更简切地说一句，就是去年。照那标识看来，自然是杂志了。

K把目录揭开，指示着《上海文艺之一瞥》②下署着鲁迅的给我看，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请你留着读一读。"

我多谢了他，问他："古东多万是甚么意思？"

他说："这书的封面背后便有解释。"

翻开封面背后来看，是从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来的一段解说，原来"古东多万"的发音是 kotodama，写成汉

---

①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作家、诗人。著有《田园的忧郁》、《都市的忧郁》、《殉情诗集》等。

② 原为鲁迅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所作的讲演，其主要内容记录稿，载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三日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第二十、二十一号，未经作者校阅；作者的改定稿后收入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初版的《二心集》。

字是“言灵”；照那解说直译出来是：

“我国之言语之自由的变化，具有一种灵妙的作用之谓。国语之妙用。”

再翻到书后的“编辑余谈”，才知道这“古东多万”用的是“万叶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汉字作为日本字母写成的——竟连日本人都不懂，屡屡质问，问得编辑先生“不耐烦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后才引用了那段字典。

我看了着实暗地感叹了一下，我对K说：“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象在这些地方真很困难啦。老实说，我起初看见封面时，我以为你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广告。”

——“哈哈，我起初却把它当成了法西斯谛的机关报呢。”

——“怎的？”

——“有个卐字啦，德国的法西斯谛希屈拉派打的是这个商标。”

彼此笑了一会，K才告辞走了。我便把鲁迅先生的文章翻了出来，原来是鲁迅的讲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译记的。据那译记者“九月十七号在上海”写的短序上说：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最近在当地某处，鲁迅秘密的讲演。那讲演的大要在当地的周刊《文艺新闻》①上连载了。然而《文艺新闻》在其立场上，顾虑到官方，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删削。但是鲁迅又根据那连载于《新闻》的笔记，更把叙述弄得恳切周到，更适切地把辛辣的骂倒直言出来，改写了这篇

① 周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刊物。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停刊，袁殊主办。

《上海文艺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写了的原稿向仆讲说了的译录。”

我看到了有“秘密”、有“顾虑到官方”的字样，已经就虔敬起来了。我预想到我们的战士一定展开了一篇左翼理论，对于上海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派① 一定加了些“辛辣的骂倒”。我如饥似渴地把那二十几页的长文，一口气读下去。看他的确是骂了好些人，骂了鸳鸯蝴蝶派②，骂了创造社，甚且对于左翼运动也没有忘记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读到尾上才看见了这样的几句：

> 以上所说之外还有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许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侠小说之类，应该详细解剖，可奈已经没有时间，等到将来有机会时再讲。

就好象读旧式的章回体小说，读到起劲处，却被“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手法欺骗了的一样，我的一口气软了下来。我鼓着劲要跳过一条三尺宽的沟，鼓得一脸通红，仍然跳不过去，立在沟的边上。象这样的讲演我不知道有甚么“秘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甚么地方要“顾虑到官方”。在《文艺新闻》上所发表过的内容，我不曾见到。鲁迅先生所“改写”成的

---

① 指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人。他们在国民党当局策划下，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并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借“民族主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② 清末民初兴起的一种文学流派，多以文言文写才子佳人的哀情艳史。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天虚我生）、徐枕亚等。

中文原稿，似乎也还没有发表出来。我现在暂以一个准鲁迅崇拜者的资格，把日译文中骂到创造社的地方要忠实地——我特别在这"忠实地"旁加上注意点——重译成中文。前后的文脉自然要稍稍照顾到，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译出来：因为鲁迅先生的改写稿一定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没有，将来也一定有鲁迅先生忠实的——又来加上注意点——崇拜者来重译全文，我不好把这一笔稿费从别人手里抢来。

讲演的开头是说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这鸳鸯蝴蝶派"因《新青年》① 的流行才渐受打击"，"那时有易卜生②的脚本之介绍，有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③ 那样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问题剧出现"，以下便论到创造社来了。

> 此后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出现。创造社尊重天才，是艺术至上派，专重自我，崇创作，恨翻译，尤憎恨重译，与同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其出阵最初之广告上，言有垄断文坛者，即指文学研究会也。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枝笔实在有点刀的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

① 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后时停时出，一九二六年七月停刊。陈独秀曾任主编。

② 易卜生(H. Ibsen，1828—1906)，挪威剧作家。著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

③ 胡适之(1891—1962)，名适，安徽绩溪人。作家、学者。著有《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其《终身大事》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

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波陀勒尔① 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罢？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绝大的天才吗？我们鲁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是"辛辣的骂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崇创作"这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也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你请去尝试一下罢。只要你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是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也"重译"过不少的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过不负责任的翻译和重译，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创造社也干过些受指摘的事情，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的这些罢？这好象是在说"你恨酸败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逻辑"。至于广告的一件，那是要请达夫② 先生负责的，说详本文③。

---

① 王尔德(O. Wilde, 1854—1900)，英国作家。著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莎乐美》等。 波陀勒尔(C. Baudelaire, 1821—1867)，通译波特莱尔。

② 即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文学家。著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③ 参见本篇第九节。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反对，主张为人生之艺术，一面创作，一面重视重译，并注意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因为彼等小国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译。而且文学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遂为新敌与旧敌所夹，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创造社，他们既尊重天才的艺术，以主张人生流之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为埋头于闲事，为“俗”（此字原译文有引用符，不知鲁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创造社员的话），且为无能，所以一发见了一个误译，有时便要大卖气力地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论。

第二方面说的是吴宓所代表的学衡一派①，第三方面是所谓鸳鸯蝴蝶派。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气力地把创造社来和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②继承着《新青年》和胡适之《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

①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学衡》，月刊，学衡派刊物。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一九三三年停刊，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提倡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

②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著名文学团体，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等发起，一九二一年在北京成立。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该得高呼万岁。① 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很遗憾，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小说的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解"。于是乎让这一"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我们须得学学乖，"顾虑到官方"啦。打个折扣，叫它个半声罢。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学卐！

在这儿要加上一个注解。这个屁股上的卐字，就和《古东多万》屁股上的那个字一样，是当作"万"字在使用。"万岁"的一半自然就是卐，但有聪明的读者要把它连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这个罪状倒不自今日始，据鲁迅先生的"一瞥"看来，从与文学研究会反对以来便已经是反动的了。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正是罪该万

① 从"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起至此一段文字，一九三二年九月《创造十年》初版本为："是的，鲁迅先生到底不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员之一人，在这些地方却很能替本店发卖膏药。'货真价实，只此一家，'——只有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们在这儿来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拥护文学的正统！

"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

"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

"反对文学研究会的就是反革命！

"反对鲁迅先生的就是反革命！

"是的，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是该得高呼几声万岁的。"收入《沫若文集》第七卷时改如今本。

死！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正是罪该万万死！哼，你们不知道象“雅典主义”①一类的翻译，不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吗？你们不知道那些名译，纵不“百世”也会“万年”的吗？我鲁迅先生正告你们：文学研究会者人生之人生也，艺术之艺术也，如此之如此也，这般之这般也；“俗”云何有？岂是“无能”？“无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错误”之仅仅“一个”便足使汝辈之“专论”做出很长很长“一篇”，谁能谁不能乎哉？——好了，我尽力摹仿我们先生的笔调似乎有点不类，然而不类者类也，好象通，又好象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逻辑”。

> 创造社的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来是胜利了。多数的作品既投合于当时的自称才子辈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帮助，势子遂盛，势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务印书馆，也就把创造社的译著来出版了。——这是说的郭沫若、张资平两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来，据我所记得的，创造社便再没有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误译来审査，来写专论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好说得，岂不就是才子加珂罗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罗茨基Gorotsuki 译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们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样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灵的推想和记忆，便把一群人的罪状

① 作者原注：当年文学研究会的一位先生把atheism（无神论）译为“雅典主义”。类似这类的误译不少。

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来，这是何等折狱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这儿也隐隐泄漏了一点天机。他在上面骂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的误译，在这儿把文学研究会的五个字写成了商务印书馆。哦，原来文学研究会就是等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至于说到我和商务印书馆发生买卖关系的详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与创造社无涉，我在本书中要提供一些事实出来，在这儿暂不赘述。）

却说，因为新上海到底不是旧上海之故，创造社员在凯歌声里终自觉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书店写商品，虽是种种的努力，然从老板一方面看来，就和眼镜铺的show-window（门面玻璃窗）中装饰着的纸扎人物之活落活落的眼睛一样，不外是以广招徕的广告而已。

这一段把创造社员叙得又如此有自觉。因为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在替书店老板写商品，在show-window中做着广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扬扬得意的！

于是乎才希图独立出版，书店老板便把他们向裁判所告发了。

这一句话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这儿所说的"书店老板"自然是指泰东书局的赵南公①。幸好赵南公还没有死，创造社的几个人也都还活着，创造社设出版部时，原来赵南公是

① 赵南公，河北曲阳人。泰东图书局经理。

提起过诉讼的吗？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神经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甚么不名誉的事。我想，怕是脑中的记忆有点绞线，在这儿把新青年社和创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 后来终竟独立了，一切的书籍大加改订，改印刷，新开起店子来，然而旧老板方面也永远地用着旧板，一味的印刷，贩卖，年年闹着甚么“纪念大廉卖”。

这几行倒很近于事实，甚么“纪念大廉卖”——这是九州万国凡百商行所惯用的骗钱调门，自然不限于上海，不限于上海的书业，不限于泰东；然而这种极普遍、极陈套的现象，落到我们大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手里是怎样地“着手成春”了！因为这个现象一局限到这儿来，便是说：创造社的作品屁钱不值！

> 在作为商品上虽是怎么也忍耐不过，然而独立了也没有如意地赚出钱来，创造社的人们之走头自然是朝比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跑去了。于是乎便有“革命文学”这个东西出现。然而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在上海呢，连那样“革命文学”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

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谓“革命文学”也就是那几个“流痞”所想出

的骗钱的幌子。我们这位“左翼之雄”的鲁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释真可以算得是超马克思主义的。但可惜那几个“流痞”所闹出的事实和先生的推论全不相符。创造社出版部的独立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员成仿吾是以一九二五年六月去广东，当的是广州大学的理科教授①。还有几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达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拆了伙的王独清②，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从上海出发往广东的。这“三一八”是一个纪念日③，在这儿自然用不着我来做“宣传大纲”。几个流痞刚好在这个纪念日上动身，这个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脑里。我记得那天在下雨，在黄浦滩码头上送我们上船的有一位楼建南④。走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还有送行的人做见证，可恨这个日期不好自由创作。就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是应该痛骂那几位创造社的痞棍，为甚么那样早便跑向广东去了，没有停一下造些事实出来和我们鲁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们的“正人君子”又形同捏诬地自由创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译文中说的是“一昨年”，大约是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学”这个名称才旺盛了起来，主张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

---

① 据《国立广东大学概览·全校教员表》（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成仿吾时任文科兼预科教授。

② 王独清（1898—1940），陕西长安（今西安）人。诗人。曾任创造社执行委员。

③ “三一八”原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纪念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执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④ 即楼适夷，原名锡椿，一九〇五年生，浙江余姚人。作家。著有《挣扎》、《第三时期》，译有《在人间》等。

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不消说是有它社会的背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和青年们中有了那样的要求。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奔走于实际运动，在那时还没有甚么显著的革命文学，然而到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地鲜明了起来。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大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剩下的青年们又入了被压迫的境遇。在这儿，革命文学才在上海成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和别国不同，不是由于革命之高扬而盛，而是由于革命之挫折。其中虽也有几位旧文人投了指挥刀又来干笔墨的旧业，有若干的青年由实际活动赶了出来不得不借此以谋生路，然而实际上具有社会的基础，新分子中极坚实而正确的人多所存在。然而这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看来，是还没有经过十分适切的计划，错了的地方怎么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象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镳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这一节不知道是根据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区区浅学，指不出出处来。）其实革命决不是杀人的东西（阿弥陀佛），而是活人的东西（再来一个阿弥陀佛）。象这种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这句话原有引用符，未详出处），而自行痛快的态度，这也不好怎么说得，只好说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毒。

这一段文章说得倒还风凉，不过先生的苦心我们是不好忽略看过的。便是一九二七年连到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坚实而正确，只是创造社的几位旧人都是投机的家伙，而且带着“极左的凶恶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碍。就这样，我们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痞打进阿鼻地狱①里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他们的份，在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也没有他们的份。我们鲁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领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过，那是在这样说：“中国的新文学中无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鲁迅一个人的！”

是的，我们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他在“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历史。（须要注意：“才子”者轻薄之谓也。）

鲁迅的《一瞥》是很长的一瞥，在下文他还把近年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瞥”了一下。在这次运动中最可庆幸的是我们鲁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说得象煞有介事。不过他叙述创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这儿，以下我不便再多事征引了。创造社遭了封闭的一节，鲁迅先生是绝口不提的，当然这在“正人君子”看来正是那痞棍集社的恶贯满盈了。日本有一位“左

① 佛家语，是八热地狱中的第八狱。“阿鼻”为梵文Arici之音译，意为“无间”，即痛苦无有间断之意。

翼作家"和暴力团的团长一样的前田河广一郎①从前到过一次上海，因为创造社的人没有欢迎他；待他回国之后听说创造社遭了封闭，他便大大称快，在他的机关报《文艺战线》②上做了一篇痛骂创造社的文章，说是中国的Ultra③派（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极左派）被中国社会清算了。我看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实在赶不上我们中国的"左翼之雄"，因为象那样鼓睛暴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场来，何如闭着眼睛连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

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象鲁迅先生的那样曲。④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⑤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

---

① 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日本作家。著有《大暴风雨时代》、《太阳之黑点》等。

② 月刊，日本左翼文学杂志。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六月创刊于东京，一九三二年七月终刊，共发行九十五期。

③ 英语，过激、极端之意。

④ 这里说的"大小说家"指沈从文。他在《论郭沫若》一文中说："郭沫若对于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画直线的笔，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乏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篇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

⑤ 作者原注：爱斯基摩人，居住于北美洲北部寒带。

不敏。

还有，我这《十年》也不好就说是历史，因为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由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来的小说。象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艺史。

后代的文艺史家一定要从那儿取材的。所以我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说它是历史。

究竟是个甚么东西呢？——说本色些，就说它是一个珂罗茨基的自叙传之一部分罢。

一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升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福冈。

福冈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在岛的北端，沿着博多湾海岸。市街是由两个旧市合并而成，西段是福冈，东段是博多。大学的医学部在博多市外，背面就是博多湾。这博多湾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点，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将范文虎征伐日本时，遇着大风全军复没了的地方。①（日本史家称为“弘安之役”，当西历一二八一年。）当时的遗迹在那沿海一带还是不少，有所谓“元寇防垒”、“元寇断首台”、“元寇纪念馆”。纪念馆中搜存着元军所遗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类。

市东尽头处有一带大松原，沿着海湾就和围墙一样，怕有五六里远。日本人称为“千代松原”，在古书上又称为“十里松原”。这“十里”怕是中国人替它取的名字，因为日本的里数一里是要当中国七里。在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幡大明神。那种

---

① 元世祖，名忽必烈（1215—1294），元朝开国皇帝。 范文虎（？—约1301），南宋将领，后降元。《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范文虎等奉命率大军征日本，遇台风，“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神社在日本国内随处都有，从前骚扰中国海边的倭寇，中国的古书上记载着他们在船上打着“八旛大明神”的旗帜。今年的上海事件①，把闸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旛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报上还拍了一些照片下来，这是他们自己意识着就是倭寇，同时也就可以看到日本人信仰八旛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级的，就象官有官阶，学有学级。那箱崎神社是所谓“官币大社”，用学制来譬比，就是所谓“国立大学”。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门走向海岸，相隔还有五六百步路光景，一直成为一条甬道，两边是松林，道旁对立着无数石灯。

到了福冈之后，我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里面。时候是八月下旬，学校还没有开课。有一天中午，我很早吃了午饭，为逃避午后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来，在松林里面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无心之间我遇着由海岸上走来的张资平②。

——“哦，你怎的到这儿来了？”

——“哦，你也怎的到这儿来了？”

差不多是同时叫出的两人的声音。

张资平本是一高预科时的同学。那时候的日本的高等学

① 指“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上海租界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② 张资平（1895—1959），广东梅县人，作家，创造社早期成员。著有《冲积期化石》、《最后的幸福》等。

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一高里面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也就照样分成三部，但是学医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质相近，一、三两部合班讲授。如象物理、化学、博物一类的功课，因为讲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讲授。资平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医科。因为不同班，彼此虽没有甚么往来，但也同了一年的学，差不多天天都在见面的。一年的预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冈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别了三年。

——“我是来进这儿的医科的，你是进这儿的工科吗？”

——“那里！我们还没有毕业呢。”老张的梅县的广东官话说得分外激越。

——“怎么还没有毕业？”

——“我们五高的校长很顽固，他说我们是因为排日回国的，他不准我们补考。我们说别的高等学校都补了考，为甚么我们又不可以补考？他说：‘你们又要爱国，又要诳文凭，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这样说我才记起了他是被分配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岛上的一个都市，离福冈只有半天功夫的火车。他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便一个人到福冈来洗海水澡来了。

原来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约”①，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

① 日本为干涉俄国十月革命，侵占我国东三省并控制中国军队，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以防德、奥为名义，与段祺瑞政府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候和安那①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②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乡间，"武力"的滋味我倒还没有领略过。

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所反对的协约并没有因而取消，于是乎便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这一决议下来，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不幸象我这样的"汉奸"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圆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甚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象铁铸成的秦桧③一样。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

---

① 即郭安娜，原名佐藤さとみ，一八九四年生，日本宫城县人。作者夫人。早年毕业于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曾在东京圣路加病院当护士。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籍。

② 吴起（？—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战国时兵家。其杀妻求将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③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曾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为人民所痛恨。浙江杭州岳王庙岳坟前和河南汤阴岳飞庙祠前均有其铁铸跪像。

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但说到回国上来，我也是有经验的人。我初来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逼着中国承认，我在那年五月七日的一天跟着几位同学也曾回过上海一次。那时我还做过这样的一首律诗：

哀的美顿书①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是，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谁料隔不到两年我又变成了“汉奸”呢？

——“回国后到底得到了甚么结果？”

——“那有甚么结果？跑北京的代表们听说是段祺瑞亲自接见过一次，嘉奖了他们，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求学，说政府是决不做有损国体的事的。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来了，有的留在北京在运动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们合在一道，现在在办着《救国日报》②。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

——“真正爱国的人怕也很不少罢？”

——“受牺牲的倒很不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小的朋友，

---

①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政府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

② 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创刊于上海，曾琦、张梦九等主编。

他们很热心，四处去卖报，去宣传。但那样的生活能够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响呢？要救国怕还是要有点实际的学问才行罢。”

老张很雄辩，大约也是因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别地愤懑。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并不比谁落后。

——“假使中国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国开战，跑回去当兵倒还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我对他这样说。

两个人在那甬道旁边的一座石灯下谈了好一会，老张问我吃了午饭没有，他说他要回寓去用饭。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他原来就落宿在邻近村落里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里面。他是住在楼上的。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着几本书。我顺手拿了一本来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①。

——“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

——“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手腕很不坏啦。”

我没有再说甚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的章回体；我又把书给他放还原处去了。

等资平吃了中饭，两个人又走到海边上来。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旅馆，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自欧战开始

---

① 不肖生（向恺然）著。

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着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①，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它们的最大销路不消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贵中华民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发户来。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痛头的便是怎样来把钱消费。依着经济上的铁则，他们自然要向着规模较大的再生产的方面去灌注，而同时是向着享乐一方面去挥霍，物价便如象受着魔术的呼遣一样，暴涨了起来。在这“成金风”吹煽着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实相符的黄金时代，一切的无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倒也还没有梦想到失业和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候最受着打击的是没有营业本领的中产人家和没有劳力出卖的知识阶级。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职员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费留学生，高等学校级的每月由三十二圆增加成四十三圆，大学级的由四十八圆增加成七十二圆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抱洋阁和筑港事务所对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时候的“成金风”的标识了。

博多湾中有筑港工事在进行着，是商办的有限公司，打算把博多湾浚深起来成为海港，好推进福冈附近的石炭产业，以

① 政友会，全称立宪政友会，一九〇〇年由伊藤博文创立，为日本资产阶级主要政党，一九四〇年解散。　原敬(1856—1921)，日本明治中期至大正初期政治家，曾任政友会干事长、总裁。一九一八年受命组阁，任首相期间被刺。原敬内阁(1918—1921)为日本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内阁”。

夺取长崎港的地位。博多湾的外貌很是象一个大湖。在东北角上有一个细长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象缩小了的意大利半岛一样，把外海的玄界滩和内部的博多湾隔断了。博多湾真是风平浪静的，比太湖的湖水还要平稳。

——“令人有点不相信啦，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在一夜之间通统沉没在这里了。”

——“那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风啦，那样的大风一来，听说是排山倒海的。这个时期不久就要到了。‘二百十日’你懂么？是从春分起算到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气寒冷了起来，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热的空气生出猛烈的对流，便激起那股大风。”

资平到底不愧是学理科而且打算学地质学的人，他这样启蒙地对我说。

抱洋阁前面停着好几部汽车，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为“成金”的人，带着“艺伎”在那儿进出。有时也挟着些戴四角帽的大学生在里面。听说那里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还有好些娱乐的设备，如象台球之类。时而从楼上的窗口中，于男女的笑声之外，响出撞球的声音。

两个人在滨海的一座石造灯台旁边把衣服脱了，便向海里走去。海水是满潮的时候，但是那博多湾真是“远浅”，在水中走了很远很远，依然还可以踏着海底。一只浚海机在将近湾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运转着。运转机械的动力用的是煤油，待我们在海里凫了一会之后，想来是风头转换了，本来是很清洁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阳光中反映着种种的

虹彩。糟糕！糟糕！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又赶快朝岸上逃跑。眼望着抱洋阁上临海的大楼，一些寻乐的男女，坐在楼头畅饮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右手松原角上停放着两尊大炮的地方走去。炮是日俄战争时的捕获品，是涂着红油漆的。这种废物，日本国内无论神祠、佛寺、学校、官衙，大抵都有陈列，一方面以夸耀他们的武功，同时并唤起国民的军国主义的观感。

在两尊大炮附近的松树脚根上坐着，纳了一会凉，又谈了一些东西南北的事。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了。

我是三年没有回国的人。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那时候我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①和《小说月报》②，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那可以不用说了。隔了三年的国内文化情形，听资平谈起来，也

① 综合性刊物。一九〇四年三月创刊于上海，初为月刊，自十七卷改半月刊，至四十四卷又改月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夏瑞芳创办。

② 文学月刊。一九一〇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初为“鸳鸯蝴蝶派”刊物；从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十二期后停刊。

还是在不断地叹气。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丙辰学社① 出的《学艺》② 杂志名誉还好吗?"

——"那和《新青年》比较起来又太专门，太复杂了。陈启修③ 的政治论文被蔡元培④ 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许崇清的哲学论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⑤老陈从北京写信到上海，叫社里的人不要再做反对蔡老头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满意。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国人的杂志是不分性质，乌涅白糟地甚么都杂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

---

① 作者原注：中华学艺社的旧名，是丙辰年(1916年)一部分留学日本的学生所发起的。陈启修、郑贞文、周昌寿、许崇清等为其初期的主要分子。

② 中华学艺社机关刊物。一九一七年四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至上海。初为季刊，后改为月刊。

③ 陈启修(1886—1960)，原名豹隐，字惺农，四川中江人。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东大学教授。著有《财政学总论》、《经济学讲话》等。

④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学者。曾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著有《哲学大纲》、《石头记索隐》等。

⑤ 许崇清(1887—1969)，字志澄，广东番禺人。曾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一七年他在《学艺》第一、二卷发表《批判蔡孑民在信仰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题之意见》，与蔡元培论争。

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象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的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象浅近的科学,我想各级学校有各级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已经够了吗?似乎用不着办杂志。象《学艺》里面所收的科学论文,专门翻译讲义的钞本,我最不赞成。”

——“出文学杂志很好,但你那里去找人?”

——“据我所知道的,我们预科同班就有一位郁达夫……”

——“哦,不错,不错,老郁是会做诗的。听说他常常做旧诗到《神州日报》上去发表。听说他也在做小说呢。”

——“对,我想他可以来一个。我还知道一位我们在冈山同过学的成仿吾。他去年进了东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国。他也是很有文学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来一个。你可还认得些甚么文学上的朋友吗?”

——“我可没有的。比我们早的同学如象文范村①、吴君

① 文范村(1890—?),名元模,字范臣,贵州贵阳人。物理学家。译有《活尸》等。

毅①，都在《学艺》上发表小说的翻译，但他们恐怕不肯和我们一道。比我们后的同学我就不知道了。在熊本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

——“大高同学②的系统之外怕还有些人罢？”

——“有或许有，但我可不知道。”

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

资平很赞成我这个办法。他约定就以我那儿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仿吾和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我和资平发生交谊实际上是从那时起头。我知道他有文学上的趣味的也是从那时起头。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我这部《创造十年》要从这儿叙起，也就是这个原故。

在海岸上谈了一会，日脚渐渐偏西了。我约资平到我寓里去吃晚饭，他也乐于同行。从那陈列大炮的地方穿进松林，走向我寓居着的“质屋”，为时只消两分钟光景的。

——“我们在研究自然科学，”我一面走着，一面这样说，

① 吴君毅(1888—？)，名永权，四川成都人。教育家。

② 作者原注：指日本帝国大学和高等学校的出身者而言。他们曾自称为“大高同学”，有大高同学俱乐部。

“只是在教我们观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们的内部发生些甚么出来，创作些甚么出来。”

——“要创作，不也还是先要观察吗？”

资平这样地回答了我，我当时觉得他似乎没有懂到我的话。但到现在想来，这两句话正是两人当时的态度不同的地方。资平是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所以他说要创作先要观察。我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所以要全凭直觉来自行创作。我现在觉得他的话是比我更有道理了。无论是怎么深渊的精神活动，没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进了我的寓所，我替资平把安那介绍了。资平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是有日本老婆的人。他回头便用中国话来对我这样说：

——“你把材料提供给我罢，老郭，我好写一部《留东外史》的续篇。”

我听了他这话，觉得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在我心里这样想：“这家伙太不客气。这家伙的趣味真是下乘！”但我没有说出口来。看他倒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觉得他这人的自信力很强，他直觉到我是不会做小说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给他。

在这次会面后，不两天，资平便回学校去了，大学也开起课来了。

二

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后，我从学校里回来。安那背着和儿在楼下烧茶。她对我说："楼上有几位稀客来了。"

我匆忙地跑上楼去，看见了三位来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陈君哲①，还有一位是我不认识的大学的同学。君哲把那位不认识的同学向我介绍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学的四年生徐诵明②。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级，比我早一年进的大学。

原来仿吾也是因为风潮回了国，这回是同着一位同乡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冈来就医的。他到君哲那儿去，听说我也在福冈，他便跟着他们到我住处来了。

我和仿吾相识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年青三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在高等学校里属于二部。我们在冈山算同了两年的学，也同住了将近两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③一道

---

① 陈君哲（1882—？），浙江绍兴人。

② 徐诵明（1892—？），字轼游，浙江新昌人。

③ 成劭吾（1889—1924），原名汉，湖南新化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革命军湘军第一师军需处处长。

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时候，和几位朋友同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助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那样一番的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的三年间是没有用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外国语字典，这在国内的学生看来或许不甚稀奇，但在对于日本高等学校有些经验的人，他至少是会惊异的。日本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甚至象我们学医的人在第一德语、第二英语之外，还要学第三种的拉丁语。一个礼拜的外国语时间在二十二三个钟点以上。加之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学生起来把原书读一节，接着用日本话来翻译。译错了时，或者让别的学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来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个人读下去，译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还可以偷懒，不轮到自己名下时可以不必准备。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没有一定的。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气力。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你看，在这样的学生生活中能够不用字典，是不是一种惊异？

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他很少说的中国话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会面的人，真不容易听懂。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的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他在风潮中回上海去了，在他本来是不想转来的。直到九月尾上，各学校已经开课了，他在上海才遇着他的同乡，那位盲了目十年的陈老先生。我们要记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冈病院里的。大约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陈老先生知道福冈的医科大学里有一位日本的有数的眼科博士。他的年纪已经六十以上了，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位管事，远远地从他的家乡出来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冈来就医，想使自己的双目复明。他们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

我的住房是在那"质屋"的质库楼上，面积只有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东北两面各有一堵铁格窗，看来很象鸟笼，也很象监狱。但就是那样的楼房，每月也还要我们六块钱的房金。仿吾想来是看到我们住处逼窄，他说到陈老先生们住在旅馆里面，每天的耗费太大，一个人每天要七块钱，四七便是二十八块，起居饮食都不方便。他们打算在外面找一间房子来自行开火。在这时候，他便向我提议，好不好让我们夫妇和他们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们管理家政。

正在这样商议，安那烧好了茶，背着孩子送上了楼来。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说，不消说她立地便答应了。因为那时

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块钱，两个人一个月至少也要吃十块钱的米。我还有一件至今想起都还令人愤恨的事，是在六高毕业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次东京，向经理员预支了两个月的官费。因为转入大学之后，第一学期要缴四十圆学费，又要买参考书。医科所用的参考书多是德文书，由于欧战的关系，书籍不能输入，就买旧书都要比原价贵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学时，预支学费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预支时原约定按月摊还，但最可恨的是那时的四川经理员，绰号叫张麻子的，他从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下来。好在我预支时在七月，是旧额的四十八圆，从八月起增加了官费，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仅仅得到二十四圆的增加额。写信去质问并请求通融，他欺负你是住在乡下的人，给你一个不置答复。于是便弄得来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进当铺，——好在当铺就在楼下——在九月将近一个月中连吃饭都是在节省着的。谁能料到在这样意外的地方才遇到救星呢？所以当仿吾一提议，我在心里早就喜出望外了。再向安那说明之后，她也欢喜得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她只说，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兴，她是没有不赞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们的同意，便辞去了。隔不一会，他又一个人转来，邀我们出去找寻房屋。原来那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愿意和他们同居，也异常地高兴。所以在瞬刻之间事情便定夺下来了。我们便到箱崎神社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楼的，楼上有四间居室，楼下也有两间。仿吾和陈老一门定住在楼上，我们一家三口便住在楼下。把租约议定了，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于是乎我的老婆便成为陈老一门的家政妇，我自己

便成为听差。但我当时是怎样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饭原值得韩信的千金①，况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卖气力，我们是没有甚么可以羞耻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处，我把月前同张资平两人的拟议向他提说过，他也很赞成。但他觉得人手太不够。据他的意见，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甚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征集同志，不要着急。

仿吾和我们同住了两个礼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进学堂上课的，他和陈老父子、特别是那位管家似乎不很相得，他的生活很有些无聊。我们劝他回东大去继续学业，他起初很迟疑，以为再当冯妇是可耻的事。但他也经不起人多口众的劝说，终于决心再往东京。他动身时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车，天气已经渐渐寒冷了下来。我记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风去的，到了东京之后又邮寄了转来。

陈老所打算就诊的眼科大夫是大西②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是有点癫痫性。他在德国留过十二年的学，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数一数二的国手，在日本医学界中也怕是数一数二的怪人。

他的逸话很多。

有一次听说有一位日本的陆军大将或是中将找他疗治眼

① 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 即大西克己（？—1932），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眼科教授。

疾，走进了他的诊察室，向他举手行礼。

他叫着："把帽子脱了！"

那将军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强地回答了一句："帝国的军人是不脱帽的。"

大西听了便跳起来，连忙把那将军推出门去，不让他说出第二句话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进我诊察室的人不脱帽。"

象这样的逸话在学生中传说着，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别是在他名下的助手，怕他就和怕老虎一样。因此他那一个教室里，助手是寥寥无几的，但也怕是由于眼科不甚吃香的原故。

陈老来找他，学校里的老同学们为他介绍，但大家都很战战兢兢地深怕触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鳞。中国人的旧礼节也是不脱帽的，因此陈老头上的那顶瓜皮小帽，又成为了大家的忧虑的焦点。那叱咤将军脱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说过，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见面时把瓜皮小帽脱了。那老先生倒还很通方圆，据他说"入乡随乡"，脱帽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在旁边所亲眼看见过的说来，老先生住在病院里的时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来诊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些次便没有脱帽，怪教授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我想，大约他是看到陈老是上了年纪的盲人，又不远千里地走到海外来就他，他也是在感着义气的罢？

陈老的眼疾据诊察的结果是白内障(Cataract)，假使施行手术，或许有复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热心真可佩服，就是要

略略见血的手术，他也甘愿受。在施行手术之前的准备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检查，小便的检查，各种内科疾患的有无的检查便费了几天。食饵的调节也特别严格，这一层似乎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爱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岁的陈老每餐没有姜，没有辣椒，是食不甘味的。但怕会激起老人的肾脏病，这辛辣的食物却在最严禁之列。不过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复明的希望在后头，医生说什么他也就唯唯听命。他时常爱这样说，他的眼睛将来复明时，能够看见我们一眼，他是多么高兴呵。

起初受种种诊察的时候是住在寓所里，遇必要时再到学校去，后来决定要行手术，便移进病院里去了。我和陈老的儿子和管事三人便轮流着在病院中陪他过夜。行手术的时候因为有课，可惜我不曾临场。据说大西教授很得意，说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畅，复明的希望或许是有的。

天气一寒冷起来，学校里的人体解剖便开始了。一个礼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胫连脚，左右各一人。余下的背部是归头部的两人解剖的。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因为左右是对称的，所以一个人便须得轮解着八架尸体。尸体是用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注射过的，全身缠着纱布，储在解剖教室的尸库里。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象围着吃西餐的一样，

拿着刀子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后是象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福尔马林的臭味倒还不甚恶劣，但到时间经久了，绷带的保障已经不严密，尸体上要发起霉来。天气一热时更要腐化，甚至钻出些蛆蛹来。这样叙述着好象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象在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

尸体的来源是刑务所，因此所解剖的尸体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绞死了的，在颈项上还留着绞索的痕迹。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很不少。日本人是有文身的习俗的，有些尸体上，全身都施着朱色和蓝色相间的人物画，画得异常工整。

在这样奇怪的氛围气中，我最初的创作欲活动了起来。

我幻想着我所解剖着的一个尸体上，在胸部有一个拙劣的裸体女人像的文身，旁边也歪斜地写着“滨田爱子”四个字。同我解剖着的一个日本学生便哗噪了起来：“哦，这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啦！”接着便谈起了一段盗尸的故事。

那滨田爱子是离福冈不远的昔年日本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门的女儿。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湾中洗海水澡时淹死了。黄昏时分尸体打上了海岸，因为要到天明警官才能来检验，在当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个棚厂里。但到第二天来，那尸首却突然不见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社会上生出了很大的波动。警察

方面不消说在加紧侦察，费了将近一礼拜的工夫都没有着落。后来是有一位渔师的行迹可疑。那渔师自那尸首不见以来，白天没人看见过他，只有在晚上偶尔出面，购买多数的冰块。他的渔船每天都不见，要说他每天出去打鱼去了，但又不见他打捕过甚么鱼回来。这渔师就是那斋藤寅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独身。警察方面得到了这个线索，对于这人的行踪也就特别注意起来了。结果是在一天夜里，那渔师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里。有两个侦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在等候着他，看见他挑着一担空鱼篮来放在门外，走进门去了。停不一会又由屋子里走出，挑着空鱼篮，走上市去。两个侦探便尾随着他，看他到冰店去买了好些冰块来盛在鱼篮里，但这回他没有挑回家，却是向海岸上走去。两个侦探又跟着他走到海岸，在星光中发现了他的渔船是停在岸边上，有一种异样的奇臭。只听见那渔师上了船，对着空洞洞的渔船在说：

——“小姐，我回来了！滨田家的小姐！……”

侦探听见了，便急忙地掩上去，跳上了他的渔船。那渔师看见有人来袭击他，便顺手提着一把切鱼的长尖刀向为首的一位侦探当心刺去，把那位侦探刺中了，他同时也被第二个侦探捕获了。

那位渔师的确就是那盗尸的犯人。那滨田爱子的尸首赤裸裸地藏在那舱板下面，虽然浸杂着好些冰块，但已经是半腐的程度了。尸体经检查的结果，很狼藉地在死后受了凌辱。受了重伤的一位侦探不久也就死了。就这样，那渔师便犯了

几重的大罪：盗尸，尸奸，拒捕，杀人。后来是受了绞刑。——

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渔师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还没有结束。

故事的全体，我是采用着欧洲旧式的小说体裁，全由一个日本学生口中谈出的。煞尾是我听了那番故事之后，我把那斋藤寅吉画有裸体女像的——那自然是他在监狱中思慕着滨田爱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肤割了下来，盛在酒精瓶子里面，在课毕之后携回了寓所。自己觉得很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间有人在我的耳边喊叫：

——“喂！还我的爱人来！”

我睁眼一看，才看见一架骷髅立在我的房门口。我不禁大吃一惊。但是这一惊不消说只是一个梦。

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创作的梗概，题名就叫《骷髅》。我自己苦心惨淡地推敲了又推敲把它写在了纸上，草稿也更易过两三次。我自己不用说是很得意的。那陈老听说我做了这样的一篇小说，叫我把原稿念给他听，他也很称赞，说落尾的一个梦收得最好。我在当时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创作投寄到东方杂志社去过，不消说是没有被采用。隔不了好久，那《骷髅》仍然寄还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来，是我把它火葬了。

陈老的眼睛受了手术之后，经过很良好，所担心的并发病也没有。但是，失了的明却是恢复不过来。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来诊察一次，要拿着手指在他眼前摇动，问他看见甚么没有。要把他的头掉向有窗户的一面，问有没有甚么白色的影

子可以看见。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双眼睛总是甚么也没有看见。我在下课时去看他，或者在病室里留宿的时候，也时常看见他爱自行伸一个指头在眼睛前面摇动，或者把头掉向有窗子的一边去望望，但总是摇头。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丝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见，那吗网膜上的视神经还没有退化，第一次的手术没有完全，还可再行手术，使效果增强些。但是终竟连丝毫的影响也没有，结论是末梢神经怕已经退化了。那盲老一听见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再受手术的勇气也就消灭了。在病院里住了四个礼拜，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们的共同寓所。在十一月中旬，他们整顿起行装回国去了。我总忘记不了陈老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我能够睁开眼睛看见你们一眼，我是多么地高兴呀！”

这句话他说过不仅一次。在未行手术以前说过，在手术无效以后也说过。我把他们送到门司上船，在临别时他也把这话来反复了一两遍。

三

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间大房子是先下了三个月的定钱的。陈老父子在十一月中旬走了之后，我们还在那儿住到了年底。在当年的除夕我们才搬到了附近临海的一家小房子里去。搬家是在夜里，因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两人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那时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过好几首绝诗。有几首我还记得，把它们写在这儿：

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
我自昂头向天笑，天星笑我步难成。

除夕都门去国年，五年来事等轻烟。
壶中未有神仙药，赢得妻儿作挂牵。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

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①

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象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在无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过且过，算好倒还没有落到自暴自弃的程度。这没有闹到自暴自弃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没有钱的关系。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风尘潦倒，便要写出满纸的醇酒美人。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为之洒雪无限同情的眼泪。其实那所谓醇酒美人是要以钱为前提的。

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在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时候产生的。

做那篇小说时是在二三月间，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那在结构上和火葬了的《骷髅》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那全部的情节只是我幻想出来的，那几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在纵贯朝鲜的铁路上虽是跑过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刚山并不曾去过。我的关于金刚山的知识，只是看过一些照片和日本

① 以上四首诗，个别字词和诗句顺序，与初版本略有不同，后作者以《十里松原四首》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现编入本编第二卷。

文士大町桂月① 的《金刚山游记》。所以那小说里面所写的背境，完全是出于想象。

那篇小说写成了之后，因为《骷髅》尝受过一次绝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险了。但我想发表它的心事也并没有抛弃。那时候我的大哥还住在北京，在司法部里做事，我便把小说寄给了他，请他改削，万一有可以发表的地方，便请他在报上替我发表。大哥写信来责备了我，说我正在求学，不应该沾染文墨上的事情。他叫我好好地学些本领，将来为国效力。我的小说，他一字不易地又给我寄回来了。问我那首《怨日行》是从那一位朝鲜人的诗集里抄下来的？

不久之间五四运动的风潮便澎湃了起来。那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

在那年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几个人的自由的捐献，买了一架油印机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但是这个团体结成以后，同学们都不会做文

① 大町桂月(1869—1925)，日本文学家。著有《黄菊和白菊》、《日本文明史》等。

章，只让我和陈君哲两个人担任。君哲只做了一篇东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做了油印机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发过好几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写蜡纸，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

因为在做这种义务的通信社工作，国内的报纸便至少不能不订阅一份。我们订的是上海《时事新报》① 。那个报纸在五四运动以后很有革新气象，文艺附刊《学灯》特别风行一时。订报是从九月起，第一次寄来的报纸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么人往欧洲。诗里面有“我们叫得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当稍有出入。）② 我看了不觉暗暗地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③ ，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

---

①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其文艺副刊《学灯》，一九一八年三月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终刊。张东荪、李石岑等主编，宗白华曾任编辑。

② 康白情（1896—1958），字洪章，四川安岳人。诗人。著有《草儿》。此处提到的诗，题为《送慕韩往巴黎》，载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学灯》。文中所引的两句诗，原为：“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

③ 这几首诗的写作时间，作者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见本编第一卷一三〇页注①和一三三页注①。

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

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①。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太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②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太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③，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④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认

---

① 梅里克(E.F.Mörike,1809—1875)，又译默里克，德国作家。《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又译为《莫扎特在去布拉格途中》，是其主要作品之一。

②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流行于西欧的一种哲学观点。认为神就是自然，神存在于世界一切事物中，否认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布鲁诺、荷兰的斯宾诺莎等。

③ 伽毕尔(Kabir,1440—1518)，又译卡比尔，印度神学家和诗人，虔诚派运动(即崇奉一神)的早期活动家。著有《五千颂》、《罗摩尼》等。

④ 又译为《优婆尼沙昙》，即《奥义书》，是印度古文献《吠陀》之最后一部分，又称"吠檀多"(Vedānta)。书中保存了古代印度一些哲学理论，提出了"梵"(宇宙本原、宇宙精神)"我"(个人的精神、灵魂)同一等问题。

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①，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象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②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③。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

① 斯宾诺莎(B.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原为犹太人。他否定超自然的上帝存在，宣扬泛神论。其《论神学与政治》又译为《神学政治学论》；《理智之世界改造》又译为《知性改进论》。

② 有岛武郎(1878—1923)，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一个女人》、《该隐的末裔》等。

③ 罗丹(A.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作品有《沉思者》、《青铜时代》等。　米勒(J.F.Millet,1814—1875)，法国画家。作品有《拾穗》、《晚祷》等。　惠特曼(W.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典型的日子》等。

《学灯》的宗白华①。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我之得以认识田寿昌②是由白华的介绍。田寿昌和宗白华都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③的会员，是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寿昌也在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读书。他那时已在介绍俄罗斯文学，又在议论着诗人和劳动问题。据我所知，他是受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同时不消说也就间接地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国的劳工运动上和文化运动上有一个划时期的促进。日本

① 宗白华(1897—1986)，名之櫆，江苏常熟人。美学家。著有《流云小诗》、《美学散步》等。

② 即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戏剧家、诗人。著有《咖啡店之一夜》、《名优之死》、《丽人行》等。

③ 一九一九年七月由王光祈、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在北京创立，后因思想分歧，到一九二五年底停止活动。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

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①，继续发刊了。

寿昌由白华的介绍和我开始通信，后来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春假竟由东京到福冈来访问过我。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当他来了的第三天，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冈附近的名胜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四天也陪着他游玩了福冈市中的名胜，把产后仅仅五六天、应该保持绝对安静的安那连带着两个孩子丢在了家里。后来弄得奶子断了，生出了种种的苦痛。

孩子因为奶断了便不能不用人工哺养。哺养又不得法，因此便发生了食饵中毒症，只得抱进大学病院里就医。先生说，孩子恐怕是不能保的，只有用最后的手段饥饿疗法来调治，要等到中毒现象的热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进病院的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守着一个发高热、因饥饿与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婴儿。时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园中有寂寞的鸡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阳。白天守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

① 《改造》，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于东京，一九五五年二月出至三十六卷二期停刊，山本三生编。 《解放》，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于东京，一九二九年停刊。

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孩子在第二天清早热度退了，算好了起来。那首副产物的夜歌，后来因为寿昌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写寄了给他。

寿昌来访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三叶集》，所搜集的是白华、寿昌和我的通信。寿昌对我有很大的失望。他回东京时，路过京都，和郑伯奇①见面，伯奇问他见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说了一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这是后来伯奇对我说的，但我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②，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侮蔑。后来在《三叶集》出版之后，他写信给我，也说他的舅父易梅园③先生说我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

---

① 郑伯奇(1895—1979)，原名隆谨，陕西长安(今西安)人。作家。著有《轨道》、《墙头小说集》等。

② 语见刘禹锡《陋室铭》。

③ 易梅园(1881—1921)，名象，字梅臣，湖南长沙人。同盟会会员。曾参加南社，一九一六年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一九二一年被军阀赵恒惕杀害。

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一时的欢迎，寿昌便又食指欲动起来，又曾约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这个提议是由我拒绝了。

在《学灯》上投寄诗稿的时候，我也投寄过一两篇小说。有一篇题叫《鼠灾》，写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箧里被耗子咬坏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场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写，写得颇暗淡，比较我那《牧羊哀话》和火葬了的《骷髅》，要算是进了一境的创作。可惜我自己没有存稿，别的人也没替我保存着的。①

那篇《牧羊哀话》，我起初是在《学灯》附刊上看见了有一种《新中国》杂志在北京刊行，看那广告上也登载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翻译，我也就大着胆子投寄了去。这回也搭响了。那杂志的编辑先生登时回了一封信，称赞我的小说"笔酣墨饱，情节动人，决于本志第七期登载"。但自从接到那封信以后便没有得到消息，后来隔了许久，由我的诘问才得到了两本杂志的报酬。那《新中国》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编辑先生究竟是谁，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②

---

① 作者原注：假使有人有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后及一九二〇年四月以前的《学灯》，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找出。(据查，此文载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学灯》。见本编第九卷。——注释者)

② 《新中国》，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五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〇年八月停刊，李骞等编。一九二〇年二卷一号《本志启事》声明，除特约稿外，概不致酬。《牧羊哀话》载该刊一卷七号。

四

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学校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着怎么，因为那儿的功课一半以上是语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学。进了大学，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闹的是“姆士苦鲁士”(musculus 筋肉)，“奈尔乌士”(nervus 神经)，“欺尔苦拉穹”(circulation 循环)，“勒斯披拉穹”(respiration 呼吸)，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乌士、鲁士、拉穹、沙穹的死记些外国名辞。一个脑筋成为一个世界漫游者的皮箧，纵横狼藉地贴各满了各个口岸、各种文字的旅馆招贴。

在我自己还有一种身体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只耳朵得了中耳加达儿，耳鸣，重听。原因是由于高热的关系使鼓膜凹陷了，在传播声音的机构上生了障碍。在高等学校时，因为那儿班上的人数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个人，教室不大，这种障碍倒还没有感觉到怎样的为难。进了大学，特别是医科，每班的人数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就这样，在身心两方都感受着痛苦。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但反对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的。她认定医学可以作为将来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身受的痛苦，她又并没有身受。象那种眼睛所看不见的痛苦，你就诉说出来，别人也只把你当成神经过敏。因为有了她的反对，于是乎我的迁怒便是恨她，甚且唾弃一切的科学。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便是在这个时候。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在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象出自我自己的心境。我翻译它，也就好象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场独白的译文在那年《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过。第二年春间经宗白华的劝诱，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开首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译了出来，也在《学灯》上发表过。

就在宗白华往德国留学的时候，我自己却是想跑回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特别是《匪徒颂》，那是对日本新闻界的愤慨，日本记者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那首颂歌。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

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我那时候想回国去，也并没有多么大的野心。就象太戈尔的《园丁集》里那个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园丁一样，我是只想跑回中国去，在那儿的中、小学校里当一名国文教员。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日，我索性放下了决心，别离了安那和两个孩子，跑到门司，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在门司养病（就是《残春》中的贺君），我去看他时，他的病也快要脱体了，打算在七月底退院回国，约我和他同道。我也想到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地方也不熟悉，一九一五年的“五七”虽然回去过一次，但只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甚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乐得有伴，我就答应了他，又由门司折回福冈。折回福冈时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张东荪① 的来信。

张东荪是当时的《时事新报》的主笔。信里说他们有几位同志，组织了一个共学社②，打算介绍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曾零碎地翻译过一些，他便劝诱我从事全译。条件在《时事新报》上有广告登着，售稿或版税都听随自便。

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那不用说也喜出望外。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著手《浮士德》的全译，把回

① 张东荪（1885—1973），字圣心，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哲学家。著有《道德哲学》等。

② 张东荪、胡适、张歆海等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

国的计划暂时中止了。

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象那《欧北和酒寮》、《魔女之厨》、《瓦普儿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搀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竽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在这些地方译得最吃力。假如要用散文译出时，会成为全无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韵文译出，也不外是下乘的游戏文字而已。因此，我觉得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

译《浮士德》的第一部费了四个礼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笔在日本的“改良半纸”上写出的。由于涂抹得厉害，我又工整地誊写过一遍。于是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都为此消费了。第二部更长，更难译。难译的原故就因为那儿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而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与现代的不同），使我最难忍耐。因此我便改变了初志，只译出第一部来印行，第二部不译。这个办法并不是由我创始，《浮士德》的英译有三十多种，仅译第一部的在二十种以上，把第二部全译了的不上十种。演《浮士德》的人，也多只演第一部。因此我便写信给共学社，提出仅译第一部的建议。不知道是那封信邮失了，还是共学社的人看见我不想译完，便以为没有出版的价值，信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不久学校也开课了，我又只好把译稿收拾起

来，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等有机会时再来译第二部。回国的念头同时也寄放着了。

不幸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灾”。学校开课之后大约有四五个礼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礼拜日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一下，同时也想利用礼拜和每日夜间的余暇来试作第二部的翻译，好使工作告一个结束。待把壁橱打开，放在壁橱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见了。那壁橱原来有一个窟窿和旁边的一个橱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译稿拉去做窠去了。纸是改良半纸，异常柔软，但那高客先生们还嫌不如意，把纸头咬得来真是和粉一样碎。这个灾难使我失望不小，因为那是我费了两个月的劳力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清早四五点钟便起床，连吃饭的时间都疼惜着，却才成了这样一个下落。被咬坏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场。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难译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还保存着，都还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清写时，已经先先后后消费到厕所里去了。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翻译了《浮士德》对我却还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

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热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仅仅发表了一幕，就是后来收在《女神》里面的那一幕，其余的通成了废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① 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②。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③，凯惹尔的《加勒市民》④，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做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

---

① 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英等国的反现实主义文艺流派。是象征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与消极主义在新条件下的混合与发展，为现代主义之先驱。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盖欧尔格、英国的斯蒂文生等。

② 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奥国、俄国和北欧等地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该派强调表现自我感受，否定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反对艺术的目的性。常以过分夸张的形体和色彩发泄内心的苦闷。

③ 妥勒尔（E. Toller，1893—1939），通译托勒尔，德国剧作家、诗人。著有《群众和人》、《熄火》等。所著《转变》是一部表现主义的剧作。

④ 凯惹尔（G. Kaiser，1878—1945），又译凯泽，德国剧作家。著有《册瑚》、《煤气厂》等。所著《加勒市民》是一部表现主义的剧作。

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① 博士，他在《语丝》上嘲骂过我，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② 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象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限马公国的宰相③ 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是可以称

---

①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改名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曾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半农杂文》、《扬鞭集》等。

② 《语丝》，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查封，十二月在上海复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停刊。孙伏园、周作人、李小峰、鲁迅、柔石等先后任编辑。刘半农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语丝》第六十三期上发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一文，其中写道：“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诗人，可比之德国的Goethe而无愧。”

③ 限马（Weimar）公国，通译魏玛公国，是德国封建割据时代的一个小公国。一七七五年歌德受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之邀，充任这个小公国的枢密顾问和首相。

为德意志的贾宝玉。

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但我不再有那时那样的狂妄，要叫着"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了。我知道这样的一点点身体上的苦痛，比较起在铁锁之下呻吟着的朋友们、在火线上再接再厉的朋友们所受的苦痛，算得甚么！但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象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样，就好象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我从前做过的一些古事剧或小说，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层也就是西洋贾宝玉所给与我的恶影响了。我们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迈斯达》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渥尔夫刚他自己。①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

① 《威廉迈斯达》是歌德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威廉有歌德自己的影子。歌德全名是约翰·沃尔夫刚·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国——美的中国。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太薄弱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仅仅是一副空架子。这篇诗剧的初稿我寄给郑伯奇看过，又由伯奇转寄了给达夫。达夫用德文做过一首诗给我，我把来寄到《民铎》①杂志去一同发表过。可惜我手里没有《民铎》，达夫的诗我也不能记忆了②。我仅记得是两节诗，每节四行。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

---

① 综合性刊物。一九一六年六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由当时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的"学术研究会"主办，初期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钺等人。一九二〇年迁上海出版，原为季刊，自二卷起改为月刊，十卷起改为双月刊，一九三一年一月停刊。

② 郁达夫的诗题为《Das Lied eines Zaugenichts》，郭沫若将其译为《百无聊奈者之歌》，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民铎》第二卷第五号。译诗为：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未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

五

《南国月刊》① 二卷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寿昌为我保存了一封旧信：

寿昌：

你近来做了些甚么称心事？还好么？你我已久不写信了，你做的«Violin and Rose»②，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③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你其余的一些计划，已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优孟化了的，不久在《学艺》杂志上当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伯奇那儿，将来拟寄往李石岑④君在《民铎》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

---

① 南国社刊物之一，一九二九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〇年七月停刊，田汉主编。

② 即剧本《环珴璘与蔷薇》，连载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和第六期。

③ 综合性月刊。少年中国学会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四年五月停刊，王光祈、李大钊等先后任编辑。

④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曾任《民铎》杂志编辑、《时事新报·学灯》主编。

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日

这“十八日”是一九二一年正月十八日，那时正是我的烦闷达到绝顶的时候。我说“二月间拟往京都”，便是想转学，进那儿的文科大学。这个计画没有实现，是遭了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从同着那位盲目的陈老来过一次福冈之后，他和我是常常通信的。当我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正猛烈地为作诗欲所袭迫的时候，我的诗，是用复写纸誊录出来，一份寄给宗白华，一份便寄给仿吾。仿吾最喜欢我那首“读Carlyle：《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的《雪朝》①，但他不高

---

① 《雪朝》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时事新报·学灯》，题为《读Thomas Carlyle：〈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意为《读托马斯·卡莱尔〈作为诗人的英雄〉的时候》。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旧衣新裁》、《弗雷德里克大帝史》等。《作为诗人的英雄》，是他的一篇论文。

兴那第二节，说是“在两个宏涛大浪之中那来那样的蚊子般的音调？”但那首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那是在落着雪又刮着大风的一个早晨，风声和博多湾的海涛，十里松原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卷来，把银白的雪团吹得弥天乱舞。但在一阵与一阵之间却因为对照的关系，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那间隔期中便连檐霤的滴落都可以听见。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吕，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我觉得要那样才能形成节奏，所以我没有采纳仿吾的意见。仿吾尤其喜欢“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头所做的处女作《流浪人的新年》，开首的几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开始作新诗，据我所知，是从一九二〇年起头。当宗白华还未去德国时，他有两首诗我替他寄到《学灯》去发表过。一首是《澎湃的黄海》，他宣言着我们达到了我们的“Sturm und Drang”（狂飙突贯）的时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诗寄给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创造》① 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仿吾初期的诗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样是在烦闷着的。他为甚么要学造兵科，我不曾听他自己说出过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

① 文艺性刊物，一九二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四年二月停刊，共出二卷六期。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任编辑。

到的，那也不外是要富国强兵，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后来为甚么又终于把造兵的本职抛弃了，我也不曾听他自己说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学趣味的抬头纵不是全部的原因，总要算是重要的一个。

一九二〇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托尔斯泰。达夫写信来对我说，他的研究最彻底，他打算把托尔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来读它一遍。但这项研究在后来似乎中断了，后来我也不曾看见他提到托尔斯泰。他和达夫同在东大。张资平那时候也在东大的地质科。我说的能够相信的几位朋友，便是指的他们。田寿昌和他们的交际是出于我的介绍。那个“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的计划，便是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了。据仿吾先后写来的信，说他们在东京在达夫的寄宿处开过两三次会，第二次寿昌出了席，讨论的结果是寿昌担任在国内找出版处，并邀约些国内的朋友参加。第三次开会时寿昌没有出席，出版处的消息也没有下文。

“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说的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① 诸人。伯奇那时还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际，又是由于寿昌介绍的。自寿昌来访之后，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听了仿吾的劝告，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但我的烦

---

① 穆木天(1900—1971)，原名敬熙，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著有《旅心》、《流亡者之歌》，译有王尔德、巴尔扎克、普希金等人的作品多种。　张凤举(1895—？)，名黄，又字定璜，江西南昌人。曾任《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编辑。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作家、翻译家。译有《新生》。

闷并没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佛罗贝尔的《波娃丽夫人》①，左拉② 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③、《水上》，哈姆森④ 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⑤；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⑥ 的戏剧，高斯华绥⑦ 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当在这样烦闷而动摇着的时候，仿吾也和我一样在烦闷而动摇。他是学造兵科的人而要彻底地研究托尔斯泰，单是这一点已经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

① 佛罗贝尔(G. Flaubert, 1821—1880)，通译福楼拜，法国作家。所著《波娃丽夫人》，通译《包法利夫人》。

② 左拉(E. Zola, 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卢贡—马尔卡家族》等。

③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法国作家。著有《一生》等。所著《波南密》，通译《漂亮朋友》。

④ 哈姆森(K. Hamsun, 1859—1952)，又译汉姆生，挪威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大地的成长》等。

⑤ 波奕尔(J. Bojer, 1872—1959)，又译博耶尔，挪威小说家。所著《大饥》，通译《大饥馑》。

⑥ 霍普特曼(G. Hauptmann, 1862—1946)，又译豪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自然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日出之前》、《织工》等。

⑦ 高斯华绥(J. Galsworthy, 1867—1933)，通译高尔斯华绥，英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福赛特家史》(三部曲)、《银盒》等。

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他决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户乘船动身，船在四月一号可以抵门司。我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四月一号到门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国。

我是在晚上动身的。那时候我家里还稍稍出了一点悲剧：便是我们在海上住了两年多的房子，在我决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号的那一天，屋主来领了房金，同时说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们在一礼拜之内搬出。这到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口实，实际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愿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放着的，虽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为房间。我们起初租赁下来的时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们赶走之后，所新招的一家人听说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经决定了走，而我留在后边的家族却要被人驱逐，这使我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在这儿我是应该感谢我的安那的。她平常虽是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但她看到我就象成为了狂人的一样，呆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她也就决心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强，只要一起了决心，便没有什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我，执行了既定的计划。

由福冈到门司只有两个钟头的火车。我动身时是在夜里，因为在白天时两个孩子看见我走，是会哭的。安那在夜间煮了些红豆饭，烧了一匹红鲷鱼来替我饯行。这是日本民间的风习，表示喜庆或祝贺的时候便要用这些东西。红豆饭不

消说是取其红色。鲷鱼在上海市上称为铜盆鱼，有红有黑，红色的居多。

走的时候天在下雨。安那说要送我到箱崎车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两个孩子在夜间醒了来没人照顾。

丢着一妻二子在后边，虽说是回国、实际是等于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和那晚的夜雨一样，是淋漓地洒雪过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后，剩下的家里人在一礼拜之内不能不另寻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说："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国之后暂时还有官费可领，我们的事情你可不用担心。只希望你回国去努力，有了职业时，我们便回来跟着你。"

就这样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个月，才第一次要作长久的分离。我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我心中的感慨就好象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门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也晴起来了。海湾中的海水呈着浓蓝的颜色，有好些白鸥在海上翻飞。在晴明的自然中，与久别的旧友重逢，夜来的忧郁已被清冷的海风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舱，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另外替我空下了一个铺位。同时他还替他的友人护送着家眷，那是搭着二等舱的。

在门司时天色异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便遇到风雨。

我是爱晕船的人，睡在那黑蜮蜮的三等舱中一动也不敢动。仿吾很强，他时而要跑到二等舱去照拂友人的孩子们，时而又跑到三等舱来和我谈话。仿吾随身带了不少的德文书，雷克朗牟(Reclam)版的屠格涅夫① 的小说。他的托尔斯泰的研究又已经转换成屠格涅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机会把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读了一遍。

船到上海是四月三号，天色又晴起来了，但是风浪还没有止息。我渴想着看海中日出的光景，忍着眩晕，跑上甲板，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验了一下，但几乎把自己的肝脏都吐了出来。我那《归国吟》中的《海舟中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写的这时候的情景。

船进了黄浦江口，两岸的风光的确是迷人的。时节是春天，又是风雨之后晴朗的清晨，黄浦江中的淡黄色的水，象海鸥一样的游船，一望无际的大陆，漾着青翠的柳波，真是一幅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几年来所渴望着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毕竟是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慰安的处所。靠在船围上呈着一种恍惚的状态，很想跳进那爱人的怀里——黄浦江的江心里去。但这个幻觉不一刻便要象满盛着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个岩石上了。

船愈朝前进，水愈见混浊，天空愈见昏朦起来。杨树浦一带的工厂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

① 雷克朗牟：德国著名出版社，一八二八年建立，曾出版袖珍本万有丛书。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1818—1883)，俄国作家。著有《猎人笔记》、《罗亭》等。

生，……中世纪的风景画，一转瞬间便改变成为未来派①。假使那些工厂是中国人在主宰，那面未来派的画幅是中国人画出来的，再不然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国的人，或许也未尝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风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动着的和乞丐相差不远的苦力兄弟们是同属于黄帝子孙，神明之遗裔！那时候我还没有阶级意识，我只有民族意识。看见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除非是那些异族的走狗，谁也不能够再闭着眼睛做梦。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

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象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辨过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走肉行尸"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象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

我跟着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马车上先到了一家公馆。那公馆是谁的，是在甚么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我也没有问过。在那公馆里面吃了一会茶，不记得又是取的怎样的

① 现代资产阶级文艺流派之一。二十世纪初由意大利马利奈蒂(Marinetti)等人首倡。该派主张未来的艺术须具有"现代感觉"，表现机械文明的速度、暴力、激烈的运动、音响和四度空间，表现艺术家创作时的复杂、混乱的思想状态。

路径，同仿吾两人到了马霍路① 的泰东书局的编辑所。到了编辑所，昏昏蒙蒙地会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那时的详情我已不能记忆了，只是记得自己感觉着没有着落。我们从一些人的谈话中，知道了改组编辑部的事原来才是一场空话。担任法学主任的李凤亭已经担任了安庆法政学校的教职，担任哲学主任的李石岑还在编辑着《学灯》和《民铎》，听说不久有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消息。仿吾所当担任的文学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② 担任着，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兴地欢迎着我们，说是他得了两个很好的助手。这样一来，在我倒是出于自动，没有甚么，在仿吾要算是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

到了编辑所已经四五天，仿吾的任务依然没有决定，我自己也没有找到出路。仿吾是领了归国费的，他那时还有余钱，便在四月八号约我去游西湖。

游西湖时的心境和经过，我在《西湖纪游》的几首诗中保留了下来。仿吾的一首长诗《由长沙寄沫若》也叙述到了这件事。

去时我们乘的是晚车。到南站时，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长庚星出在西边，由车头冒出的蒸气在那红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时候在思念着我离别了八年的母亲，同时又在担心着留在日本的妻儿。火车是由南而北地奔跑，我的心思是在东西的纬线上梭织。我们坐的是二等车，车上有

① 今黄陂北路。

② 指王靖，又名王梅魂，福建闽侯人。一九二〇年八月继张静庐编辑《新的小说》。编著有《英国文学史》、《模范小说集》等。

几个中国人，好象是上海市的马路政客，带着两名妓女，在一只角上大事吃喝。火车上没有特设的食堂，就在客车中便可以叫番菜，喝酒。那几位先生一面和妓女开着玩笑，一面牛饮着啤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烟，吸得一个车厢都是烟雾沉沉的。把酒菜吃喝了，又打扑克，又闹又笑，两位妓女特别闹得厉害。车上的有好几个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阅，在他们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没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几位日本人在高谈阔论，时而带着极轻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群吃喝赌博着的中国人取笑。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制服，他们大约把我们当成日本人去了，有的远远用眼睛来向我们示意。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起来。我愤恨的自然是我们的贵同胞太不争气，同时是连想到中国的政局和国际上的形势：车中的情景便是这时局的一幅缩写图。凡是自己不能够抱一个妓女在怀里的中国人，想来是谁都会痛哭流涕的罢。

到杭州时是半夜，我们投宿在清泰旅馆里。——这座旅馆我不妨在这儿给它登一个广告，但我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了。进了旅馆使我第一件感着惊异的是杭州的清静，连那穿长衫、戴京帽的茶房都很斯文，就好象中、小学教员一样。

第二天清早起来，吃了早饭之后，便去游湖。在杭州没有熟人，只买了一份地图来做向导，决定沿着湖的西南岸走去，先游雷峰塔。这个路向便是一个顶外行的路向。在图上看来不很长的一段湖岸，走起来却是费了半天工夫，而那一段湖岸在西湖是最没趣味的一段。我们的没有经验还闹了一个小小的

笑话。我们不知道在西湖里面只要有钱随处都可以吃喝，我们照着日本的“远足”式的办法，备办了一些干粮。我们所备办的干粮又有些特别。因为“素心馒头”的名目别致，又听茶房说有甚么“素鸡”、“素火腿”，以为那冠在头上的“素”字是清洁的意思，便拿了两块大洋叫茶房替我们置办。于是乎一个人一块钱的干粮便是荷叶两大包。挟着两个大荷叶包子走了半天的路，真真是再别致也没有的西湖游，但有火腿和鸡肉在手中可以犒劳，倒也不觉得有怎样的厌烦。走到雷峰塔，正是所谓“日午当空塔影圆”① 的时候，两个人都感觉着口渴，而同时肚子也有点饿了。于是在塔下草地上坐下，把荷叶包子解开，把那“三素”来赏心。谁知所谓 “素心馒头”才是甚么心子也没有的馒头，所谓“素鸡”、“素火腿” 才是一些豆腐皮。“三素”嚼在口里，倒也没有怎样的难吃，只是愈嚼愈见口干，嚼不上半个馒头，怎么也难吞下喉去。只得又把荷叶来包好了。

在雷峰塔下停着一只湖船，船中的矮桌上放着一个茶壶，那诱引我们把沿湖走路的计划抛弃了。我们坐上了船，把船家的那壶冷茶倾向肚子里，比吃了两大杯冰淇淋苏打水的还要快意。船家把我们摇到北岸，在湖滨公园近处的一家小馆里吃了中饭，我们把我们的“三素”送给船家去了。

在西湖北岸游了一回，参拜了一些英雄英雌的坟墓，没有感受着多大兴趣便折回了旅馆去。

第三天逛了一回孤山，遇着一番微雨。雨中的西湖给人

---

① 语见《西厢记》第一折。

一种寂静的感觉。回头又到湖滨公园去过，遇着了几位画画的女子，想来怕是杭州女子师范的学生。

"un dane!"我这样用日本话对仿吾说。

"un da!"仿吾也回应了我一声。

我在这儿对不住我们那天看见过的几位女同胞，要把这个隐语解说一下。这是日本学生间所惯用的隐语，un字是由德文的unschoen省略下来的，意思便是不美。反过来遇着好看的女人时便说一个 schoen 字。这德文的schoen字正确的发音当如中国的"熏"，日本人没有这个音，他们所发出的声音都象中国的"香"。

杭州一下过雨，街上的道路就和黄海一样。两位初到西湖的外国回来的学生，在西湖里费了两天工夫，到第四天上来便遇着那黄海样的杭州，把所有的迷恋都打破了。于是又匆匆忙忙地折回上海。就这样，我们也说是去游过西湖。我也做了些游西湖的诗，但西湖的好处实在连边际也没有摸到。

六

仿吾在东京接到的信上是说聘请他当文学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编辑所已经半个月，没有给他聘书，也没有说上月薪的话。书店老板赵南公——其实赵南公并不是泰东书局的老板，那书局是政学系①的人办的，赵南公只是经理，后来政学系的几个分子成了“大人物”，没有再管书局的事，那书局于是乎便成为了宋朝的江山②——看见了我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终没有接过他的聘书，始终没有正式地受过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两三个礼拜，看见那书局情形没有容纳下我们两人的地位，他便决心回长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给我办。仿吾说，长沙有一座兵工厂，厂长是东大的同学，他到那儿是有事可做的。

仿吾去后，我住在德福里中，更好象飘流到孤岛上的鲁滨孙了。那位姓王的大编辑听说是天津的什么学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装，手中拿的是手杖，脚上穿的是响鞋。他的脚步好象羚羊一样，走得很快，与其说在走宁可说在跳。他每天起床

---

①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不愿参加，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称政学系。主要人物有张耀曾、谷钟秀等。

② 宋代帝王姓赵，泰东图书局老板也姓赵，故戏云。

很迟，一起床便在楼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饭，差不多没有一次不听他吵菜不好。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上课时总爱涂一脸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双响鞋由楼上响出大门，出了大门还可以听见好一段响声。当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大门外老远便听见他的响鞋。大门如是关着，他总要用手杖来在门环上打得满响。一进门就叫"茶房啊，打水！"他那枝手杖，和楼梯的栏杆是很有仇恨的，无论是上楼或下楼，那棍子总要在栏杆头上出气。先生的专长是英文，一部归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国人原名为 Laficadio Hearn，日本名为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①的《文学概论》，便是他的宝典。他一高兴时便捧着朗诵。诵倦了又进房间去按按一架 babyorgan(团团风琴)。再不然便拉长脚在床上"宰予"②起来。编辑所里的人对于这位先生都有点不大高兴，特别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几次水、以厨房而兼茶房的司务尤其恨他，当面叫他是王先生，背面便叫他是"亡八蛋"。为要更具体地表现他的愤恨时，他爱把右拳来加在左膊上歪着嘴做出一种哭声。据说那王先生初来上海时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医生打"六零六"把手膊打肿了，睡了一个礼拜。

我和王先生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的，因此我很感觉着不

---

① 小泉八云(1850—1904)，原名拉夫卡迪奥·海恩，日本文艺评论家、小说家，生于希腊，一八九〇年赴日，与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入日本籍。著有《陌生日本的一瞥》、《异国情绪和回顾》等。

②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学生。《论语·公冶长》中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说，此处借为昼寝之意。

方便。我们在日本读过书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便是在嘈杂的地方不能用功。王先生的英文朗诵和团团风琴的独奏，尤其是使我痛头的资料。因为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干犯他的自由。每当他在编辑所里的时候，我便用毛巾把头包着，把两只耳朵遮盖起来。别人问我是否头痛，我也就答应是头痛。

在编辑所里有一位四川人邓均吾①，这要算是我在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他很年青，在当时怕只有二十三四岁，他的态度很冷静，他没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但一眼看来便可知道他不是呆子，也决不是胸有城府的人。他本是由吴芳吉②的推荐，出来任上海某女塾的英文教员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暂时由王先生替他代理。但等他到了上海，代庖的先生才霸占了别人的位置不肯退还。他乐得也就象我一样，呆在编辑所里当了几个月的食客。这件事也是使我不高兴那位王先生的重要原因。

王先生当时在编辑着一种杂志，叫着《新的小说》③，是白话文流行时一种应时的刊物。在初似乎也还销了一些，但到后来西洋镜拆穿了，遭受了一般读者的唾弃。书局方面听说我们要出纯文艺刊物，便有意思要我来主编，我已经替它改了

---

① 邓均吾(1898—1969)，四川古蔺人。著有《白鸥》等。

②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号白屋先生，四川江津人。著有《白屋吴生诗稿》。

③ 文艺性月刊，一九二〇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一年三卷一期起改名《新晓》，同年六月停刊。

一个名字叫着《新晓》。但是，王先生却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让他去主持，自己乐得做自己的事。

我开始编纂了我的诗集《女神》，其次是改译了那本《茵梦湖》① 。《茵梦湖》的共译者钱君胥② 是我的同学，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说的体裁，失掉了原作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原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那时候上海滩上正是旧书新式标点流行的时候，亚东标点的《红楼梦》、《水浒》等书很风行一时，泰东看了眼红也想照办。我便劝他们标点《元曲》。这个提议立地也就见诸实行起来，但把那位王先生难着了，他把那词曲中的文句标点不断。我自己为填塞提议的责任起见，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窜了一部《西厢》。这项工作在当时已经很不满意，现在想起来尤其无聊，并且可惜了那部缺了一册的明刊本，那和金圣叹③ 批

① 德国作家施托姆(T. W. Storm，1817—1888)著。

② 钱君胥，名潮，一八九六年生，浙江杭州人。医学博士。一九二二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回国后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教授。

③ 金圣叹(1608—1661)，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改名人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曾批改《水浒》、《西厢》等，著有《沉吟楼诗选》。

本的内容有些不同，却被我把它涂毁了。

在这儿我应该追溯到我们和文学研究会发生纠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时，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①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也就是文学研究会由酝酿期向实行期突进的时候。

我的西湖纪游的那几首诗，是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国，振铎也就是其中的一人。振铎的名字我是在《时事新报》上时时见到的，共学社的出版预告里面有他的名字，《学灯》里也常见他的名字。在我们由西湖回沪之后的不几天，接到振铎写来的一封信，约我在一天礼拜日在半淞园②会面。

仿吾在这时候才告诉了我一件事情。

原来振铎和他的朋友们要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有过一封信寄到东京田寿昌处，约他和我加入。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那封信仿吾是在寿昌处看见的，他那时说过寿昌的不是，那样的消息都没通知我一声。

半淞园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不知道，是赵南公的儿子送我到西门，由西门改换中国电车坐到了那儿的园

①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取火者的逮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

② 原在上海市南，园已废，现附近有半淞园路。

门口。在那儿遇着了振铎，沈雁冰①，和编辑着《时事新报》的《青光》栏的柯一岑②。一岑和李石岑到马霍路来看过我，他是认得我的，我和振铎、雁冰算是初次见面。

见了面彼此都很殷勤，特别是振铎，他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我记得他穿的是一件旧了的鸡血红的华丝葛的马褂，下面是爱国布的长衫。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腊人的风味，但那时好象没有洗脸的一样，带着一层暗暮的色彩。他伸出来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学生的手一样，有很多的墨迹。那时候我觉得他很真率，当得德国人说的 unschuldig，日本人说的"无邪气"。

雁冰所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马褂，竹布长衫，那时似乎在守制。他的身材矮小，面孔也纤细而苍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背是微微弓着的，头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谈话的时候，总爱把眼睛白泛起来，把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来看你。声音也带着些尖锐的调子，爱露出牙齿咬字。因此我总觉得他好象一只耗子。——我在这儿要特别加上一番注脚，我这只是写的实感，并没有包含骂人的意思在里面。

柯一岑的印象没有甚么特别可说的，我只记得他的面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翘，有点朝鲜人的风味，只是没有朝鲜人

---

① 沈雁冰(1896—1981)，原名德鸿，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主编《小说月报》。有《茅盾全集》。

② 柯一岑，江西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一九二一年参与沈雁冰等在上海组织的民众戏剧社。

所共有的那种可怜的茫漠感。他穿的是青哔叽的学生装，我听雁冰称之为“劳动服”。

四个人将近玩了一天，中饭是在园子里面用的，是振铎付的钱。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临池的亭子上，因为是礼拜，园子里还有好些人在用中餐。饭后我同振铎坐在那临池的栏杆上，望着池里的败荷梗。

——“我们不久要在《时事新报》上出一种文学周刊①，”振铎对我说，“希望你能够合作。”

——“我已经看见过你们登的广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尽力地帮助。”

——“你索性加入我们的组织不好吗？”

——“没有甚么不好的，只是我听说你们最初发起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写过信给田寿昌，并邀我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么一封信。那时没有得到你们的回信。”

——“那信我并没有看见，寿昌没有把信给我看。他没有答复你们，想来他怕是没有合作的意思。现在我又来加入，觉得对不住朋友，所以我看最好是在会外来帮助你们了。”

——“好的，总之请你帮忙好了。”

当天谈的话自然很多，在园子里游玩了好些时刻，还在园

---

①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时事新报》增辟《文学旬刊》，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三十七期起，定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一九二三年改称《文学》，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一百七十二期起改为《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郑振铎、叶圣陶、谢六逸等曾任编辑。

外的田野中逍遥过好一会。一面走着，一面畅谈，但那临栏的一节话要算是那天谈话的核心。那一节话我也记得最清楚。在田野里盘桓到天色将晚的时候，一岑要到报馆里去，雁冰也好象有别的事情，我们便同坐电车到西门，在那儿握手告别。一岑在临走的时候说过这一句话："你今天会很有一些诗产生出来啦。"但不幸那天的游览我却没有纪在诗里。

振铎看我不熟悉上海的路径，怕我走错路。他从西门还陪我坐了好一节的电车，坐到一处很繁华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车，指示着和乘来的电车道成正交的路线对我说："你乘那一路的电车往西首走，走不好远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面左手边上有一个大跑马场，在那跑马场门口的电车站上下车，便是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车的地方是先施公司前面，浙江路和大马路成正交的那个十字口，这自然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很感谢他的殷勤，但我不知道他那时是不是已经住在闸北，如是已经住在闸北，那他乘浙江路的电车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节路也不必就是专于为我了。不过他的确是陪我下过车，他那时候的厚情，我始终是怀着谢意的。

嗣后振铎也还到马霍路来过几次。有一次是同着叶圣陶① 来的，是在晚上。振铎把圣陶介绍了，圣陶握着我的手，十

---

①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编辑《文学旬刊》。著有《倪焕之》、《抗争》、《稻草人》等。

分恳切地说了好些话。但可惜振铎向我介绍时，我没有听清楚；圣陶的苏州腔，我连百分之十也没有听懂。我待他们走了之后，才问编辑所里的人，那位王主任吃惊不小地向我说：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叶圣陶，你不认识吗？"

我听见是圣陶，也很后悔，觉得自己太木讷，没有尽量地多多谈些倾心的话。圣陶的小说，我最初是在《青光》栏内读过他的《他与她》①，觉得他的笔致很清新，虽然并不怎么深刻。

我自从那次以后便没有和圣陶见过面，他留在我脑里的第一印象，是矮小、朴实、和蔼可亲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铎是同朱谦之②一道来的，似乎还有李石岑同路。他们是到编辑所来商量谦之的《革命哲学》的出版。那时我同赵南公正坐在天井里面喝茶。他们来了，起初是只和赵南公谈话，我沉默着坐在一边，谦之也是沉默着。我看他怕只有二十岁的光景，穿一件毛蓝布大衫，一双圆头的布鞋，头发最异样，那周围的毛边是剃光了的，就象在头上顶着一顶圆形的毡帽。振铎代他说，他的《革命哲学》在商务不好出版，问过别家书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东替他印行。

南公没说二句话便答应了下来，回过头请他们和我商议。到这时候，谦之才知道了我是郭沫若，他从椅子上一跳而起，

① 应为《伊和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北京《新潮》二卷五号，又载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晨报副刊》及十二月七、八日《时事新报·余载栏》。

②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革命哲学》、《历史学派经济学》等。

跳到我的面前，一双手把我的手抓着。

——"沫若，啊，你是沫若！"

他那一双有些可怕的眼睛就象要迸出火来的一样。

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

谦之听说我住在泰东，他也就决定把行李搬来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学》的出版。

就在谦之住在泰东的时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铎也到马霍路来过好几次。他那时在编辑《学灯》，在《女神》出版时，那首序诗他曾替我发表过，同时也发表过那集子中所未曾发表的一两首。我有一次还做过一首儿歌，也蒙他拿去发表过的。①（这首诗我没有保留下来，意思是孩子要到海边去，孩子的妈妈不让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赶快回家，带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说是我思念自己的儿子，托为儿童的情绪所做出来的。）又有一次，我把王维的《竹里馆》那首绝诗写在纸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是我从前最喜欢的一首诗，喜欢它全不矜持，全不费力地写出了一种极幽邃的世界。我很喜欢把这首诗来暗诵。振铎看见了这首诗，他以为是我做的，他还这样地问过我：

① 此诗题为《孤寂的儿》，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时事新报·学灯》。

——"你还在做旧诗吗?"

在初回上海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①也到马霍路来过。那时少年中国学会另外出了一种杂志，叫着《少年世界》②，要出一期"日本研究号"，向我征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铁问题》寄去。因为那篇文章不很满意，我便写了一封信去，请把原稿退还。左舜生便亲自到了马霍路来。来时是在晚上，他告诉我《少年世界》杂志已经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出了。

同时又谈到了些别的事情。

——"听说你们要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啦?"他这一问，使我很诧异，这个计划怎么他会知道?他又说:"寿昌在二月间有信来，托我找出版处，我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仿吾们在东京开第三次会议时，为甚么寿昌没有出席，以及找出版处的事之所以没有下文的原故。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艺杂志，这是始终在脑子里盘旋着的一件事。《新晓》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着，

---

① 左舜生(1893—1969)，名学训，湖南长沙人。曾任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主任，后为《醒狮》周报创办人之一，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

② 综合性月刊。一九二〇年一月创刊于南京，由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编辑，同年十二月停刊。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又出"日本号"增刊。

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晓》之外另出一种刊物，这层是得到了赵南公的同意的。当时我也暗暗地感谢赵南公，因为我听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话，象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同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虽然有一位邓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长沙后连信都少有寄来，在日本东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来回至少要两个礼拜。起初要主编《新晓》，写信给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时，局面又改变了。就这样，我呆在上海由四月初达到六月中旬，杂志的事还没有弄出一个眉目。我便想，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杂志用甚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期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于是我在七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①。

这次我往日本的来往路费，是赵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块钱，还送了我老婆一只金镯，是买成四十三块袁头。这一百四十三块钱就算是我在编辑所里住了三个月，编译了三四本书的报酬了。但在当时我的“流氓痞棍”性似乎还不十足，领了那笔钱总觉得有点受之有愧。

---

① 据郑伯奇一九二一年日记，郭沫若当年六月一日已由京都抵福冈。故郭沫若离开上海的时间当在六月以前。

七

离别了三个月，又回到福冈。我留在福冈的妻儿是被家主驱逐出了从前的旧居的，新迁的地方离旧居不远，但我不知道在那儿。我走到旧居近处问以前相识的邻里，又才按照着地址去探寻。原来新迁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还有两三家渔家。后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墙围着。我先隔着那木板墙看见大的一个儿子和夫，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空地当中挖土。头发很长，好象是自从我走后不曾剪过发的光景。就单只这样一个情景已经就使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又转到街头的前门去，前门才是锁着的。我也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着第二个儿子出外去买东西去了。我在门口伫立着不一会，安那果然背着孩子买了些小菜回来。她看见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为我走得很仓促，临行时我没有通知她。

新居是平房，结构和旧居的楼下相同，可说就是旧居削去了楼层的一样。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我的一些书籍又已经运回了上海，看起来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

我那《泪浪》的一首诗，被已故的“诗哲”（徐志摩）骂我是

"假人"，骂我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①的那首诗，便是在这一天领着大的一个儿子出去理发时做的。我们绕道走去，在以前的旧居前缠绵了一会。那里还没有人住，有两三位木匠在那儿修理。我也就走进去，在那楼上眺望了一回，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齐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了。

我回福冈仅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动身往京都。在车上过了一夜，到京都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访问伯奇。他那时正在考试，我在会客室里坐了好一会才等到他出来。他和我虽通过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见面，他信上写的字迹异常纤细，就象姑娘们的笔迹一样，那知一看见他才是一个矩形的面孔，身子比我还高，我觉得他可以称为东方的兴登堡②。伯奇对我也一样地感觉着一种意外，他领着我去找一位旧同学李闪亭时，他这样对我说："从信上得来的想象和实际的印象又不同，文学的要素是不免有些夸张的。"因为我做过《死的诱惑》那一类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上也每多消极的话，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

①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代表。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等。他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努力周报》五十一期上发表《坏诗・假诗・形似诗》一文中说："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象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

② 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二年两度当选为总统。

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考试。我便不好打扰他，便在李闪亭的寓里住下。这李闪亭是冈山六高的旧同学，进的是京大经济科，要算是河上肇①的弟子。在冈山时我们同住过两年。因为他是第一部，我们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 中国官僚)，他很不高兴。进了京大，京都的同学们又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了。但这位“中国马克思”到底还是成了“曼大林”，他后来是属于孤军派的中国青年党②的一员健将，做过长沙法政学校的校长，一九二七年客死在上海。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③，我在当时并没有感觉着有怎样的必要，他这个劝诱，我也没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应着张凤举的邀约，到他寓里去茶话。我同闪亭去时，凤举又到近处去把当时在京大研究的

---

①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经济学家，曾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著有《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唯物史观研究》、《资本论入门》等。

② 孤军派，指围绕《孤军》杂志的一批人，其中大多数信仰国家主义，代表人物有陈慎侯、何公敢等。该派后来多数为中国青年党成员。　中国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由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发起成立。

③ 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于东京，一九三〇年停刊。

沈尹默①先生请了来。沈先生那时恐怕将近五十岁了，他戴着一副药片眼镜，眼睛好象很不好。脸色很苍白。那苍白的脸色配着药片的眼镜，怎么也好象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凤举替我介绍了，说起我们要在上海办一种纯文艺杂志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声是“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

我听见了这一声，微微地感觉着一种惊异。我不知道为甚么在上海滩上便不可以谈文艺。文艺究竟是该在甚么地方谈？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没有甚么地方说得上的，这一层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种反抗心理。北京我从前到过，我觉得象那样暮气沉沉的地方倒未见得配谈文艺。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来，我觉得说是多事。——其实照现在看来，就是那样的作想也已经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大学教授的文艺，讲研究要唐钞宋刻，讲写作要古月荒城。这自然是以北京为宜，上海滩上是说不上的。这儿有一个阶段不同的阶级意识，就如贵族们之鄙视资产家一样，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视“上海滩上的诗人”。这种思想，明白地说，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穴，蟠居在这座古城里的正人君子或准正人君子，要想超越这种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话一不投机，结果是把杂志的话丢在一边去了。谈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国古书，谈上了元曲。我发表了我的中国剧曲在文学构成上优于西洋歌剧的意见，凤举说他没有研究，没有

---

①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诗人、书法家。曾任《新青年》编辑。著有《秋明集》、《书法论》等。

加以赞否。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凤举又说到厨川白村①(京大的文学教授)称赞过我那首《死的诱惑》,——因为大阪的一家日报翻译过——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我听了这话,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称赞,还是在藐视。

谈不好一会,便同闪亭从凤举那儿退出。那时京大附近的饭堂很多,都是以学生为对象的。用中饭时,在饭堂里遇着了伯奇。那天的下午,伯奇陪我去访问过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时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专门研究童话的,一屋子里都堆的是童话书籍。我觉得他自己就好象是童话中人。他人矮,微微有点胖,圆都都的一个脸有点象黄色的番茄。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把眼睛眯成一线,因此把他那丰满的前额和突出的两个脸墩便分成了两部分。他特别象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儿。他是吉林人,爱用卷舌音的北方话也特别助长了他的天真烂缦。我觉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时听说他参加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②,我也觉得象他这种童话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我却是谢绝

---

① 厨川白村(1880—1923),本名辰夫,日本文学评论家。著有《近代文学十讲》、《苦闷的象征》等。

② 周作人(1885—1967),号起孟,又作启明,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 "新村"运动,十九世纪初源于法国,主张以合作互助组织村落。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曾倡导试行。一九一九年周作人赴日参观"新村",归国后在《新潮》二卷一号发表《访日本新村记》,介绍"新村"运动情况,并组织"新村北京支部",广作宣传。

了。我这人，用我们四川话来说，怎么也是有点“不带贵”。不知怎的，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在京都想会面的人，都已会了面，虽然所想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但已觉得无可再逗留了。我便决意再往东京。闪亭，已故的“中国马克思”，劝我到晚上乘夜车去。他说那样要方便些，到东京时是清早，省得许多麻烦。我听从了他的话，他便陪我去游过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个大湖。那湖的规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蒸汽船在里面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谓“近江八景”，是仿照着“西湖八景”所拟定的。到过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说是比西湖还好，但这个比拟似乎有点不伦。因为西湖的好处是在它的小巧玲珑，就象规模放大了的庭园；琵琶湖那样宏阔的大湖，是没有这种风味的。

在琵琶湖游了一天，晚间在大津市乘车东上。坐在夜车里，自己免不得又想到杂志上的事情来。怕是只能出季刊罢，能够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学校缠着，而且散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经很费事的。季刊用甚么名目呢？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名目太夸大了，要求实质相副，是很费力的。书局方面拿不出稿费来，这是一件很大的困难。……这些都在萦想中，但想来想去总得不到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东京后，要靠几位有力的友

人来决定。

到了东京，先走到达夫的下宿处去看时，他得了病，进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去看他，是骏河台的杏云病院。

我和达夫已经五年不见了，在未见面之前只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象中描画着我那位本来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他那苍白而又带着一层暗灰色的面孔，怕已经是面如土色了。但一进病室时，他是坐在病床上的，带着红红的脸色。

他见了我，想立起身来和我握手，我急忙劝他安静着莫动。我问他是甚么病，他说是胃病。但我顿时怀疑起来，为甚么得了胃病就要进病院呢？我疑心是肺病，他不肯说实话。

谈了一天，并陪他去登临过一次在病院附近的俄罗斯正教的尼哥拉斯圆堂。——这是东京的名胜，在大地震时已经毁灭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头等，在一间前室中摆着一尊钢丝床，一只角上有洗面池等的设备。邻接着的后室是三铺席面的日本式的小房间，是护士或患者家族们的寝处。我那晚便睡在那儿的草席上，同时还有两个看护妇睡在我的左右两边。——这样一写出来，好象很风流，达夫在第二天清早也说过些风流的趣话，其实我被夹在两座肉山中动也不能一动。那两位护士大姐真够胖。一位好象是一条白肥猪，一双肥白的手各个手指节都呈着眼窠；又一位大约肾脏有毛病，面孔上带着暗灰色，全身有点浮肿。达夫有一篇小说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写的那时的事情，那位白胖的密斯（？）被我们的达夫描写成了杨贵妃。

达夫很热心，他所讲的话，主要是说他明天或后天便要退院，退院之后便要创作了。他已经做成了三篇东西，便是《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他打算拿来出一个集子，退院之后便要寄给我。他说，他的《银灰色的死》寄往《学灯》已经四五个月还没发表出来，叫我回上海之后给他要回。杂志的名目他赞成用《创造》，月刊、季刊都不论，每次他可以担任一两万字的文章。

我看见他这种热情，觉得到东京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他能否在一两天之内退院还是未知数，资平他们都还有考试，不好多费他们的时间。在东京方面的事情我便要他做个中心，退院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商议一下；最好督促着大家在暑假之内努力做些文章，好使杂志在年内或来年的正月出版。他和田寿昌那时还不十分熟悉，我在东京该做的事情便只有去访问寿昌了。

第二天适逢礼拜，清早在病院中和达夫离别了，便往东京郊外去访问寿昌。寿昌住的地方，就是仿吾从前住过的月印精舍。那个地方，我起初以为是僧寮或者道院，原来只是几个留学生共同组织的"贷家"①。寿昌和他的漱瑜②是特别住在一间小房里的。他们那时的恋爱已经是在所谓"纯洁的"以上了。他们同住的人在精舍里面养了一些鸡，我到了，在吃中饭时便蒙他们杀了一只鸡来款待。午后寿昌约我去会佐藤春

① 日语，出租的房子。

② 即易漱瑜（1903—1923），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二年与田汉在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

夫，我谢绝了。又约我去会秋田雨雀①，我也谢绝了。不拜访名人的我的"不带贵"的脾气在寿昌面前又发挥了一下，其实我所拜访的寿昌，在那时候已经是名人了。他那时虽然还是高等师范的学生，但那儿的学课他已经老早没有去上了。只是他说晚间要引我到银座去领略些咖啡馆情调，这对于我倒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我在一九一四年初到东京时，预备入学试验的最初半年住在小石川的偏僻地方，我不曾到过银座一次。在一高预科的一年是青年矜持期的绝顶，不说银座的咖啡馆，便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以后便分派到乡下去了。在暑假期中虽然偶尔有到东京的机会，但象银座的咖啡馆，实在是受了禁制的乐园。"咖啡馆情调！"这是多么诱惑人的一个名词哟！我听说那儿有交响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响曲，有年青侍女的红唇，那红唇上有眼不可见的吸盘在等待着你，用另一种醇酒来使你陶醉。那儿是色香声闻味触的混成世界。在那儿能够使你的耳视目听，使你的唇舌挂在眉尖，使你的五蕴②皆充，也使你的五蕴皆空。这样的一种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寿昌来向导，这真是我到东京的一种意外收获了。

咖啡馆情调要到晚间才能领略，午后寿昌引着我在代代木松林里盘桓，追忆到了一年以前的千里松原内的散步和太

---

① 秋田雨雀(1883—1962)，原名德三，日本戏剧家、作家。著有《国境之夜》、《埋葬了的春天》等。

② 佛教名词。"蕴"为梵文 Skandha 之意译，意为"集聚"。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蕴。色蕴即身，其他四蕴即心。此处泛指整个身心的意思。

宰府的遨游。他谈到了漱瑜最近和他闹过一次闲气。他说他和“康月昭姐”——这位女士据说是广东人，寿昌是这样称呼她的——太亲密了，漱瑜有一次便对他说要和他分离，免得成为了他和月昭姐两人的交谊之障。他说漱瑜是在摹仿欧洲某一位作家的戏剧里面的女主人公。可惜我把这位某作家的名字忘记了，我的贫弱的外国文学知识里也没有这个典故的储藏。

好容易到了晚上，吃了晚饭后，漱瑜说要到某姐处，叫我们等她回来之后再往银座。这个礼节自然是应该遵守的。不一会漱瑜回来了，寿昌先走去迎接她，他们好一会都没有进来。我也走去看时，看见漱瑜坐在门道上带着一个很不愉快的脸色。

——“怎的？生了病吗？”我问她。

——“是的，我肚痛。”

——“最好是赶快休息的好了。”

这样一来，所谓咖啡馆情调已经飞到另一个太阳系统里去了。

第二天漱瑜的病算好了，她和其他同住的人都去上课去了。那时有一种表现派的电影叫《格里格里博士》，在神田某戏馆开演，是不可不看的，寿昌留着我，定要我把这场电影看了再回福冈。他和我两人便坐上电车进东京市去。起初是陪着他到上野，因为他要去会一位美术学校的朋友。那朋友住在一家临着背街的楼房上，下面是汽车行。到了那儿，寿昌在楼下叫了一声：

——“老王，在家吗？”

——“是老田吗？你上来。”从那楼上有湖南人的声音回答出。

寿昌叫我在下面等着，他跑上楼去了。刚上去又跑了下来，又叫我走。我们在上野公园里逛了一下，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他又拉我到本乡去会他的一位“剧友”。

原来那位“剧友”就是屠模①，本是我在冈山的同学，但不幸我们在冈山时，为了一些小事有点不和睦。他是武进人，有演剧的天才，寿昌和他的交际便是由演剧而来。他在帝大学植物学，但他那时正在热心制造香水，进了他的房间，一房都是香气，随处都是香水瓶。中饭是在他那里用的。用了中饭之后他要去上课，我们又才分了手。

寿昌又拉着我走，在大学前面的街道上，就象两个梦游患者一样走来走去，进过好几家旧书店，在几家书店店头也立读过一些杂志，不知几时已经走到了万世桥。是电影快开演的时候了，我主张坐电车去。两人上了电车，我拿出一张五圆的老头票来买电车票，车长找不起。我的零钱，却又不够，坐了一站路，车长又把我们放下车来，意思是让我们把钱换了再坐电车。我到这时候才知道寿昌是囊空如洗，他是连坐电车的零钱都没有的。我这个太不聪明的脑筋，也才悟到在早上他为甚么要到上野去会那位“老王”，为甚么到中饭时又去找屠模，为甚么几次都不坐电车。说不定昨天晚上漱瑜去会某姐，也怕是

① 屠模（1896—？），字伯范，江苏武进人。曾参加中华学艺社。

去借钱，因为钱没借到，所以肚子才痛了起来，让我们的咖啡馆情调也就成为了画饼。脑筋太迟钝的人，就是在享乐上都是没有资格的。我假如早悟到了他们是没有钱，我自己虽然也穷，但还有从书店老板那儿领来的路费，一小时的咖啡馆情调或者是可以领略的。可惜我就在那一次把机会失掉了，自有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终还不曾把我们的“咖啡馆情调”领略过一次。——我这样写来倒不是要夸示我是一位道学先生，也并不是想否认我之为“流氓痞棍”，不过我这个“流氓痞棍”委实是一位胆小的家伙，凡是没有经验的地方，实在没有胆量一个人去撞。自然，在这儿也有一种东西在说话，那种东西多的便是胆量十足的人，那种东西一缺乏不怕就是想要以“咖啡馆情调”来款待我的寿昌，反因我而得到一番梦游患者的经验。

那场《格里格里博士》的影戏，所描写的是一种狂人心理。开首是疯人病院的场面，是现实的情景。接着是那院里的两个患者在谈话的光景，以下便是幻境了。

德国的某一个都市有一对青年同爱着一位姑娘。有一次节日，他们三人同往市中观看种种的游艺。格里格里博士利用着一位梦游患者在市上营利，说是能够判断人的吉凶祸福。那两位男子和他们的共同的爱人也就进了博士的斋馆。馆里是一座小小的戏场布置，正面一段高坛上立着一个细长的木匣。坛下围着座席，观光的人已经坐满了。停不一会，格里格里博士走了出来，字幕上表现出了他的说话，就是说他要向着看官们开示他的能知人吉凶祸福的梦游患者。他把木匣揭开，里面立着一个人，就和干槁了的尸首一样，眼睛闭着。博士向看

官们发问，有没有人要问自己的吉凶。那对男子中的一个便要立起身来，几次都被他的友人和爱人拉着了，但他终于站起了身来。他问的是知不知他几时会死。在这时候博士叫那梦游患者把眼睛睁开来。眼睛徐徐地睁开，睁得璧圆，放出一种可怕的凶光，直射着问者的面孔。患者的口奇怪地动了几下，字幕上表现的是："你呀，你今晚就要死！"说了又把眼睛闭了。

三位爱人大笑了起来，便各自退了席。谁料那质问者在那天晚上就寝之后，就由格里格里博士的梦游患者潜去暗杀了。另一个男子揣想到是那位游方博士作怪，便要替他报仇。经了几多转折，得到了一些实证，便率领着人们去逮捕博士和梦游患者。两人逃跑了，人们紧紧地追赶着，一直追进了最先现出来的那座疯人病院里。银幕上又是现实的景象了。一些狂人仍在那病院的中庭游散，有一个象死尸一样的人闭着眼睛立在一边，便是那位梦游患者。又有一个女的患者象垂着眼帘的白蜡观音一样，是那两位男子所共爱的一个爱人。格里格里博士是那儿的院长。不用说谈出这番幻想出来的人也是患者中的一个。

走出电影馆时，满街都已经上电灯了。寿昌问我还到咖啡馆去不？我却也早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来，只是买了一些西洋点心，敦促着他，赶快回去安慰他的漱瑜。

跑到东京，混混沌沌地便过了三天，到第四天清早又和寿昌告了别，我是决定回福冈去了。因为想买几本书，便又打算跑到东京大学前面的书店里去渔猎。坐在电车里自己觉得真

是无聊，跑来东京一趟，也就和在京都混了几天的一样，真是空洞。自己也会了一些朋友，但好象所当解决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朋友们自然大家都在答应要做文章，但那不是和几个月前还未回国时的情形一样吗？未知数依然还是未知数，X依然还是X，问题并没有进展得一步。想到达夫说要退院，觉得最可靠的还是只有他。他的寓所本就在大学附近，我便决心再往他那儿去探望一次。

他果然是在我会见了他之后的第三天退院的，我再在他的寓所见面时，他已经在做他的《友情和胃病》了。

这一次的重逢才会见了好些朋友。会见了资平和何畏①，是东大同学们在学校里把他们找来的。无心之间也会见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时候，已到了东京，那时他好象是和达夫同住在一个馆子里。就在那天下午，在达夫的房间里聚谈了一次，太家的意思也都赞成用"创造"的名目，暂出季刊，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出版的时期愈早愈好，创刊号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准备起来。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时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记得了。②

---

① 何畏，即何思敬(1896—1968)，原名浏生，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法学家、翻译家。译有《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战争论》等。

② 据郑伯奇一九二一年六月四日日记，"……沫若六时许外出赴大津。是夜沫若由大津起身赴东京去矣。"由此推算，作者当于六月五日晨抵东京，即往医院探望郁达夫；六月六日与田汉同游；六月七日在郁达夫寓所与张资平、何畏等聚会；第四天晨返回福冈。故创造社成立日期应在六月七日。

八

到日本去往返了一次，费了三个礼拜的光景，在七月中旬① 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很不愉快的是《新晓》的预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着我不在，把我锁好了的书桌的抽箱打开了。——因为他和我的书桌是相同的形式，钥匙也相同。他把我的两篇旧稿取出了。一篇是我译的葛雷的《墓畔哀吟》②，另一篇是名叫《Love Lane》的随笔。Love Lane 是静安寺路上的一条小巷，离马霍路不远，华名用的是那几个字，我不记得了。那个名字在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诗意，地方也很幽邃，直译出来便是"情侣弄"或"爱情弄"③。我住在马霍路时，晚间每爱到那儿去散步；每次要遇着好几对逍遥着的西洋男女，大约都是些"情侣"。我自己的"情侣"呢？时常是我自己的影子。那篇随笔便写的那种情趣，原稿后来失掉了。

主任先生不得到我的许可，便任意打开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来做他所编的《新晓》的幌子。这使我大不愉快。

---

① 此处时间有误，应在七月二日以前。

② 葛雷(T. Gray, 1716—1771)，通译格雷，英国诗人。所著《墓畔哀吟》又译《墓园挽歌》。

③ 作者原注：华名"斜桥路"。

编辑所里的人都劝我登报声明，于是在《学灯》的一角上，在我回沪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启事。① 启事也没有揭穿，只是说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而已。这样含糊的文字自然有为它注释的活着的脚，上海虽大，大家也就晓得我为的《新晓》了。到这时候那太聪明的书店老板才知道我和主任先生是不能合作的。他见了启事便跑到书店里来，谈了些和衷共济的话。有人向他谈到了私下打开抽箱的事，他拿着也就没有办法。《新晓》停办的话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他说以后便不出《新晓》，专出《创造》。

从那时以后，书店老板便把对于王主任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遇着人便骂，骂他编纂了三个月连一本小杂志都编纂不出；骂他太不负责任，做出了对不住人的事。这样一来弄得那主任先生的响鞋，响得愈见焦躁，但是脸上的雪花膏却少涂了，香水也少打了。有一天清早，他还睡在床上的时候，有一位娘姨跑到编辑所里来叫醒了他。

——"王先生，太太叫把这架风琴拿回去。"那个"团团"便被她抱下了楼，坐着黄包车走了。

原来那架风琴是P公馆的东西。P是组织泰东书局的一个人，家眷住在上海。有一位成了人的女公子在学英文，编辑主任由书店老板的介绍在担任那儿的家庭教师。风琴是从那儿借来的。P家对待西宾似乎很有礼节，往常每每有鸡肉和清蒸

① 启事写于七月二日，载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四日《时事新报·学灯》："沫若从事文学的述作两年于兹，所有一切稿件，均署本名，不曾另用别号。今后亦永远抱此宗旨不改。恐有疑似之处，特此先行申明，有昭己责。"

鳖鱼之类的食品送到编辑所里来。大家都称王先生为未来的驸马，王先生亦隐隐以此自命。囝囝风琴一被搬走之后，于是乎驸马公的希望也就随着朵奶妳向空中消逝了。用所谓《春秋》的笔法来说，或许这一段姻缘是由我拆散了的。但是当年的那位密司P，假如看见了我这篇文章，她就和我们的《创造》没有被《新晓》污辱的一样，我倒要请她感谢我的。

这时候文学研究会的人又来提起过入会的事。在七月中，他们要在上海开一次大会，在开会之前的两三天，李石岑写了一封信给我，传述振铎他们的意思，要我加入文学研究会，并限我在一天之内答复（有人说过就象是哀的美顿书）。石岑那时已经进了商务编译所，《学灯》是让振铎在编辑的，他不消说也是加入了研究会。但他的提议，我却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暑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和我同住在编辑所里。他搜集来的资料是王独清由法国寄来的一首长诗名叫《支那》，和一部《新月集》的翻译。《支那》似乎是惠特曼式，但对不住我们的“情调诗人”，我在原稿中便替他毁弃了。《新月》却替《支那》报了仇，叫我流了好几斗汗水。《支那》既不能采用，伯奇碍在他们的友谊上，始终要叫我赏玩《新月》；于是乎在那上海市上的100°F以上的炎热之下替他渲染起来。那部《新月》除掉一些单语单字外，真可以说一钩新月。

当年的上海市的确是炎热得不堪，有时候热到一百度以上。坐在马霍路的楼上就使一事不做，也象面包烤在炉里，汗水不断地迸出。但是在吃别人的饭自不能不努力地做点事情，倒是做着事情反可以把炎热忘记。那时候我在开始翻译《少年

维特之烦恼》。伯奇在翻译《卢森堡之一夜》①。伯奇是从法文翻译出的，那书在描写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译本都替作者删削了。伯奇为此颇为碍难。我劝他全译，但他有所顾虑，终于把原文删节了好些。

号称为编辑所的地方，丝毫组织也没有。本是一所二楼二底的弄堂房子，楼下做了堆栈，五六个人通杂住在楼上。做工、会客、睡觉，在那儿是三位一体。中国人的客，有事来商量的很少，无事来消遣的很多。客一来总是高谈阔论，起码总要坐上两个钟头。编辑所里有五六个人，平均每人一天一个来客，你一天工夫便要整个地费掉。在这种环境中，译事很不容易进行，创作的机会更是没有。本来是有躁性狂的烦闷者在上海不免又烦闷起来了。因此伯奇和我便有拿着工作暂时到乡下去做的计划。就在七月下旬，我们一同到过一次镇江。

在镇江游了金山，登过金山寺的塔。塔是木造的，涂着红色。塔下的门锁着，要缴纳若干钱，和尚才来替你开门。塔上的眺望当然是一个壮观，可惜我的记忆已经完全消逝了。我只记得塔壁上纵横狼籍地有无数的题名，也有些西洋人的题名杂在里面。

焦山有定期的小蒸汽船往还。坐船上了焦山，一山都是寺院。那些寺院的和尚就和四马路上的野鸡一样，专门在做拉客的生意。我们初到，自然是外行，在开始走进的一个寺院里便投入了他的罗网。大和尚拿了些茶点来款待，又展示了那寺里

---

① 法国作家古尔蒙(R. de Gourmont, 1858—1915)著。

所藏的寺宝。他听说我们是来避暑的，便愈见殷勤起来。我们要到山上去游玩，他便派遣了一个“小童”来跟着我们。他所称的“小童”其实是和鲁智深相差不远的大汉，任随你走到那儿，他都在后面跟着。各个寺院都有所谓“寺宝”，看了便要你出钱。我们两个宝贝看了的“寺宝”也很不少，但只有焦山寺的“无惠鼎”① 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连“瘗鹤铭”② 的所在我都是模糊印象了。

大汉又把我们引回了他的寺院，那儿已经替我们预备下了一桌很丰盛的素菜，和上海的素菜馆子功德林的上等席面相差不远。菜虽号素，用的通是荤名，而且还为我们备下了一些“素酒”。我们见了，不是酒的事，只是愁的事了。我不知道这一席款待究竟是要我们付多少钱。我一面用素餐充着饥肠，一面用日本话诉着愁肠。我很感觉着焦山这个名目倒不愧是座焦山。把饭吃完之后，结果是拿十块硬洋来抵塞，故意用了硬洋者也是因为十块硬洋比一张十元钞票来得更有实感。那位大和尚倒还客气，他说我们施舍得太多了。这一句话真是天来的佛音，才把我从焦愁解脱了。我就是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究竟那十块钱是给得太多，还是给得太少。假使是少了，而能使那大和尚不说话，怕或许是我们的日本话奏了功效。那秃头大师说不定把我们当成了帝国主义者了。

但是，十块大洋！这在大和尚看来或许不会多，而在我穷

---

① 又作无专鼎，周宣王时铸。

② 碑刻，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原刻在焦山西麓石刻上，两次堕落江中，清时砌入定慧寺壁间。

小子却不算少。我带去想在乡下住一个月的费用已经用了三分之一。焦山，避暑，还是滚他妈到阿鼻地狱里去罢！不用说我们就在那天也就退回了镇江。

游了一次焦山，花了十几块大洋，换来的是在这儿再写几行卖钱的文字。

焦山的北面，峙立在江岸上的是北固山，那山上有有名的甘露寺。我们游了金、焦二山之后，北固山没有再去了。但我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一首唐诗，便是王湾①的《次北固山下》。那开首两句是：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这青山绿水的几个字隔了二十几年才使我感受了惊异。我想在唐时的北固山上或许会有一些林木，而扬子江里面的红水断不会是绿化了的。大约那位王湾先生也是一位大天才，大创作家，他在夜里泊舟，并没有看见山，也没有看见水，只是按照着自己主观的观念做出了那首杰作。不然，他或许是一位红绿盲，不能辨别水色，也不能辨别山色，只沿用着通常的习惯语，言水必冠以绿，言山必冠以青。

由镇江折转到无锡。我们要到无锡去，是因为住在那儿的朱谦之写过一封信来，说那儿的惠泉山有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听了他的话，便也到了那儿的惠泉山。那儿的确是有"希腊的风味"，但不是古典的希腊，而是现代的希腊。山是一座童山，山下丛集着一些颓废的节孝祠，谦之和他的朋友们

---

① 王湾，洛阳（今属河南）人。唐代诗人。《全唐诗》收其诗作十首。

便住在一座节孝祠里面。那儿倒还好，比西湖还好的好处，便是可以少花钱。我们到的时候，谦之已经到了南京，由他的朋友们招待着我们，我们也就在那家节孝祠的一间楼房里住下了。

楼上有两尊木板床和一张方桌，平常大约是做泥人的匠人住的地方。邻接的空敞的楼房里，沿着楼壁还陈列着好些未上彩色的泥人。匠人们是回去了。为甚么回去了，在当时也听人说出过一般理由，但我已经没有记忆了。我想或许怕是各处的商场被西洋团团占领了的原故。楼房头上直接露着瓦顶，白天很可以纳暑，晚来蚊子的大军逼着我们只好在帐子里面过笼城生活。就这样在那儿住了有一个礼拜光景，工作丝毫也不能做，并连逼在近旁的太湖都不曾去过，又只好"桃之夭夭"了。

逃回上海之后，仍然还是住在马霍路的楼上。但在我们去避暑的期间中，有一位显客来访问过我。那便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之一高梦旦①先生。梦旦先生来访问我，这个异数的光降，就好象汉光武访问严子陵②，或者是象亚烈山得③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特别受了惊惶的是书局老板赵南公。在我回到编辑所时，南公老板来看我。他说

---

① 高梦旦(1869—1936)，名凤谦，福建长乐人。一八九六年起即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长。

② 事见《后汉书·逸民传》。

③ 亚烈山得(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通译亚历山大，马其顿国王。他曾率军大举侵略东方，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梦旦一定是想找我进商务编译所的。他同时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消息，是安庆法政学校的校长光明甫①给他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代聘一位英文教习，月薪是每月二百块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担任，遥领着他的编辑。但我这个不识抬举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却没有胆量去拿那一笔大钱。我自己自然也是学过英文的人，但我的英文仅仅能够看书，除掉参考着日本文或者德文译本也勉强能够翻译翻译之外，要讲几句“不落肯的因革利徐”，我连上海的茶房都还赶不上。钱自然又何尝不想拿，但恐怕上了课堂立地便会被学生哄掉。我这位胆小的“痞棍”在那时才推荐了达夫，因为达夫的英文程度的确比我高明，他那时还是东大的三年生，学的是法制经济。学那种功课的人平常是可以不必上课的，只要在试验之前把别人抄的讲义借来或买来——日本的苦学生多有抄讲义来发卖的人——准备一下，试验便可以无事地渡过。达夫的头脑很好，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本领，所以便推荐了他。我并且说，达夫来也可以遥领泰东的编辑所，比起我来是更要拿手的。

我在当时已经是在准备退路了。住在日本的时候，就象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象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

① 光明甫，原名光升，安徽桐城人。北伐时期曾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委。

目弄出。象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因此，我又想到还是继续我的学医安全些。世间有很多不怕死的病人，吃饭想来大约也是不会成为问题的。

南公听见我说达夫可以遥领编辑所的话，他很诧异。"怎么样？"他这样问我，"你是打算进商务吗？"

——"笑话！你未免神经过敏！我是打算暑假过后折回日本去。"

——"为甚么？刚刚架好步势，为甚么就走？"

——"不行，在上海不能创作。"

——"到乡下去怎样？"

——"乡下也是一样，这次跑到镇江和无锡去，花掉了几十块钱，得到的便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我在这样想，想把编辑所移到西湖，让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对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赵南公在他的烟瘾过足之后本来是很可以想些妙计的，但在我以为妙的，少有看见过他实行，而他所实行着的我却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编辑所里，差不多是在唱独脚戏。跑印刷所，管校对，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在搞。"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但我对他说，"西湖还是一样。西湖我同仿吾也去过一次，终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国没有可以使我们安定的地方，无论到甚么地方去，都感觉着颓败，感觉着压迫。"

——“怎么样呢？杂志呢？”

——“自然要办，唯其要办，所以我才要折回日本。我在那儿多少还可以做些文章，同时有达夫回来兼顾，你是可以不必愁的。”

“把你的日本太太和公子们接回来怎样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这一层，他定然是以为我的性欲不能发泄，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①派的精神分析术讲来，一切的烦躁都是由于性欲的不满足，那我们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术的大家。但他却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白吃着他的饭，好象是奴隶，又好象不是奴隶，已经有点难耐了。

——“他们回来是愈见使我累赘的。总之，达夫很好，只要他肯回来，那便甚么都不成问题。”

谈这些话的时候是在八月中旬的上午。我们就在那天决定了去请郁达夫回来，先由我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同意。高梦旦先生那儿我却摹仿了一次孔二先生的办法，便是“阳货归孔子蒸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②。我听说梦旦先生白天是在商务编译所里办公的，我便跑到他的公馆里去投了一张回拜的名片。但在这儿我要声明一句：我并不是比梦旦先生为阳货，比我自己为孔丘，只是我自己怕见名人的怪癖使我采

---

① 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等。

② 语出《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取了这样一个滑头的办法罢了。

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里面本来是有好些同学在那儿做工作，如象郑心南（贞文）、周颂久（昌寿）、何公敢①诸位，在当时的薪水虽然没有欧美留学生多，但在实际上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他们肯到马霍路来看我，我也时而到闸北去访问他们。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到商务编译所里去会我的那几位同学。那时候梦旦先生正在邻室会客，他听见同学们在和我谈话，便特别跑过来和我见了一次面。那老先生的态度异常诚恳，人很魁梧，声音很宏朗，神采于质朴之中带着精干的气味。我一看见了他，便觉得和我父亲的面貌很相仿佛。那天他说到他日前来访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位侄子得了肺结核，想到福冈医科大学去就医，要想问我些那边的情形。我便谈到我不久要转回福冈，梦旦先生便决定了让我回福冈之后再送他的侄子渡日，好托我照料。

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子里请吃晚饭。②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没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两块半钱缝就的一套法兰绒的西装，我是穿的夏布

① 郑心南（1890—？），名贞文，福建长乐人。曾参加丙辰学社，一九二三年被推为中华学艺社总干事。　周颂久，名昌寿，贵州人，生于成都。丙辰学社成员，与郑心南合著有《相对性原理》。　何公敢（1889—？），字崧龄，福建福州人。丙辰学社成员，《孤军》杂志创办人之一。

② 据《胡适的日记》，此次进餐地点在一枝香，日期为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

长衫。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

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象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脚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光荣到了绝顶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长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的身材，我们在那儿的像片上早是看见过的，只是他那满面的春风好象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掉转了一个方向。梦旦先生向我们介绍，他殷勤地和我们握手。

梦旦先生说："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

我脸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声，这三个字好象是他的习惯语，我以后便听见过他说过无数次，"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个"再"字，自然是为我的事情已经是商量过的。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老实说，在上海

的书业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务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地方，这点知识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东发生关系之前，商务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费俄顷的迟疑，或许早就唯命是听了；但我不幸一回国后，便和泰东发生了关系。我要想"朝高枝飞"吗？这个行为是 something like① "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

他这样的一问，我没有摸准确是怎样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觉着受着了一种要求，便是要我说出一句客气的话。这话却没有立地构想得出，我只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时候，梦旦先生并没有照着西洋的礼节，他是坐在那长餐桌上手一边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时时隔着梦旦先生和我打话，在席终用茶点的时候，梦旦先生索性把我让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并坐了起来。谈的话很零碎，我现在也只能零碎地记得一些。

博士说过："我们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最近把海涅的诗选译了，将来要作为'世界丛书'的一册出版的，她把那首«Du bist ein 〔e〕»译得真好。②"

---

① 作者原注：类似。

② 陶孟和(1888—1960)，名履恭，天津人。著有《孟和文存》。其夫人沈性仁，翻译家。«Du bist ein 〔e〕»，全名«Du bist wie eine blume»，译为《你象一朵花》。

我听了他说出这一番话，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发音好象很有点“不落肯”。

他又告诉我：“某君①（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记了）译了Drinkwater②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戏剧写得异常之好，把古事写得和新事一样。”

他回头又问我：“你近来有甚么新作没有呢？”

那时候《学艺》杂志上正在发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戏剧《苏武与李陵》的序幕，我便问他看过没有，正打算说出我要做那篇戏剧的大旨和细节时，他已经插断了我说：“你在做旧东西，我是不好怎样批评的。”

此外还谈了些事情，我无庸缕述了。但我在这儿要叙述一件我们的大博士对于我的小小的奉仕。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散席的时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

① 即沈性仁。

② 德林克沃特（J. Drinkwater，1882—1937），英国诗人、戏剧家。著有《威廉·莫里斯》、《继承》等。

九

安庆学堂的事，达夫早有回信来，愿意担任。路费汇去了，他是九月初头回来的。他回来之后有四五天光景，我又转回日本。这一次泰东送了我一张二等票，另外又送了我六十大洋。我动身的一天，朋友们把我送到汇山码头上船。送行的有达夫、伯奇、均吾，还有一位新认识的朋友毕瑞生。

上了船，在二等舱的食堂里开了几瓶啤酒，但待我一搜钱包来付账的时候，钱包不知道几时已经被扒手扒去了。真是要命，急得我这个背时倒灶的“流氓痞棍”几乎流出了眼泪来。我那钱包里面不消说泰东送我的六十块钱是放在里面的，另外还有上海朋友托我到日本去买医书的一百块钱。足足一百六十块钱就那样便无翼而飞了。船又临着快要拔锚的时候，身上一个钱都没有，到长崎上了岸便是问题。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朋友是可感谢的，达夫连忙把他的钱包搜了出来，倾了五十块钱给我。毕瑞生也尽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块钱出来。这些钱在后来虽是由泰东抽出来还了的，但在那咄嗟之间，全不顾虑到自己而能倾囊相助，不是很可感谢的吗？

我离开了上海，把上海的事情移交了给达夫。伯奇因为有别的事要留在上海，他可比我迟得两个礼拜。他留在上海的期间，一切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达夫商量。但他们两人的勇气的确比我大。在我回到福冈之后，第一次送来的上海报

上便登载出《创造》季刊的预告，计算起日期来，就在我离开上海后的第三天。预告上说季刊准于明年元旦出版，并且还有就在十几年之后都还使我们的鲁迅先生不能忘怀的“有人垄断文坛”的话①。那一方面使我佩服着我们达夫的勇气，同时也使我感觉着分外的不安。我在上海呆了将近半年总不敢登出的预告，达夫接事仅仅三天，便把它登出来了。旗鼓一张便不能不有实质相副，我始终感觉着同人们的力量实在并不充足。还有那“垄断文坛”的话，我也觉得打草惊蛇，而且不免有些夸张。因为那时候的中国那里有甚么“文坛”？更那里说得上甚么“垄断”？但把“垄断文坛”的字样一揭出来，于是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便居然“坛”起来，而且也“断”起来了。

回到了福冈，自然是继续学业。医科大学的课程，头两年是基础科学，后两年是临床科学。基础科学的毕业试验本在第二年年末举行，但我当时没有受，便跑回上海去了；要继续学业便不能不补受试验，因而我的时间便不能不为试验准备而花费。但我从上海回来时还带回了好几件工作。第一件是替穆木天修改那部王尔德的《童话集》，第二件是译完《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三件便是准备《创造》季刊的文章。这些工作我是在试验准备和学课的余暇中完成了的。还有那被扒手扒去了的那一百块钱的买书费，算我自己是学医的人，我把我自己的医书拿了好些来抵充了。

---

①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时事新报》载《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说：“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

《创造》季刊既已预告在明年的正月一号出版，发稿至迟便当得在十二月以前。那第一期的稿件，除达夫的那篇《茫茫夜》之外，通是我集成的。我在十一月以前已经陆续把稿件集齐交给了达夫，只期待着到了正月一号便可以如期出版，但不料第一期便愆了期。愆期的原因就是等达夫的那篇《茫茫夜》。达夫是心雄万夫的人，如在一种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压卷，他是不肯苟且的。他到二三月间才把稿子发出，发了稿之后便回到日本受毕业试验；第一期自然没有经过他的勘校和指点，一直迟到五月一号才出了版。产生出来的结果倒还马马虎虎可以过去，单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经是拍案惊奇的大文字了。但是那排版的拙劣，校对的荒疏，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刊物中怕要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录。有一位热心朋友替我们统计过，一册创刊号的错字在二千以上。还有同时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错误在五百以上。

由于校对的荒疏，同时还惹起了一件小小的悲喜剧，便是田寿昌的抗议了。寿昌在第一期中发表了那篇《咖啡店之一夜》，使我们在纸上领略了一番“咖啡店情调”。他的原稿先是寄给我，由我转寄上海的。他没用原稿纸，只是在随便的纸头上乘着自己的兴趣挥写出的。笔下的龙蛇已经飞舞得有点骇人，他那时做文章还沿着旧时刊物的习惯，凡有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点，因而愈加是满纸的云烟。那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涂抹添改很不少，而他在纸上又是写着两面。我最初接到他的原稿时已经就在担心，怕一定会弄出不好的结果。结果是果然不出所料，他的那篇文章错处最多。寿

昌在这儿便生了一个疑心，他疑达夫改窜了他的原稿，有意要陷落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他很严厉地叫我替他把原稿索回，要在别的刊物上再行发表。他说他可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多。我是相信达夫决不做那样卑劣的事情的，我把达夫不曾经过勘校的情形告诉了他，又告诉了他泰东的校对素来是荒谬绝伦的，劝他不要疑心朋友。即使真有怎样的改窜，待我在暑假期中回国去检查原稿，查明之后再作理论。当时算好，寿昌听了我的话便没有急切地和达夫决裂。他还把应该在第二期发表的《午饭之前》寄给了我。

六月尾上学校放了暑假，泰东给我寄了一百块钱的路费来，我在暑假期中又回到上海。最先在马霍路的楼上把《创造》季刊第一期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来校勘了一遍。寿昌的原稿是还保留着的，结果是证明了他的多疑。从那原稿上除掉为保持杂志的统一，把那密圈胖点删除了之外，丝毫也没有更改。原稿我寄还了寿昌，他的疑团也就冰释了。

回到上海最感受着惊异的是邓均吾的进步。去年在上海同住时，只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他的英文还好，对于旧式的诗词也有些教养。我走的时候曾经把我所有的一本英译的《海涅诗集》送给他。隔了一年回来，他已经把那《海涅诗集》读得烂熟。他自己还写了一册新诗稿，交给我看，他那诗品的清醇是举世无匹的。在《创造》季刊二期和三期上所发表的《白鸥吟》及其它①，便是经过我替他挑选过的作品。

①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载有邓均吾《心潮篇》诗三十二首，第二卷第一期上载《白鸥》诗十七首。

马霍路狭隘的楼房又添了南公老板的两位亲戚，实在住不下了，他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便顶下了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我回上海不一个礼拜的光景，便搬到哈同路去了。那儿比马霍路要清静一些，起初是一个人住着，也觉得很舒适。不久我便把《创造》季刊的第二期编出了。

就在我移到民厚南里之后没两天，高梦旦先生和郑心南同学又来访问过我一次，适逢其会我又不在寓里。那时候商务的编译所已经改组成四部，心南在担任理化部的主任，何公敢在担任庶务部的主任，凡是稿件上的交涉都是由公敢经手的。不久公敢也来找我，他说梦旦的意思是叫他和我订下一个契约。凡是我的著译可不经审查，售稿时著作千字五元，翻译千字四元。据说这在商务印书馆是最高的价格。公敢又说，这种优待是对于我的一种报酬：因为去年梦旦托过我为他的侄子调查过医院的事情；但他的令侄在未能渡日之前已在沪上病殁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怎样尽力，没有资格受这样隆重的报酬。同时也觉得还没有售稿的必要，所以把这项契约只在口头听了一番，并没有写在纸上。

达夫在春间把东大的毕业试验通过了之后，早已回到安庆服务。他利用着暑假也到上海来了，他便和我同住在民厚南里里面。那时候肯到寓里来的有张闻天、吴明、汪馥泉① 诸人，他们当时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次。来

① 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川沙（今属上海）人。著有《青春的梦》、《旅途》等。　吴明，即陈公培（1901—1968），又名陈善基，湖南长沙人。　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时谈话的对象多是达夫，和我是少有交涉的。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①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象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在那时文学研究会的人和我们已经是有些隔阂了。发起时的劝诱经了寿昌的不置答复，去年夏间劝了我两次参加，我又婉谢了。《创造》季刊出预告时，达夫又暗射了他们"垄断文坛"。于是乎在不知不觉之间便结起了仇怨。《文学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骂我们，例如骂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便是指郁达夫；骂"盲目的翻译者"便是指我和寿昌。②《创造》季刊出版之后更蒙沈雁冰以郎损的笔名加了一次酷评③，所谓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颓废派，便一时甚嚣尘上起来。我们的刊物是季刊，大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对于别人的攻击，只有忍受。但我们毕竟还年青，一回到上海，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有达夫的

---

①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诗人、作家。著有《踪迹》、《背影》、《诗言志辨》等。

②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文学旬刊》上署名"CP"的《丑恶描写》中说："……那几个新文学家的性欲描写，固然不如旧式淫书之甚，……然而至少也已使这些地方给他们的全书以洗扫不掉的污点了。"又，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文学旬刊》上署名"西谛"的《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说："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e)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贵推(Geothe)的《法乌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

③ 此文题为《〈创造〉给我的印象》，载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二十一日、六月一日《文学旬刊》，署名"损"。

《血与泪》的那篇小说写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铎诸人在当时所空吹的“血泪文学”的。我也有《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评坛》的两篇文字，在正式地和他们交绥。那时又是柯一岑在编辑《学灯》，达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学灯》上发表的。我们当时的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雁冰在当时虽有些比较进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见得和振铎相同。文学研究会的几位作家，如象鲁迅、冰心、落华生①、叶圣陶、王统照②，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药。雁冰在那时能够同振铎合作，倒是我们的一种惊异。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

这种意识，一方面促进了我们对外的抗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们的内心的哀感。我们感觉着寂寞，感觉着国内的文艺界就和沙漠一样。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达夫把《血与泪》写成之后，我们到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市部去。赵南公正在过瘾，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一下，问及《创造》季刊的销路，他

① 冰心，原名谢婉莹，一九〇〇年生，福建长乐人。作家。著有《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　落华生(1893—1941)，原名许赞堃，字地山，祖籍福建龙溪，生于台湾。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印度文学》等。

② 王统照(1898—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童心》、《一叶》、《山雨》等。

说："初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这样的一句话在那时使我们感觉着特别的悲哀。创刊号由五月一号出版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才仅仅销掉千五百部——其实这在当时已经要算是很好的成绩了——我们感觉着同情我们的人真是少，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象只有他和我两个孤另另的人一样。

——"沫若，"达夫叫着我，"我们去喝酒去！"

——"好，我们去喝酒。"

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第一次是在一家面馆的楼上，我们喝了两壶酒，以后叫添酒菜，怎么也叫不来，一座大楼上空空洞洞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把头伸出楼外一望，酒店招灯上的红字是用白纸贴了的，原来才是有丧事的人家。我们急忙下楼去付了钱，又跑进别一家馆子里去。第二处也因为堂官送来的酒接济不上，饮了几壶又冲出去了。最后一家是在那青莲阁旁边的一座酒楼上，两人坐在一张方桌上吃喝，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两个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几壶酒。我们平时是没有那样大的酒量的。我就到现在也还有点怀疑，我恐怕喝到后来的一些壶数，堂官看见我们喝醉了一定是作了假的。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双眼睛就象要迸出火来的一样，可他说过的一些话，我现在通不记忆了。我只记得我们决定请仿吾出来主持社务。

两人都喝醉了，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象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象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面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连忙去把他挽着，汽车从我们的身旁取了一个抛物线形跑过去了。

虽然和文学研究会的人有些意见，但也并不曾怎样的决裂。记得在八月初头达夫发起过一次"女神会"，是纪念出版后满了一周年的我的诗集《女神》。这种聚会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达夫要把它输入中国。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达夫拉着我到闸北去找振铎，请他们参加。振铎那时候是一个人住在一层楼房里，书架上陈列着不少的古书。在深处的一角，一张长条的书桌后面，有圆顶的罗纹帐子罩着一尊小巧的床，那床想来定是单人用的钢丝床了。振铎高兴地答应参加，并答应要多多邀约些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出席，想借这个机会来组织作家协会。

开会是在晚上，地点是在一品香，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到的有振铎、雁冰、谢六逸和卢隐① 女士诸人，日本帝大出身的同

---

① 谢六逸（1896—1945），号无堂，贵州贵阳人。著有《水沫集》、《茶话集》等。　卢隐，即黄庐隐（1898—1934），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著有《海滨故人》等。

学也到了不少。那回雁冰先生在席上确是含着敌忾地演说过一次，组织协会的事情就没有提起。席终后在屋顶上还拍过照，但那次的照片我不曾看见过，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一〇

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商务编译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来的"孤军派"，集合起来要出一种政治性的刊物。主脑是陈慎侯①，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学。他们的主张，起初是以"约法"为中心，主张恢复"约法"以维系中国的大局。他们说，这种主张是和当时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派②，主张劳农革命的共产党成鼎足的。他们的杂志本可以在商务出版，因为不便说话，便托我介绍由泰东刊行，因此我也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列过几次席。我那时候的知识实在不足以参加他们的讨论。我每次都是旁听，并没发言。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总是有点迂阔，他们主张护法，主张裁兵，在当时自然谁也都感着切要。但怎样来实现呢？靠着一本杂志的宣传，能使当时破坏约法的、拥着私兵的督军们觉悟吗？我对于他们的主张，出马便有点怀疑，但那里的同人大都是同学，而且多是专门研究政治经

---

① 陈慎侯(1885—1922)，名承泽，福建闽侯人。《孤军》杂志发起人，曾编辑《时事新报》、《救国日报》、《学艺》等杂志。著有《国文法草创》等。

② 一九二一年十、十一月间《晨报》副刊先后发表署名费觉天的《万能的好政府主义》和胡适之的《好政府主义》；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王宠惠、梁漱溟、丁文江、汤尔和、罗文干等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好人政府"。

济的人。特别是那位陈慎侯，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就采取了好意中立。

慎侯是福建人，在辛亥革命时是参加福建起义的一个人。他以福建代表的资格参加过南京的参议院。等到政权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却跑到上海，当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专心在于他的国语文法和国语整理的工作。他主张把中国通用的字数限定，限成九千字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汉字一样，那在教育普及的过程上是必经的阶段。他的生活很朴素，思想带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明确地给他一个估定时，大概是一位社会民主派。他是尊重法的，他要以法来维持着国家的机构，在法的维系之下再进行着社会的改革，以达到将来的“大同”。他反对个人主义，因而也就反对恋爱神圣。因为我翻译了《少年维特》，那里便有些神圣恋爱的话，在有一次他们的讨论会终结了之后便谈到了这个问题来。

他说：“恋爱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冲动，结局是要把对方占有。这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矛盾的。你是‘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为甚么又主张恋爱神圣呢？”

他这句话实在是把我问穷了。我自己虽不曾主张过恋爱神圣，但既翻译了歌德的东西，自己便不免要负一番责任，我便取了一种解释的态度。我说：“凡是我们，在恋爱中是要陷到一种无我的态度，假如是文人，在这时候每每有平时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涌出，平时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诗人们的所谓神兴，所以诗人们便神圣视之。这种感情虽然结局是在占有，但因两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会服务的精神，我觉得

在理想的社会之下是不会矛盾的。”

他反对我这种说法，始终强调着那占有排他的一面，并且说自古的帝王因为恋爱，因为女色而亡国败家的不计其数，无论怎样不能认为神圣的感情。特别是年青人，对于这种感情尤当尽力地控制。

他的话我不大心服，但我也不能驳倒他，只是说恋爱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想这样含糊了事；但他并不肯放松。他说：“你既认明恋爱有坏的一面，那就不能认为神圣了。”

结果是他占了胜利，我没有再说甚么。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他是怕恋爱神圣说一出，会使得中国的青年都陶醉于恋爱，把正当的工作抛掉。这是他淑世精神的表现。但我现在可以增加几句：恋爱和吃饭、睡觉是一样，在人生是一种不能缺少的冲动，用不着神圣观，也用不着罪恶观。饭吃多了要生病，觉睡过了要惰业，恋爱失掉了节度自然也有它的害处。但是理想的恋爱，能使恋爱双方更好地为实现理想社会而服务，却是可以断言的。

就在那年的八月，在《孤军》① 尚未出版之前，慎侯便中了丹毒死了。《孤军》失掉主宰，一时有中止的形势。后来在何公敢的领导之下，仍然出了版；他们在第一期上请我做过一首歌，便是那首《前进曲》②。

---

① 综合性月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五年十月停刊，何公敢等主编。

② 发表时题为《孤军行》。

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由于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孤军派主张护法，不赞成用流血手段，他们同时也在反对胡适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但其实护法的主张也不过替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办法而已。约法恢复了，总要人人能遵守约法，那不就是“好人”吗？

在政治上我虽然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但在文学的活动上和这种想法并没有怎样有机地连络起来。《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歌颂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锄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要主张流血，那先决的条件便是武力问题。空洞地主张流血的人碰着这个实际上的问题，便没有方法解决。他要为自己解嘲，那空想者便不能不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而率性高蹈。暑假期中，我在上海译出了《卷耳集》，暑假过后回到日本

又译出了《鲁拜集》①，做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完全就是那种态度的表现。《孤竹君之二子》浓厚地带着虚无主义的色彩，记得是邓中夏批评过，他希望我少做那一类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类的东西。② 其实两篇都是一种倾向，只多少有些消极和积极的不同罢了。

日本的资本主义在欧战期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欧战过后便遇着了恐慌的危机。重要的原因便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要在世界商场——很荣幸地几乎就是我们贵大中华民国的别名——继续他们的经济战了。日本产业界中所必然发生的倾向便是资本的集中，小资本家的破产，零碎事业的中断，猖獗的"成金风"之平息。这个现象从那博多湾的一角上也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博多湾中的筑港工事中止了，那座象王宫一样的抱洋阁，渐渐萧条了起来，终至不能经营，在一九二二年的春间，全部拍卖了。

买了抱洋阁的是新起的博多湾沿海铁道会社，买来打算改成公司的办事所。但在未改公司之前，空了有半年光景。公司派了一位技师看守，但那技师和福冈市上的一位伎女姘上了，兼顾不到抱洋阁来。他便托了一位在抱洋阁附近住着的

---

①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 1048—1122)著。

②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湖南宜章人。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青年》第十期《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说："郭沫若君颇喜用古事做新诗新剧，这是对的，有人讥笑他'迷恋骸骨'，那就未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了。不过郭君所作，如《孤竹君之二子》，如《女神》等等，命意为我所不赞成，假如他的作品，尽象《棠棣之花》，那就好了。所以我对于郭君技术上大体赞成，而思想上却希望他更进步。"

工头代他管理。工头的家和我们的寓所相隔不远。我们在那箱崎町上住了已经三年，自然是相识的，逢年过节也时而有些往还。那工头的老板娘想到自己一家人住在那王宫一样的抱洋阁里，在扫除上要大感困难；同时她的经纶似乎也很不弱，她利用那技师的弱点，便私自把抱洋阁的一部分向我们开放了出来，她请我的女人和他们同住。于是在那暑假前后的几个月中，那临海的几层楼房便成为了我们的居室。在三年前我在岸上羡慕着楼上的人如天上人的，在三年后的我自己却被岸上的游人羡慕为天上人了。

临海的第三层楼上是六十铺席面的房间——这“六十铺席面”假使日本人听了立地便要大吃一惊。因为日本式的房屋通用席面计算，席面的广度是有一定的。一席宽约三尺，长约六尺，普通的居室大抵是八铺、六铺、四铺半的规定。那样大的房间在前是作为筵会场使用的。临海的东北两面都有回廊，廊外有栏杆，博多湾的景色毫不吝惜地全部裸示在面前。大房间的西南角上又还有一间三铺席面的小屋，这不用说是搬运食案上楼来的中继站。

我在回廊上摆了两张由上海买来的藤制睡椅，安了一张短桌在那大房间里面，那儿便成为了我临时书斋。有时海风太大时，我又把短桌移到后边的小室里去。

就在那样的广居之中，我译出了《鲁拜集》，做成了《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想写达夫和我在四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写成小说的。但我对于现实的逃避癖，却又逼着我把伯夷、叔齐写成了那样一

篇不成名器的作品。我开始写时，本打算写出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挨饿时的心理。为求得实感起见，我有一天实行地饿过一次。早饭、午饭通没有吃，睡在回廊上的长椅上，等待着饥饿心理的到来。早饭不吃，倒还没有甚么；到不吃午饭，那真是受了点熬煎。饿着肚子幻想着伯夷、叔齐，同时是想借伯夷、叔齐的史影来暗射当世，因此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构成之前，我却得着了《哀时古调》九首的副产物。那几首是用古诗格调写出来的，自然只是一些歪诗，但在可以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我自己的心理上，它比《孤竹君之二子》却是更有意义。我现在把它写在下边，自己来加一番注脚。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阮嗣宗，刘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对日抚琴的嵇康是在二楼的一室里弹着钢琴的陶晶孙①。晶孙本来要迟我一年，但因为我回上海去停了半年学，我们便同在一班了。他花了六百块钱买了一架钢琴，一有空闲便在一东二冬地弹奏。我们迁进抱洋阁之后，他也一同搬了来，寄居在二楼的临海的一室里。他那一东二冬的琴声正在伴奏着我的饥肠的跳舞。

一椀饭，五羊皮，

① 陶晶孙(1897—1952)，江苏无锡人。作家。著有《音乐会小曲》等。

养活淮阴侯，买死百里奚。
伯夷、叔齐首阳山，
不合时宜该饿死。
四支，五微，秋高马正肥。

这是那晚和达夫醉酒时的情绪。泰东老板对于我们采取的便是“一椀饭，五羊皮”的主义。他知道我们都穷，自然有一椀饭给我们吃，时而也把些零用钱给我们用。但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的买活便不能不尽我们的奴隶的劳力。我们不曾受过他的聘，也不曾正式地受过他的月薪。我们出的书不曾受过稿费，也不曾算过版税。他以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来羁縻着我们。我们所受的恩惠虽是有限，而所尽的义务却没有可言满足的一天。因为这儿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们的自由无形中是受着束缚的，譬如商务印书馆要聘请我们，我们便不好向高处飞。受着这样的束缚，善于自行解嘲的人，自然可以美其名曰“高洁”，曰“不合时宜”，自然也就可以自比为伯夷、叔齐了。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我们出马的时候假使是亚东，是群益，它们都一样地可以做我们的主子的！

羡煞人，黄金印，
顺口说合纵，横目说连衡。
富贵在天生有命，
一朝尸被五牛崩。

酒醴，三牲，准备哭苏秦。

这指的是当时的一批政客，特别是那时的一位“小徐”（徐树铮）①。

唐藩镇，势绝伦，
当年炙手热，今日几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尽，
满池鹅鸭可成兵。
虎口，当心，骊龙有逆鳞。

这指的自然是当时的军阀。

白居易，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犹自嫁商人。
怀抱琵琶邻舟去，
赢得青衫泪满襟。
五鼓，三更，关公走麦城。

这儿所说的徐娘是指当时的徐世昌②。那位老头子卖名卖到晚年，不料他的权势欲是很大的。苦心孤诣地运动到做

---

①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北洋皖系军阀，安福系骨干。

② 徐世昌（1855—1939），号弢斋，原籍天津，生于河南汲县。曾任清体仁阁大学士、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政府国务卿。一九一八年由“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

了一任大总统，后来被段祺瑞赶跑了，跑向天津。

孙悟空，齐天圣，
十万八千里，只消一翻身。
才闻专使拜曹公，
又见三桂哭清廷。
三正，五行，相克还相生。

这是在讽刺当时的国民党，因为一时在联络曹锟①，一时又在联络张作霖②。

楚狂人，笑孔丘。
七十二大贤，三千小猕猴，
包办中华教育界，
老庄无分吃猪头。
三跪，九叩，缘木把鱼求。

中国的教育界有这样包办的一群人，这是无须乎再来加注的。只是那一群人在当时正叩头百拜地向北政府请发薪水。

博浪椎，何处有？
荆轲今已死，狗屠不可留。

---

① 曹锟(1862—1938)，字仲珊，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

②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北洋奉系军阀首领。

陈涉、吴广起田间，
农民之中今在否？
一笔，全勾，醉死梦生侍！

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时的情绪。

天风吹，海浪流。
满怀悲愤事，聊以寄筌篌。
神州原来是赤县，
会看赤帜满神州。
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耨！

这儿明白地露出了一个“赤”字，但奇怪的是这几首诗里面骂了政客、军阀、官僚、党人、教育家，却没有提到在这些傀儡之后牵着线子的人物；追慕了些Lumpen-proletariat①，一跃便想把中国赤化了。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这便是我当时的一个如实的写照。——

肚子实在饿得难以煎熬，在那六十铺席面的三层楼上当着海风，熬出了这几首哀时古调，把赤化问题、饥饿心理、《孤竹君之二子》抛在一边，自己跑下楼去把冷饭来填了一肚子。

---

① 作者原注：流氓无产阶级。

一一

回福冈不久，达夫从安庆寄了一封很悲哀的信来，同时寄来了一份胡适编的《努力周报》①。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骂我们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②。达夫挨了骂，他便异常地悲愤，写来的信上说，他要跳黄浦江。我得了信，又看见了胡适的那段杂记，也很悲愤。我尤其怕的是我的朋友会真个跳进黄浦江里面去了。

先是达夫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夕阳楼日记》③，指摘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④由英文重译出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错误。余译的错误委实很厉害，但不幸达夫的指摘的开首的几句中有"establish"的一个字应该是"证

---

① 综合性刊物。一九二二年五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三年十月停刊，胡适主编。

②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努力周报·编辑余谈》中说："但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

③ 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④ 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湖北黄陂人。曾编辑《醒狮》周报。著有《国家主义的教育》(与李璜合著)。

实"或"证明"一类的意思，达夫又译成了"建设"(恐怕是"建说"的误排)。胡适大博士便抓定了这一个字，又把达夫所指摘的几句重译了一遍。但我们大博士的翻译更错得一塌糊涂，连"while"这个极普通的英文，都译成"虽然"去了。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德国哲学家威铿① 的著书，因此要使问题得到最后着落，就必须查看德文原本。我有德文原本第四版，和英译本的内容完全不同，达夫所指摘的那几句根本没有。英译本所根据的是初版，在这儿却于不意之间得到一个重译之不必可靠的实证。便是著者本人已经废弃了的文字，在别一国的旧译里却珍重地被保留着。这个事实，我想就让我们尊重重译的鲁迅先生，无论怎样把他手中的一只笔自由自在地曲，曲得就象卓别麟② 手中的一根手杖，也是难于曲护的。但这当别论，我们要驳倒胡大博士的《骂人》，自然又当去找寻威铿的初版。这却是难事，因为问题不是买书，而是买骨董了。

仿吾的见解不期然地和我两相契合了。他那时候已经到了上海，田寿昌应中华书局的聘也回到了上海，仿吾便在寿昌的藏书中找寻到一本初版，他给我寄了来。结果是发现初版的原文和英译文都很有距离。原文只是半句话的文章，英译者竟译成了好几句。胡大博士的重译不用说和原文是更隔了

---

① 威铿(R. C. Eucken, 1846—1926)，通译倭铿，德国哲学家。著有《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哲学导论》等。

② 卓别麟(C. S. Chaplin, 1889—1977)，通译卓别林，英国出生的美国电影艺术家。编导并主演的影片有《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

十万八千里了。胡大博士结果仍然是错了的(参看《创造》季刊第三期中《反响的反响》)。

全书译得不成名器(即是本无译书的能力,因投机而不负责任地乱翻)与偶尔有一二字的误译,这本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达夫的误属于后者。然而胡大博士的身份却拿得十足,他指摘了达夫的错误,骂了我们"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又还说了一句"彼此都是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郁达夫和余家菊都是才毕业的学生子,有好深一点的水,落到我大博士手里,你看,怎样了,不空落得一个"浅薄无聊而不自觉"的骂名吗?是的,可怜那大博士的骂语却不折不扣地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我们这位博士只是一位有些常识的启蒙家,而他的常识也不是怎样高级的。我这样空空洞洞地说来,显然也有些心存报复地在骂人,让我在这儿把他的文章来举个例罢。

我手里有一本《新月》① 月刊二卷十号,那里面有胡大博士的一篇高文,便是《我们走那条路?》,那篇大文章开端处引了一句《淮南子》② 上的话,他说"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态"。

> 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今本作"则易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今本作"则陷沟壑")。

---

① 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初为文艺性刊物,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编辑;二卷二号后为综合性刊物,梁实秋、胡适、罗隆基等编辑并撰稿。

② 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

（原注：淮南《泛论训》，文字依《意林》引。）

我们的大博士引用了这一句古语，十足地表示他是一位学者；而且他的标注更表示出他是一位精细周到的考据家（可惜“蹈于沟壑”四个字似乎是依据《御览》①，“于”是作“於”的），不是寻常的学者；这样一位大学者的高论你还不好信吗？所以博士先生的引古是有意义的，便是标注也是有意义的。但可恨我们多生了一副脑筋。我们只要让自己的脑筋来思考一下，便会知道《淮南子》的话完全是睁眼子说的瞎话，世间上绝没有那样无聊的瞎眼子。我们知道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视官虽然失了，在视官以外的听官、触官，乃至所谓第六官，比睁眼子更锐敏得多。他能够以听官、触官来补足视官的缺陷。他能够因丝微的气流而辨别方向。他能够依杖梢的点触而辨别高低。他的耳朵上有眼睛，竹杖上有眼睛，脚上有眼睛，全身的皮肤上都有眼睛。所以我们在极繁华的都市上，每每能够看见有独自一个人能够上电车的瞎眼子。瞎子走路，绝不是“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的。淮南王刘安②是两千年前的人，那样的话作为两千年前的常识倒还没有甚么；而我们胡大博士就好象从前的闱墨文章爱引“子曰”、“诗云”的一样，引用来做了自己的木铎（motto③），那是证明了胡大博士的常

① 即《太平御览》，宋李昉等奉敕编撰，凡一千卷。

② 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西汉文学家。著有《淮南鸿烈》。

③ 英语多义词。一译为箴言、标语；又可译为书卷前的引用语，或印有广告语的糖果袋。

识至少是落后了两千年。

学学博士的笔调:"古人说得好:文章争一起。"胡博士在一起上想以学者的资格来钓人,可惜我们在这一起上已经看穿了他的落后。他以后的文章,除非是好事家或者同是爱说瞎话的睁眼子,是可以不必看的了。但我们为忠厚起见,不妨再看一下他的下文。

博士说:

>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
> 第一大敌是贫穷。
>
> 第二大敌是疾病。
>
> 第三大敌是愚昧。
>
> 第四大敌是贪污。
>
> 第五大敌是扰乱。
>
>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加圈照原样)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象巫师一样一里招来、二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

门。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胡大博士在疾病的项下举了一项疟疾，他把疟疾说成亡国灭种的大病，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疟疾的可怕甚于肺结核，甚于花柳，甚于鸦片”。这位先生假如多少学过两天近代的医学，我想他断不会这样的夸张；同时凡是多少学过两天近代医学的人也立地会知道他张皇得真有点程度。我们暂且就把疟疾来做譬比罢。这是由于病源虫Plasmodium所唤起的疾病，有间日疟、三日疟、四日疟等的类别，但假如这几种疟疾的病源虫同时侵犯了一位病人时，由时间的组合上可以形成不规则的疟形。这种病是有特效药的，便是金鸡纳霜(Quininum)，用得得法时可以药到病除。古时候没有这样明确的知识，故也苦于无法治疗，在中国更是当成鬼病在处治。说起那鬼状来要举出“五大仇敌”可以俯拾即是。第一大敌是寒热间作，第二大敌是肝脾浮肿，第三大敌是谵呓迷离，第四大敌是食欲不进，第五大敌是衰弱无力。假使不顾惜纸面，还可以举出好些。在古时当鬼病治的时候，便是对于这些征候“一点一滴”地想方法，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照着那样办去，或者也怕会弄到胡大博士所夸张的那样，亡国灭种了。但到现在已经不是再见鬼的时候了！现在有特效药来扑灭病源虫（古时疟疾也每服药而愈，是因药中含有鸡纳成分)。有预防的知识来扑灭那传播病源虫的媒介。(这是一种花脚蚊子，立在壁上后体斜翘与壁面形成一种角度，学名为anopheles，见了这种蚊子务请打倒，千切不要怀疑说这蚊子并不在疟疾之内！)而且还有一项新奇的知识，便是利用疟疾来医治淋病、梅毒。

因为后二者的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热的，疟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热，可以扑灭那些病源菌。去了虎再来驱狼，这可以说是以毒攻毒。但是要有明确的医学知识的人才行，倘是见鬼医生，听了都是会骇倒的。

说到了梅毒，再来谈谈梅毒罢。从前在上海的小报《晶报》①上看见过一篇文章，说胡适博士害过梅毒，确否虽不得而知，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来比疟病还平常的人，而在我们学过医的人看来，梅毒患者和疟疾患者也是一视同仁的，倒没有甚么名誉不名誉。即使说胡适博士害过梅毒是讹传，也就如说胡适博士是得过疟疾一样，倒也不会发生毁坏名誉的诉讼。而且我们还知道，梅毒单由简单的接吻也可以受传染。好了，还是来谈谈梅毒。博士先生把梅毒看得来比疟疾还平常，我想这是因为知道了有"六〇六号"的特效药的原故。但其实这病依然是可怕的。病由驱梅疗治即使断了根，便是把病源菌的Spirochaeta pallida扑灭了，但那病菌的尸骸留在人体里，在神经系统中有时仍然要发出种种不愉快的脑症和脊髓痨。那究竟不是疟疾可比的。但就有这样稀罕的例症也还是要用根本的驱梅疗法，不能够委弃梅毒而不治，或者是在梅毒的征候中举出五大仇敌来打倒。拿第三期的梅毒来说罢：第一大敌是毛发秃落，第二大敌是鼻头腐烂，第三大敌是声音变哑，第四大敌是骨髓疼痛，第五大敌是运动不灵。此外还多，还多，让你去一点一滴地去打倒！

---

① 原为《神州日报》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始单独发行。

哼哼，我们的博士先生"浅薄"得真是有点可爱。他说"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是的，内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国的金融、交通、矿山、纱厂等等是在贵何国度的贵何主义、贵何阶级的手里呀？他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只是在名词上玩把戏。他说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说法（但那种说法已经靠不住，周代的诸侯大多数是自然生长的国家，当时的社会还是奴隶制度）；现在所谈的"封建势力"是指在行帮制下的各种旧式产业，在地方上割据着的军阀、官僚、地主的那个连锁，以及因之而发生的各种痼弊的迷信与腐化（胡博士所说的五大仇敌都包含在这里面），这些是崩坏了的吗？问题不是徒逞唯名的（nominalistic）诡辩，而是要你看着事实！更可爱的是我们的博士问"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这该不是多喝了两杯洋酒时说的话罢？因为这等于在问："疟疾的病源虫为什么不侵害Pl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为什么不侵害Spirochaeta pallida？"先生是无知呢，那倒还可恕，因为他究竟还年青，还可以再读几年书来再谈。虽不能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①（胡博士的原文很严正地引用了这两句，其实世界上并没有这样大的牛皮），至少可以说"一言可以留芳，一言可以遗臭"。

---

① 语出《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

其实中国积弱的病源，就象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寻正确的道路一样，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毕竟早已摸着了。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遵循民众所找寻到的正确道路，只是象五牛奔尸一样乱跑。弄到现在来还要让我们的博士问“我们走那条路？”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门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你便是跨在这两个肩头上的人。没有这两个跨足地，象你那样个学者，无论在新旧的那一方面，中国虽不兴，实在是车载斗量的！

这一个例证举得未免太长了，还是收回本题来，便是我们的博士始终是一位稍稍有点常识的启蒙家，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他这个启蒙家是起过相当的作用的，所以他当年骂起人来也很有使我们达夫先生想跳黄浦江的力量。但我想假如达夫现在肯来骂骂胡适，那或者怕会使我们的博士去跳瓦儿池①罢。

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②，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

① 作者原注：瓦儿池者德国的跳舞Waltz之音译也。

② 指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作者的《反响的反响》，均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参加过这场官司①，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②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③。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④，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摘⑤。还有是“诗哲”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浪滔滔”。这场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但我们那位聪明的夕阳楼主，他是最先把兵马收了的。这是后话，在下边自然要慢慢地谈到。

仿吾由长沙再到上海是在我们离开了上海以后，他便住在我们住过的民厚南里里面。在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田寿昌受了中华书局的聘，也由东京到了上海，寿昌是住在民厚北里。同在民厚里里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们的两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会想到创造社的进行是会要更加圆满的。但不料在

①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时事新报·学灯》载戈乐天《批评缁译的批评》一文，指责余家菊、郁达夫、胡适译文的错误。该报主笔张东荪在此文后加了一段按语，附和胡适，袒护余家菊，攻击郁达夫和郭沫若。

② 作者原注：原意：手势戏容易看懂，喜剧则不然。张译为“手势戏开场，喜剧终了”。（见张东荪所译柏格森《物质与记忆》。——注释者）

③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文学旬刊》载何宏图《杂感》一文，文中说：“试看最近的某种刊物，其中有一位自命现代批评家的，象那由黑松林里跳出来的李逵一般，手持板斧乱斫，他的那种态度，我们还不能承认他有在文坛上发言的资格。”

④ 吴稚晖（1866—1953），原名朓，江苏武进人。他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一、三、四、五日《时事新报·学灯》连载《就批评而运动“注译”》一文，主张翻译须逐字逐句直译并加注释。

⑤ 陈西滢（1896—1970），名源，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他对《茵梦湖》的指摘见《译本的比较》，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太平洋》月刊第四卷第二号。

这儿有小小的一点意见，使寿昌和仿吾决裂了，并因而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事情是《创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后，仿吾由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是在季刊三号上发表的。信中批评了第二期里面的作品，批评了达夫、资平和我。中间有一笔带说到寿昌的《蔷薇之路》。仿吾说他不知道寿昌为甚么要把那样的文字来出版，他对于他的前途真是绝望了。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给仿吾编入第三期，是用红笔把那两句勾了的。寿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时相过从，不幸有一次寿昌在仿吾的抽屉中看见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见了那用红笔勾了的两句。那使寿昌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中间虽也经过我的通信调解，但两人终于决裂了。我早就在这样想，寿昌的离开创造社虽以仿吾的信为其近因，其实是有远因埋伏着的。寿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那个学会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寿昌在前虽不必便是怎样鲜明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别多。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寿昌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参加创造社，他在出马的时候便不怎样热心，可以说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友谊。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甚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这种意识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隐隐成为对立。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意识在作怪！

一二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福冈足足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把医科大学弄毕业了。但终因自己的听觉的不灵，做医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抛弃的。

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封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他又说，知道我的周围有一位陶晶孙，他希望我介绍给他做朋友。晶孙我介绍了，但是北京我却没有意思去。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的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

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国，并回到已经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没有甚么。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着我跑向未知的国土的，在她当然是别有一番感慨。——我现在问了她，问她当时的感慨怎样。她说："好象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象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她当时如果是这样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骗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间，把前楼让给了我们。均吾又搬回马霍路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三个儿

子，第三子的佛孙生后刚满两月。我毕业了，家里给我汇了三百块钱来，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块钱便是我唯一的财产。我最初的计算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译稿整理出来，以了结一重公案。译好之后或回四川，或到什么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东编辑所里，也和我向来是一样；他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虽然蒙我们的鲁迅先生把他归之于"流氓痞棍"之例，更斥之为"极左的凶恶的"，但我在这儿是要为他严重抗议的。——自从去年十月到了泰东，住了半年，除吃饭而外，也没有用过泰东一个钱，弄到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那时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广东担任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托他们的军长谭组庵①先生为仿吾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笙②先生，求在商务的编辑所里面谋个位置。菊笙先生是商务的元老，组庵先生是军长，他们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称"年兄"而知道的）。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可以做个二等编辑，每月拿它一百五十块钱，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击为止，他都还安闲地吃着一碗安乐饭的罢？

回到上海之后，商务的同学们多肯来访问我们。庶务主任的何公敢又来提起了著译契约的事，还是著则千字五元，译

① 谭组庵（1880—1930），名延闿，湖南茶陵人。一九二三年七月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七月任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兼任军长。

② 张菊笙（1867—1959），名元济，浙江海盐人。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著有《校史随笔》、《涵芳楼烬余书录》等。

则千字四元，不经审查的旧议。我当时谈过一次笑话，我说："著译未免太辛苦了，能够每个月送我几百块钱，我倒一定要拜领的。"公敢说："你的资格可惜还不够啦，你要想闹到梁任公、胡适之一流的资格，总怕还要等几年。"自然我们彼此都是一笑。因为公敢并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话只是含着讽刺的意义。契约的事依然保留着了，也没有说订，也没有说不订。

不久达夫带着他的夫人和龙儿和一个丫头由安庆回到上海来了，他是因为甚么事情卸了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因此，那时的达夫要算是失了业的人，我们觉得他很值得同情。说也奇怪，我自有生以来不知道就过甚么业，偏在同情达夫的"失业"。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聚集在民厚南里，在谈笑之间决定了一个路线，便是过"笼城生活"。仿吾的那封介绍信不投交，我的著译契约也不缔订。可怜的那几个封建余孽！他们竟想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不过那时候已经不止是伯夷、叔齐，而是加上仲雍①了。

决定了过笼城生活之后，第二步便决定出《创造周报》②。商议地点是在马霍路的楼上，达夫那时是住在那儿的，写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茑萝行》。那个提议的首倡者是达夫、还是仿吾，我现在不记清了；总之不是我，我是可以断言的。路线一决定之后执行得却很勇猛。达夫在四月下旬回富阳去了，我们

① 仲雍，又称虞仲、吴仲，周太王次子。太王欲立少子季历以传其孙昌(即文王)，仲雍和兄太伯文身断发避往江南荆蛮之地，后立吴国。

② 文艺性刊物。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创刊于上海，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停刊。

没有等他，赶在五月一号便出版了第一期《周报》。所以要赶着在五月一号出版的，与其说是为要纪念劳动节，宁可说是为要纪念创造社的满了一个周年。——《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千巧万巧地是挨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劳动节日才出版的，这却成了创造社的意外的一个光荣纪念。特别是仿吾，他把这个日期看得分外有光辉。仿吾异常的猛勇，在《周报》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中国的所谓诗坛，爆击得比今年的闸北怕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都可以得罪人，那个敢有那样天大的胆量再来言"战"？仿吾因为那篇文章便得罪了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一些大贤小贤。然而仿吾的报应也觌面了。他在用爆击弹，而在敌对者方面却用的是毒瓦斯。《时事新报》上的弥天漫野的绿气①把他化成了一阵"黑旋风"，就在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的"一瞥"中都还说他是带着一个"极左的凶恶的面像"。——仿吾，你知道了好歹么？我怕你是永远不能超生的罢。

因为有了那场"防御战"，在敌对阵营里并没有损失分毫，把自己却弄得焦头烂额，使本阵营崩溃了一角。在创造社的酝酿期中曾经一同参预过的张凤举和徐祖正两位先生，他们在《创造》季刊四期的"雪莱纪念号"上是做过文章的，凤举在

① 即氯气。

那一期上还发表过一篇小说叫《途上》①。但在《周报》创刊以后，他们说仿吾改了他们的文章，因此便和创造社断绝了关系。屡次请他们把那未完的稿子继续下去，他们也谢绝了。彼此改改文章，在我想来，在朋友之间，断不会便成为"广绝交"②的资料。重要的原因怕还是那一"战"罢？那一"战"把我们北大教授周作人导师得罪了，倒是千真万确的。

出了二期之后，达夫由乡里出来，第三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也不亚于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③，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

正在那出周报的前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④的驻沪特派员M来找过我，说他们的新闻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闻》上出一期"中国专号"，要我代表着中国的文艺界做一篇文章。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僭妄，也真是有点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们的文艺新运动》⑤，由仿吾译成英文交了去。在日本布尔

① 即《路上》。

② 梁刘峻（孝标）曾著《广绝交论》，讥讽世风浇薄，友道沦亡。

③ 即《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④ 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创刊，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⑤ 即《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文稿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创造周报》第三号，文后有作者《附白》："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在本月二十五日要出一次英文的'支那介绍专号'，该报驻沪记者村田氏日前来访，要我做一篇关于我国新文学的趋向的文章。我得仿吾的帮助做了一篇《Our New Movememt in Literature》的短论寄去。我现在把他自译成中文，把初稿中意有未尽处稍补正以发表于此，我想凡为我们社内的同志必能赞成我们这种主张，便是社外的友人我们也望能多来参加我们的运动。（五月十八日译后志此）"

佐亚治的大新闻上发表了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新闻的编辑者怕定然是感着苦笑的罢？那篇文章是得过二十块钱的稿费的，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

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周报》发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里面有我的《卓文君》①，达夫的《采石矶》，不期然地同时刻薄了考据家，把胡博士骂我们"浅薄无聊"的话来发挥过一下。就在那时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对于我们的反攻采取出了一种求和的态度。他由亚东书局送了一封写给我和达夫的信来。信中的文句涂抹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是对于我的说话。他说考据家有当骂的与不当骂的，象我译《鲁拜集》的时候如肯多考据一下，有些地方便不会弄出错误来了。

我们得了他的信，同时也就回了他一封②。我是劝他把提倡白话文时的精神恢复起来提倡气节。达夫是怎样写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达夫口头说过这样的话："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③，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我们的回信去后，胡大博士毕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来看我们。一年不见的他是憔悴多了。他说在生病，得了痔疮；又说是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点象梁山泊的宋

---

① 此作载一九二三年五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② 此信收入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③ 戴东原(1723—1777)，名震，安徽休宁人。清代学者、思想家。有《戴氏遗书》等。

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一笔官司就象是从来没有的一样。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仿吾、达夫和我，也去回拜过他一次。我们被引进了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① 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

《周报》在开始创办的时候本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些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筋疲力尽了。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三送初校，礼拜五送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我想到乡下去整理《浮士德》译稿的计划，在无形之中被抛弃了。还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没有钱用。泰东依然没有和我们议正式的薪水，在初我还有钱的时候是用着自己的钱；但我自己的钱因为初带家眷回上海，不免要新置些用具，用不许久就告罄了。到那时自然也跑到泰东去，十块五块地要。说起要钱，虽然是应得的报酬，总觉得在讨口的一样，有些可耻。十块五块的钱，在上海的几个人是用不上几天的。达夫和仿吾的洁癖比我更还厉害，要钱时

① 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时停时复，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终刊。

大概是叫我去破脸。我的脚自然也就有些羞涩，当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两次。在这儿便诱导出了一个重大的龟裂。

是在七月中旬，上海有一部分同学在消闲别墅燕集。席上有《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①。他从前是住过一高的人，所以也要算是先后同学。他在席上对我说，要我们分点余力来替《中华新报》每天编一项文学副刊，编辑费每月一百元，编辑的篇幅是半面报纸的二分之一。编辑的全权全盘委托给我们。我当场保留了考虑的余地，只是答应回去同达夫、仿吾们商量好之后，再作正式的答复。

在民厚南里商议的时候是在晚上，除我们三个人之外，有陶晶孙和何畏，他们是在暑假中回国来，不久便要转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绝。理由是《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中华新报》的销路当时在上海市上只能销得三两百份，而我们创造社的《周报》初出版时每版三千，后增印至六千，还要屡次地再版，犯不着去替他们推广销路。还有是我们编《周报》和《季刊》已经疲于奔命，再添上日报，终是没有力量顾及的。

仿吾和达夫却赞成接受。他们以为文学研究会有《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在旁系上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②，上海

① 《中华新报》，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四年冬停刊。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一九一六年开始主持《中华新报》，一九二六年后任天津《大公报》主编。

② 原为北京《晨报》第七版，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出单张，名《晨报副镌》，一九二八年五月停刊。

《民国日报》的《觉悟》①，我们总得有一种日刊来对抗。其次是《季刊》和《周报》的标准太高，外来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读者，应该要有一种日报来做尾闾，以销纳外来的投稿。其三是编辑的全权在我们，他们的政治色彩自然沾染不到我们，并且有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补助。

晶孙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们客气着没有发表甚么意见，但在语气之间是赞成接受的。

就这样，在五个同人的会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反对，结果是我服从了多数。但同时的决议是日刊由达夫、仿吾、均吾负责，我的力量多用些在《周报》方面。日刊又定名为《创造日》②，这是我提议的名字，那标题画的木板画在黑暗之中闪出了一些电光的，也是我画的。

就这样在那七月下旬便有《创造日》的诞生。

在这儿又要加上一段光荣的插话。《创造日》诞生的预告在《中华新报》上登出来了。在要出版的前一天，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又请我到他公馆里去晚餐。男客有杨端六③、郑心南、何公敢、周颂久诸位先生，都是在商务任职的同学。

---

① 《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七年终刊。其副刊《觉悟》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一年末终刊。

② 《中华新报》附刊，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创刊，同年十一月二日停刊。

③ 杨端六（1884—1966），湖南长沙人。著有《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银行要义》等。

杨端六谁都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但他在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而且是冈山六高出身，照着西洋的话来说，我们是同一个"母校"。女客有端六夫人①，还有两位女士我不记得名姓。主人除梦旦先生之外，有振铎和振铎的未婚妻，梦旦先生的第二女公子②。我由梦旦先生的介绍才知道振铎"招了驸马"。或许那天的晚餐，就是婚约的披露宴罢？

梦旦先生把我和端六夫人坐在首席上，夫人坐在我的左边，因为要和坐在她左边的端六先生连席。我的右边又坐着两位未知的女士。梦旦先生大约是看见我是名诗集以《女神》，并做过《卓文君》一类的作品的人，以为一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以才那样安置我的罢？但我的位置一嫐起来——这个奇字是我新造的，暂且假定它为嬲字的异体罢——委实是有点左右做人难的苦况。

席散之后，心南邀我到他的寓所里去。他对我说，振铎是他族上的一位族孙，人很聪明，也很用功，目前虽然幼稚得一些，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又说，这次的婚约是振铎请他去说合的，梦旦也很喜欢振铎，说他的女儿配不上他，只要振铎喜欢，自然情愿。又说梦旦的几位女公子中，长女公子最有学问，见识也很高，其他的便远远不如。心南以他那族祖而兼月老的

---

① 即袁昌英(1894—1973)，湖南醴陵人。作家。著有《山居散墨》、《法国文学》等。

② 即高君箴(1901—1985)，字蕴华，福建长乐人。译有《天鹅的故事》(与郑振铎合译)。

资格向我委委婉婉地说，我虽然呆笨，但同时是感觉着高梦旦先生的一席晚餐，是对于我的一个箝口令。物质的通性有一项是：一个空间不能容两个物。梦旦先生把那很可口的福建菜充满了我的口腹，自然会把我口腹中的话从反对的孔穴里逼进茅房里去了。但无如梦旦先生对于我是作了过高的估计。梦旦先生以为我是创造社的代表，创造社同人的主张我是可以左右的。其实我并没有那样大的本领。拿学级来说，仿吾是早我一级的，日本人的习惯是称为"先辈"。达夫、资平虽和我同级，但我因回上海闹创造社的事停了半年学，毕业在他们之后，所以他们也要算是我的"先辈"。我以后来者而居上，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文艺界比他们早出了一两年的风头，在创造社的酝酿期中，我比他们多跑了一些路。因此外界的人通有一种错觉，以为我是创造社的"领袖"，其实象创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为联系之外，绝没有任何人能以"领袖"的资格来统率的。在我自己始终只有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友谊，我决不曾以自己的意见来压迫过朋友，我们的朋友中任谁那一位也都是不甘愿受人压迫的。我从前说过些唯美派般的话头，说"毒草有美丽的色彩，也可以娱目畅怀"(《创造》季刊三期上的一段漫衍言)①，那是达夫在受着京、沪两地的批评家责骂，我说来拥护他的；在我自己实在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又譬如仿吾，他是心直、口直、笔直、手直的人，我假如要劝他稍稍妥协一下，那他一定会先把我骂倒。所以我虽然多谢了

---

① 见《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曼衍言其一》、《曼衍言之二》。

梦旦先生的极诚恳的两次晚餐，我自己的口虽然可以箝，——我自己从不曾骂过振铎，虽然也不曾恭维过他。——无如梦旦先生没有同时请我的朋友。

一三

《创造日》出版了，照着最初的决议是达夫、仿吾、均吾，三人主持。一百元的编辑费也是由他们三人分用的，达夫用六十，仿吾和均吾各用二十。达夫有了那每月的六十块钱，算好，使他产生了那《还乡记》，《还乡后记》，以及未完成的《苏州烟雨记》的杰作。达夫那时候怕是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他的笔调很快，仿着日本式的新闻连载小说的办法，文稿是每天写一段，写好便拿去付排。在他的《苏州烟雨记》刚好写了两次(?)的时候，北京有电报来了。

北京大学的陈启修教授——就是近年的陈豹隐——要到俄国去留学，在北大所任的两个钟头的统计学要请达夫去担任。

接到这个电报，我们又在马霍路的楼上商议过一次。我的意思是劝达夫不要去，因为到北大去当讲师，在那儿的分门别户的几种既成的势力之下没有发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为他是创造社的一根撑天柱，他一走了，《季刊》，《周报》，《创造日》便很难维持。但是仿吾却赞成他去，他说："我们通集中在这儿也不是办法。现在要用散兵线，散到各处去开拓。"

我说："那吗，几种刊物怎么办呢？"

出乎意外的是达夫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最好是停办！"

我听了觉得有点伤心，就好象费了几年的心血养成了几个儿子，要一刀把他们斫成两段的一样。

我又说："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

达夫更决绝地说了一句："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说得有点声色俱厉。

我碰了一个大钉子，才感觉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仿吾没有说话，我自己也就没有再说了。

那时候我大的两个儿子正在出麻疹，第三个幼儿也得着痢症，我和我的老婆在民厚南里的前楼上守着三个病儿，有好几晚都没有睡觉。达夫在要动身的前夜，泰东书局替他饯行，晚间几位朋友更在振华旅馆里开了房间为他惜别，我守着病儿没有出席。但到第二天要开船的时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达夫握了别的。他拿了几个金山橙子给我，说："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来。

达夫在要动身之前，还做过一篇小说叫《离散之前》，那是达夫最得意的文章，他自己说过是他平生的杰作。那篇小说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的，也要算是在创造社同人中开了卖稿的风气之先。那是预言着创造社之将离散而当成事实写着的。预言在几年之后自然是应验了，但事实却和小说是两样。那里面的邝海如，谁都知道就是郭沫若，他被描写得十分忠厚。——在民厚南里的楼下一张方桌上，把出了几期的《季刊》供奉起来，点了一对红烛，邝海如跪在地下，大呼"艺术之神"，磕了几个响头。原来我在朋友的眼中看来才是那样一位忠厚长者——我想鲁迅先生一定是要大反对的。不过在达夫

走后，创造社还没有即行分散，因而那篇《离散之前》在还没有机会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之前，便已经离散到《东方》去了。

达夫一接了北大的聘，那篇《苏州烟雨记》也就因"作者卧病"而中辍。以后的《创造日》是仿吾和均吾负责的，一百块钱也就由他们两人分用。《创造日》经达夫一走自然减色不少，又因我没有本事兼顾，惹得张季鸾说"大将不出马"。然而政学系的大将章秋桐① 却到上海来出马了。

那位纸老虎在九月尾上到了上海，在《时报》② 上做了些抨击白话文的文章，又在研究甚么"墨经"，把上海的文艺界弄得有点稍稍墨而且黑。《中华新报》和泰东图书局是政学系的两个私生子，不消说也是章老虎的势力范围。在泰东方面受着他的意旨，便有出文言文中、小学教科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因为没有钱，没有实现。《中华新报》出着白话文的《创造日》，在我的揣想中早迟难免是要停刊的。

说起办《创造日》，仿吾委实是费了不少的心血。《中华新报》的排字工友和校对员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亲自去校对，遇着有外文的地方还要亲自去检字、排字。仿吾的右膝关节是患着柳麻迭斯③ 的人，走起路来都不大自由。自从

① 章秋桐(1881—1973)，名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曾任《苏报》主笔。一九二三年，任上海《新闻报》主笔。一九二五年七月再度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兼教育总长，主编《甲寅》周刊，因该刊封面绘有一虎，故时人称之为"老虎总长"。编辑有《大革命家孙逸仙》，著有《柳文指要》等。

② 一九〇四年四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狄楚青等创办。

③ 英语Rheumatism的音译，意为风湿症。

达夫走后，天气渐渐寒冷起来，看着他在晚上一个人去登报馆，觉得有几分悲壮，同时也觉得有些难忍。到后来，有时候我也陪着他去，在我最初说出这样的话时，他很凄切地笑着说："你也去吗？"——他那简单的一句话使我觉悟到，我以前没有陪伴他们去，大约就是使朋友们厌弃我的原因，我自己是失悔莫及的。

达夫去后，委实是言能顾行，他一直便没有文稿寄来。他有工夫在《晨报副刊》上投稿，在《太平洋》① 杂志上投稿，但是创造社的几种刊物似乎已经被他忘在脑后了。三个人分担着都感觉着吃力的工作，剩着两个人来做，自然是愈见捉襟见肘。每天要文稿的《创造日》，起初是视为销纳外来稿件的尾闾，其实才是一个爱吃甘旨的饕餮。外来稿件不加减一下盐梅，它是不肯入口的。为我们驱除了这个饕餮的，怕应该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老虎。

十月下旬的一天清早，《中华新报》的总理殷柱夫② 到了民厚南里我们的寓所里来。他讲到报馆的经费支绌，希望我们把《创造日》结束。殷先生说这话时很客气，怕得罪了我们，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话正是救命的符箓。我保留着考虑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他回头便告辞走了。在他走了之后我和仿吾商量，仿吾也赞成停刊。刚好《创造日》满了一百

① 综合性刊物。一九一七年三月创刊于上海，原为月刊，自一九一九年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双月刊，一九二五年六月停刊。李剑农、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为主要撰稿人。

② 殷柱夫（1882—1940），名汝骊，字铸夫，浙江平阳人。曾任众议院议员、财政次长等职。

期①，于是乎那个孩子便在一零一号上夭折了。

《创造日》停刊后，可算松得一口气。但说也奇怪，那一停刊却也增加了创造社的萧条的景象。《创造周报》已成了强弩之末，失掉了它从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有些人劝我们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时由广东到了上海，他也劝我们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欧战期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虽蒙受着频年的内乱，但也看到了它的畅茂的发芽。上海、天津的纱厂有一个时期如象雨后春笋一样簇生了起来。但自欧战结束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卷土重来，把那簇生起来的春笋又几乎全盘拔去下了油锅。觉悟了的人在这儿明白地看到那无形的帝国主义的势力，觉悟到中国如不抵抗帝国主义，就连民族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发展。就是一般近视眼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内乱妨害了中国的产业，因而政治问题便成为一般社会人的意识的焦点。这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便是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

在这时，达夫从北京寄了一个消息来，便是太平洋社的人想和我们合作，打算把《太平洋》杂志停刊，和我们同办《创造周报》，前半政治，后半文艺。政治的一半由北京编好寄来，由我们在上海加上文艺的一半，付印出版。这个求婚的提议本是极投时好的，而且也特别看重了我们，我们如稍稍聪明一

① 因《创造日》第二十三期编号重复，故最后一期编号误为第一百期，实际出版一〇一期。

点，一定是无条件地接受了的。但又是仿吾和我的洁癖误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太绅士了，说坏些便是官僚气味太重，一时好象合作不来。又加以用文艺来做政论的附属品，是我们出马时所最反对的办法，虽然时势变了，也觉得不好立地抛弃。在这两种的顾虑之下，我们提出的办法是：《周报》由两社的人轮流编辑，一期政治，一期文艺。但这个提议却失掉了合作的主要意义，——想借文艺做调剂以推广政论，因而便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事情也就搁浅了。

合作不成，转换方向又没有能力，《周报》的出版只是在一种惰性的习惯之下维持着。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已经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为他的大哥在广东，早就存了南下的心事。而在我自己又加上了一层家小的束缚。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第三个幼儿的消化系统的疾患，实在是最大的累赘。住在日本时，小儿一有病痛便抱进大学病院去。医生是最可信任的，医费是一文不取的（因为是学生的眷属可以免费）。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外的医生没有一个敢信任，医费也贵得惊人。如果有钱倒还没有什么，但在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生活的人，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老婆因此便时常吵着要回日本，她要顾着几个肉体上的儿子，我同时也不能不兼顾着几个精神上的儿子。她带着三个儿子回日本，独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实际讨口。所以那便逼着我不得不把创造社的全部抛弃。

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因此在家庭中也就免不了时常在闹着风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倾幼稚病的人，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的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

年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那时正在热心地提倡他的“国民文学”。那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他自己也很模糊。但在仿吾和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的时候，便索性让他编辑了几期。那几期，我现在可以明白地说，要算是《创造周报》的最消沉的时候。伯奇在二月底才回日本，我便起了一个决心：请他把我的家小送回福冈去。我待把《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再往日本，也好让仿吾决心南下。

在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后，写了那《歧路三部曲》①，尽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

---

① 作者原注：即《漂流三部曲》。

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人到下了决心，唯物地说时，人到了不要面孔，那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读了我那《三部曲》的人听说有好些人为我流了眼泪。就是我们的达夫也受了感动，他把我们的旧谊又恢复了转来。他从北京寄来了他那篇《北国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后在《周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作品。

决定要分离了，泰东自不免起过一下恐慌。南公老板也费了好些唇舌来挽留我们。他说以后要为我们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单身，只定一百。以前的积欠作为股票，我一千，达夫六百，仿吾四百。这样的话他不只说过一次，但从未见诸实行。象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话，待我去了日本之后，他在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上也明白地提起过的。——在这儿我又算替鲁迅先生提供出了一项史料：便是郭沫若辈还是泰东书局的大股东呢！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还很郑重地替他保存着的，大约她是想借她的帝国主义的背景来收回那笔陈账的罢？所以假如有人见了我这项史料还要怀疑，以为我是在自由创作，我随时都可以破点钞，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来。

烽火台的诸侯毕竟只能戏弄得一次①。更公平地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象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的编辑，并且还有些是占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

① 事见《史记·周本纪》。

几句硬话。替商务办杂志的人，是连半句硬话都不敢说的，如有人肯高兴去问问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为这件事情便是上过当来的人。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该应该感谢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然而梦一醒来，暂时不想那样去表现，不想那样去创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

创造社决计和泰东脱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达夫要算是最先觉，我是足足后了他半年。仿吾又是为着我而后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办满周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决定之后，终耐不过再作勾留，便索性提前了一个月，在四月初头上便离开了上海。

我走了，暂时没有发丧，《周报》还由仿吾一个人支持了一个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报告了达夫的。达夫在我离开了上海之后，他在四月尾上由北京赶到了上海，赶着在《周报》的最终号中夹了一张预告，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共同预告。预告着两社将合办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现代评论》①，在最短期内将与读者见面。这个预告当然是得到仿吾同意的，事后

①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第六卷第一三八期起迁往上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九卷二〇九期。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等为主要撰稿人。

我也得到达夫的一封信来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冈接着了最终号的《周报》，并同时接着了那张预告的时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不值钱的眼泪清算了一场。在这儿我和达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对立的方向。在达夫方面或者会说，我们的密斯创造临到弥留的时候，由他度了一口气便复活了转来，更嫁给了高门；而在我这一方面，始终是感觉到：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尸奸。

创造十年续篇

(1924—1926)

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期间上海《大晚报·火炬》。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题为《创造十年续编》。

一

《创造周报》的停刊是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中旬，但我在四月一号便离开了上海，后事是由仿吾一个人把它结束了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还有一个很执拗的记忆留在我的脑里，我现在借着这个机会把它先清算在这儿。

近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说，所谓"歇斯迭里"的那种病症，是因为在前有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一时被意识界的生活把它抑制到潜意识界里去了，它便在潜意识界里郁积着，使人的精神生出种种的障碍，充其极可以使人成为疯狂。治疗的方法是要施行"Chimney-washing"，便是"烟囱扫除"。这是把人的精神比成烟囱，把那些郁积着的不愉快的经历比成烟煤，烟煤把烟囱闭塞了，炉灶便生出毛病，如把那烟煤扫清，毛病也就同时被扫除了。扫除这人体烟囱的方法是怎样呢？是用种种诱导的方法，或甚至如催眠术之类，以唤醒病者的那些不愉快的记忆，让他从自己的口中吐出来。那样便使人的意识清明起来，渐渐地回复到健康状态。

"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其实广泛地说时，我看一个民族或社会似乎都可以得这种病。民族遇着了种种

的高压，经历过久，把种种的不愉快，主动地、被动地，压到潜意识界里去，渐渐地招来民族的萎靡，颓丧，互相猜忌，互相残刻，结局不为异族所吞并便酿成革命的爆发。革命的爆发也不外是一种自然疗治性的“烟囱扫除”。但这扫除来得剧烈，其趋势是要把烟囱乃至炉灶本身都爆破，这便应着俗语所说的“另起炉灶”。所以开明的行政者对于民意是因势利导的，民意得到畅达，社会也就健全地发展起来。古人说“上医医国”①，我看的确是道破了一部分的真理。那种善于“医国”的“上医”，就是能够对于民族的“歇斯迭里”及早施行“烟囱扫除”治疗的人。

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②或“文人无行”③，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④。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锐敏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出来，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熏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在这儿我赞成一切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记忆，尽可能地吐泻出来。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种方术，同时也是使社会健全的一种方术。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然后才能够完成文艺之社会的

---

① 语见《国语·晋语八》。

② 语见曹丕《典论·论文》。

③ 语出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④ 语出《宋史·刘挚传》：“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使命。

一味地吐泻着烟煤，对于旁人，或许会是一种患害。但那不过是比喻而已。事实上所清扫出的记忆不必便是烟煤。即使是烟煤，但松烟可以做墨，冶铜厂的烟可以提取金银。所谓竹头木屑①，皆为有用。即使是完全无用，总比烟囱闭塞着，专吐炭酸瓦斯毒气的好些。

是那年的三月中旬了，中华学艺社要在杭州开年会。我自己在那时是一位挂名干事，社友们定要叫我出席，而且还要我讲演。关于讲演，我是一点自信也没有的人，不仅没有自信，而且还着实有点害怕。因为站在大众面前要作为一种号筒而大施教训，如果不是品行学识都俯仰无愧的智者，便是或多或少不知道惭愧的骗子。自己和智者自然有很大的距离，但要成为一种骗子，脸皮又好象还薄了一点。因此，我对于出席是答应了，而对于讲演则始终不敢应命。

由上海北站出发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决定坐最后一趟晚车。住在民厚南里的我，不料稍微误了一下钟点，赶到北站时，火车已经开了。糟糕！朋友们不会说我故意失信吗？于是在第二天清早又搭着最早一趟早车赶去。记得在硖石停车的时候，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不胜光荣之至的是在那儿还遇着过殷汝耕②。他也是要去赴年会的，但他坐的是二等，

① 《晋书·陶侃传》：晋陶侃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后常以竹头木屑喻可利用的废弃之物。

② 殷汝耕(1885—1947)，字亦农，浙江平阳人。政客、汉奸。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

我坐的是三等。互相招呼了一下，又各自分开了。

到了杭州，在湖滨旅馆会见了学会的干部。一切开会的手续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经决定了，而且登了报。在当天礼拜日，假教育会的会场开讲演会，由物理学专家周颂久讲演“相对论”，另一位新由德国回来的姓聂的朋友①讲演德国的现状。第二天，礼拜一，派人到各学校去分讲。担任分讲的人大体上也都排定了，但还有两处没有派定，一处是工业学校，一处是蚕桑讲习所。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迟，说我是有意回避，定要叫我分讲一处。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学生较少的蚕桑讲习所去担任分讲。工业学校是由殷汝耕担任的。

杭州是一九二一年四月才回国时同仿吾两人去游历过的地方。那时因人地两疏，只在西湖边上玩了一下便算了事。这次，在总讲演之前，才跟着大家去游览了一回栖霞岭，观赏了飞来峰，随喜了灵隐寺。但在自己心里是横亘着一个忧郁的。为着文艺生活与现实生活之不能两全已经和妻子分离了，而且在不久之间更要把年来的工作通统放弃，和最相契的朋友也不得不分离。游山玩水的乐趣怎么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牢愁。

总讲演是在午后二时开讲。中午在教育会楼上招待杭州名流一同用了午餐，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便集中到讲演会场上来。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当了。会场很大，楼上楼下怕可以容纳一千人以上。但出乎意外的是来听讲的人异常的冷落。一点钟过了，只稀疏地有几个人来，来的人看见没有后继者，坐

① 指聂俊，字汤谷，江西人。

不一会又络续地退出去了。就那样等到了两点钟过了，依然没有人来，弄得主持的人异常不舒服。眼睛见到我时往往是白多黑少，这使我也不胜其觳觫起来。

——“就是你不好了，你要回避。”一位在日本高等学校同班的范允臧①，在楼上一间临街的屋子里，这样责备我。他也是学艺社的干事，而且是负着实际责任的。

——“怎么怪得我呢？”我反驳着说，“我本来告诉过你们，我是不能讲演的。而且没人来听讲，我相信是因为礼拜日大家回家的回家，玩耍的玩耍去了。你就叫我去出马，也不见得会有人来。”

——“只要你肯出马，一定会有人来。”允臧坚决地说。

旁边有一位在杭州任教职的社友也这样帮着他，据他说是讲题不能引起学生的兴会。假使由我去讲演一点关于文学上的东西，一定可以“叫座”。

对于讲演已经没有自信，对于文学上的演讲是尤其没有自信的。我自己虽然在做做诗，写写小说之类的东西，然而对于所谓“文学”实在是个外行。我并不曾把文章来当成学问研究过（我学的本是医学），拿什么东西来对人讲演呢？

听讲者既没有人来，讲演是不能不延期的。问题毕竟集中到我身上来了。

——“无论怎样你非讲不可！”

——“讲演，一点也不困难，一上台便会有话出来的。”

---

① 范允臧（1896—1983），名寿康，浙江上虞人。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通论》、《朱子及其哲学》等。

——"只要你肯讲文学，一定有人来听讲。目的是在号召听众，只要有人来听讲，你就讲得不好，还有两位也可以补偿的。"

大家都把讲演会的失败来归罪于我，我受不过朋友们的责难和劝诱，便也放下了决心，答应去做一次曲马团的小丑。于是讲演会改到了第二天下午，加上我一名，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重新在杭州各报登出消息，更由教育会的后援请求杭州各学校在第二天放半假。事情便这样决定下去了。

允臧本是上虞人，杭州是他少年时读书的地方。他看见我答应了讲演，当天下午便和另外一位姓郑的社友①，把我引到万松岭一带去游览。由九溪十八涧折至钱塘江边，登过那儿一座临江的垂危的木塔。晚上走到闸口，观光了那儿的有名的"江山船"②。很迟的坐着火车才回到了杭州。

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饭，允臧又约着郑君和我坐汽车去游览花坞。我愁着下午的工作，很想一个人留在旅馆里作一番静静的思索。但允臧说，花坞很清静，在讲演之前倒宁是去舒散一下的好。

花坞在西湖背后，那儿的确清静。由马路插入一段荒僻的背径，便到了那个游迹罕至的地方。地在两山之间，中有一道溪流，两岸是深深的竹林。沿途有不少的庵堂，据说在前都是尼庵，但尼姑通已经解放了。在那流水琤琮的溪边上走着，允臧大约是感受了浓厚的诗意罢，他问起我的笔名的意义

---

① 指郑心南。

② 旧时浙东的一种游船，亦称九姓渔船。

来："沫若"(Mo Jo) 两个字，是不是取自佛经的"如梦幻泡影"①那样的意思？但我的名字其实本是"沬若"(Mei Jo)，是由我的故乡的两条河，沬水与若水合拢来的。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里有"关沬若"的一句②，便是那两条河并举的开始了。

允臧又谈到他往年夏天一人游过花坞，遇着一位姑娘在他前面走着，身材很美好，但总不掉过头来。一直走到花坞的尽头，走进一家别墅里去了。他这一席话，我倒感觉着颇有些水月镜花的意味。

沿着溪边朝上走，快要到尽头处，路边上有一座小庵子，名叫白云庵。我们走进了里面去。佛堂前面拢着两盆素心兰，正在开花，吐着令人沉静的清香。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却是一位中年的和尚。他很殷勤地献了我们各人一杯茶，又向我们讲了一番兰经。

从白云庵走出，再往上走。走不好远，在那尽头处果然有一家别墅，有白色的高墙围着。允臧说：这便是那位姑娘走进去的地方了。别墅门是紧闭着的。门前有一个月台，立在那儿眺望，花坞全景都呈在眼底。存了好奇心，大着胆子去敲门，但里面没有人应门。绕到屋旁，看见墙次有一道侧门开着。门内是厨房，有好些人围坐在那儿讲话。看那情形，知道是看守人的家属和邻近的农民。我们走进去，道了来意，说要拜望主

① 语见《金刚经》。

②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关沬若"句，出自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一文。

人，瞻看别墅的内容。那儿的人回答说主人不在，屋内可以尽我们去看。我们便被引进了那儿的中堂。详细的情形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只记得正中有两排坐椅陈设。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堂的右翼，放着一架和冰河时代的“莽孟斯”①遗骨相仿佛的——风斗！

从花坞走出，又坐着乘来的汽车回到西湖。在湖里的一家菜馆里面吃了中饭。允臧特别叫了一样西湖所独有的菜，叫着“醋鱼带柄”。那是用湖鱼去骨去皮，切成片子，染以姜醋汁生吃，而另把皮骨之类烹来熟吃的。菜名和菜的本身都很稀奇，但吃起来并不怎么可口，大约也是自己心里在愁着别的事情的原故。讲演的时间，刻刻地逼来了。然而腹稿仍然没有打好，自己却起了一种不好对人说的侥幸心，希望到了讲演的时刻也和第一天一样，没有听讲的人来。

时刻终竟挨近了，允臧一直把我引到教育会去。这次又是出乎意外！昨天听讲的人寥寥无几，今天却是川流不息地拥来，在未到时刻之前，那宏大的讲堂里，楼上楼下都被人坐满了。允臧把我引上了楼，社友们都是喜气洋洋的，有的连连在叫着“大成功！大成功！”很沉着的允臧，他也向我夸负着他的先见，说我把昨天的罪过补偿了。然而我却弄得来愈见惊惶失措。怎么办呢？愈想愈着急，愈着急腹稿愈见理不出一个头绪。讲演的招标上，又把我写在第一名。挨头刀的便是我，这怎么办呢？时间终竟逼来了，只好请讲“相对论”的周颂久去

---

① 英语 Mammoth 的音译，即猛犸。

打头阵。大家要我出场去，在讲演台上坐着，我也推谢了，想在楼上多挨一点时刻，调整一下自已的着急。

楼下的拍掌声起来了，"相对论"已经开了头。走到楼头去窥伺了一下，只见颂久在讲坛上步来步去，妙喻取譬地讲得头头是道。满场的听众都肃静无声，听得十分专一。这一窥伺愈见使我不能安定，自已是毫无经验的，那能够作为承继颂久的下手？自已想要说的话，仅仅是由搜索枯肠而来的一些支离灭裂的野狐禅，那能够和那严整的理论系统"相对论"相对？"文学"要死在我口里了！失悔太不自量，要把补讲的事情承应了下来。这一慷慨，真真是有点慷"文学"之慨。糟糕！怎么办呢？……

颂久讲了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允臧上楼来催我下去。

——"想说的话一点也没有整理好，一定要失败的，怎么办？"

——"不要紧，你若无其事地镇静着，当作没有人在你面前的一样。"

允臧见我着急，便尽力鼓舞我。他并且说："你讲的时候，我要杂在听众里面去，讲到好处，我便替你鼓掌。"

推诿是无从推诿的了，只好到下面去。在那比听众高一段的讲台上坐着，心头只是橐橐地跳。"相对论"哟！你再讲长些，再讲长些，不要立刻便轮到我名下来。唯一的希望，随着跳着的心搏在那儿跳。

颂久讲演了一个钟头光景，在热烈的掌声中终竟结束了。我也就受着指挥，被立在了一千人以上的听众面前，左右还有

和陪审官一样的杭州的名流们。

关于新兴文学的理论，在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自己所说的究竟是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总不外是从拉斯金的《艺术经济论》、葛罗舍的《艺术原始》、居约的《由社会学上所见到的艺术》① 那一类书上所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一些理论和实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见解。一方面是想证明文艺的实利性，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就象先打了一碗泥水，再倒了些米粉、面粉、豆粉乃至石灰粉，所火迫地拌搅出来的浆糊一样，向那满堂听众的头上倒灌了下去。那可不得了！听众在开始的十分钟光景，都还能够忍耐，但渐渐地便动摇起来了。自己所向人倒灌的是那种不明其妙的浆糊，心里在感着内咎，声音怎么也不能提高。声音不能提高，听的人也就愈见着急，最后的几排在擦脚，接着有几个人退场，接着又是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没到三十分钟的光景，全场的人退去了三分之一。人一稀疏了，杂在听众里面坐在最后第二排右边的允臧，孤影悄然地也就印到了我的眼里。我看见他为我颓丧着的神情，几乎流出了眼泪。不用说允臧的手是最初替我鼓了的，但是，是在我讲了有四十分钟的光景，把那昏水浆糊的倒灌停止了的时候。

---

① 拉斯金（J. Ruskin，1819—1900），通译罗斯金，英国艺术理论家、政治家，著有《现代画家》、《芝麻与百合》等。　葛罗舍（E. Grosse，1862—1927），通译格罗塞，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著有《家庭的类型》、《东亚的雕塑》等。居约（M. J. Guyau，1854—1888），通译居伊约，法国哲学家、诗人。著有《当代英国伦理学》、《未来无宗教说》等。

讲演失败后还由郑君陪伴着到蚕桑讲习所去也讲演了几十分钟。这一次又讲了些什么，连题都忘记了。只记得那讲习所是在西湖里，地方很僻静。讲时已经傍晚，在一座幽暗的讲堂里虽然坐满了人，但人数似乎不足两百的光景。号筒是“曾经沧海”，失败是“除却巫山”，① 象在教育会里的那一幕倒没有重演。

① 语出唐元稹《离思》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二

仿吾：

我离开上海足足两个礼拜了。几次想写信给你，但总不容易执笔。随便写几句平安的报告，我觉得没有写的必要。待要写长时，而我所想写的又太多。本打算在《周报》办满了一年之后才走，但终竟提前了四五个礼拜跑到了海外来，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这是使我心里不安的。我每晚上几乎都要梦见你，梦见和你商量《周报》的后事，但我现在实在无能为力了。……

你到广东去的时期定妥没有？

此地的樱花正在盛开，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里小小的庭园中有一株粉红的茶花，已经将近残谢了。听见一朵残花坠地的声音，使我化了石的心也时起动悸。

半月以来只在译读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怕还要三个礼拜才能完工。

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

明天是拜伦的死期①，但是我的文章还没有做。我一时想起他轰轰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了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贵族，他有钱，有幸福，他的世界终不是我的世界。

---

① 拜伦（G. G. Lord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病死于希腊军中。著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

《周报》久不见寄来，大约是已经停刊了。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是在《周报》将停刊时，由日本写给成仿吾的第一封信的摘录，信上署的日期是“四月十八”。全信在《创造周报》的终刊号上登载过，在泰东出版的《沫若书信集》里也有收录。

我自从四月一号离开了上海，仍然跑到住过了五年的福冈，住在箱崎海岸上一家面海的屋子里面。屋子相当宽敞，背后有一面宽敞的园子，种着好些花木。

再度跑向福冈的意趣，起初是相当复杂的。我自己对于生物学本是很感趣味的人。福冈的九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石原博士① 又是我所敬爱的一位学者，我听过他的生理学总论、遗传学、内分泌学等的讲义，相当地引起了我对于那些学问的向往。我和博士的个人的接触虽然不曾有过，但他对于我的印象却颇象一位深通禅理的高僧。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讲时总是把眼睛闭着的，让他那颇有涩味的声音不急不徐地流出。生理学总论是医科学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后的一点钟上曾经离开了讲义说到自己的私生活上来。他说：近时的学生好美衣美食，食事爱在“卡罗里”(热量)的多少上关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义者，已经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见减衰。关于菜食的生理学上的根据，博士没有说出，但他那简单的几句话，对于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自己早就有志研究生理学，很想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

① 即石原诚(？—1938)，日本生物学家。

于自然科学的奉仕。但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早就觉醒了，就当时耳濡目染地所得来的一些关于历史唯物论的学理，觉得有好些地方和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例如社会形态的蜕变说似乎便是从生物学的现象蜕化出来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

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由他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上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所纂集成的，那平明而剀切的笔调曾风靡过日本的读书界。他击败了他的论敌福田德三博士①的不正确的理论，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社会问题研究》，在发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购读过，因为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认识，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编纂的总集，加上我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决之必要，于是乎便开始了对于它的翻译。

翻译时用的是由上海带来的用中国纸印的原稿纸，非用墨写不可。寓中没有桌椅，也没有置办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国式的皮箱拿来作了代替。砚台是没有的，随便捡了块砖头磨平，便当成了砚台。就那样坐在草席上，从清早起来写到深夜，写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终竟把那部二十万字以上的大著译完了。

---

① 福田德三(1874—1930)，日本经济学家，法学博士。著有《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

那书的译文曾部分地在学艺社的《学艺》杂志上发表过，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把它印行了。但发行不久便由出版处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里现在是没有存本的，连那用毛笔写的译稿也归了商务，恐怕早已成了“九一八”① 的炮灰了。商务既承印了那书而又把它停版，这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便是怕那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社会要发生影响。然而影响毕竟发生了，是在我自己身上。不久，在写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有这样的话：

> 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书的迻译本是你所不十分赞成的，我对于这书的内容虽然也并不能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但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
> 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

这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话。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诬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但那书也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

① 根据上下文，“九一八”疑为“一·二八”。

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尤其是那里有篇专论，引用着贾买依加①岛的奴隶解放的事实以证明早期社会革命之终必归于失败，我觉得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美洲在被白人经营之前，社会状态是还没有达到奴隶制的阶段的。白人侵入了，一时曾施行人为的奴隶制以经营资本制的生产，后由人道主义的立场把奴隶解放了，而那被解放了的奴隶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有一部分的学者便把这个事实作为社会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实证。这从奴隶一方面着眼诚然是无可否认，但如从白人一方面来观察，美洲岂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经济一跃而成为了资本制的社会吗？故尔社会的进展如加以人为的促进，在我看来，的确是有飞跃的可能。隋唐时代的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时，由氏族社会一跃而入于封建社会的，不也是有史实可据的另一个明确的证据吗？那人为的促进便是政治问题，如抛弃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就等于只讲基础医学而不谈临床学，不仅违背了医学的精神，且于人类的实际是毫无用处的。这便是我对于该书的不能满足的地方。后来原作者河上博士曾经写过信给我，说他自已也不能满意，在初版刊布后便嘱出版处停止了印行。原作者的学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钦仰的。在这儿，中国的出版处之自动地中止了译文的发卖，虽然用意不同，却是获得了与原作者所企图的同样的效果。

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

---

① 通译牙买加(Jamaica)。

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

给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我这样说过：

> 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技巧上的主义都不成其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地得占生活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明日的文艺：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全面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闷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人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euphoria（迷魂）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hallucination（幻觉）里呢！……

这些觉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的。我想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学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实际活动。这，是决定了我日后的动向的。在当时对于两者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故尔仍只能称之为"梦想"。没有想到这"梦想"的实现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了之后，在箱崎海岸上还替泰东书局尽过一次义务，是替《王阳明全集》做了一篇长序。

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那时候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在中国的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

庄子的思想一般地被认为虚无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和斯宾诺莎最相近的。他把宇宙万汇认为是一个实在的本体之表现；人当体验这种本体，视万汇为一体，摒除个体的私欲私念；以此养生则能恬静，以此为政则无争乱。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宇宙主义者。而他的文笔，据我看来，在中国的古文中是古今独步的。王阳明的思想虽然是以禅理为本质而穿着儒家的衣裳，其实和庄子也别无二致。他把庄子的本体所谓"道"，命名为"良知"，一面主张静坐，以求"良知"之体验，一面主张实践，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尽管那出发点是有问题，但他的"事上磨炼"那个主张，尽足以拯救一切玄学家的偏蔽。而他自己的实际，古时候所谓"经纶"，也正是他的学说的保证。我在当年学过静坐，耽读过他的《传习录》和他的诗，后来虽然抛弃了，但我对于他的景仰依然是维系着的。我相信，他终不失为我们民族发展中的一个杰作。泰东要标点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因此我也就乐于温理了一番旧业。但不用说也还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几块钱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不幸这个物质要求却没有达到。泰东版《阳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还有章太炎和释太虚① 的两篇，后来听说泰东对于这两位

① 释太虚(1890—1947)：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今属桐乡)人。名僧，新佛教运动领袖。有《太虚大师全书》。

大师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笔墨费，但我所用的笔和墨是名实相符的“金不换”，一个铜板也没有换到。

一九二四年是文艺界相当多事的一年。那年是英国诗人拜伦的死后百年祭，也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诞生二百年祭①。这都是操觚者做纪念文章的资料。创造社当时是打算纪念拜伦的，已经收集了好些文章，预定在《创造》季刊上出一个专号。但我一离开了上海，仿吾不久也去了广州，因此那个纪念专号也就流产了。当时所收集的一些文章，是在后来的《创造月刊》②上发表过。拜伦本是歌德所极端推崇的人，歌德说过单是为了要读拜伦的诗都有学英文的必要。歌德自已也译过拜伦的诗，据《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与海伦所生的那位欧福良，便是以拜伦为典型的。但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却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关于他的纪念文章终竟没有做出。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二十八岁的雪莱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③

关于纪念拜伦的文章虽然没有做，但关于纪念康德的文

① 康德(I. Kant，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康德诞生日为四月二十二日。

② 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③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集第二六一页：“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章却是做了的，便是《Lōbenicht 的塔》。这篇小说在《学艺》杂志的纪念号上发表了，曾为北京的《晨报副刊》所转载。作这篇文章的用意，与其说为了纪念康德，倒是想借以讽谕哲学家。尽管哲学家或思想家是怎样的冷静，超然，过着如冰霜、如机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终不免要来萦绕，而且在暗默中还要给他以助力。恶魔说过："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① 这意思可惜没有表现十足，曾蒙受一位作家的讥评说："文艺作品是人生的反映，不是古人的行状。"是的，我本来是没有意思替康德作行状。

在福冈住了有半年的光景，为了实现研究生理学的志愿也曾去过一次东京，和四川经理员接洽，希图入大学院，继续领取官费。但没有成功，只领到一年前毕业回国时所应领的归国费，结局是仍然不能不作归计。但在回国之前，在十月间又在福冈与长崎间的佐贺县的山中住过一个月。这六七个月间要算是我最多产的一段时期。除开上述的一些译著外，我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②，写了《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万引》、《阳春别》，及《橄榄》中除掉《歧路三部曲》的全部。当时的生活纪录大体就留在了《橄榄》里面。

在这儿应该补说一下《周报》的下落了。《周报》在我离开上海时已决定停刊，但在将要停刊的时候，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由北京赶到了上海，在第五十二期的终刊号里夹了一张通告，是预告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将要合编一种周刊，就是后来的

① 见作者所译《浮士德》第一部《书斋》。

② 通译《处女地》。

《现代评论》，改由北京编印。我接到这终刊号和通告是在五月中旬，同时也接到达夫的来信，说到合伙的事。两三个月以前本来早就由太平洋社方面的人提议过，起初的提议是扩充《创造周报》，一半政论，一半文艺。政论由太平洋社的人担任，由我们把文艺的一半附上去，照旧由我们编制，在上海印行。我在当时却不赞同这种以文艺为政论的附庸的老办法，曾经提出过一种折衷意见，便是一期政论，一期文艺。但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原议也就中止了。待我离开了上海，《周报》已经决定停刊，障碍在无形之间被除去了。因此，合伙的一幕便顺畅地进行了起来。

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的。太平洋社本来有《太平洋》月刊在商务出版，他们的构成分子大都还是有点相当学识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政论，公平地说，也还算比较开明。那个月刊虽然从不曾左右过中国文化界，但在科学与玄学之战①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吴稚晖在那儿发表过一些突梯滑稽的论文②，把读书界轰动过一下。我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与仿吾有同乡之谊，而与仿吾的长兄劭吾又多是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仿吾随着他的长兄留学日本时，是和他们之中的

① 张君劢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清华周刊》第二七二期上发表《人生观》一文，提出人生观乃"起于良心之自动"，"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接着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撰写《玄学与科学》与之对立。随后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等均参加论争。

② 指吴稚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太平洋》月刊第四卷第一、三、五号上连续发表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

一部人同居过的。其在达夫，则因为多是北大的同事，过从当然更加亲密。有这种种关系，加上我们自己本已有趋向政治的要求，两社的合伙，除掉我自己的一点点洁癖和矜持之外，几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然之数。这层是我一向对于那次合伙一幕的理解，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日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是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的第三卷，蒙出版处改造社的赠阅，我得到了先睹的快乐。卷后有胡风①的《解题》，署的日期是今年的一月二十二日，那儿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此时代的鲁迅之活动是活泼的。被作为敌人者是段祺瑞政权之教育部总长章士钊与其支援者的《现代评论》之一派。章士钊在当时自行主唱复古运动，编辑发行《甲寅周刊》，以孤桐的笔名写着评论，因其《周刊》的封面上画有老虎，故被呼为老虎总长。与此勾结的《现代评论》，虽然以太平洋学会和创造社之同人杂志为招牌，但反动的政客俱乐部交通系及研究系为其背景的势力。

原来当时的现代评论社才有这样伟大的政治背景，我这十几年来真正是蒙在了鼓里。不过我在这儿也并不想替别人来清理这番陈账。我不是个中人，对于“支援”、“勾结”与“背境的势力”的黑幕，似乎尚只好采取一个“姑妄听之”的态度。假使那场黑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却敢于保证就连仿吾和达夫都是被蒙在鼓里的。达夫早就在叹息着被人利用了作为

①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左联书记。著有《文艺笔谈》、《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小丑"(见他在《现代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小说①);仿吾呢,更是不识时务,他还做过一篇反对章士钊的文章,而且是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号数不记得了,总得在十号以后)。②

仿吾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似乎就只有一篇。达夫在开始多得一点,后来也沉寂下去了。我呢?前前后后就只有两篇,一篇是《亭子间中》,一篇是《哀感》。前篇是受不过达夫的敦促,勉强寄去的,同时还写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长的信给达夫,直率地叙述了自己对于他的感情。那信恐怕没有被达夫保留,但写那信的心境直到现在都还能仿佛。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象一尊圆鼎的三只脚。达夫中途离沪,去北大担任讲师,我是不赞成的。想维持创造社自然是种私心,而达夫的大才小用也觉得不值。但他终竟去了,而且去得如象绝了交的一样。文章尽可在别种刊物上发表,对于嗷嗷待哺的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却一字也不肯飞来。圆鼎子去了一只脚,结局是只好塌台。塌了台之后,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参加《现代评论》,然而一个人不免终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后便接接连连地写信来要我的文稿。

我当时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屋子里的。有一天一次接到达夫的三封很恳切的信,使我感动得

① 题为《十一月初三》,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现代评论》周刊第一卷第一至四期。其中有这样的话:"若把这世界当作个舞台,那么这些来往的行人,都是假装的优孟,而这个半死半生的我,也少不得是一个登场的傀儡。若以所演的角色而论,那么自家的确是一个小丑的身份。"

② 该文题为《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流泪。觉得象自己这样的人依然被朋友在当着朋友看待的。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平衡，为要镇定自己的冲动想坐下去写封回信，在间小小的堂屋里，就象被关在笼里的烦躁着的老熊一样，转来转去不知道转了好几十个圈子。

《哀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孙中山的死耗时所写的一篇短文。那又是因为陈西滢的几次来信的敦促，才寄去发表了的。西滢和我相识是从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钱君胥所译的《茵梦湖》开始。他后来到上海也曾访问过我一次，但是，是在"五卅"以后了。西滢的信我到现在也还保存着的，不用说是不便发表。他那时劝我到北京去，说要把《现代评论》的编辑全权交给我，甚至于又称赞我是"天成的领袖"。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励，还是有意调皮，我也不免暗暗起过一番哀感。因此也就把追悼那位真正的"天成的领袖"的《哀感》邮寄了去。

前前后后就只发表过这两篇文章，这对于"背景的势力"似乎也太"背"了一点。

要谈文坛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笔札文学和日记文学之所以当笔诛墨伐矣。聪明的人可以用创作的态度来写日记，而更聪明的人却劝人连日记也不要写。

三

由福冈回到上海是十一月中旬，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弄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这“四十四号弄”就在四十四号国民党支部旁边，因为号数相同，我住在那儿时接受过好些国民党的所谓西山会议派① 的刊物。房子背后是一面空地，有几座无主的大坟耸立在那儿，多少还呈着些自然原野的风貌，但当我移住不久，大坟已经次第被人启发，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筑填塞满了。

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五天，相别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长兄的灵柩，也由广州回来了。仿吾是六月去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充任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兼着黄埔军官政治学校的教官。他的长兄劭吾，任着第二军的军需处长，得了心脏麻痹病突然死去了。仿吾扶着他的灵柩要转回长沙，因此在上海又凄寂地聚首了两天。我最忘记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两只手来。“这两只手！这两只手！”他的意思是，他的长兄留下了五个遗儿，还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这一双手都是须得他来扶持。他的长兄虽然在做军

①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需处长，但当年的广东经济是异常窘绌的，军队的给养时常闹着问题。仿吾尚未去广东时，军需处长曾写过信给他，叫他在上海设法弄点钱寄回长沙去养家。这是我所知道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跟着北伐军路过长沙时曾去看望过劭吾的遗儿，我记得顶小的一个还在母怀中吃奶，顶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况是相当寂寞的。尔来十几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离开了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形是怎样。

回上海的当时，由于曹锟贿选① 所激起的卢齐之战刚好告了终结。卢是浙江督军卢永祥②。齐是江苏督军齐燮元③。齐是曹派，卢是反曹派。反曹派的卢和南方的革命势力与东北的张作霖是联结着的。九月初旬卢齐在江苏境内以兵火相见，东部战线是在上海附近，西部是在宜兴。在战争开始时，卢相当地占着优势。但到十月初旬为曹派的闽督孙传芳④ 所乘，终竟遭了失败。然而身受战祸的江苏人于齐燮元却是怀恨入骨。有一部分江苏绅士，据我所知道，是以陈陶遗⑤ 为代表，打算

---

① 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军阀迫使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曹锟以五千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于同年十月当选。

②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一九一九年任浙江督军，一九二二年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

③ 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今属天津）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〇年任江苏督军，一九二三年任苏皖赣巡阅使，一九二四年兼任导淮督办。

④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三年任福建军务督理。

⑤ 陈陶遗（1881—1946），又名道一，字剑虹，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曾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长；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调查战地的惨状，以反对齐燮元，同时对于曹锟、吴佩孚①辈加以笔诛。他们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上海的孤军社。孤军社的人多是留东同学，见到我在赋闲，便劝诱我担任调查宜兴一路，并作调查报告的总编辑。这事情，我觉得颇有意义，便答应了下来。

我开首是相当踊跃的，除掉自己所担任的一路之外，还到浏河、黄渡等地去视察过。战痕的确是有点惨淡。象浏河镇上有几条街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砾场。那儿的东岳庙就象成了神像的野战病院一样，一些残废了的泥塑木雕，露天狼藉着。

宜兴的调查费了一礼拜的功夫。我到过蜀山、兰右、湖汊、悬脚岭，也到过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我有一篇未完成的《到宜兴去》，便是那次调查的纪录。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纪录可惜没有写完。其所以没有写完，是有一段隐情伏流着的。

孤军社的人本来有一大部分是信奉着国家主义的，和当时的醒狮派有密切的联络。他们既委托我担任调查，并担任调查报告的总编辑，却又去找醒狮派的首领曾琦，要他在调查报告上做一篇序。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旧友，但他那种近于病态的矜持和把真正爱国的人当成"国贼"的所谓"国家主义"，我是不能赞同的。而他又是长于做"之乎也者"的闱墨体的文章家。孤军社的人要请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既志同道

---

①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二三年二月镇压"二·七"大罢工，十月任直鲁豫巡阅使。

合，又可以得到兼收并蓄之效。但在我，却觉得有点类似乎薰莸和冰炭。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来，不把它完成。终于使孤军社等待不过，把调查报告收回去自行编辑，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为牛溲马勃的资料。但我那篇文章一经拖延，也终于失掉了把它写完的兴趣，我至今都是引以为遗憾的。

同样遗憾的事，是关于《资本论》的翻译。这又是和学艺社所发生的关系。私立大学的开设，在当时的上海颇为流行，学艺社的人也打算办一所学艺大学。我一回沪，便被指派为筹备委员之一人，并被预定为大学的未来教授。除我而外的筹备委员们大都是有职业的，他们多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里任事。离大学的开办还有相当的时期，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由商务出版，在翻译的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这个意趣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尤其在商务编译所任着庶务主任的何公敢，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须得参考的英译本都为我借了出来，他们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须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

我当时感受着十二分的愉快，并且预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译完要五年，在读者或许会诧异，以为是过于迂缓。但《资本论》全部译成中文会有四百万字，日本的高畠素之[①]是

① 高畠素之(1886—1928)，日本社会思想家。著有《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马克思学说解说》等。他从一九一九年七月开始翻译《资本论》，至一九二四年译完。

费了十年工夫把它译成了日文的。高畠在译成之后不久也就病死了。这日译者之死是否为译《资本论》而过劳，虽不得而知，而在我自己却觉得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然而那次的计划，在商务的编审会上却没有通过。译其它任何名作都可以，《资本论》却有不便。

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终于是计划了。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一九二六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

《资本论》的翻译计划既归失败，结局是只好在上海滩上过着卖文生活。这样写起来，在现在的作家眼里，或许会感觉着不愉快，因为“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但在当时的我却是视为万事失败了所剩下的一条绝路。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便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在这些作品之

外，也还陆续地卖了不少的译文。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①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

自己所视以为不大冠冕的事，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识的人看来，自然也不大冠冕。例如已故博士刘半农，他在《语丝》上便挖苦过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比歌德"。他把我和闲话家陈西滢，已故诗哲徐志摩，归诸一丘之貉。据说骂人也是要讲点艺术的，幼稚的人剑拔弩张，阴险的人指桑骂槐，这样的骂适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阴险，事实上是成为了向天而唾。象半农博士的那种骂法，那是可以登诸大雅之堂的了。在"上海"下只消加得一个"滩"字，便深得了春秋笔法。为甚么呢？因为所谓"江湖派"者本来还是雅名，再通俗得一点，便叫"跑滩匠"。在上海"跑滩"的人而"自比歌德"——歌德者，德意志的诗圣而曾为隈马国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不过半农博士的雅骂，其起因似乎也不专为我在上海卖文（单只这层，博士倒是我们的先进），而是卖文卖错了地盘。那时的北京《晨报》本是研究系的机关报是谁也知道的。但那儿的《副刊》向来是孙伏园②编辑的，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上留下了很大的功绩。就在那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伏园和

---

① 约翰沁孤（J. M. Synge，1871—1909），通译辛格，爱尔兰剧作家。著有《骑马下海人》、《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②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晨报》的主事者似乎发生了什么意见，便退了职；①一向在《副刊》上寄稿的主要作家们也就退而组织《语丝》，与晨报社断绝了关系。就在这时，《晨报》的主事者曾写过信给我，要我劝仿吾去主编《副刊》。仿吾不用说没有去。那主事者同时又希望我投稿，允许我以千字四元的报酬，我觉得也是一种收入，便拿了些既成的随笔寄去发表了。但这一发表，我是明确地知道的，便是半农博士的那番挖苦话的触媒。

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小小的讥刺可以惨于蜂虿，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象半农博士的那两句话，其实是很平淡的，但我却记得非常深刻。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于我的神经过敏了。由于这同样的神经过敏，在同一时期，我也受过好些人的小小的慰藉，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住在环龙路，没有雇用女工。内事是由内子担任，外事便归我外子听差。每日所吃的蔬菜，都是我一早跑到八仙桥小菜场去采办的。

我记得，在要赴宜兴调查之前，因为要有好几天不在家，非多储备些食粮不可。一天清早提了一个菜篮，又拿了一张大包单，跑到八仙桥去。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一件学生装，外面披着一件破外套，头上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骆

---

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间，孙伏园拟将鲁迅当年十月三日所作《我的失恋》一诗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发排后被《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遂愤而辞职。《我的失恋》一诗后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四期上刊载。

驼绒的鸟打帽①，是民国三年初到东京时买的。在小菜场附近买了些猪肉、腌鱼、白糖、白菜，把一个菜篮已经装满了。又跑到菜市上去，向我每常照顾的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妈妈买了一大堆塌菇菜、芹菜、油菜苔、豌豆苗。我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那老妈妈向我说了几句话，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闻其声。

老妈妈一面在三和土面上替我打包袱，一面问我："大司务，你在啥地方烧饭呀？"

——"在环龙路。"我回答她。

——"你往后该买个大来些格篮，用包单会把菜搁坏个。"

就只这样简单的两句，而在我，却好象是有生以来所受过的最大的恩宠。我自己并不想自比为韩信，但韩信受了漂母的一饭之恩而以千金为报的心理，我觉得是能够了解的。

同样是八仙桥。大凡在上海的小菜场上都有面摊，卖粉和面。我是喜欢吃面的人。每逢一早到小菜场去，便要吃两碗面来当早饭。那儿的一座面摊，当炉的怕是一夫一妇，都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老板娘的一位，人颇矮小，在血色不甚好的脸上有些雀斑，一双眼睛倒还灵活。我一去吃面，她总要特别把我面前的桌面打抹干净一下。面吃完后，她又要用一张比较洁白的葛巾用水绞来让我净面。起初的两三次只以为她是爱干净，善于招待客人。但去的次数多了，看她对于别人却不那样，才知道她是对于我一人的好意。这，也是使我有些受宠若惊的。在那位年青的老板娘眼中，或者又看待得我是在"大

---

① 作者注 日语，便帽。

司务"以上了罢?我不曾和她搭过话,她的厚意继续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我离开上海去广东为止。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桥去吃两碗素面。

达夫因为《创造周报》事虽然和我稍稍有点扞格,但我们的交谊是没有改变的。

一九二五年初头,太平洋学会的石瑛① 长武昌师范大学,达夫做他的辅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他们要聘我去做文学系的主任,连聘书和路费都送来了,路费是二百元。

说起武昌师大的下聘,前后共有三回。第一回是一九二一年九月,那时还是高等师范,尚未升成大学,聘我去做文科教授,聘书下到了四马路的泰东。但我已经折回了日本,在继续着我的医科学业了。

第二次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已经升成了大学的时代了。校长姓张,寄信到福冈,也聘我去做文科教授。那次我倒很想去,但因为学校的手续没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书,未寄旅费来,而屡次催我去上课——弄得我不很高兴,我又谢却了。

第三次有聘书和旅费寄来了,而且升了官,是做主任。达夫既在那儿,又有张资平是那儿的理科教授,颇有声望,而且正领导着一批青年作家。有了这样好的条件,论理,无论怎样都是应该去的了。但我却又陷在了不能去的苦境。

在前面说过,中华学艺社的人所打算组织的学艺大学,我是挂名筹备委员之一,而且被预约着充当将来的文学系主任。

① 石瑛(1878—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众议院议员。

委员虽仅是挂名，主任也仅是预约，然而，怎好见了实利便抛弃了朋友们的厚谊，而向高枝飞去呢？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武大的聘书和旅费一同退回去了。

这次的辞退，觉得很对不住达夫和太平洋社的人。达夫写了信来，说是我的辞退使得大家失望，要我再加考虑。北大的陈西滢也写过信来劝我，他照例是用着那种使我有点难堪的措辞。他把武昌比成限马，叫我去当歌德。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①，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他说，要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中国人是封建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他是讳莫如深的。一会儿要和你道弟称兄，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槃出世。这真是不合算的。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实。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树立了一个势力，又怎么样呢？何况那样的建树，也谈何容易，入教育界的人多，能够树立成一个中心势力的，却没有几个。

其实我的参加学艺大学的组织也要算是加入了教育界，而事实上是失败了的。这，且留待后述。在学艺大学开办之前，我也在大夏大学当过几天讲师，结果是那儿的办事人把我当成“么二”②，而且有一两位国家主义派的学生更曾打过我的

① 洪为法(1908—1970)，又名式良，江苏扬州人。作家。著有《为法散文集》、《呆鹅》等。

② 旧时上海称低等妓女为“么二”，稍高等的为“长三”。

翻天印。足见专靠封建意识便能盖世称雄的自然有那样的人，而我却没有那种本领。

关于“么二”的待遇，我在这儿想插说几句。

当我初回上海时，大夏便想找我去当讲师，讲文学概论。因为钟点少，每礼拜只两个钟头，而校址离我的寓所又远，我没有答应。但终因那儿的学生有一部分希望我去，办事人有一位是留东同学，他直接间接地总要拉我去帮忙。我在第二年的四月，新学期的开始，也就答应了每礼拜去讲两点钟的文学概论。

我那时对于文学，已经起了一种野心，很想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关于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先从文艺的胎元形态，原始人或未开化人及儿童之文艺上的表现，追求出文艺的细胞成分，就如生理学总论是细胞生理学一样，文艺论的总论也当以“文艺细胞”之探讨为对象。

这种“细胞”的成分，在我看来，不外是由于外在条件所激起的情绪，与情绪所必具的波动，即节奏。开始是简单的，继进是复合的，更进则由情绪的领域跨入观照的领域，由条件之反射成为条件之再现。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创作过程。

情绪的波动是有感染性的。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由其本身的节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样的反射。但更进一境，把内在的或外在的条件如实地、或由作家的能动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现出来，那不用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或更进一步的效果。小儿见人哭则亦哭，大

人则哭之所以然如不说明，或说明而不得到适可，他不会和你同声落泪。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感应过程。

条件是进化着的，无论内在的或外在的，都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进化。由这条件所反射出的情绪，因而也是进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条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感情，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过去了的时代条件无由再现，故过去了的时代文艺有它的不可摹仿性。它是独立具存，它是后无来者。这是我所了解的文艺的进化过程。

我是想根据这三种过程以构成文艺总论，再就诗歌、小说、戏剧等以作分论，以构成所悬想着的"文艺的科学"。

这个规划是需要有多方面的参考书，才可以实现的。我自己素来是没有什么藏书的人，而当时的大夏大学更连具体而微都还说不上。他们租了一间租界外的旧公馆在开散学，图书馆是没有的。我的规划，自然也就很难如意地推进。但我当时也要算是费了我的至善的努力。自己没有书，而且没有钱买书，每每跑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借阅或者立读。为着一礼拜两点钟的讲义，总要牺牲好几天的工夫。

但我得的报酬是多少呢？他们每个月给我二十块钱，勉强可以够来回的黄包车费。原是出于帮忙，钱多钱少，倒不在乎。因此，我在那儿也相安无事地教了两个月。但不幸我到后来才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秘密。

原来大夏大学的讲师是有等级的，有每小时三元与每小时二元半的两种。这等级究竟是依什么标准而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是受的二元半的"么二"待遇，那是明而且白的。

在这儿又有件出乎意外的事，是五卅事变成为了我的救星。五卅事变一发生，沪上学校全体罢课，我也就得以和那座伟大的大学堂于无形中断绝了关系。那学校在暑假过后又下过聘书给我，起初是照旧的二元半，我把聘书退还了他们，自己觉得颇幽默地，说不愿再当“么二”。他们接着又下了一道聘书来，每点钟加了五毛钱，把我提升成了“长三”。说也奇怪，知道了受着“么二”的待遇时倒也还没有什么：因为原约本是帮忙，别人出此或许并不是有意的歧视。然而这次的“长三”提升，却是存心把钱来买贿了。受人买贿倒也没有什么，不过为了五毛钱便要卖身，终嫌自己还矜持了一点。

四

五卅事变转瞬便要随着木星一周天①了。全国各报纸照例是会有连篇累牍记述的。年年岁岁都在做着纪念文章，而那事变的全貌，替我们把它塑像下来了的作品，却似乎至今都还没有见到。

有的人在怪时代。时代姑娘哟，你似乎也太轻佻了一点，花样变得太多，使我们实在应接不暇。然而我们这些照相匣子太简陋，照相的本领有限，更加以不肯努力，怕也是实际的情形罢。

别人暂且不忙责备，就是我自己也就胡涂得可观。"五卅"当时我是住在上海的，而且就在"五卅"那一天我也到过南京路，虽然去迟了一刻没有得到侥幸地做一名烈士的光荣。然而我对于那次的事变又有什么文字纪录下来了呢？

手中无书可查，只能全凭记忆，而记忆却真是不甚可靠的东西。连那样划时期的事变，仅仅十二周年，那全体的经过，在我已经是很模糊了。我只记得事变的起源是由于小沙渡路的日本纱厂的工友为经济的要求罢工，工厂的日本人采取无

---

① 木星公转周期约十二年。

理的高压，把工友之一人顾正红①，用手枪打死了。上海的学生界同情工友，在“五卅”那一天，往南京路工部局②去要求惩办凶手，不料又酿出了更惨的悲剧，被那儿的西捕开枪，把学生打死了若干人，打伤了若干人。——记忆的残存就只有这一点，死伤者的人数姓名，不用说都已经忘记了。听说目前是“民族复兴”时期，我也由衷地在希望我们的民族真真正正能够那样。但不知对于那一批为民族斗争而死了的烈士，在上海或中国的那一隅，有什么纪念的建筑没有？

仅仅十二年，要搜集当时的活鲜鲜的资料已经就不容易了。大家委实地都差不多。其所以差不多者，岂不是仅仅受动地在时代的潮流里被推荡，而没有能动地把各个时代的精神和面貌把握得着吗？真正要想差得多，只有努力把那容易消逝的东西抓紧，才能够夺得锦标。你不高兴她而要朝相反的方向走，我也敢于保险，那一定也会是差得很多的。当猿人进化到人是差得多，由人退化到猿人也是差得多。要在人中求出“超人”，断断乎不是向着猿人走去的那条路。

月亮光光呵，美呀美！听说“诗人”还在赞赏着。但是，从那冻结着的火山口里有冰冷的笑声了，朋友。

约略是午后三点多钟的光景。

---

① 顾正红(1905—1925)，江苏阜宁(今滨海)人。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② 五卅惨案发生于南京路、贵州路口的老闸捕房前，此处工部局应为老闸捕房，下同。

我同一位C君①，在浙江路上，朝北，向大马路走去。照例是那样乱杂而又悠长的街。走到交叉路口的近处，街旁步道上的行人就象潮水一样从前面簇拥来了。承头的多是学生，都呈着一个苍黄的面孔。

——“他们开了枪了，不要往前进！危险！”一位学生气喘着向我说。那是大夏大学听过我的课的人，他也在苍苍茫茫地放着小跑，被我把他拉着了。

——“谁开枪？”

——“工部局门前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好些人！交通断了。”

人潮愈拥愈来得汹，我放了学生的手，同C君商量着仍往前去看看实际的情形。

在人潮中推荡着，好容易逆凫到了大马路。电车、汽车，黄包车，举凡交通工具都停止着。宽大的马路就象是崖礁突兀的浅海，形成着一片猛烈的人的漩涡。

天是阴晦的，有浓重的灰色的云在低空中由东向西地流荡。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两座高塔就象在动摇，就象几时要向那人涛中倒溃下来的光景。

要突破那人漩，端直地向工部局凫去，那是不可能的。在那儿只好是一半自动地，一半被动地，在停窒着的一些车辆中，被那潮头荡到了大马路的彼岸。

好容易被荡到了先施公司的大门口了，前面更加猛烈地

① 指周全平(1901—1983)，江苏宜兴人。作家。著有《烦恼的网》、《梦里的微笑》等。

退下一股人潮来。我和C君终被荡进了先施公司的门内，而那铁制的锁子门在我们的背后好容易把闸口堵着了。①

公司底层已经化成了一片人湖，店员们也都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

我们走上三楼去，那儿，人却是很稀疏，除掉店员之外，外来的人没有几个。大约在楼上来买货的顾客，因为生了事，便都窜下楼，找寻出路去了。

走向那西南角上，从一堵向上半开的玻璃窗口俯瞰下去，惨剧发生处的情景一目了然地展开了出来。

那素来是阴沉沉的工部局，把铁门紧闭着，愈见表示得阴沉。门前和街心的电轨上有些水渍，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工部局对面和其附近的商店都早已把店门关闭了。

楼下是一个十字路口，有几个红头巡捕②和山东大汉在那儿堵塞着行人。有的端起步枪来威骇，有的举起木棍来乱打。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几位没穿制服的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鹗视地东奔西突。手枪柄上是有丝绳套在颈上的，那大约是怕第一防线的手被人突破时，还有颈子作为第二防线以维护武器罢？然而那样的推臆，却不免是一种杞忧。猛烈的人潮尽可以荡掉脚上的鞋子，尽可以冲破公司的铁门，而对于那些木棍、步枪、手枪的尖子，却如象演奏会上的各种

① 作者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所述情景与本文稍有不同。《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说，五卅惨案那天，他和周全平走到先施公司门口时，“全平竟不知被挤到哪儿去了”。据楼适夷一九八六年回忆，当时他在先施公司楼上与作者相遇，未见周全平。

② 即印度巡捕，又称“红头阿三”。

演员和乐器之受着指挥棒的指挥。尖头的一举一收便是潮头的一涨一落。

干得真迅速，门口的血没多一刻工夫便冲洗干净了。尸首是不用说的。……

一位讲广东官话的管事，同站在窗边，对我们这样说明着。

我们没有说话，只顾看楼下的光景。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罢，街心的一位西捕，忽然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们。那人，我佩服他真是精敏，他不仅在防地，而且还在防空。他举起手枪来向我们挥动，意思是要我们把头缩进窗去，不准往外看。他那一双眼睛就象要爆出弹丸来的一样，比他手中的一对手枪还要可怕。接着便有几位红头大汉和山东大汉举起步枪、手棍来楞着我们。我们也只得把头缩转来。讲广东官话的管事自行把玻璃窗拉拢了，接着更命令店员们把临街的窗幕通统拉拢了。

看这情形是只好弄到罢市的，终竟流了血，终竟被逼到了这步田地。……

广东官话在慨叹，但我们却还想再看看外边的情景，又向更上的几层楼走去。然而，那几层楼的临街的窗幕，都早已被拉拢了。

就这样，和五卅惨剧绝缘后，在先施里面被关闭了几个钟头。等到街上的人潮平静了，又才被解放了出来。街上已经上了电灯，大马路上的电车和黄包车绝了迹，时而有大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外国兵飞速地往来奔驰。

绕道仍从浙江路走回法租界的环龙路去。走到浙江路的路口时，已经有外国兵如临大敌地在那儿站岗了。

受伤者里面，记得有一位顶年青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似乎姓黄，是南洋的华侨子弟，年纪只有十七岁。入了医院后，报上载着他的同在上海读书的一位姐姐便住在院里看护他。还有他的圣约翰的同学多人都诚恳地关切着，替他们姐弟奔走。其中一位朝鲜人姓申，我看过他打脚球，是魁梧奇伟的一位大汉子。这些姐弟间的、同学间的、乃至被压迫民族间的令人可以落泪的爱情，和小沙渡路与南京路上的流血，形成一个极显明的对照。我是深切地受了感动。当时曾起过一个想念，想把这个对照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幕　慰问顾正红的家族；

第二幕　南京路上的惨剧；

第三幕　病院中的死别。

想写成这样的三幕。前两幕不用说要让那小兄弟去活跃，第三幕却要让姐姐做主人公。那小兄弟实际上是否死亡，我现在已经不记忆了，但在我的拟想中，是要让他死亡的。由于他的死亡，向他悲痛中的姐姐，启示出一条艰剧的而是应该走的路。那姐姐要沉痛地放下一个决心，越过她兄弟的死尸，努力变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央大克①。

但这剧却没有做成功。

这，要怪我太无能力。由于画鬼容易画人难，我在构想的

---

① 作者原注：Jeanne d'Arc(1412—1431)，法国莪尔伦的少女，英法战争之际，莪尔伦城被围，挺身而起，解救国难。后为英军所捕，被焚死。

途中便把方向转换了。

前好些年辰我便想把聂政姐弟的故事写成剧本，名之曰《棠棣之花》。我也曾经发表过两幕，一幕是收在《女神》里的“聂母墓前”姐弟的诀别，一幕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濮阳河畔”聂政与严仲子的邂逅。落尾还有两三幕，起过好几次稿，但都不能满意，写了又毁了。那计画遭了停顿，并早决心把它抛弃了。不料五卅惨案一发生，前面所说的那对现实的“棠棣之花”却使我这虚拟的古事剧复活了转来。我便费了两礼拜光景的工夫把那两幕剧的《聂嫈》写出了。

《聂嫈》和未来的央大克，自然不同，但和起初所计画的《棠棣之花》也完全两样。“聂母墓前”的姐弟诀别让它独立了，“濮阳河畔”的一幕是完全改造了的。这剧写成后曾由上海美专学生表演过一次。演了三天，卖了几百块钱，捐献给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去了。详细的情形，我在《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后序里是提到过的。

《聂嫈》的写出自己很得意，而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里面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艺人所吐露出的情绪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奥处的表白。但那种心理之得以具象化，却是受了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影响。

爱尔兰文学里面，尤其约翰沁孤的戏曲里面，有一种普遍的情调，很平淡而又很深湛，颇象秋天的黄昏时在洁净的山崖下静静地流泻着的清泉。日本的旧文艺里面所有的一种“物之哀”(Mono no aware)颇为相近。这是有点近于虚无的哀愁，然而在那哀愁的底层却又含蓄有那么深湛的慈爱。释迦

牟尼舍身饲虎① 的精神，大约便是由那儿发挥出来的。日本的“物之哀”大约也就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学虽充分地被腐杂化而被定型化了，但那里面确有些清湛而深邃的东西。在佛教经典以外的印度文学，我所接触的也有限，但我读过伽里达惹的《霞空特罗》②，那种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读起来令人心身上所有的一切窒郁，都要消融了的一样。

我自己在这样感觉着，只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才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绪。但在救世的方法和悲苦的认识上有所不同。象佛教的以有生为苦蒂，导人归于寂灭的那种消极的办法，两千年来已经证明是不合实用的。爱尔兰人有哀愁的文学，而也富于民族解放的英勇精神，谁能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呢？日本人在还懂得“物之哀”的时候，他们的国势是蒸蒸日上的。日俄战争时的名将，乃木希典③，他有一首《金州城外》的七绝，我觉得颇足以表示明治维新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的心境：

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
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这诗，在日本人所做的汉诗里面，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

① 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 舍身饲虎，佛教故事，见《金光明最胜王经》十《舍身品》。

② 伽里达惹(Kœlidāsa)，通译迦梨陀娑，印度古代剧作家、诗人。著有《鸠摩罗出世》、《云使》等。 《霞空特罗》，通译《沙恭达罗》。

③ 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名将，日俄战争时任第三军司令官。

种。更想到他是指挥作战的武人，而在战胜之余，却做出了这样一首表示着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诗，怎么也要令人肃然生敬。他之所以能够有叱咤三军的力量，不也就是出于这儿的吗？然而日本人的这种心境，在目前似乎也要费点考古学的工夫才能寻找得到了。

《聂嫈》写成后，我把它同以前发表过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两篇集合起来，成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还在氤氲中的光华书局。这书局是沈松泉和张静庐① 两人合伙搞的，但据我所知，他们所合的伙可以说是干伙。

张、沈两人和我的关系，说来也颇有一段渊源。在一九二一年我最初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在泰东书局的编辑部，张在管印刷而兼做"小说家"，沈在管校对而兼做"诗人"。因此，我们在马霍路上也就有过半年同吃大锅饭之谊。他们由泰东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也是很有限的。张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三岁大的男孩，一同住在堆栈后边的一间小房里。因为生活的支绌，他和沈两人便想做小伙计生意，在夏天曾托我挪点时间出来，替他们译部小书。我答应了，便把安徒生② 的有名的童话《没有画的画谱》，由德文重译出。但到译得

① 沈松泉，原名涛，一九〇四年生，江苏吴县人。作家、出版家。一九二五年与张静庐、卢芳创办上海光华书局。著有《少女与妇人》、《死灰》等。　张静庐（1898—1969），浙江慈溪人。曾参与创办上海光华书局、现代书局、联合书店。著有《在出版界二十年》。

② 安徒生（H. C. Andersen，1805—1875），丹麦童话作家。著有《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只剩下一两夜的光景，泰东的赵南公却把他们同时开除了。那原因，我至今都还不大明白，大约是赵探听到他们有做小伙计买卖的消息罢。

《没有画的画谱》，因为那样，也就没有译完。那译稿直到现在都还留存在我的箧底。

沈、张离开泰东后，一同到过一次新嘉坡，沈因为是"诗人"，偶尔在和我通信。但他们到了新嘉坡之后，也没有得到成功。在一九二四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也回到上海。张在商报馆里编本埠新闻，沈是赋闲着的。

沈的家——记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庙附近。他有一次引我到他家里去过，因为要去看他父亲的病。他的家实在是很寒伧的，既逼隘而又肮脏。他的老人患着瘫症，睡在楼上，楼的空间几乎被一张床所独占着的。当时我才从医科大学毕业不久，听诊器、橡胶槌之类西医所必具的法宝，是随身带着的。我替他的老人验了瞳孔，敲了膝反射，听了听心音，我断定了那病症是 Tabes dorsalis① 。那是无法医治的。后来的结果是怎样，我可不清楚了。

我生平替人诊病，除掉在学校时的实习之外，就只有这一次。但也没有主方，没有受甚么脉礼，只是为相熟的人尽尽心而已。

沈的生活是那样的情况，张也相差无几。因此，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们两人又起心想做点书生意。这次，自然又来

① 作者原注：脊髓痨。

找我。我便把那《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了他们。

上海的商家惯例是以端午、中秋、年底三关结账的。他们在端午过后把书拿去付印，因而印刷、纸张等费便可以捱到中秋，等到中秋来时，卖书所得的钱已可以周转了。故尔他们的成本，我知道，就是出了些钱来租了一间办事室，在福州路上正对着棋盘街口的一家门面极窄小的药店的楼上。书出后，他们起初是找那药店代售的。但不久，他们竟把那药店顶过来，便成为了自己的门面。

这，便是光华书局的诞生史。它在出了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后，接着便是我的《文艺论集》，接着又是达夫的《文艺论集》。此外在中秋节前后又发行了创造社所编的《洪水》①半月刊。那书店，可以说是作为创造社的托儿所的形式而存在的。这关系在后来创造社被封以后是尤其显著。但这托儿所在现在是已经化为乌有了。可怜创造社所托的儿，或者仅是我自己的儿，竟遭了那不良的褓母辗转的卖身，到了现在有好些竟连下落都不知道了。

---

① 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至十二期由上海光华书局发行，十三至三十六期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发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五

漆树芬①住在霞飞路上的一个弄巷里，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弄背抵背。他是那年春季，由日本的京都帝大经济科毕业回到上海的。他是河上肇博士的弟子。

漆的号叫南薰，本来是四川成都府中学的同学，要低我一级。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我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他也到了日本。同在东京，算又相处了半年。虽然不同居，但于礼拜日或节日是时相过从的。但不久便分开了。学籍虽然相同，同是经过日本的高等学校而大学而毕业，但因学校不同，学科也不同，八九年间不仅没有见过面，连信也没有通过。

南薰是一位老同盟党员，他在辛亥革命时似乎就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人不甚高，连五尺怕也不足，但并不瘦削。眼睛有点暴，嘴角有点斜，一个龙胆鼻倒悬在闷铜色的颜面中央，颇带着矜持的意味。有点不修边幅。体臭颇强，尤其胁臭，大约也是由于不大肯洗澡的原故。在中学校时，成绩是优秀的，同时对于政治的趣味似乎也很浓厚。在东京聚首时，一谈到国事上来，总要谈得慷慨激昂，而且有点口角流沫。

这种典型的人，我在当年是不大喜欢的，——就是近年也

① 漆树芬（1892—1927），字南薰，四川江津人。经济学家。一九二六年任川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新蜀报》主笔。著有《经济侵略下的中国》等。

未见得便怎样喜欢。

但在八九年后，在上海重聚时，南薰实在把我征服了。

因为居处相近，他时常肯到我寓里来，照例是那副志士风貌。穿西装时一条领带总打不整饬，穿中装时几个纽扣总有一两个要忘记扣拢。体臭依然布着相当有力的第一线。但他一谈吐起来，虽同样谈着国事，同样慷慨激昂，却再不象往年那样使我生厌，否，而是使我“如听仙乐”了。

他在上海法政大学担任了几点钟的功课，来时多是在吃过晚饭后，一谈总要谈到夜半。

有一次晚上，记得是在五卅惨案① 前不久，他到了我寓里来，抱着了一大包原稿。原稿纸是通常日本人用的四百字一张的，订成了两大厚册，每册有三四百张的光景，用字数说时自当在三十万字以上。那便是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了。

从历次的谈话上，我早就知道，他在从事着写述关于中国近代经济的论著。但没有想出他的著作早已告成，而且分量是那样的大。大约也是由于同受了河上肇的影响罢，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见解，我们大抵是一致的。我是半途出家，论事仅凭直觉，要叫我举出实证，尤其象统计图表之类，我既不拿手，而且身边没有材料，也有手难拿。南薰却不同，他是专修这一部门的，所有一切的资料，真是取诸左右而逢其源了。

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创造十年续编》单行本，此处作“三一三惨案”，《沫若文集》第七卷照此编入。现据上海《大晚报》最初发表时行文改回。

古时的刘玄德说他遇着诸葛孔明如鱼得水①，我之得到南薰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在当时的感情，正好借着这个譬语来表示。

南薰说，一切材料是在大学在学的三年间注意搜集的，写是在第三年上开始，写了有一年半的光景才完成了。这努力，这坚忍，单只这层早就是在我们侪辈中所少见的。聪明的人更会取巧，有的在宣言：长篇大作的东西连看都不高兴看，那有闲工夫来干这种傻事！

我接到《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之后，读了一昼夜，一口气便读完了。南薰要我做篇序，表明我和他的关系和我对于他的著作的批评。我答应了，而且也做了。我往年是不肯替人做序的，达夫的《沉沦》、资平的《冲积期化石》，都曾叫我做序，但我都没有著粪佛头②。我明确地知道，他们的作品是用不着我的序的，序了反会要玷辱他们。但是南薰的书，我却替他序了。③

南薰虽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实性质相当小心，甚至有点逡巡。他愁他的书没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后没人要，因此也就煞费踌躇。我所以答应他做序，也是想给他一些鞭策。但他在叫

---

① 事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② 即佛头著粪。典出《传灯录》七《如会禅师》；又见刘壎《隐居通议》十八《序书》："欧阳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记其前。王荆公见之曰：'佛头上岂可著粪！'"

③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创造十年续编》单行本将本章第一段至此并入前一章，《沫若文集》第七卷照此编入。现据上海《大晚报》最初发表时分章情况改回。

我做了序之后仍然不放心，接着又去找徐谦和唐绍仪①。徐是法政大学的校长，唐在当时也是住在上海的，他们也都答应了。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笔，仅是经过署名者的检阅而已。最后他更找到了吴稚晖。吴稚晖给他写了一篇很认真的长序，更把他恭维到了绝顶。序里有一节，记得曾把他的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说是近年来使他感佩的最有价值的著作。吴稚晖的眼识的确精明，他于风尘中发见俊士，以他那“耆宿”的资格肯为素不相识的一位无名青年做那样无保留的介绍文章，在当时就连我这个第三者也都是暗暗地生着感谢和钦佩的意思的。

南薰得到了这些序，欢喜自不用说，但在序的位置安排上又费了相当的苦心。我的是不成问题的，但其余的三位都要算是不折不扣的“鼎辅元勋”。到底谁个当前，谁个当后呢？在这儿，说也“幽默”，却要感谢我们的“方块字”。南薰拿着这个问题来和我商量，我教他，何不把姓氏笔画来数一数？真凑巧！一数，便成了“吴唐徐郭”，唐、徐虽同是十画，但唐究竟是做过内阁总理的人，无论尚齿尚爵，安在徐的前头是没有多么大的问题的。字假如拉丁化了，——变成K·S·T·W——位置便刚刚倒过来，那可就麻烦了。

---

①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民国初任司法部次长，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一九二四年任上海法政大学校长。著有《诗词学》等。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曾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一九一二年任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一九一七年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为七总裁之一，一九二五年时闲居上海。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南薰也并没有因而安心。他那书名，在初并不叫“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他自己本是用了一个很冗长而不很响亮的名称的，详细的字面我忘却了。当我接到他的原稿时，我嫌他的名称不好，便替他改成了“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儿自然是含有集纳者的派头。他在初也高兴了这个书名，曾去找了一位姓萧的女书家①，名字不记得了，当时和他同住在霞飞路上的，替他题签。但等到他自己破费，自己印行，印到那全书都快要告成，只差封面还未印就的时候，适逢有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②在五卅惨案中由北京到了上海，南薰又抱着那书去找他。意思是仍想请他做篇序。经济学家说公务太忙，序没有工夫做，只是书名太刺目了一点，却替他改题了一个封面，便是“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这书印行后曾哄动一时，销路十分畅达，现在究竟销到了几版，而且曾经改排过没有，均不得而知。如字版是照原样，读者可以见到那书的表里的书名是两样的。外封面用着马寅初的题字，里封面却用着萧女士的署名，颇有一名一字的风味。

相隔虽然仅仅十一二年，当时的世风和现在的却相差得很远。“帝国主义”这种字样，在现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当年却几乎是一种讳名。要使用这种名词的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共产党。马寅初先生要把“帝国主义”云云改成“经济侵略”，是良有以也的。

---

① 即萧娴，字稚秋，一九〇一年生，贵州贵筑人。

② 马寅初(1882—1982)，浙江绍兴人。经济学家、教育家。著有《马寅初演讲集》、《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等。

这儿又要插一段故事。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各团体都动了公愤。留沪的四川同乡，竟也曾因此而活动了起来。中国人据说是一盘散砂，但是四川人却更象一盘鹅蛋石。四川人的乡谊素来是很淡薄的。这原因怕是由于多是客籍的原故。在明末清初，四川据说遭过一次张献忠的屠杀。据乡间的口碑，说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四川成了空地，因此在清初也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现在的四川人大概都是外省人，就如我自己的祖籍便是福建。我们这些客籍人在四川是各省有各省的会馆的。因此我们四川人的乡土观念似乎没有广东、浙江那些省份的来得浓厚。这，或许也就是四川人的好处。四川话可以通行天下，四川人可以四处打锣。然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就连那些鹅蛋石也都想团结起来了。

鹅蛋石中之尤近于鸵鸟蛋者，记得有谢持，有熊晓岩；其次有王兆荣，有数学家何鲁，有敝同宗郭步陶，① 有国家主义派的领袖当今圣人曾琦，南薰和我也凑了两脚。否，南薰倒是很热心的一位，似乎事情的发动者便是他与何鲁与步陶。他们

① 谢持（1876—1939），原名振心，字慧生，四川富顺人。先后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七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参议、代理秘书长，一九二五年参加发起“西山会议”。　熊晓岩（1881—？），名骅，四川万县人。曾任四川省议会议员、成都法学院院长等职。　王兆荣，号宏实，四川人。曾任丙辰学社理事兼总务干事、北京法政学校教务长等职。　何鲁（1895—？），字奎垣，四川广安人。数学家。曾任中山大学数学系主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等职。　郭步陶（1881—？），名惜，四川隆昌人。早年参加南社，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上海《新闻报》编辑等职。

三个人的确很热心，何鲁不惜金钱，南薰不惜奔走，步陶不惜笔舌。磋商了多少次，同乡会公然成立了。

第一次开成立大会，记得是在一个讲堂里，不记得是什么学堂。开会的结果自然是举出了一批职员，而且很多。干部是王兆荣、何鲁、郭步陶、漆南薰几个人，我也算是一位，是担任文字上的工作，名目不记得是"宣传"还是"文牍"。在我的下边有一位李民治①，别号德谟，他当时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后来在北伐时共事很久，但我和他的相识是在这儿起头的。

第二次是聚餐会，会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西藏路的宁波会馆②。为什么要聚餐，聚餐后干了些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场有杨杏佛③的演说，我是第一次看见他，第一次听他说话的。人颇瘦削而高长，有满脸的天花，是一种才子型。他那口齿的清白，措辞的简洁，思路的有条理，的确是名不虚传。他和何鲁最好，他之出席是由何鲁请来的。——我的记性真坏。这聚餐说不定本是第一次，就为的是开成立会的商量，而上述的成立会倒是第二次了。

成立会上通过了一件事情，是要发表一通宣言，由我执笔。这，不用说，我也做了。后来由创造社出版的初版《水平线

---

① 即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县人。曾编辑《流沙》、《巴士底山》，译有《新俄诗选》、《工钱劳动与资本》等。

② 应为宁波同乡会。

③ 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玉山（今清江）人。曾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一九三三年被害。有《杏佛文存》等。

下》里面，有一篇叫《一个宣言》的，就是这个东西。① 宣言做好后，要在第三次职员大会上通过。

第三次的职员大会也是借的一处私立学校的讲堂，是在楼上。讲堂是空了出来，在一边安着一张条桌作为主席台，前面围放着几排板凳。另一边放了一张大餐桌，准备了一些茶水。

职员到得不少，将近四五十人。有各科各股的负责人，也有各学校、各商帮的代表。开会如仪，通过了好些议程，议到要审查我所做的《宣言》来的时候，吾乡圣人曾琦中途出席了。他是第一次出席同乡会的。

《宣言》的草稿由我自己朗读了一遍。说句开诚布公的话，那篇文章我自己很得意。虽然总不免是所谓"洋八股"的那一套，但就仅那一套在当时并没有好几个人能做。前面已经说过，连"帝国主义"那种字眼都要犯讳，也就可想见了。结果依然是犯了讳。

"洋八股"也有"洋八股"的路数，既在做五卅惨案的宣言，无论是怎样会做搭题，总不会搭到"学而时习"上去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免不得便出现了两下。

当我的《宣言》念完，主席征求大家的意见时，圣人曾琦便悠然而起，步至主席台前，要求简单发言。曾琦是一位自封的雄辩家，高度近视，中等身材，苍白而略带肥意。上唇微翘，声

---

① 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北京《晨报副刊》，题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收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水平线下》时，改题《五卅的返响》；今题《为"五卅"惨案怒吼》。

音虽然有点盘舌而带痰，说话却是很得要领。他说，同乡会应该提倡爱国精神，不好为赤党张目，象郭某所做的《宣言》，所说的大抵是赤党的经济理论，尤其有几处“帝国主义”字眼，太露骨，应该慎重修改。

就这样简单地说了几句，接着又说，他的事情很忙，便忽忽地又中途退席而去。

曾琦担任的是什么职务，我不记得了。《宣言》本是公众的事，要经修改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们的圣人，尽管是怎样的“一日二日万机”①，而同乡会又尽管是怎样的没啥意思的团体，别人都在提起全副精神在干，而他素不关心，在这第三次会上也仅仅中途出席，忽忽而来又忽忽而去，这，是使我十二分不高兴的。

《宣言》经过主席王兆荣的裁夺，当场指定了谢持、熊晓岩诸人做审查委员，修改后留待下一次开会再行通过。这样，本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我因为过分的不愉快，在预定的议程开完后，我自己临时动议，请求辞职。于是便也生出了一个小小的波澜。

谢、熊诸人大约也是感觉着“左右做人难”罢，审查的事情停顿下来了。但《宣言》又不可不早日发出。结局又是由何鲁去找杨杏佛，请他执笔修改，奇妙的是没有更动什么，只把“帝国主义”改成了“经济侵略”。

究竟还是圣人能识时务。《宣言》发出去后，上海的各大

---

① 语见《书·皋陶谟》。

报都不肯转载。步陶是时报馆的老记者，就以他的大力，在那儿也只登出了半截。

同乡会成立了之后，也还出过一种刊物，叫着《长虹》①，是由我去找梁溪图书公司出版的，没有要印刷费。但仅仅出了一期，那条“长虹”也就雨霁天青了。其后不久，就连同乡会也随着“长虹”而无形消灭了。

谁个能够说我们四川人不是鹅蛋石呢？

南薰住在霞飞路上，我为“公务”也到他寓里去过一两次。寓所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租给一位朋友②住着，他的一家人就住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面，除他而外有他的夫人③和两个孩子。看那情形，南薰夫人是很能吃苦的，虽然随着南薰到过日本，而且住在繁华的上海，乡下人的朴素之风依然保存着。用旧式的观念来说时，南薰在著作上的成功，怕有一多半是由于她的“内助”罢。

我第一次碰着吴稚晖的便是在他那儿，是那老头子把他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原稿和序文送去的时候。时候是在晚上，我和王兆荣先在，老头子后来，在楼下坐不了一会，并没谈什么，他又上楼去了。听说楼上的朋友和老头子相熟。老头子的这点不拿身份，我是佩服的。他自己卖了气力，做了文章，还要亲自送来，真正是难能可贵。象我自己尽管住得和南薰比邻，但他来十次，我总怕去不得一次。我自己并无身份可

① 月刊，一九二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仅出两期。

② 指陆丹林。

③ 即凌树珍。

拿，不过总懒得一点。只要人肯来，我也就懒得去，如此而已。然而不拿身份总是值得称述的。

南薰的书虽然销路很好，但仅靠一本书，收入自然有限。他为什么不找书店出版，而要自费印行，我记得不甚了了。似乎也是找了几家书店，没有打响。我要再说一遍，当时和现在，究竟是两样。尽管有“鼎辅元勋”做序，老板们也怕你太红得烫人。原因不用说也还是上海的太上支配者不好惹，弄得不好是要吃官司罚钱的。但南薰终于自费出了版，而且也出了名。但名与利却是不容易兼收，他一家人的生活费以后便不免发生了问题。

要说南薰是死于《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恐怕也是说得过去的罢？在上海的生活既弄到不能维持，结果只好跑回四川。他在重庆当《新蜀报》① 的主笔，似乎当了很久。一九二六年的六月我在广东大学充文科院长的时候，曾打电去聘他，并把聘书都寄去了，要他到广大去任教授。他照例又发挥着他那小心而逡巡的癖性，不肯出来。不久我也就随着北伐军出发了。在北伐的高潮期中，他在重庆听说还做过什么军的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的退潮期中，重庆发生了三三惨案②，他，和着好些同志，被当地的军人惨杀了。

真是冤枉！据我所知，他始终是一位“忠实的国民党员”；

---

① 一九二一年创刊于重庆，一九五〇年停刊。

② 应为“三·三一惨案”。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市民万余人集会抗议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四川军阀刘湘命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芳舟）派军警镇压，当场打死打伤千余人。

虽然有对于政治的热情，而实无做政治家的铁腕。他如肯降心相从，做一位大学堂的经济学教授，我看是最相宜的。我时常在这样想，假使一九二六年他慷慨地出了四川，总不会遭到那样的惨死。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总有许多是由他的手里替我们解答了的罢？

南薰的死听说是从主席台上拉下来，被刺刀当场凿死的。凿死他的兵，是我的胞同乡乐山县人王芳舟的部下。王家和我家本是世交，民国二年我最初出川的时候，王芳舟在当重庆镇守使，我还在他的衙门里做过几天食客。十几年后却由他的手下杀死了我的一位友人，真正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六

学艺大学的创办也是在五卅潮中实现的，但这实现与其说是迎着潮流的应运而兴，宁是抗流而起的一种预定计划。参预这计划的主干自然是中华学艺社的人，连殷汝耕也是最努力的一脚。

起初是募款，仿照青年会的拉会员的办法，分成了十大队。各队有队长，有队员，采取着竞争的形式，各各分头招募。成绩似乎也还好，相当招募了一笔款子，详细的数目我是记不得的，不过为数也很有限而已。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中国人的脂肪，自所谓海禁大开以来，一百年间，已被国际资本家榨取成了油渣，在这油渣上面再加锅铲，实在也榨不出好几珠油来。假使中华学艺社的人是以美国留学生为主体，或者尽有法门去向洛克费勒、摩尔刚①辈的大财主们分些余润。然而，这个学社的主体们却都是留东学生。因此，目光便不免要近得一些。②

---

① 洛克费勒，通译洛克菲勒；摩尔刚，通译摩根，均为美国老牌大垄断财团。

②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创造十年续编》单行本将本章第一段至此并入前一章，《沫若文集》第七卷照此编入。现据上海《大晚报》最初发表时分章情况改回。

在五卅前两年，日本的东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中国人虽然捉襟见肘，也曾慷慨输将，在那时学艺社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日本的文化中心虽然是在东京，但产业中心是在大阪一带，故尔东京虽然遭了震灾，日本的国本并没有因之而受多大的打击，倒反而给了它一个除旧布新的机会，使那三百年来的老江户成为名实相符的新兴都市。故尔日本人也尽有力量和欧美诸国在世界舞台上角逐。这座世界舞台和我们中国差不多是同义语，大约也是值得我们夸耀的了。欧美人在这座舞台上所演的文化剧，名优日本又岂能少得一脚？于是乎退还庚子赔款作为文化基金的消息，在一九二四年年末也就逐次有见诸事实的倾向。当时有日本医学博士入泽、子爵冈部① 等来华，便是带着这种使命来的。学艺社曾经大大地欢宴过他们，请了章士钊做陪客，我自己也曾叨陪末座。

还有一位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后以研究绍兴酒而得到博士学位的山崎百治，他便是在学艺社与日本的文化事业部之间的最卖力气的周旋者。记得也象是一九二四年末或者一九二五年初，为学艺大学募款事相当热心的殷汝耕，曾作过一次东，邀请那位绍酒博士，和另一位在沪的日本大实业家，在他相好的一位长三家里。在座的不用说都是学艺社的要人们。

那是位广东姑娘，据说是当时的“花国状元”。门面倒很讲

① 入泽，即入泽达吉(1865—1938)，日本新泻人。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一九二三年起在外务省供职，从事对华工作。　冈部，即冈部长景(1884—?)，日本大阪人。曾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陆军政务次官等职。一九二一年袭子爵爵位，后任国际文化协会副会长。

究，面貌也还丰腴，但名号虽叫“状元”，胸里却没有几珠墨水。

“状元”既是红姑娘，自然外局很多，在开席时曾侑过一巡酒，接着便出去应局去了。直到我们席罢之后，她又才回到了自己的状元府来。

有人和我开玩笑，向她介绍。

——“这是有名的文学家，郭先生啦。”

——“嗐咾，夷家知道。”① 她说着便从茶几上取了枝笔来在局票上写了一个“郎”字。

——“照嗐格个Kuo字，嗐牟嗐？”②

这假使是有意卖俏，倒也别有风韵，但其实是写了别字的。字画既歪斜，结构也有点诡异，身当其境的人立地便可以看出。

我自己对于募款是丝毫也不能尽力的，只是两肩荷口地吃了不少次的中餐、西餐乃至日本餐。此中自然也有的是日本人的回席。

但是日本人毕竟是白手兴家的苦劳人，他们的钱没有“洋记”③ 那样的松泛。虽然交际是相当频繁，空气也很可乐观，要由日本民间捐助十几二十万的消息始终在酝酿着。然而“其雨其雨”地闹了半年以上，日头毕竟还是杲杲的。④

那也是理所当然。一个人要真正有了余力，然后才能顾

---

① 广州方言，即“是了，现在知道。”

② 广州方言，即“就是这个Kuo字，是不是？”

③ 英语Yankee的音译，即美国佬。

④ 语出《诗·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到邻人。国际间的关系又何得两样？我们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日本的情形，多少应该了解得一点。别人自家都还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例如上级学校之供不应求，连中学的入学试验，其竞争的激烈，上而对教育行政的主脑，下而对应试子弟的父兄，都是一样的痛头的资料。就拿小学的义务教育来说罢，因家贫连中饭的“便当”① 都不能携带的“缺食儿童”，因没有户籍竟无资格入学的失学儿童，正不知凡几。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五卅”。虽然沪上各学界一时罢了课，然而在暑假期中要在上海各报上大热闹一下的各学校的招生广告，照例也热闹了起来。在这广告的竞赛中也就有了学艺大学的一份，校长是王兆荣，预科主任兼教务长的是范允臧，文科主任便是我。招生广告上是列出了这三个名字的。

王兆荣号叫宏实，也是留东同学。他是在“五四”前一年以反对中日密约而回国的。在上海曾办过《救国日报》，后来便在北京教育界里做事情。他是专为办学艺大学由北京南下的，当时的北政府已经任命他为四川教育厅长，他都辞掉了。

允臧一向在商务编译所里任事，也为办学艺大学事辞掉了那边的职务。

这两位同学的破釜沉舟、公而忘私的勇气，是使我私心佩服的。虽然他们的教育方针和我所怀抱的并不一致，但我是把我自己的意见灭没了，一意地当了个苍蝇，附随在他们的尾巴上。

---

① 作者原注：饭匣。

方针是怎样的呢？前面已经说过，是“抗流而起”，而且是抗到了有点惊人的程度。在招生广告上已经就写明白了，不收女生，入学后不准参加政治运动，资格的限制毫不苟且。

这样的办法在我自己是感觉着危惧的，我怕的是不会有人来。但同学们很坚决，他们并不是想做生意，是想教育真正的“英才”，应募的就只一两个人也都要办下去。的确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办法，在求学时代便有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大约将来也会是非凡人物。更何况“鹤立鸡群”，那样鲜明的对照或者还可以收些逆效果呢！

然而毕竟是危惧占了优势。能够超越乎时代的“英才”，看来，实在是少。招募的结果，应考者虽然不只一两个人，但把预科和本科合计起来，所得到的报名学生还不上三十位。校址是租定在静安寺路西头的一座公馆里①，位在民厚北里背后西手的街角上，在那儿与静安寺路交成十字的那条小街名，我可忘记了。公馆相当宽大。进门后，沿街一带是一列三层楼的房子，楼下作为办事室，二楼作为讲堂，三楼是图书室。隔着一个宽阔的草场，又有第二栋，是一列二层建筑，楼下礼堂兼食堂，楼上学生的自修室兼寝室。在这前后两栋之间，右手是一带平房，沿着那忘记了名字的街。左手是一条有屋顶的通道。

学生既少，因为都是一年级，教员也就没有几个人。记得由我所找的，有教语言学的方光焘②。由校长所找的有教德文

---

① 地点为静安寺路赫德路（今常德路）三二〇号。

② 方光焘（1898—1964），字曙光，浙江衢县人。作家、语言学家。著有《曼兰之死》、《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等。

的常云湄①，教社会学的李剑华②。何鲁来兼了几点钟的数学，曾琦兼了几点钟的国文。外加上我们三位。如此而已。

说也奇怪，教职员中除掉范允臧、方光焘是浙江人外，其余的都是四川人，一个学艺大学就有点象是四川同乡会的延长。这在当时并没有人说过闲话，连我自己直到现在写到这儿为止，都不曾感觉到有什么异样。这些地方倒很足表现，当时学艺社干部诸人间，友情是怎样的纯厚。

开学了。学校的董事、教职员、学生，综合起来，不上五十人，也还济济跄跄地聚集了一堂。行了开学礼。校长致了训辞之后，又由他挨次请董事演说，请教职员演说。这又把我苦着了。我本来是害怕演说的人，而又全无准备。宏实校长大约也就是要想给我以相当的准备时间罢，他一直把我留到最后去说。简单的腹稿打了好几次，以为要指到我名下来了，但一指却又指到了别人。人是同此心，心是同此理的，一个开学式那经得起十几个人演说呢？

但我也不再象在杭州省教育会演说时的那样着急了。我是经过"五卅"怒潮涤荡过来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好多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下去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喊口号的方法

---

① 常云湄，四川华阳（今属成都）人。经济学家。

② 李剑华（1900—？），四川大邑人。著有《劳动问题与劳动法》等。

你总是知道的罢？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声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总得要有抑扬，而且要先抑而后扬。一句话的表达要这样，一场演说的表达也要这样。——再说一次，总要先抑而后扬。而落尾处你把声音放大，在愈武断的地方你愈把声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热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贪长，千切不要说理，千切不要先扬后抑，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东西。懂得这些妙窍，尽管有多少群众都不够你吞。人少，少得仅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饭了。

索性便把我那次的演说引来做个实例罢。——为什么隔了十几年依然还能记忆呢？这却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大约因为是毫无道理的诡辩罢。

我说：我们办学校，人要求其多，心要求其少。古人说"纣有亿万臣为亿万心，周有臣三千为一心"①，我希望我们眼前的三十人的同学，从今天开学以后，便把大家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成为一个心脏。（这儿把声音放大了一点，于是乎一次鼓掌。）

——"我们的同学仅仅三十人，或者大家会嫌其少罢？或者大家都觉得有点难乎为情罢？不，一点也不。英国的卡莱尔说过：英国宁肯牺牲印度，不肯牺牲一位莎士比亚②。莎士比亚是有名的大文学家，诸位想来都是晓得的。我们单拿印度的人口来说罢，那儿据说有两万万人。英国宁肯牺牲印度而不肯

---

① 语出《书·周书·泰誓》："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② 卡莱尔的这句话，见《论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三讲。

牺牲莎士比亚，岂不是一个莎士比亚的价值，抵得过两万万人以上。”（声音放大，鼓掌。）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从今天起便放下决心，要人人都成为莎士比亚。”（鼓掌。）

——“那吗，我们这三十个人，不是就有六十万万人以上！”（鼓掌。）

——“六十万万人是我们中国的人口的约略十四倍，我们如造出了三十位莎士比亚，不是就等于造出了十四个中国吗？”（热烈的鼓掌。）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要觉得难堪。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的心总要求其少，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总望要生出孙悟空的毫毛。”（声音特大，点头下台，鼓掌声不绝。）

我原说过是讲不得道理的，这段小小的演说，你如要拿道理来给我讲，那可以说每一句话都不通。然而，不管那些，大家都是替我喝了彩的。在行礼毕后，有一位董事拉着我的手说：“你今天的话，讲得最好！”

然而，事实却也真是胜于雄辩。我尽管在说，心要求其少，要把三十个人打成一片，其实这是比一个人抵得上两万万人的话还要夸张的。一个人要求其只有一个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人数还有三十！据我所知道的事实说来，那三十个人的同学，也就和其他的三百人或三千人的学校情形一样，至少是分成了三派的。

一派是国家主义者，崇拜圣人曾琦。此派的领袖是一位宁波学生，他的成绩最好。我有一次上学生自修室去，在他的书

桌上，看见曾琦的像是装在玻璃匣里被供奉着的。

一派是非国家主义者，自然也就不崇拜圣人曾琦。曾琦那时在办《醒狮》① 周报，虽然仅仅小报一张，所用的洋纸却十分讲究，而且每期都有他的雄文登载着。学校的规定虽是不谈政治，但圣人所教的国文教材却就是他的《醒狮》。他每礼拜向各位学生各人奉送一份报，就把自己的文章来当场宣讲。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如听纶音，但不崇拜他的在背后也就有些烦言。也是在自修室里见到的现象，我有一次在一位四川学生的书桌上看见展放着一张《醒狮》，但在曾琦所做的文章上用红水笔批了六个字："狮子狗儿放屁。"

另外还有一派便是无所谓派了。这一派论理倒应该是本学校的最理想的学生，因为他们对于政治的趣味可以说是等于零。然而他们的头脑也差不多就是等于零的。不忙说一个人要抵两万万，就希望能和一位红头阿三比比，恐怕都有点困难。

看来，我们人，倒的确是一种"政治的动物"(Zoopolitician)。何以呢？因为除掉了"政治的"，便只是"动物"而已。

学生虽然有分派，但也还相安无事。尤其教职员们，大家是客客气气的。

在食堂后壁正中处，有凹进去的一段地方，开学时是设过礼坛的，平时却设了一架乒乓台。吃过中饭后，大家都走到那儿去打乒乓消遣，没有先生和学生的区别。

---

① 国家主义派刊物。一九二四年十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〇年十月停刊。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主编。

李剑华的乒乓本领，最是助人消化的一种药料了。

剑华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在教职员中人最年青，身子也矮小轻便，不知怎的，打起乒乓来却那样地要人死活。他运用球板时，不是运腕，不是运肘，而是运用全身。他把右手的上膊紧紧地挟着，肘也不动，腕也不动，球来了，便跳动身子去将就。发球是这样，接球也是这样。一个球总要打脱三两次，十个球也接不上一次。打得最好的是由柏林回来的常云湄，和崇拜圣人的那位宁波学生。李先生一遇着了他们，更是弄得疲于奔命了。他们故意要摆布他，打得来半个桌面只见球也在跳，人也在跳。这喜剧倒弄得来颇有悲剧的味道了。

兼课的外来讲师，何鲁、曾琦、方光焘，他们是不参加这种游艺的。宏实要保持他的校长的尊严也不便参加。但是校长倒也并不是怎样不通方圆的道学，别种的逢场作戏他也还是喜欢来，而且是来得很热心的。

那时候在上海滩上风行着诗谜，单只大世界一个游戏场里，所设的诗谜摊子就有好几处。这诗谜，想来凡是稍微认得几个字的人大概都是懂得的。不过我在这儿也不妨学一点“小说家”的伎俩，专把万人所晓得的东西来描写一下。

先把一首旧诗来，掩掉其中的一个字，而把这个字和其它假拟的几个字混在一道揭出，让你去猜。谜面的诗句如是五言，谜底的字汇便要四个，七言便要六个。在谜面上有时也有掩去两个字的，谜底自然便是双套。

这不用说是一种赌输赢的游戏。在大世界那些小摊上，赌者用铜元和银角子，庄家是以香烟赔偿的。赌法有孤注与搭注

之分，在谜底中单赌一字者为孤注，如猜中了，庄家见一赔三。兼赌二字者为搭注，如猜中其中之任一，庄家只见一赔一。

我自己偶尔也有到大世界去消遣的时候，从那诗谜摊上，每每要赢他一两筒的“白金龙”回来。

那些地方的谜子实在太蹩脚了，有些死不通的字汇也用来做谜底。然而诗谜摊总那样多，足见设摊的依然要剩钱。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到那儿去压诗谜的人多是么二女士和瘪三男士，他们并不问你字句的通不通，其实有多少连字都不认识，只是和赌单双有无一样，猜着好玩而已。赌单双有无，庄家和闲家是一与一之比，机会相同，可说完全是靠运气。诗谜却不同，闲家和庄家却是一与三或一与五之比，虽然闲家赢了孤注，庄家要见一赔三，在那儿的机会依然要多你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所以诗谜摊总是日见加多，而且扩展成为大规模的赌博，和瘟疫一样，在上海滩上风行了起来。

有一天，象是十月尾上了，在已经罢课之后，校长约我和允臧两人往大世界邻近的一家四川菜馆去吃晚饭。在饭后走出店门时，无心之间却遇着了蒲伯英。他也是吃了晚饭，刚好走出店门的。他是我们四川最后一科的解元，反正时曾做过几天四川省的都督，后来在段执政时代(?)又做过一次北政府的教育部次长。那时他从北京到了上海，不知道有什么公干。

他和我们遇着，便约着一同去打诗谜。我还以为就是大世界里面的那些赌香烟的诗谜了。然而被他一引，却引上了一处临街的三楼，在大世界的斜对面。

楼上是前后两大间。后间的一侧隔出了两三间小房，房前

陈设着两张大圆桌，一些斯文中人正围坐在那儿开晚饭，又有伎女样的女子杂在里面。有浓厚的鸦片烟的气味。想来那些小房间一定是芙蓉城了。沿着另一侧的楼壁通向前间去，那儿正中更围集着一大堆人，渗进去一看，原来也就是打诗谜的，是在一张大餐桌上。但这儿所赌的输赢，不是铜元、角子和香烟，而是大洋和钞票。注子竟有大到三四十元以上的。看了，不禁使我大吃一惊。

——“这不完全是赌博吗？”

——“可不是。象这样的，在上海滩上有二三十家，每家每晚都是有几千块钱的输赢的。”

——“是公开的？”

——“那里！不过上海的情形都是这样，只要你懂得门径，没有什么公开不公开的。”

在当场遇着一位朋友S，他是报界中人，对于我的疑问替我解释了一番。

再看同来的人时，蒲伯英已经上阵了。他很勇猛，回回都是压孤注，注势都来得很大。但接连四五回他都失败了。

所出的诗谜自然高明得多。有时也有一两个谜底实在不通，不通到谁也不肯去压。然而揭晓的时候，却偏偏是那顶不通的一个字。众客便都不免哗然起来，要求看底本。底本拿出了，的确是“有诗为证”。书不用说是相当有点年辰的古本子，好象是什么时代的滥诗人，专为预备后人出诗谜赚钱而印的一样。

宏实和允臧站在蒲伯英背后，替他做顾问。但宏实的右手

不知几时已经在捏着钱包了。他左手理着他那很有点爱娇的胡子，豁朗着一双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向着我笑。

允臧把左手向我拐了一下，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借给你。"

"我看，还是到对街去打白金龙罢。"我也一样地悄悄地对他说。

豁朗着眼睛的宏实，关心到我们所说的话，连忙向着允臧问。允臧又悄悄地告诉了他。

——"好的，我们去。"宏实就象解决了很大的难题一样，立地踊跃起来，便领导着我们开始出发。

隔了两个钟头的光景，三个人由大世界走出，要坐黄包车分手的时候，宏实的右手捏着了两听白金龙，左手又在理着他那很有爱娇的胡子。他向着我说：

——"好不，我们明晚上再来，咹？"

依然豁朗着一双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齿，在笑。

七

《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时，第一期的一些成员有多数还在日本留学，而回了国的几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但我却是最不努力的一个。

真的，我并没有直接主持其事，就连那创刊日期，我都只能约略记得是在“五卅”以后。不过这个“五卅”以后的创刊，其实已是《洪水》的复活。《洪水》的第一次创刊还在一年以前，是《创造周报》停刊了，我跑向日本去了的时候。主持者是周全平、敬隐渔、倪贻德① 诸人。我那时做了一篇《资本主义与盲肠炎》② 寄给他们，是在那创刊号上发表了的。但那次的创刊却仅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后，几位年青的朋友又卷土重来，而我所采取的仍只是旁观的态度。这理由，在“洪水”这个名词的解释上，也就是表现着了。杂志之所以命名为“洪水”

---

① 敬隐渔，四川遂宁人。作家。著有《玛丽》等。 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作家、美术评论家。著有《玄武湖之秋》、《艺术漫谈》等。

② 此文最初发表时题为《盲肠炎与资本主义》；收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水平线下》时，改题《盲肠炎》。

者本是出于周全平的心裁。他这心裁，我知道得最明确，是酝酿于他在当年替某教会校对过一次《圣经》。上帝要用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圣经》上有这种意思的话①，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并非时人所斥为"洪水猛兽"者之"洪水"也。

故尔在第二次的创刊号上，他们要我做篇文章，我也没有做。结果是那《资本主义与盲肠炎》又重被揭载了一次。这样的发轫，在上海方面自然没有得到好评。刊物传到了当时的北京，也同样使人失望，连吴稚晖都在报上泄露过不满意的话。因此我才觉得自己的消极冷淡之有点近于罪恶，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而且使朋友们也难乎为情。于是我又才从旁把柁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

大约是从第三号或第四号起，我才开始做文章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马克斯进文庙》、《文艺家的觉悟》、《新国家的创造》，……那一联的文字便络续地出现了。

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蒋光慈②也拉来参加了。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是使《洪水》，否，不仅《洪水》，是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我和南薰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我现在要说到光慈。

---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② 蒋光慈(1901—1931)，又名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发起人之一。著有《新梦》、《少年漂泊者》、《田野的风》等。

光慈，初名本叫光赤。他是安徽人，当时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课。他和我的交往是怎样开始的，现在怎么也想不出来。只是我有一次和达夫两人去访问过他，他也有一次和秋白①两人来访问过我，我是记得较为明晰的。

我同达夫去访问他是在《洪水》创办才不久的时候，达夫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到了上海，我们在那时曾短聚过几天。有一天上午，我拉着他，一道往法大马路的明德里去。

天气很晴朗。我们走向那弄堂一隅的绝底，在一家大门上正在扣着门环的时候，光慈先从侧面的楼窗上望出，看见了我们。他是赁居在那儿的。楼房是在上海成为了公式的二楼二底的侧楼，有点象伸着懒腰的懒猫一样，腰身过分的长。但因那家屋子是在弄堂的边际，遂得三面开窗，光线是洋溢着的。

房中没有什么装饰，只在近门的一头安了一张床，另一头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轴线成正交地放着一张书桌，周围有几张坐椅。书桌后面靠壁是半壁书架，不十分整饬地摆着些西书和新刊的杂志之类。

桌上最惹人注意的是摆着有汪精卫和蒋介石②的像，像

---

① 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五年六月就义于福建长汀。有《瞿秋白文集》。

②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广东番禺人。汉奸。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五年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发动"七·一五"政变，背叛革命。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制造"四·一二"惨案，背叛革命。

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玻璃匣里。蒋的像我是第一次看见，是经过主人的说明才知道的。他说："这两位真了不起，简直是中国的列宁和托洛次基①。"我们自然也跟着赞叹了一阵。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他那时正在校读我所译的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俄文原书和我的译本一同摊放在桌上。校读得还不很多，有些地方略略有点修改。他特别指出一处向我说明过，是那开首处奥斯突罗杜摩夫走进涅暑大诺夫的寓室的时候，我的译文写着"坐到一个椅子上，在抽屉里抽出一只快要压扁了的香烟出来。"（译书二页九行。）

光慈对我说："抽屉在原文是作荷包，这一定是译错了的，来客初进人的房间也不会从'抽屉'中去找香烟吃。"

他说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说是我译错了。我便请求他详细地把全书校改一遍，做篇文章在《洪水》上发表，同时我也可以做个勘误表请求出版处挖改字版。光慈是欣然答应了。但他日后却没有践约。这自然是因为他过于忙，没有多的闲工夫来做这种义务校对。但在我，就单只这一事也已是增加着怅惘的回忆了。

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象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

---

① 托洛次基（Л. Д. Троцкий，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苏联托洛茨基集团首领。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可惜太死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得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炼，“中国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的罢？

方块字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误人。economics被意译成“经济”，往年的经济学教本在开宗明义章便要大讲其“经国济民”。romanticism 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变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不过近几年似乎“浪漫”也走起了运来。原因呢？大约是由于我们的高尔基①，他很在替“浪漫派”张目罢。猫儿眼照例是容易变的。

但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他这所说的“浪漫”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吊尔郎当”。但他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曾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

“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大意如此，就作为我自己的话也是无妨事的。）

---

① 高尔基（M.Горький，1868—1936），苏联作家。著有《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

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可惜实在太死早了一点。而在把他对于结核菌的抗斗力减弱了的一点上，“围骂”怕也是相当奏了一点功效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文字在杀人。“浪漫”，“才子”，“诗人”，“标语”，“口号”，“洋八股”……这些字眼如用罗马字写出来，都有guillotine① 的发音。

光慈有一种奇癖。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的，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看那情形谁也会以为是起了草稿又誊写过的东西，但他却说他是决不打草稿的人。他说，他写东西在中途错落不得一个字，错落了往往会使全篇文字流产。因此他的文章是不肯修改的。有几次请求他修改，但他说与其修改，宁肯毁稿。这，我总觉得是一种奇怪的脾气，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矫情的说辞；和他的私生活更曾接近过的朋友，我希望能够写些东西出来为我证实。

严格地说时，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那种笔调做长篇小说倒还可以敷衍得过去，做短篇小说便不甚相宜。因此他做来希望登《洪水》的文字便每每有被退回的时候。而编《洪水》的几位年青朋友，尤其是有点忌避他的：自然是因为他不仅“赤”其名，而且是“赤”其实了。

他和秋白两人的来访，又是在我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已经闯出笔祸以后了。这笔祸倒也并不是因为干犯

---

① 作者原注：断头台。

了当时的执政，而是干犯了一位学艺大学的董事。且让我在这儿简单地追溯一下罢。

学艺大学的董事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位姓林名骙，表字植夫，别号灵光者，乃福建人氏，由日本东大农科毕业，曾在哈尔滨办报，与“十大学教授”之一人王新命①有同寅之谊，由安那其②转入国家主义者也。一九二四年寄寓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创造社办《创造周报》，他以灵光之名曾联续发表过几篇给青年的信，因为后来论到了要求恢复约法，要求裁兵的滥调上来，我们实在没法顾情面，把稿子退还了他；他便在《孤军》杂志上写出文章来骂了我一顿。我有过一篇笑剧式的短品，名《无抵抗主义者》的，即以此君为模特儿者也。

隔了一年，灵光先生因募款出力，荣膺学艺大学董事。照例在《孤军》杂志上发挥淋漓的大笔。不记得是一篇什么论文了③，那里面在痛骂当时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为“穷汉”，又大声疾呼地吼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我在这些文章中感觉着了很浓厚的“幽默”味，因此也就不免多事，写出了上述的那几篇闲文字来。

自己的文字记得也还写得相当“幽默”，不过在打着“幽默”招牌的专门名家看来，或许又会说“只是那一套”。但是，管不得那许多。我是说，唯其是“穷汉”所以才要来闹点乱子，

① 王新命，又名无为，福建福州人。曾任《新人》月刊主编、上海《晨报》编辑。

② 英语Anarch的音译，意为无政府。

③ 此文题为《独立党出现的要求》，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孤军》第三卷第四期。

不穷谁个肯去干那种傻事？弄得自己家丧人亡，还要把一个脑袋子准备给别人拿去建功立业。又说“共产”与“共管”的关系似乎只是双声与叠韵的关系。据我的看法，中国是不待“共产”已经老早遭了“共管”。我们的作为国家而存在的太上支配权已经是老早被操在了别的一些什么人手里。问题是与其去担心着莫须有的什么“共产”，倒还是应该努力采取什么方法和行动来解消这种实际上的“共管”。云云，云云。

就只是如此这般的一些戏作，倒有点近于“土八股”，——此其所以“幽默”也——然而却又触犯了我们董事先生的逆鳞。董事先生又在《孤军》上大做其长篇高调的檄文，连那题目都已经够长，公式是“论什么的什么，以质问共产党，兼质问郭沫若”①。这一长枪杀下来倒还容易招架，因为他杀的只是风车。

公平地说起来，我这个人究竟要比灵光狡猾得多。前面已经说过，学艺大学的经费，全靠募款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学生又少，收入自然说不上来。因此在仅仅开办了三个月之后，经费便不能支持，十一和十二两个月的教职员薪水便不能不拖欠了。我在这时是靠着卖稿过活的，正苦于碍着朋友的情面，没法抽身，而身为董事的灵光先生却在他那长篇高调的檄文里面授了我一个话柄。

我在这儿须得先行声明，我在学艺大学任上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五十元。那十一和十二两月份的欠薪在隔了两年之后

① 此文题为《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郭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载一九二五年《独立青年》创刊号。

的一九二八年，正月，我已经失掉了自由，在上海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没钱付医药费，是由宏实校长补发了的，虽然那时候学艺大学已经早已不存在了。这层，我是应该在这儿特别声明，而且表示着深厚的谢意。

董事灵光说："一个人每月坐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怕也不配说是'穷汉'罢。"

这话如译得通俗一点，便是：我董事老爷每月赏你百五十块钱的大洋，你这不识抬举的小瘪三还要吵"穷"吗！

言外之意是：妈的，你给我滚蛋！

是，是，董事老爷，我就滚蛋！

正在苦于脱不了身的我，真是得到了一个天来的救星，你怕我不够狡猾，我还不会把捉着这个机会吗？

因此我便向校长辞了职，把第一学期教满之后，还我初服，坦坦白白地大做其"穷汉"焉。

关于学艺大学还有一两件事情值得纪述，我顺便在这儿写出罢。第一是学校的招牌出于海藏楼大名士郑孝胥① 的手笔，其次是把自己的藏书寄赠学校图书馆的第一名社员是殷汝耕阁下。真真是"无巧不成双"。这两位先生，曾几何时，竟先先后后成为了"万年"式的人物，长垂青史了。

光慈陪着秋白的来访，是在我已经辞掉了学艺大学以后，但是，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年底，还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记得了。

---

①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清末官僚，伪满大臣。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寓所"海藏楼"。著有《海藏楼诗集》。

只记得是在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后，秋白戴着一副药片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

秋白的相片早是看见过的，光慈虽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小堂里只有正面有一堵窗，正对着外边的铁栅门，在那窗下摆了一张长条的西式书桌，是达夫住在马霍路的泰东编辑所时用过的，我把它要了过来（现在这张书桌我相信是在周全平家里）。我就在那书案前正对着窗口坐着，秋白从右侧的门口进来，便在门次傍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光慈也从正中的小圆桌旁拉了一张椅子来，一同凑紧地坐着。

秋白的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早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

我那时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因为在和“孤军派”、“醒狮派”的那些国家主义者论争，目的总是想怎样地去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迷信和其催眠力。

同样是主张国家主义，在社会的声名上“醒狮派”虽然赛过“孤军派”，更几几乎有独占的形势，但在实质上“孤军派”的人实比“醒狮派”的人高明得多。“醒狮派”的人只会做点煽动文章，惯于用些慷慨激昂的笔调以挑拨青年的爱国情绪，说到实际的主张上来是空空如也的。

他们也有两个口号，叫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表面上，似乎也就是“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闹墨式的翻译。然而，他们一方面可以和当时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携手，而

对于吴秀才①也在暗送秋波，则他们所"内除"的"国贼"乃反抗军阀的那些"国贼"也。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反赤最力，把苏俄甚至广东都视为"洪水猛兽"，则他们所"外抗"的"强权"乃企图打倒帝国主义的那种"强权"也。假如开门见山地这样说，中国的青年并不那么易骗，但他们的锦囊里有的是美辞丽句，呜呼噫嘻，密圈胖点，尽能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尔也尽足以麻醉得一部分青年。

他们，尤其首领曾琦，也倡导过飞潜政策，便是天上用飞机，海里用潜艇，用以应付外来的进攻。这在作为旧日的秋闱中应时的策论一道看，或者倒可以侥幸备荐；然而说到实行上来，可羡我们的圣人似乎把飞机当成了鹞子，潜艇当成了鱼秧。那些东西似乎都是从天然界孵化出来的一样。

在"五卅"前我自己沉默着的时候，因友人的招待，和曾琦在消闲别墅同过一次席，他那时不知道是诚心还是客气，曾向我征求过文章，希望在他的《醒狮》报上发表。（记得钱玄同②也曾说过"郭沫若、曾琦那一批国家主义者"的话。）

——"我和你们的见解不大同，"我这样对他说，接着又把当时苏联所施行的"新经济政策"敷衍成了我所憧憬的理想，"我是想用国家的权力来发展一切的基本产业，而这国家是要从新创造的。"

——"那不正和我们一样？"圣人的痰音高兴地说，"请你

① 指吴佩孚。他曾于清光绪二十二年考取秀才。

② 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等。

尽量写出来，在我们的报上发表。”

我在心里只好暗笑。

但在“孤军派”便迥然不同，象这种烟幕是不能蒙蔽他们的。他们大抵是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过经济学回来的人，其中还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们对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学说是实地信奉着的，以为资本主义的扬弃非经过一道个人资本主义的阶段，绝对不能实现。所以要振兴中国，根本是须得厉行个人资本主义。他们就为中国的经济路线曾经举行过长期的讨论，连我都是参加过的。讨论的结果，主张采仿苏联的办法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就只有我和林伯修①（当年的杜国庠）两人，其余都是反对派。因而“孤军派”的经济政策便由周佛海②所想出的巧妙的名词来模棱了，那纲领便是什么“社会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社会化”。这个半头红萝菔，如把一层皮剥掉，不外是个人资本主义的奖励与保护而已。所以“孤军派”的国家主义，如说得更切实一点，是国家社会主义。

有好些皮相的人，直到现在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每要起着感情上的绞线，有的人看着“资本”两个字便要蹙额，又有的人见到“社会”两个字便要白眼。此“醒狮派”的圣人之所以要叫我做文章的原故了。然而“孤军派”的人，象这点皮毛，他们是懂得的。

“孤军派”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便是学习日本和土

① 林伯修（1889—1961），本名杜国庠，别名杜守素，广东澄海人。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等。

② 周佛海（1897—1948），原名福海，湖南沅陵人。汉奸。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等职。

耳其。

日本采用个人资本主义，仅仅几十年工夫便成了功，这是人目所共睹的事。日本不正好是我们的指路碑吗？我们应该学习日本。这，也并不是“孤军派”诸人的特见。自甲午中东之战以来，这种倾向早已成为了我们中国的国是。象我们这一代可以说便是在这种国是中被陶冶出来的人。三十年来，年年都有几千人到日本去留学，毕业回国的自也不在少数。然而仿效的结果呢？

有的人归之于人，以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人物都是好人，因此我们中国也应该在人材的精神方面着想，便主张着组织好人政府。

孤军社的人则归之于法，以为日本的法律严明，宪法早就颁布，人人都有法可依，故国事容易上轨道。清朝末年漫无法纪，民国成立以来虽有约法，但屡经毁弃，等于弁髦。这便是中国之所以不长进，故尔他们极力主张恢复约法。只要约法一恢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布尔乔治德谟克拉西便可以建立起来，中国便可以顺畅地走上日本所走过的路。

这些，自然都不失为一种爱国的见解，前者是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后者是所谓“有治法无治人”。在某种共通的条件下，这两者委实都是可以实验成功的。然而这个共通的必要条件，他们两派的人都把它看掉了。条件是什么呢？那是说要有完全地或近于完全地和外界的影响绝缘了的一个实验场所。只要没有外来影响扰乱，无论好人政府也好，约法政府也好，都可以或早或迟地把中国兴盛起来。然而中国这个实验

场所和外界影响是绝缘了的吗？百年以来的世界趋势和中国局面用不着再缕述了，必要条件分明是缺乏着的。把这种缺乏都不放在眼里或甚至盲昧无所睹，只在治人治法的畸轻畸重上兜圈子，真可以说是等于痴人说梦。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诚然不可否认；然而他们的实验场所却和我们不同，而是近于完全的绝缘体，也同样不可否认。在六七十年前发生着“黑船事件”①，划口通商，允许过外国人以治外法权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风貌出现于世界也，和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但不幸中之幸，却有所亏得。我们中国人中所并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对于日本人要泄泄气的时候，直到现在不是都还能提起笔来，蔑视之为“弹丸蕞尔之邦”吗？就是这同一的心理了！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那里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作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有了这种近于完全绝缘的条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迹”也。

我就象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秋白和光慈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

① 一八五三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舰队驶进日本江户湾，以开战相威胁，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因培理舰船都涂成黑色，故日本人称作“黑船事件”。

但关于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点隔膜。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①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近东问题已被解消于远东问题的原故。反正是我们中国当了撑天的长汉子。

我希望秋白给我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

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去。但那复活的《新青年》似乎只出了两期，以后又停顿了。

零碎地又谈了些俄国文学，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②，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并有点小儿病的地不高兴托尔斯泰，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也。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经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种出版家之出现，都是我们所渴望着的。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报上看见秋白到了广州的消息。又不久便有广东大学聘我的消息。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

---

① 一九一九年基马尔（又译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于一九二三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基马尔当选共和国总统后，着重发展民族经济，鼓励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社会改革计划。

② 作者原注：反拿破仑主义。

八

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人多是认为不能两立的。就在现在，有好些风雅之士依然在维持着这种见解，所谓“反差不多”运动① 便是这种见解的具体表现了。这种人的根本见解是以“艺术”或“美”那种东西为先天存在的什么，这种东西是超绝时空的，因而以这种东西为对象的人也就应该“度越流俗”，于是乎他也就不差不多了。这种着想法，正是典型的观念论，因为他们把那种由历史的发展所生产出的东西，不作为历史的成果，而认为历史的起源。这和宗教家之信仰上帝是一个模型铸成的商品。不必远说到星云以前，地球以前，人种以前，住在北京城的人，为什么不拿前几年所发掘出的“北京人”(Cinanthropus Pekinensis)来想一下呢？那时候，有风雅人所说的“艺术”或“美”存在吗？一切都是“时代”产生出来的，有新旧代谢的机运，不舍昼夜地流行，新的你不敢和它觌面，旧的你把它投射在水瓮里，“时代”自然也就空虚起来了。②

---

① 见炯之《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报·文艺》。

②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创造十年续编》将本章第一段至此并入前一章，《沫若文集》第七卷照此编入。现据上海《大晚报》最初发表时分章情况改回。

但在前些年辰，主张文学和革命不能两立的，倒并不尽是风雅之士。譬如吴稚晖，他便是主张得最激烈的。不过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场说话，虽然他所说的和革命不能两立的“文学”，其实就是现今的风雅之士所“上帝”化了的那种东西。然而吴稚晖本人的思想，在后来也是稍稍有点变迁的。前两年他又曾大叫过“文学不死大乱不止”[1]。“大乱”呢？大约也就是有点象革命。能够闹“大乱”的这种“文学”，当然又不是和革命不能两立的那种“文学”了。一隅可以三反之。

“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文学死，大乱止。”

“死文学，止大乱。”

“活文学，出大乱。”

所以我们可以说吴稚晖是反差不多运动的元祖，或者也可以说他近年来是风雅化了。

真的，当吴稚晖还未风雅化，唱着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时候，我受了他的反面的暗示，却想到了文学与革命的一体。因为人类自发明了言语文字以来即有文艺的表现，人类除非灭迹，文艺是不会灭迹的。在人类社会的革命期，凡是旧有的东西和革命都有点不能两立，倒不限于文学。然而革命并不是把人类的一切传统革光而恢复到猿人时代以前，它只是把旧有的遗产加以损益，而得着新的成果。新的成果逐次又变旧，又生出更新的，更更新的。因此我于革命文学之外便提到了

---

① 见吴稚晖《大众语万岁——答曹聚仁讨论大众语问题的一封信》，载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革革命文学，革革革命文学。这些异样的表现，虽然遭受过讥刺，然而我到现在仍然不感觉着它们是怎样的滑稽。这根本不外是一种由文学的角度所窥察得的辩证的史观而已。要说它稀奇，我倒反觉得有点稀奇。

我的《革命与文学》那篇小论文，便是在那种情趣之下酝酿出来的。写成为文字虽然是“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写的时候虽然已在广东，但那起初本来是一篇演说，是在去广东以前在日本人所设的上海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班所讲演的。时期记不甚清楚了，总得在那年的正二月里面罢。那儿所下的“革命文学”的定义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这正是后来所说的“普罗文学”或“无产文学”了。有些朋友竟把我所说的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分成两个不同的名物，这不是不曾看过我的文章，大约也就是出于有意的抹杀罢。

“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间也发生过一下问题。有人把它解成怜悯去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表同情”是说表示意欲上的一致，并非哀怜。这用英文译出时，应该是to coincide而不是to have sympathy（怜悯）。幸好在那年的“三月二日夜”我还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末尾的几句话正好是我自己的注脚。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这和近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标帜，似乎也并不是两样罢？

那一九二六年的初头，就因为脱离了学艺大学的羁绊，生活虽然苦得一点，但在精神上却是自由的时期。在那时代的自己的思想之变迁是有点近于突变的。其前，其实也差不多是风雅之士。就因为有旧日的风雅作为保护色，故我说话，作文都两得其自由。说话的机会是相当多的。记得在三八妇女节上曾说过三不从，在交通大学的孙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上曾说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如在日后是颇难出于口头和笔下的东西都平安无恙地通过了。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水平线下》的初版在一九二八年是遭了禁止的书，被禁止的理由就因其中有论社会经济的文字，其实那些文字都是在《洪水》上发表过的。

创造社出版部之酝酿和其得以成立，也就在这风雅还未扫地的时候了。

在这儿且写一段我到过甪直的回忆。

甪直在江苏吴县的东南境，与昆山接界。那儿的周围都有水环绕着，但也并不是岛子。（这地形，请查看地图自明。）唐开元时的杨惠之所塑的罗汉还有几尊留存在那儿①，稍稍留心近代文化动向的人，前几年曾发生过的保存运动②，大约是还留在记忆里的。

我早就被朋友们约过，想去鉴赏一下那些唐代的塑像，到

① 杨惠之（713—741），江苏吴县人。唐代雕塑家。所著《塑诀》一书已佚。现留存的罗汉像，一说为宋塑。

② 即保存杨惠之塑像的运动，为顾颉刚发起。见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努力周报》第五十九期顾颉刚《记杨惠之塑罗汉像》。

了一九二六年的初头，才把机会得到了。那是因为严良才①的结婚，要往那儿去吃他的喜酒。向导是周全平，另外还有常云湄同路。

大约是从正仪下的火车罢，下了火车后还坐了一趟小火轮，然后才到甪直。坐船的地方和船的本身都不干净，水也照例是江南地方所常见的不甚清洁的水。然而甪直于我却有点象物外的桃源。

去只一次，住仅半天，已有十年以上的光阴流过去了，回忆自然只是些难于把捉的缥渺，然而却又是这么的亲切。那境地有点象是在梦里的一样。空气是那样澄净，林木是那样青翠；田畴的平坦，居民的朴素，使人于不知不觉之间便撤尽了内外的藩篱，而感到了橄榄回味般的恬适。

到了甪直，自然便落在了良才家里。宏大的房子相当旧式，婚仪也是旧式的。我们看到新人正在拜堂。赞礼者颇是一位新语制造者，他赞呼着——"鞠躬天地"——"鞠躬祖宗"——"夫妻交鞠"，满堂的男女宾都不免大笑。不一会又是新人拜客——"鞠三躬"——"鞠二躬"——"鞠一躬"。

照老规矩，应该是三跪九叩，一跪三叩，不跪徒拜的地方，换成了脑袋子的几屈屈，太不艺术的地方，这也就是时代的空虚了。在风雅皮还未十分脱尽的当时的我，也曾依稀仿佛地那样作想，似乎不妨独创一下——其实也就是贡纸照抄——来它一个"三抱九接"或"一鞠三握"。三抱九接者，每拥抱一

① 严良才，江苏吴县人。《洪水》半月刊创办人之一。著有《惆怅》、《最后的安慰》等。

次，接吻三次；一鞠三握者，便是鞠躬一次，握手三下也。自然，也可以因次数之多寡而定礼节之崇夷。……一个人正在独自思索，想入非非的时候，突然之间受了赞礼者的点呼。周围的人把我一拥，于是乎我也在严氏堂上，把脑袋子屈了几屈起来。跪拜礼也，而今也鞠躬，吾从众耳。再要说到"抱接"，在心里想想，在口头说说，乃至在纸上写写，都还呒啥要紧，真要实行起来，那恐怕只好跑进疯人院了。

在傍晚时分，全平把我们引去看了一次杨惠之的塑像。那是被锁在一间新修的矮小的平房里的，门外挂有一道小牌，似乎是杨惠之塑像保存所那样的字样。

所内靠着后壁，泥塑的几尊罗汉，冷飕飕地坐在土面上，觉得和所谓"保存运动"是有点名实不相符的。那塑像如真的要保存，对于原物的护惜自应再加珍重，此外似乎还应该委托现代的名手把它们模塑下来铸成铜像（原物乃泥质，未便直接铸铜），或则铸成石膏像以事广布，方是道理。不然，尽管怎样宣传为国宝，再不几年，会化为乌有的。

向导的全平颇有以那塑像之再被认识，归功于自己的意思。据他说，前几年顾颉刚在《小说月报》上所发表的文章①——一般是作为再认识的开始——那儿所插的几张照片，本是他和良才两人照的，因良才和颉刚相熟，转赠了颉刚，颉刚便把它发表了。我看这倒是很美的一种行为了。

---

① 顾颉刚（1893—1981），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著有《汉代学术史略》、《史林杂识》等。这里所说的文章题为《杨惠之的塑像》，载一九二四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一号。

惠之，据说，在开元时与吴道子①同学画于张僧繇②，学成，不屑与吴道子齐名，便转而为塑，皆为天下第一。这话是否可靠，实不敢说。不过，惠之与道子，似乎倒有点象罗马文艺复兴期的米克朗杰洛与拉斐罗③，而尤其惠之与米克朗杰洛更有点象一形一影。两人的作品都有力的律吕之横溢，尽管受着宗教的题材束缚，而现实感却以无限的迫力向人逼来，使人不能不感受着一种崇高的美。惠之，我想他对于人体的筋络骨胳之观察乃至解剖，一定是相当周到地做过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以极正确的客观现实为粉本而加以典型化的夸张，故尔虽夸张而终不失掉它的实感，否，反是因夸张而增加了它的实感。

遗像大抵是被人补修过的，有一两尊的头部尤其一眼可辨。那是通常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平滑无表情的塑像相，也是在我们中国随处都可以见到的活人相，但是看来却总是死的。不夸张者死，夸张者反活，这一对照，似乎把那艺术活动的机微，被某一些人说得神乎其神的东西，是形象化了的。

到了晚间，我们也被邀进了洞房。

再照老规矩，洞房花烛夜的新嫁娘，理应是"低头向暗壁，

---

① 吴道子(约685—758)，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唐代画家。

② 张僧繇(502—557)，吴县(郡治今苏州)人。南朝梁画家。

③ 米克朗杰洛(B. Michelangelo，1475—1564)，通译米开朗琪罗，意大利雕塑家、画家、诗人。塑有《大卫》，画有《最后的审判》等。 拉斐罗(S. Raffaello，1483—1520)，通译拉斐尔，意大利画家、建筑师。画有《雅典学派》、《西斯廷圣母》等。

千唤不一回”①的。因此，别的地方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其在我们四川，在当夜便大有所谓“闹房”之举。那是约略同年辈的男女宾对于新嫁娘的戏谑。他或她们，总要想方设计把新娘惹笑或逗她发声，谑而失诸虐，甚至——据乡间的口传——连闹出人命案来的事，都往往有之。

到了晚间，我们也被邀进了洞房。

在柏林住了七八年回来的云湄，却依然旧习未除。他和良才本来是不相识的，被我把他强拉了来，而所以把他强拉了来的原因，也不外结婚那天是礼拜而已。而他却在打着闹的主意。

——“你看，”他在走进洞房的途中悄悄地对我说，“我今晚无论咋个说，总要把新人逗笑。我第一步要请她抽纸烟，第二步要请她和我打四圈麻将。”

——“不要装壳子，你没把新人当成你的表妹了。”

我们四川人说夸大嘴叫作“装壳子”，上海话之“吹牛皮”也。

走进洞房了。

真正是银烛高烧，绫罗耀眼，满屋都是崭新的陪奁。

新娘虽也是坐在花格床前，但她一看见我们进房便预先立起了身，泛着一脸的微笑。

新郎替我们一一介绍了。

新娘从一张靠壁的条桌上，排有镜匣、磁坛等等的，取了

---

① 语见李白诗《长干行》。

一筒“白金龙”来，先向我们敬烟。

我用眼睛向云湄示意，云湄反有点忸怩了。

——“郭先生，我是喜欢读《创造周报》的。”这是新娘的第一声，“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①，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是思想变了？”

一鸣惊人，实在出乎意外。

全平到这时才替我解说了一番。

原来良才的夫人，和良才是旧相识，在某地的小学校同时担任过教职。他们的恋爱，本是自由了来，而婚礼暂且通俗下去而已。

真没想到新娘要问到尼采，那时的尼采已经老早离开了我的意识中心了。

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早晓得还有良才夫人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中止了。

——“你们不会宣传，有些人利用新闻政策，利用得上好。”

这是良才的一位“小孃子”说的，又使我吃了一惊。

“小孃子”是良才的从姑母，矮矮的身材，团团的面孔，看

---

① 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著有《悲剧的诞生》、《善恶的彼岸》等。《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最初连载时题为《查拉图斯屈拉之狮子吼》，后改题《查拉图斯屈拉》；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时题为《查拉图斯屈拉钞》。

来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她是先在洞房里的，坐在新娘的旁边。

——“喔！”我叫着，“没想出你这样小的孃孃！”

——“你说她小？”全平插说着，“她人小心不小。”

——“全平，我倒要问你，”“小孃子”转问着他，“你们的《洪水》说要独立出版，独立了没有？”

——“想是在那样想，但自己没有出版部，怎么独立？”

——“创造社不好办出版部吗？”

——“那么资本呢？”

——“募股不好吗？你们假如肯募股，我自己有一百块钱，我最先就交出来。”

“小孃子”这一鸣，又更使我出乎意外。

——“喔！没想出你这样小的孃孃！”我又叫了出来。

——“看不出来，‘小孃子’今年已经十六岁了。”良才夫人解说着。“她也是喜欢读创造社的作品的。我们有好些人都希望创造社独立。听说《洪水》的编辑费每月只有五十元，那是太不值了。”

不期然地从两位亚马茸①的口中谈出了这些问题，“闹房”居然成了“房闹”，时代倒也并不空虚。

然而还有更进于此者。在谈了一会之后，又由良才夫人自己提议：打起麻将来罢！

全平私下对我说，她这是一种策略，是想借你们来作防御

---

① 作者原注：女英雄。（英语 Amazon 的音译——注释者）

线，省掉好些男女亲戚进来应酬。

我又把云湄看了一眼，云湄觉得愈见忸怩了。

不一会，在花格床前陈设了一张方桌，果然打起了麻将。良才夫妇合打一脚，云湄，全平，我，各打一脚。我自己是仅能打而不能数和数的，幸亏有"小孃子"做我的军师。此外进房来看热闹的男女宾却不很少。

牌可打了四圈。云湄算最最规矩，他除却一些打牌用的术语之外，当晚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夜深人散之后，我们被送到邻接着的另一座大院子的楼房去，云湄上了楼连连地赞叹：

——"真没想出，真没想出！象这样开通的新姑娘，就在我们成都，无论咋个找是找不到的。"

第二天动身要回上海的时候，"小孃子"们又谈到出版部的事情，她居然把她的一百块钱拿出来交给了全平。

是的，这一百块钱！这在事实上就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最初的基金了。

甪直有这样一位"小孃子"，在我看来倒并不输于有杨惠之的罗汉，

九

出版部的组织，在《洪水》创刊后不久，曾经酝酿过一次。

那时是达夫来上海，他主张得最积极。他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言之不胜其悲愤。

那是有点难怪的。

在被定性为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大抵的人都跳不出个人崇拜或行帮意识的那个圈子。所谓文化人——其实是尤其厉害的：因为文化便是意识的表现也。

达夫本是发起创造社者的一人，尽管你自己没有那种意识，尽管你自己甚至在鄙弃那种意识，然而帮外尚有帮，那些帮外帮，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头上打了一个商标的。商标若曰“创造社的才子”。不要说当时的达夫要受“继母式的虐待”，就在现在，不是都还有人在广播无线电，说创造社的某某人曾怎样怎样，某某人又要怎样怎样吗？好在创造社虽然没有建立过什么大了不起的功劳，但也似乎还没有犯过什么万恶不赦的大罪。鞭尸的健儿们，尤其和我们百不相干的一些日本的文笔勇士如M·S·之辈，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罢。

那一次的酝酿也曾由周全平计划过。募股的办法记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我自己还破过一点费，印了四

册比较讲究的三联式的股票簿，一册寄与广州的仿吾，二册寄与武昌的达夫与资平，剩下一册留在我自己的手里。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实上连自己要来记上一两小股，都感觉困难。结局是大家都不曾发动，成了一场泡影。

但第二次又从新酝酿起来了。

由甪直回沪不久，全平趁着《洪水》满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来自印。同时又另外规定了一个募股的计划，把单位降低，规模缩小，手续简单化了。记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股东除应享的权利外，还规定有种种的便宜。这计划又因手头有《洪水》作为宣传机关，一发表了出去，便俨如刺中了时代的神经，远近的青年便都翕然响应了。

就这样在闸北的三德里里面，于当年的四月一日，便看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开张。然而，这开张，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的，达夫也没有看到，仿吾、资平自不用说。那原因呢，是在三月十八号，达夫和我，更和一位新从巴黎回来的王独清，一同往广东去了。

达夫那时是已经离开了武昌师大的，住在富阳家里养病，时而也到上海来一次。

他的失职，据说是因为遭了学校内的国家主义派和一部分旧教职员的攻击。不久连石瑛校长也遭了同样的运命。一年前他们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没有去，去了不还是在背上被人画了一个乌龟？

王独清的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而且似乎还是同学。王还住在巴黎的时候，曾

和我通过信，也曾寄过一些诗的译作来，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们是不曾见面的。

不记得是那一天了，总得在二月尾上罢。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过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那时候田汉也住在上海，广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担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过他，劝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狮派”的遏阻，他是决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环龙路，才晓得王独清回来了，在中饭时分来访问过，不一会还要再来。

一个人坐在小堂屋里，正打算给广大写回信，表示接受，并要求添聘达夫。王独清出现在大门外了。他隔着窗口看见了我，眼睛睁得璧圆，直好象多年不见的知己。他急急忙忙地放着小跑，跑进堂屋来和我握手。

——“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独清！”

口吃得满脸通红。

王的身材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愧是从巴黎回来的人，看装束就有点象雨果的儿子。广沿黑呢帽，黑色波赫民央领带，宽裕的玄青哔叽西装，马裤上套了一副黑色的皮裹腿(这副皮裹腿在北伐出发时承他解赠了给我，后来被我的一位勤务兵拿去了)。只是披在帽下的头发也采取着一致的黑色，那却似乎是不应该的。

但是全体的印象还不坏，因为装束都很旧了，并不显得矜

持，而“心贫者福矣”的那句话也可以解释得他那于荒率之中流露着真挚的当时的态度。那时候独清先生还没有出大名，而且腰缠也羞涩，所以似乎也还很晓得谦虚，很晓得珍重友谊。他在初见面的当天，便向我说过这样的话——为避免口吃起见，且用间接叙述法。

他说，他是最重友谊的人，凡是自己的朋友，他总是要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这听来的确是象本心话，因为他说话的态度十分真诚。大约也是因为说得格外费力的原故罢。

在他未回国的几月前，伯奇转寄过他的信来，说他在巴黎的生活不能维持，叫我在上海替他谋卖稿的方法。只要他有稿来，卖是容易设法的，但他的稿子没有来而人却跑回来了。

不过，他也回来得真是恰到好处。

当时的广东虽然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儿，有达夫答应同去，但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畏途，觉得这一去好象要受着欺负。

好了，现在又有援兵来了。这位雨果第二是西洋留学生，而且又听说他和汪精卫的秘书曾某① 相识，这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助手吗？

我最初见到独清先生，便在这样与兔谋皮——我故意把“与虎谋皮”这个熟语修改了一下，因为当时的独清并不象“虎”，而他的“皮”也是容易“谋”的。

---

① 即曾仲鸣（1896—1936），福建福州人。

——“好不，我们同到广东去？”

——“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

这次的回话，似乎并不纯粹是因为口吃。

我当下把回信写了，并请学校替我们送旅费来，信写好后便和独清一道出去付邮，又和他同往振华旅馆去。原来他也是在那儿下榻的。在那儿，不用说，又把达夫替他介绍了。

在三月十号左右，广大有了回信来，对于我所提出的条件，一概照办，把聘书和旅费托林祖涵①的兄弟林祖同②，带来了上海。

旅费是六百元，我自己留了两百下来，对于达夫和独清，各付了两百。穷得连馆债都不能付的独清，自然是欢其天而喜其地的。

三个人老早就讲好了，只等聘书和旅费一到，便立即择期启程。这决定，连上海的相熟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晓得的。

记得就在旅费领到了手的那天晚上，楼建南和湖畔诗社③的几位朋友们约我们在一家小小的宁波馆子里饯行。当席还讨论过要组织一个小刊物的计划，刊物的名称都定了，叫着《野火》。——但这个刊物，后来却没有出版。

---

① 林祖涵(1885—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人。一九二三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农民部长等职；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

② 应为林祖烈(1899—1931)，字叔衎。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五年归国；曾在广东大学、黄埔军校任教。

③ 一九二二年四月成立于杭州，成员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曾出版诗歌合集《湖畔》、《春的歌集》。

馆子不很清洁，所在的街名不记得了，只是那周围是宁波馆子集中的地方。宁波菜并不怎么出色，仅生吃蛎黄颇留有深刻的记忆，以其和日本风俗相同也。

酒是我们的好朋友，但独清却是不能喝酒的。他喝了酒还有一种脾气，便是喝到将醉时要伤心地哭。这哭倒也并不稀奇，和喝了酒要笑，要唠叨，要生气，要动武等等，其实是同一现象。那是因为脑里的制止中枢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冲动失掉统摄，于是便胡闹起来了。——写到这儿，突然想到了那位遇路穷便痛哭而返的诗人阮嗣宗，那位晋代诗人是嗜酒的，其无端痛哭，大约不外是一种醉态罢。

我们的诗人王独清当晚过于高兴，多喝了几杯，不免也就痛哭了起来。

——“沫若，达夫，”独清流着泪喊着我们，奇异而又不足奇异的是，平常很口吃的舌，喝醉了却一点也不“吃”了。

——“我这人是重友谊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俗语说，酒醉吐真言，更何况说这话时还流着眼泪，这样的诚恳是怎么也要令人感动的。

然而，这“生死与共，水火不辞”，毕竟只是两句诗。

第二天清早，独清一个人跑到环龙路来，照例是忽忽忙忙地劈头便叫着“沫若”，口是吃得异常厉害的，听得令人着急。但意思是听懂了。他是说，路上不清静，海贼很凶，前几天才抢了一只船。又说，广东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么变动。结论是叫我先去看看形势，他和达夫后来。

——“达夫也是这样的意思吗?”我微微感觉着失望地，这样问。

——“是他他他……他叫我来对对对……对你说的。”

——“那我要去问他个岂有此理，学校早已开了课要我们赶快去。你们既要观望，为什么早不说?”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达达达……达夫讲，你你你……你不要动动动……感情。……”

这个小小的波澜就这样没有壮阔下去。关于这事我以后不曾问过达夫，达夫也不曾向我说过什么，我们是三月十八号一同离开了上海。

那天在下着微雨，有楼建南、应修人①、周全平诸人，到码头上替我们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托全平替我照料的，创造社的事情也付托了他。他就在我们走后，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过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广东。沿途的记忆虽然多少还有一点，但在此不愿意缕述了。

憧憬了多久的广东，到了之后所感到的，却也并不是什么乐土。码头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话既不通，人手又杂，实

① 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诗人。曾任上海《支那二月》月刊主编。一九二六年在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

实在在弄得人有点头昏。但是有一种景象觉得比任何名画家的圣母玛丽亚还要动人的是那些穿着黑而发亮的香云纱、驾着船、运着货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妇人，身上的浮脂为生活的重压和南方的炎热所榨迫干净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并不羸弱，倒显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铜筋铁骨的风味。而她们之中的大多数还在背上斜背着一个婴儿。那紧张着的全身神经，象鹰隼一样，在生活战线上飞来跃去的身手，真正是无上的画材。但这样的画我是还没有看见过的。

在苦力群中看见了仿吾，他笑着老远便向船上的我们叫出："我守候了你们三天了。"

靠着由仿吾所带来的人手帮助，算把各人的行李和书籍，安全地运上了岸。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馆，接着便去访问林祖涵：因为聘书和旅费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时是叫我们到了广东后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①。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②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③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

---

①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一九二六年时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② 张良(？—前189)，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

③ 语见《史记·留侯世家》。

抑而潜氿，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当时的广州因为“三二〇”之变①还在戒严期中，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

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象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林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量了一会，便先告辞走了。

当天在林家吃了中饭。午后，他和仿吾把我们引到学校里去接了头，是到二十八的一天才一同搬进学堂里去的。

在未到广东以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便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在几个月后也都先后到了广东，虽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过创造

---

① 即“中山舰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向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时为共产党员）传达命令，调中山舰驶抵黄埔候用。中山舰抵黄埔后，蒋介石即以共产党企图暴动为由，于二十日逮捕李之龙，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行全市戒严，强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员退出该军，从而夺得国民党的军事领导大权。

社的分社，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识是和它渐渐疏远了。因此，我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和蝉联着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们写在这儿。

不过那两段生活的时期倒也并不长。我是三月底到广东，七月底参加北伐军出发，在广州算整整住了四个月。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开红花，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①，吃了田鸡饭，吃了烧鸽，吃了蠔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②。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五月中旬到的广州，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们留在那儿了。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只是由广东到广东，即是由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广东出发，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广东的那一段。在这一段的期中我和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的。这一年中和以后的创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只好让别的朋友们来补写，假如他们是有写的兴趣。

时代是在飞跃着，文章也只好飞跃了。

---

① 似应为龙牙蕉。

② 作者原注：boycott的音译，即抵制的意思。（据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郭沫若于四月二十日发布广东大学文科教学革新计划。少数不良教师抵制革新，煽动罢课，登报要求罢免郭沫若文科学长职务。此举激起全市进步师生反对，后经政府批准，将广东大学文科十五名不良教师开除。——注释者）

附　录

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上海《大晚报·火炬》，共七十八回，十章。第十章在八月十一、十二日上刊登。“八·一三”事变后，《大晚报》由八版改为四版，连载中断，全文未完。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仅收九章。现将未完之第十章附录如下：

十

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我已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从香港回到了上海，那时我的妻子是住在虹口的窦乐安路的。

家是很狭隘的，仅仅一楼一底，而是小规模的一种。

自己的少许的书籍是早赖朋友之力，由广东运回来了的。因此，一回到了这儿，和久别的妻儿相见，尽管是怎样的蜗居，怎样的不自由，而在自己的情趣上是感受着了无上的恬适。自己就俨然象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而且同时是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一样。阔别了将近两年的文学的氤氲，又来袭击着我来了。

我开始整理着几年前我所翻译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的残稿。——“残稿”？这故事怕早被一般的朋友们忘记了吧，在这儿我不妨再来追述它一下。

那是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的事了。上海的张东荪和其它的人们组织了共学社，打算多量地刊布有价值的译著。因我以前曾零碎地翻译过《浮士德》的一两幕，在张所主编的《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发表过，张便劝我从事全译，我也就答应了。

那时我住在日本的博多湾上，还是九州帝大的一位医科学生。趁着暑假期中，我便开始全译。

原稿是用笔和墨写在日本的所谓“半纸”上的——性质就如我们普通所使用的白纸。

初稿，涂抹得相当厉害，我怕寄回国后认不清爽，因此又破着工夫清缮了一遍。

每天从清早起来译到晚，连译带抄，整整费了两个月的辰光，算把第一部译好了。待要赓续译第二部时，暑假期所余无几，学校的开课已经逼在眼前了。第二部在量上是更加长，而在质上是更加难译的，因此我便想了一个通权的办法，便是先把第一部单独发表，随后再慢慢地移译第二部。这办法，其实也不是我的创见，欧美和日本都是有成例的。然而待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回上海之后，我却不知怎的，一直没有得到回信。

学校一开课，译事自然便停顿了下来；既成的译稿，我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面去了。

隔了若干时日，偶尔想到，又把壁橱打开，想把译稿取出来整理。——然而，一个绝望的打击！那两百多张的原稿，有三分之一的光景，通被老鼠咬碎了！

"半纸"本是很柔软的东西，老鼠真聪明而又奢华，它在上面砌窝，还要嫌其不够柔软而更要把它咬成鹅绒。

所被咬的自然是原稿的上层，上层自然是《浮士德》的开首几幕，那些在第一部中是最难译的。假使初稿还保存着，虽受打击倒也还不会怎样绝望；然而初稿是已经毁灭了的，在我清写了一遍之后。

就这样，那"残稿"就象自己的死去了的儿子的骨壶一样，跟着跑了几年。在北伐期中是由我的夫人替我保管着的，现在又从箧底取出来了。

《浮士德》的原文几乎全部都是有韵的诗剧，我的初译是不甚严密的：因为有些地方译成了韵语，有些地方又译成了散文。这样的不统一，在自己重经检阅之后，是感觉着十分的不满足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几年前使我绝望的老鼠，倒反转成为了我的恩人了。它打救了我，使我免得以不成熟的译文问世，留下一个不能洗涤的——罪恶！

今津纪游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一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①

我们人类好象都有种骛远性。当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诗圣但丁②，生时见逐于故国，流离终老，死后人始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③，生时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这种要算是时间上的骛远性了。空间上的骛远性，我把我自己来举个例罢。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却不曾攀登过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万余里了，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风光，昨夜梦中，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顶，在月下做起了诗来。

不再扯远了。我来福冈市，已经将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湾，是六百四十年前，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复没的地点。当时日人在博多湾沿岸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九年前在东京

---

① 语见苏轼诗《题西林壁》。

②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早年参加新兴市民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后因反对教皇势力，被终身放逐。著有《新生》、《神曲》等。

③ 杜斯妥逸夫司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后改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及流放，近十年。著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一高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垒残存，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访，凭吊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战地。

我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初到日本的时候，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火车过山海关时，我在车中望见山上蜿蜒着的城垒，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而今人之碌碌无能。后日读雷沫尔(P.Remer)所著德国的诗人利林克龙(Liliencron)①传，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Pellworm)上做堤防总督的时候，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度之感发，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何不由山海关下车登高壮观，招吊秦皇蒙恬②之魂魄？我至今还在渴想……唉！这也算是一种骛远性的适例了。我在福冈住了将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垒”在近旁，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万里长城呢！

元寇防垒，日人所高调赞奖的“护国大堤”，在我想象中以为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差堪伯仲。守此而不登，岂不是骛远性之误人乎？

---

① 利林克龙(D. von Liliencron，1844—1909)，通译利林克隆，德国诗人。著有《副官骑马行及其他》、《波格弗来德》等

② 秦皇，即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在位时修筑长城，东起辽东(今辽宁辽阳北)，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 蒙恬(？—前210)，秦国将领。秦灭六国后，奉始皇之命率兵三十万击退匈奴，并督修长城。

二

今晨八点钟，早早跑上学校里去，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才是休讲，好象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突然迟延了的一样，我反而没法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馆，把一两礼拜前的报纸随手翻阅，觉得太无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课程，都是不愿意上的，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不能不出席，我何不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走到个甚么地方去，或者我亲爱的自然，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

市外的西公园，自从前年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我们曾同去游逛过一次以来，我已两年不去了。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园内有些梅花，定已渐渐开放，能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坐在那园中高处，看望太阳光下的海波，也正是无上的快心乐事。不错，我便往西公园去罢！我才一动念，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我运出了校门。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

电车西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到了西公园。我下车徐徐向园门步去。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东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的是制帽，行路的人好象都在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驱使吗？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心，我还没有走到园门，骛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西公园离今川桥只有一区的电车，到了今川桥再坐几站轻便火

车，便可以达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么意思哟？“元寇防垒”！“护国大堤”！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古战场！去罢！去罢！去学利林克龙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电车。没有几分钟的光景，电车已经到了终点。我从今川桥下车，往轻便铁道的驿站——名目虽叫驿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上去买车票。我检查我的钱包，只有五十钱（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的一张纸币。

——“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

——“要二十四钱。”

——“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

——“要四十八钱。”

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他给了我十六区的车票，找了我两个铜板。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是分区零买的。他指示着车票上的站名向我说：从此处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钱，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

我问：“渡船钱要多少？”

他说：“要三钱。”

我听着吃了一惊，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今天的计划，不是完全成了画饼吗？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寻，另外又才寻出一个五钱的白铜小币。啊，好个救星！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商队，突然遇着了Oa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驿站中待车的人很多，火车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

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的不好洁净，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就好象是世界第一。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

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所有的侧街陋巷，其不洁净、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刮风，又要成为灰尘世界。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垫些细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代用。隔不许久，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又要变成了泥浆了。驿前的街道，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街心的四条铁轨，差不多要埋没在泥土中了。街檐下的水沟，水积不流，昏白色的浆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就好象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摊上堆一大堆山榛，妇人跪在地上烧卖。这种风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杂沓喧阗的街市，无端地发出了这段敌忾心来，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象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

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金钱一富裕的时候，总要涌出些奢侈欲望来。我无意识中又在一个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币，我好象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车轮船要运转时，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人要去旅行时，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个铜板，买了一包纸烟、一匣洋火，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起来。可怜吹吐还不上半支，我的脑天早已昏昏蒙蒙了。滚蛋罢！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支纸烟，愤恨地投在水沟里去。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还在混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

三

小小的火车头，拖了两乘坐车走来，肮脏的程度，比上海“大众可坐”的三等电车还要厉害。车中拥挤得不堪，如象才开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车得早，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了一个座位，但可恨一位不客气的中年人，竟来加上楔头，坐到我左脚的大腿上，我好象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唤奈何了。①

汽笛放起猫叫声，火车已经开动起来。

过了一个停车场，两面的街市已经退尽，玻璃窗外开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抽出麦苗，长达四五寸了。远山在太阳光中燃烧，又好象中了酒的一样。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子上来热腾腾地。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指点沿线的各处小小的工场，和着车轮的噪音，高谈阔论，谈吐多不可辨。

又过了两个停车场，车上渐渐稀疏了。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馆，戏目的招贴立在馆前，怪刺目地挂着种种的广告画。出村，落入松林中。检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

---

① 项羽（前232—前 202），名籍，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楚汉相争时，被刘邦围困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曾作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后自刎于乌江。

色，点点的明帆，昏昏的岛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背海一面，树甚深远，除了无数退走的树干外，别无所见。在这种晴和的天气，能偕个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怕更会是件无上的快心乐事罢。

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走出海岸上来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几只白鸥，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盘旋飞舞。有的突然飞下海面，掠水而飞，飞不多远，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

火车到了今宿站。

我从今宿下车，问明了渡船所在。从今宿市中穿过，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无人，阳光洒地，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子在跟着我走。啼鸟在空中清啭。走过松林，又走到一座小小村落，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席地，坐在太阳光中缝纴。出村，又走到海岸上来，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立在一座浅峰之下。渡船已开，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时钟，已经十一点过了，时间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我便转入渡家后的厕所中去。

我踞在厕所中，一面解决问题，一面想起前两天B君向我所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B君哟！我在这种地方怀念起你来，你恕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罢！

B君说：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边，放出的大小便听随流水冲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awaya)，这正是日本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

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象。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这种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表现艺术，于民族风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

——恋爱者何？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如象人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

笑话！笑话！在这壁画蔚然的“艺术之宫”再沉吟得一刻的时候，渡船怕又要开走了！

四

今津是在系岛郡上。系岛原来不是海岛，是与陆地相连。渡船在海湾中过渡，海水异常清澈，有点象西湖。因为没有带张地图来，上了岸后，竟把地方走错。问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才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我在村中旋来旋去，只想朝外海边走，却只在村中盘旋。最后走到一家卖花邮片的铺店门口，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有一张是"胜福寺的蟠龙松"，有一张是"元寇歼灭碑"，有一张就是"元寇防垒"了。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照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这就是"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吗？一条杂乱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站在这种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

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龙松。

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消息。关于此树，有一浪曼谛克的口碑流传。说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chi）①

---

① 足利尊氏(1305—1358)，日本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一三三八年自立为征夷大将军。

来到九州的时候，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①盛名，亲来拜访。禅师旁乃有一窈窕的婵娟侍坐。尊氏大惊，怒骂禅师品性恶劣。禅师自若，而美人惭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为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迂哉！迂哉！侍侧之美人也！不知种种声闻，都如泡影。

这种无稽的传说，总觉得有种葱茏的诗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午后两点钟起还有检眼实习，我没有在梦境中低徊的余裕。

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终竟走到了最后的目的地点。松林外沿海一带砂堤，上有乱石狼籍，我把照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我才知道就是所谓"护国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曼谛克的骛远性之误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我坐在乱石上，在防垒照片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

——堤长不过百丈。堤上狼籍些极不规则的乱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头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最高处仅及股臀关节。

堤前为海湾，堤后为松林，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海风清爽。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树木甚苍翠。

---

① 临济宗为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唐高僧义玄创，因住真定府临济院，故名。公元十二、三世纪间传入日本。　大觉禅师(1213—1278)，俗姓冉，西蜀(今四川境内)人。日本镰仓中期由中国去日本，日本名兰溪道隆，谥号大觉禅师。

海湾中水色青碧，微有涟漪。志贺岛横陈在北，海中道一带白色砂岸，了然可见。西北亦有两小岛，不知名。海湾左右有岩岸环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峰峦起伏。正北湾口海雾蒙蒙，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见。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阳当头，已是正午时候。

堤前砂岸，浅草衰黄。有长椭小蝇在日光中飞绕，无力。

茅屋几椽，已颓圮，疑是渔人藏舟之处。——

邮片已写满了，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元舰四千艘，元军十万余人，竟会于一夜之间，突然为暴风所淹没，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①咏赤壁的一诗。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出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虽没有，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左右两横突起，开张如蝶翅，上关节突起，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我断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或者便是元军载来的水牛残骨，也说不定。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又想去攀登那右手的狮头峰。

---

① 杜牧之(803—852)，名牧，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文学家。有《樊川文集》。

五

狮头峰余势，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题“元寇歼灭之处”五字。碑前有纪名铜柱，上题“大正四年十一月建”(大正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碑下有石栏环绕，周围有几处竹栏，各围浅松一株，是些贵族、华族的纪游品。坐石栏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湾环，只有防垒后的一带松原低地几于与水面齐平，此地在千年之前，当然是绝立的孤岛，系岛郡之名可以推见。所谓护国的大堤，或许只是防水的水堤，被人附会历史的名迹。转入碑后，碑后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样。

舍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渐登，气渐促，喉嗓渴不可耐，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登山决不是件乐事，以为怕要到峰顶了，山路一转，峰顶依然还在上头。如此屡受欺骗，亦只得鼓舞余勇而登。热，汗流，渴，气促，心搏亢进，筋力疲劳，好象得了心脏病的一样。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遇山樵数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将至绝顶，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纪游者的芳名，题满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脏，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心气渐渐平复了，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狮头临海，古松森森，秃石累累，俯瞰海湾，青如螺黛。有渔舟一只，长仅尺

许，有两人在舟中垂钓。唐人太上隐者有《答人》一诗：

偶来松下坐，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①

他这第一句，我实际办到了。第三句，我也实际办到了，因为我没有带表来。但是我的懒惰工夫，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后二时起，还有两点钟的检眼实习不能不出席，我看见日脚偏西，纵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我的脚也不肯唯唯听命了。

我正站立起来，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使我大吃一惊。上来的是两位工人。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决意从那两位工人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路极崄隘，攀援树枝而下，路尽处，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给了他。啊，这两个工人，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这不是段绝好的佳话吗？就好象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恪拉芬里德两少女邂逅相遇②，就好象郑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③，那岂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吗？……

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④。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

① 《全唐诗》卷七八四引《古今诗话》：“太上隐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从问其姓名，不答，留诗一绝云。”所留一绝即《答人》，第一句作“偶来松树下”。

② 事见卢梭《忏悔录》第一部第四章。

③ 事见《艺文类聚》七十八卷《列仙传》。

④ 语见《国语·周下》。

看来，倒是从恶如登，从善如崩了。我此处所谓善恶，不消说是以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受尽种种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种恶事，心里所受的不快，怕与登山时的苦楚无甚增减。偶尔做出一件善事，心里所生的快感，也怕和这下山的快感无甚损益。

上山时那么困苦，几乎如象害了一场大病；一到下山，就好象在滑冰的一样，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掌。飞，飞，飞，我身轻如鸟，听凭山道的倾斜，把我滑下山来。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嗓终是有几分渴意。

六

取捷径趋向渡头，渡船又已开了。在渡头近旁小店中，买了一瓶荷兰水①。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见店内的挂钟，已经是午后二时了，完全出乎意外。早知是这样，我又何苦那么着忙呢？恨不曾往胜福寺内凭吊婵娟之魂，恨不曾在狮子山巅高枕石头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满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哟！你恕我不客气，滥引你的雅言了！你说："只要是处女，便是美人。"不消说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买了十钱的饼干，她称的分两，分外足实呢！我说：十钱的饼干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狮子狗儿坐在街心看我吃饼干，好象很有几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个给它，它才兀的惊立起来，哼哼地向我恨了两声走了。它怕把那个饼干当成了小石子罢？这位狮子狗儿，我佩服它有些道德家的气质。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见赤裸裸的纯真无饰的艺术品时，有不反射地啃啃狂吠的吗？

午后的海水，又是一般气象了。好象圆熟了的艺术家的

① 即汽水。

作品，激越的动摇，烘腾的气势虽然没有，但总有一种沉静的诗情荡漾在上面。潮水渐渐消退了。渡船将要到时，突然搁起浅来。此时对面又开出一只渡船，船缘上坐着两位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头，一位披着白色的毛织披肩，一位披的是狐皮。她们本是背我坐着的，紧相依傍。她们看见我们的坐船搁浅，都偏过头来。我的视线同她们觌面相值。啊，这真是郑交甫遇着江妃，卢梭遇着雅丽、恪拉芬里德了！要是她们的船搁了浅的时候，我定要跳下水去，就好象卢梭涉水至膝，替雅、恪二姑娘牵马渡溪的一样，把她们的坐船推动起走。是夕阳光线的作用吗？还是她们看破了我的隐意呢？她们的眼眸中总觉得有几分羞涩的意思。我真羡慕卢梭！他真幸福！他替雅、恪二姑娘牵马过溪之后，被二女殷勤招待，骑在恪姑娘马后，紧抱着她，同到初奴别邸燕欢一日。他在花园中攀树折樱桃投向她们，她们又反把枒枝投向树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亲了一吻，雅姑娘也没有生气。啊，幸福的卢梭呀！……

船动了！不要再空咽馋涎了罢！

浪曼谛克的梦游患者哟！淡淡的月轮在空中发笑了。

1922年2月10日

水 平 线 下

到宜兴去

发　端

自从四月初我飘泊到日本去，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开火的时候，上海有朋友写信给我，劝我回国来看看热闹。那时，一来我没有路费，二来也不相信这场热闹会真使我们看见，因此我没有回来。谁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的。闹了一两年要开火要开火的江浙，终竟开了火，而且由于局部的动摇竟牵动了全局，中国的大势生出了剧变。吴佩孚倒了，孙逸仙由广东进了北京，段祺瑞公然当了执政。这在四五个月之前谁能料到呢。

外界的事情变得这样剧烈，我内心的生活也改换了正朔了。在海外飘流了半年，又饱受了异邦人的种种虐待，自己觉得世界虽大，真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可以作我们的桃源。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要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锥扶持，我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因此，在十一月中旬我又折回到上海。如今又蹈践了中国的旧土了。在我自己实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至十月上海《孤军》第三卷第三至第五期。

一点什么感兴也没有。快乐呢？我已昧不过自己的良心。羞耻呢？我又何必！

回到上海后的第十天，朋友们发起了一个组织，调查此次的江浙战祸。他们因为我是闲着的人，便找我担任调查宜兴的一路。

我听说往宜兴要坐轮船过太湖，我的高兴便登时勃发了。天地间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路费是不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热闹过的痕迹，也可以观赏些脍炙人口的江南风光，天地间还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我的高兴使我把这个难差当成了美缺，没有说上两句话，我便满口承应了下来。我坚决地要到宜兴去。

但是要到宜兴，却有不能不解决的两个难题。一个是到宜兴去听说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们却怎么过活呢？家里既没有用人，邻居也没有相识的，他们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国话，七天之内即使不会发生什么意外，这七天的食粮谁替他们采办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不能不感谢上天。天气已经冷起来了，就采办七天的食粮留在家里，也不会腐烂了。七天之内究竟能不能发生出意外？那也只好望天老爷广行方便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宜兴竟在那一个方角，我在地图上虽然找寻了出来，但我是四川人，我怎么能够听懂宜兴的土话呢？“吃人钱财与人消灾”，领了路费是往宜兴去调查战祸的，连方言也弄不清爽，怎么能够调查？

这是第二个难题。

在这儿我却要感谢C① 君了。因为他是宜兴人，而且也和我一样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希望他和我同去。一说，他也满口承应了。他还许我：到宜兴去要请我吃两样好吃的东西，一样是宜兴的松菌，一样是黄雀。他说这两样的风味是美得无法形容的，都是宜兴的特产。他这么一说，更把我的胃脏神说得大动而特动了，本来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车去的，却在一日午后说走就走地提前动身了。

啊！天地间真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不要自己出一个钱，可以去看看热闹，可以去赏赏风光，家里有天看承，路上有人作伴，而且在最后还有松菌和黄雀好吃。啊，天地间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

第一日

在我们离开上海的这一天，正是上海的风声又有些吃紧的时候。南京的齐燮元和北京的执政府还在争持，上海地方的官职竟闹起了双料的排场。双料的护军使，双料的交涉员，双料的警察厅长，双料的县知事，这许多双料的官，各以南北两京为背景，便和一妻一妾一样两立起来，但却很有不能两立之势了。

三点钟我们到了沪宁车站，刚好赶上了三点二十五分钟开往无锡的专车。我们买了二张三等票，走进月台的时候，劈头便看见一串灶孔一样的铁皮车，装着无数的灰色的猪八

① 本篇中的C最初发表时指明为周全平。

戒——丘八老爷。听说这是早晨才从南京开来的，晚上怕还有两趟开来，双料的两大小免不了又要内讧了。

我们跨上三等车的时候，车里的人已经拥挤得不通气息了，只得在月台上站着。月台上也站了不少的人，我们更只得站在门口，隔着一道玻璃观赏窗外的图画。

兵车煞是有趣味的，拥塞着的一些丘八我觉得怎么也好象些猪，好象这两天要过年的人预备着要弄进杀房去的肥猪。你看，他们那臃肿得不成名器的尊躯，还要穿上一件臃肿得不成名器的灰色的棉军服。他们的脸墩，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眉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太阳筋，他们的冲嘴，终不外是臃肿的两个字。他们的颜面神经，他们的颜面筋肉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闪动的。他们那小小的凝滞着的眼睛和他们开着的口一样，呆呆地望着——他们究竟是在看还是不是在看，这是只有上帝才晓得的了。蛮大的头颅上要顶上一个熨斗形的帽子，短缩的颈子上还要披些乌黑毵毵的长毛狗皮。啊，他们这个尊容，谁能不联想到猪上去呢？我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军阀老爷们究竟什么个存心。他们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为甚么连这些自己手下的小兵，都不稍稍装饰得好一点呢？纵横是做装饰品的，弄得好看一点，觉得于自己的面子上也还可以过得下去罢？连这点面子也不顾，我替老爷们实在有点难乎为情了。

铁皮车之外还有好几驾敞车，如山如峦地堆积着一车的家具。家具里面什么都有，太师椅、八仙台、床架、蒸笼、挂钟、朱红漆的马桶，……这些东西当然是从江南民间得来的"胜利

品”了！

一位象猴子一样的瘦人，是一员下级军官，躺在这家具山的一把杨妃椅上。他手里捧着一个茶瓶，闭着眼睛好象在那儿参证玄机。啊，他那超然物外的态度，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情！无论什么人看来，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得道的圣者，冯玉祥的圣经，吴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学，①我怕都没有这位先生参悟得透澈罢？看来看去，不知不觉地又把他连想到齐天大圣来。是的，这位先生的道法毕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变出十万八千的兵马。这些眼前的猪兵猪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变幻出来的罢？……

唔，唔，脚下动起来了也！我们就好象驾起云头一样，被“火轮之车”把我们运出了上海。上海市向后面退去了，我们也渐渐走到自然中来。假使退返两三年，我就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出一篇自然的赞颂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眼前的自然总是一片的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红绿的色盲，还是客观的世界果然是这样呢？那愁容惨淡的冬景，到底还有人不看成愁容惨淡的么？那荒凉一片的大地，到底还有人不看成荒凉的么？啊，颓废的故国，冷落的江南！无情的自然把中国的真相赤裸裸地给剥示了出来，我们的泱泱中华，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沦落吗？

---

①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爱国将领。曾反对袁世凯，讨伐张勋复辟。一九二四年推翻曹锟，驱逐溥仪出宫，后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信奉基督教。　吴佩孚信奉道教，著有《易箴》一卷。段祺瑞信奉佛教，自号正道居士。

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便是真如。听说在战事结束后，齐燮元带领着数万大兵在这儿驻扎过半个月光景。战事已经结束了，真如又不在火线上。齐燮元的兵竟大肆蹂躏了一回，烧毁了五百余家镇上的精华。古人说：火主文明。五百年疲倦了的希腊的凤凰，不经过一道火灾也没有再生的希望。看来齐燮元的猪兵猪将倒会反而是振兴中国的伟大的功臣呢！可惜真如离铁路线太远，这些文明成绩，在车上看不出来。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沿着路轨的一些军用灶孔罢了。

车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给我们，路轨下面便是一道水沟，昏浊的死水就如翻了白的消化不良的幼儿的小便。

江南人对我们说：那些北方来的兵士真是畜生！吃的水是在那沟里，扯的污也是在那沟里，真是腌臜得没有王法呢。

江南人说的时候很带着几分鄙夷不屑的样子。但是哟，你漂亮的江南人！在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方人占了你们的上风呢！其实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洁的呢？你们的习惯不是上河洗马桶，下河洗饭桶吗？

你们或者说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从前到过无锡，无锡总可以算是江南罢？我在惠泉山下避过一礼拜的暑，那时我住在一座节孝祠的颓废了的楼上。楼窗下面临着一眼方池，池里的水快要全干了，不消说是不流的。我每天清晨起来，总要看见一对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块大石上工作，一边是在淘米，一边是在洗马桶。这到底是在顾惜时间，还是在讲究用水的经济呢？守着有清洁的“天下第

二泉"在近旁，她们却不晓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远了。牢骚一发，竟倒拆起江南人来。这是不对的！同路的C君也还是江南人呢。不可这样的普遍得罪人，凡事总得从好处看！

好，我要再说到猪兵猪将的成绩上来了。他们在铁路旁边掘了许多军用灶，把周围的田地蹂躏成了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断折的残梗，还缀着些可怜的残花败絮。啊，刮地皮的工夫毕竟要算他们是一等一呢！真如过后便是南翔，车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涌下车去了。这些人听说有些是逃难到上海、到这时才回家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来的，有些是来白相① 的，但不知道何以会有这么多人！这毕竟是我们中国的人口还经得着好几次的大战火的证据呀！涌哟，涌哟，涌到地狱里去罢！你们这些猪之猪，猪之猪哟！你们的人并不是不多，你们的人比齐燮元的兵总要多过五百倍罢？你们听他们烧你们的乡镇，听他们奸淫你们的妻女姊妹，听他们勒索，你们听他们拉夫，你们放花炮来替他们送行，还让你们的绅士们在南京替齐燮元办凯旋会，……啊，你们真是一些猪之猪，猪之猪哟！纵横是要烧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乡镇烧了，坚壁清野地使那些猪八戒们无扯污之地呢？纵横是要抢的，你们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私财捐点出来，组织些民军来抵御抵御呢？纵横是要死的，你们为什么不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猪八戒们决一死战呢！他们来了你们便跑，你们平时还要豢养他们，你们真是猪之猪，猪

① 吴语方言，游玩的意思。

之猪哟！滚，滚，滚，滚罢，滚罢！……

南翔镇听说也烧了不少的房子，也是战争过后才烧的，烧的人也都是齐燮元手下的苏军。苏军烧江苏人的房子，被烧的江苏人还要歌颂他们的凯旋，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天下真是太平无事，许多回家去过年的人，正买了不少的年糕呀！

从南翔下了车的人真是多，我们乐得走进车里去找得一个座位来坐下了。

车过黄渡与安亭的时候，有一位在车里相认识的姓杨的朋友，又对我说明了许多战迹。他指示些战壕给我们看，又指示了些安大炮的地方；指示了些打得大框小洞的农家房屋，又指示了些田地里戴孝的女子。田地里有些女人，髻上扎着白色头绳，在那里摘取飘零的败絮。火车过时，她们都瞠目地抬起头来。

姓杨的说：你看，那些女人都是戴着孝的，她们头上缠着白色的头绳子还很新鲜呢。她们里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在这一回的战事里被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杨君说得很有点凄然的，但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在我的心里实在连一点凄惨的感情也没有！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该死，但我总觉得他们只是自己寻死。他们平时上粮纳税，要去供养一些猪，猪发了疯时要咬死他们，这有谁能够替他们流泪呢？

黄渡、安亭之间是战事最剧烈的地方，但仅仅隔着一道宽不过二丈的二十四号桥，苏军以十倍之众，竟在这儿争持了将

近两月。这到底是在谦虚，还是在儿戏哟。战壕是有的，大炮也是有的，但我总觉得有点滑稽！

姓杨的是苏州人，在太仓的一座纱厂里做事。他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战时的情形，也还说了许多在江南地方游历的经验，但他的话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近来纱厂的危机。他说自从欧战过后，外国的纱陆续输入国内来，象日本资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设了几个大纱厂，中国的纱厂事业便受了莫大的打击。中国的纱厂，成本又少，办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国竞争。象最大的大中华纱厂，也已经闭了门好久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觉得是接触到了目前最紧要的经济问题。这比什么调查江浙戬祸，比什么收拾中国政局的善后事宜，还要十二万分紧要！

我们中国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应该采取自由放任主义，还是应该采取社会主义？许多读饱了东西洋杂志的论客，正在那儿起劲地争论，有的要提倡个人资本主义，有的要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平心静气地暂且就事实上来立论罢。我们先假定个人资本主义是最合乎人性的东西，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个人资本主义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吗？我们请把一张全世界的地图展开来看看罢！除开我们中国而外，地球上究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被殖民地化，没有受尽国际资本家的侵蚀？国际资本家万矢一的地倾向着我们这个还在资本制度以前的中国，把我们中国已经作为了万国的商场，彼此在这儿互相争逐了。他们国际资本家以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组织，在经济圈内君临着我们，我们可有相当的能力足以抵抗吗？他们的组织是"新机

克得”①，是“脱拉司”②；我们的呢？

资本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受着它接触的地方便立地受它感染。所以欧西资本主义一入日本，日本便受了它的感化，一入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也渐渐地甲坼进芽了。

资本主义的最初的萌芽，大抵是在棉纱事业。日本是后进国，但她的幸运处，是因为有我们中国作全世界的销场，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护政策，把资本主义扶持了起来，骎骎乎要与欧美并驾了。但是我们中国呢？在欧战剧烈的时候，欧美的资本家暂时中止了他们的侵蚀，于是应运而起的便是如竹笋丛生一样的纱厂之林立。但是现刻的形势是怎样呢？资本和组织两者比较最宏大的大中华纱厂，终竟关门半年了！这儿提供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教训呢？

树木本是从种子的萌芽发生出来的。渐渐占取地盘，征服邻近之同类而成其伟大。欧西的资本家也不外乎是取这个路径。他们起初是由小资本家发祥，渐渐吞并较小的资本家，扩张经济上的地盘，供他们的营养，他们现在是宏大的巨木，他们的枝叶几乎要荫遍了全世界。在几株参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从土里标出来，要和他们竞参天之势，试问他是能够的么？个人资本主义之于中国，便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现势已经不是两百年前的亚丹斯密③时代的英国了！主张应该

① 作者原注：原文是 syndicate，现在一般译为“辛迪加”，即资本主义垄断性的一种产业组合。

② 作者原注：是 trust 的音译，指资本主义垄断联合中比较高级的一种形式。

③ 作者原注：Adam Smith(1723—1790)，资产阶级正统派经济学的建立者。

施行个人资本主义的论客们哟！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他们也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他们说，他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们以为要达到社会主义，不能不经过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段路程。个人资本主义有堆积资本，团集工人，增进生产力种种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所必要的条件，所以提倡个人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这话是诚然不错的。但是照我们中国的现状说来，我们中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是断难发达的了。能够自在地发展起来，我们又何乐而不听其自然发展呢？但是时代已经不许可了，几棵大树子林立在你的旁边，你一株嫩苗如能够苟延残喘也就是万幸了。但是万不幸的实在是苟延残喘的年老的小树！他们年纪已经老了，发育的生机已经窒息了，将来即使与以相当的条件，他们也不能发展起来，以至参天。这是有实在的事例的。半残半落的小资本家林立的苦处就是这个样子。资本不能集中，生产受了分割，所团集的工人的数目，也很有限。这在促成社会主义实现上反而是莫大的障碍！要实现社会主义自然希望有大工业、大物质的生产力以作基础。象在欧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前头去了，他们所剩下的一条路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无产阶级只消把政权拿过手来，资本主义的组织便可以容易打破。但是我们物质后进的国家，我们还要努力赛跑一次才行！我们要希望大工业发达，我们要希望物质生产力增进，只剩着一条比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我这话好象是很矛盾的

主张，但这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并不矛盾的。俄国现行的政策是这样，便是马克思自己的主张也是这样。马克思分社会革命为三个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半成期”，一切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的权力施行，国家须努力使生产力发展到尽头，然后才能移转于完成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决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梦想者，但假使他是坐在飞机上，他总是想把速度加快的。在物质后进的国家，比较先生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景仰。因种种经济以外的机缘，社会主义者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要促进物质的生产力，舍国家资本主义而外没有别的道路！聪明的列宁，他所以指导俄罗斯的便是这样。我们中国正好学他，正好由有主义、有计划、当然是不赞成自由放任主义的人，纠合主义相同的人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再施行国家资本主义。舍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无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些崇拜亚丹斯密的先生们的自由放任主义了。既没有法子，那也就只好放任。

有人说：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有也还脆弱得可怜。好，如果承认无产阶级脆弱，那就加强它好了。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那是说不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工人。我们所争的，不是形式上的工人与不工人；而是精神上的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与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这种聪明难得的资本家要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抛弃他所有的一切财产来作革命的军需，难道还会拒绝他吗？难道还要开一次资格审查

会，说他没有资格吗？我们所争的便在这种精神的赞成与不赞成！如果精神是赞成了，即使是资本家也可以来参加革命。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精神上的解释也可以，即使改为“共产主义者专政”也未尝不可以。……亲爱的读者哟，我这样发挥了一长篇了，但我自己还是坐在沪锡专车的三等车中的。这样的思想在我那时的脑中盘旋着，怕不过几秒钟的光景？说着说着，便到了昆山，火车停止着了。有人说是在等南京开来的兵车。车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争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渐渐苍茫起来，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的光景，而我们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所等候着的兵车却始终没有开来，开来的只是一趟客车。这客车是怎么迟了到的，并怎么迟到这样久，车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姓杨的在苏州便下了车，我们又于昏昏茫茫中坐到无锡。时间已经是七点半钟了。

“无锡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第一次和郑伯奇同来，第二次和成仿吾，这一次却是和你。”

在无锡车站上下车后，拒绝了一些黄包车夫的执拗的拉客，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来。我一面走，一面发生着怀旧的感情，对C君叙说起来。

“第一次来是民国九年① 七月，那时是朱谦之写信来告诉我们，说无锡的风光有些希腊的风味，比西湖还好。我们受了

① 应为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

他的怂恿，从上海跑到惠泉山来，但他已经往南京去了。我们在惠泉山下一座节孝祠里面住了两个礼拜光景，蚊虫之多，居处的不适，惠山的童裸，更加之以天气的炎热，使我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朱谦之才由南京转来，无论如何要约我们坐花船去游太湖，他好象不知道花船是什么性质，而且价钱也很贵。他这个提议，被我们反对了。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走到运河里面去凫过水。能凫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骅① 两人。我们凫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觉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边上学狗爬，只有朱谦之始终不肯下水。凫水起来之后，大家的下衣都打湿了，家骅他们是穿的学生装，他们主张就穿起湿裤回去。朱谦之严烈地反对。他说这是有伤风化，有伤风化！说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大家拿了裤子转来。我看他转来时候，在路上走得飘飘忽忽的。我问他怎么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扪着他的额部，他在发着高热，如象火烧着的一样。我问了他的病情，才知道他得的是疟疾。我劝他先回去睡了，再请家骅替他买些金鸡纳霜。

“那时我们住的节孝祠里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谦之们住的房间便在池塘边上，池塘的对岸便是节孝祠的大殿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见谦之在床上乱发谵语。他说——啊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在青天白日之下脱得光丝丝的呀！……人家都在骂你们了！……你们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啊啊，我是要保护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

① 袁家骅，又名嘉华，一九〇四年生，江苏常熟人。著有《唯情哲学》等。

枪对待!……

"他说着便一翻身跳起床来，赤着脚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声声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

"他跄跄踉踉地从池塘边上向大殿跑去，我们紧紧追赶着他。

"大殿门外正坐着两桌人在那里打马将牌，打得正在异常起劲，朱谦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我要用手枪对待呀!你们骂我的朋友!'他一直向那些人跑去，那些打马将的人看见势火太凶了，连牌也不顾，钱也不顾，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窜起来。

"祠堂的门限很高，'我要用手枪对待呀!'谦之一声吼着，把右手向上一伸，踉跄地便跌向门外。幸好我刚好赶上，他的头部还没有及地，我便拦腰抱着他。他还屡次反抗，要把自己的头去碰触地面。这时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赶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们抬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终不肯，口口声声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要用手枪对待!'我那时起了一个急智，我便对他说:'请你好好地去睡罢。等我拿手枪去对付他们，一切事情你都相信我好了。'

"顶奇妙的是他听了我这话便立地平静起来了。

"我们把他抬去睡好后，朋友们都惊惶失措了，我说他只是疟疾，因为热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些神经性的症状来，明天包管会好的。但他们都不肯相信我，他们到第三师范去请了一位中医来。这位中医，倒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鸡纳霜丸给

他吃，一面又开了一张药方。他这是再高明也没有的办法。[1]

"无锡的朋友们对于朱谦之的友情是异常深厚的。他们请了中国医生来看了，还不放心，还要把他抬进医院去。那是无锡公园旁边的大同医院。受诊察的时候，我立在旁边替朱谦之报告病历。一位青年医生，大约是助手，我看他也不打诊，只把脉评了一下，就说入院了。我觉得这位西医也是过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医法门来掩盖自己的妙手了。我问他是甚么病？他说要住了几天病院才晓得。我便不客气了。我说，不分明是 Malaria（疟疾）吗？他说是 Malaria 时，怕是另外一种 Malaria。

"这位医生也使我佩服到五体投地了。那明明是三日一来复的间歇热，他要说是另外一种 Malaria。朱谦之入院后，我因为有别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后来听说他在院里住了三天，也没有再发一次烧，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个医生医好的？我不敢替西医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医捣蛋。……"

我一面说着，已经走到了无锡饭店的门口了。这座旅馆是第二次来游时住过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间的时候，那时我的日本妻子因为在上海的生活过不惯，已经折回日本去了。

---

① 初版本此后尚有以下文字："象这样做去，中国的旧医是永不会失人信仰的呢！西医费尽了种种的科学的研究，费尽了无数的科学家的心血，好容易才发明了几种药到病除的特效药，象对于疟疾的这金鸡纳霜，便是这其中的一种。而我们高明的中医却轻轻便便地把他混用起来，病医好了之后，到底还是金鸡纳霜的功劳？还是中国药的功劳呢？主方的是中国医生，不消说是中国药对症。可怜是金鸡纳霜走了背时运了。"收入《沫若文集》第七卷时删去。

我在上海临到人生的歧路，消沉了好久。那时是袁家骅和顾绶昌两人约我们来看梅花，我却不过朋友们的盛情，便又到这儿来住过一夜。那时候同来的有仿吾、尼特①，我们居过的房间便是这儿的二楼十七号了。

因为有这样的一番旧情，我走到无锡饭店门首，便自然而然地走进店里面去。

啊，天地间真再没有这样凑巧的事情了！我们走进店里去后，茶房把我们引到的却又是二楼的第十七号房间！

房中唯一的一点装饰便是一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广告，但这种俗不堪耐的广告对于我也觉得有几分依依欲动的神气了。

在电灯光下不禁怀念起成仿吾来，几乎又要流出些不值钱的眼泪了。

"成仿吾怕已经到了长沙罢？"C君这么问起我来。

"怕还没有这么快，到汉口要五天。他在武昌要耽搁些时候，恐怕还不会到长沙。"我这样沉抑地回答。

天地间真是有多少出人意外的事情。自从四月我到日本去后，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广东。但在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后，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从广东回来了，而他这回回来是扶着他长兄的灵柩。

他的这位长兄比仿吾早到广东不过半年，而他竟至成了灵柩转来！他不是轰轰烈烈地去投了什么人的炸弹，一同被炸死，也不是阵亡，他的死愈见不为人注意，而对于我却愈有不

① 即倪贻德。

能言喻的悲哀。他有五个儿子寄居在长沙，他假如能庸庸碌碌做些家人生产，又何尝不能供家养口？但他偏又做了湘军的军需处长，远远要到广东去从军。广东的财政穷绌得不堪，客军的湘军有时候几乎没米煮饭。他在这种奇绌的状态之下，不能不四处去找些米粮来使健儿们糊口。但他顾得了军队，便顾不了家庭。他在去年十一月，写过一封信给仿吾，说他寄留在长沙诸儿的学资要仿吾由上海供给。仿吾想方设计汇去了一百五十块钱，这是我所目睹的事。但他终竟因为军事多忙，劳死在他乡了。听说他得的是心脏麻痹的急症，仅仅苦闷了两点钟便溘然长逝了。仿吾也没有赶得及和他见面。象他这样不折不扣的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人，泱泱的中国中，究竟能有几个？然而他竟死了。他死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没有人替他在报章杂志上出专号，也没有人替他流一珠眼泪，替他照拂下他五个无父的孤儿。他这五个孤儿当然要归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责任还不仅这五个。我听说他的二哥也有五个儿子，而他的二哥除抽大烟之外是一事不问的人，这当然也不能不赖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个人要担养他这十个侄子，啊，这真是不容易的事！他到上海后，我们于哀切之中也聚首了两天。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上来，他总要把十个指头伸出来，连连地说道："一双手！一双手！"——啊，他这一双手，一双手！但是谁肯替他分得一只去呢？

仿吾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后的一礼拜，又来下榻在和他一同下榻过的旅馆。我素来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惯会生儿子的无产者的悲哀哟！

"仿吾的大哥叫作什么名字呢？"C又问起我来。

我说："叫成汉，号叫劭吾。他是早期的日本留学

四'运动的那一年，大学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我现在这样地把他写在这儿。我不敢保证：他的名字是不也就和写在水上的一样？

在灯下谈了好一阵，虽明知袁家骅、顾绶昌两人是已经毕了业的，但也打了一次电话到第三师范去问，接电话的人竟回答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哎，相别仅半年，他们又真的往那儿去了呢？

晚饭没在店里用。我们走出街去，我特意选出了一个饭馆，是前回同仿吾和家骅们用过饭的地方。我想起了德国诗人乌兰德(Uhland)①的一首诗来。诗意是说他在一个渡口过渡的时候，一个人给了两个人的船钱。因为这个渡口是从前他和他的友人过渡过的地方。他的友人死了，但灵魂是还随附着他的，所以一人给了两人的船钱。我在吃饭的时候，想起这首诗来，也很想叫茶房多备几份碗筷，但又觉得过于摹仿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后，还东鳞西爪地谈了大半夜，以后是睡眠神来下了我的箝口令。

第二日

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八点钟了。醒是醒得很早的，但因天

---

① 乌兰德(J·L. Uhland, 1787—1862)，德国诗人。著有《祖国诗集》、《关于诗歌和传说的历史文集》等。

气冷，好容易费了半夜的体温才温暖了的被窝，怎么也不忍和它离别。荏荏苒苒地弄得肚子有些饿起来了，还是吃饭的问题要紧，只得毅然决然地起了床。

我在这儿发明了一个推倒军阀的秘诀。

军阀！军阀！在二十世纪的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个为万众人所诅咒的东西恐怕没有比得上军阀的罢？甚么人都在骂军阀，甚么人都在讲推倒军阀。甚至军阀自己也在讲军阀不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军阀抛掉，做一个不挨骂的平民呢？啊，谈何容易！他们当到一个军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们要逢迎上司，要笼络部下，要屠杀群众，要占领地盘，要拍卖同僚，要暗杀几个官长。他们虽然不曾身经百战，但却曾心经百战。好容易得到一个督军、一个巡阅使的地位，这就和我好容易才把被窝烫暖了的一样，他岂肯虚虚受点骂名，便轻轻把这个安乐窝抛掉吗？你们就骂我睡懒觉也好，说睡懒觉不卫生也好，但是在被窝里是要舒服些。我睡在床上，你们如肯把饭送到我口里来，我怕整天整日也不会爬起床来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便在这儿了！

睡懒觉的人，要吃饭的时候便不能不起床。要推倒军阀呢？当然是要使他们饿饭才行！你们常常把饭送到他口里去，他怎么愿意起床呢？把粮税抗拒一下也好，把市罢一下也好，总之要想解决目前的中国的军阀问题，只有饿的一个字。

饿哟！饿哟！伟矣哉饿哟！俄国的革命自然是列宁弄成功

的，但也有你老先生的功劳呢！① 你老先生也把我赶出安乐窝来了。

上面馆去吃了两碗面，看见街上卖的石膏豆腐花（豆腐酪），不免又垂涎起来。自从一九一三年出省以后，这东西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吃过了。

雪嫩的豆腐酪，红得透明的辣椒油，金黄色的虾米，翡翠般的青葱，加上——童年的记忆，这是多么可口的滋味哟！站着便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们一共吃了五碗。付起账来仅仅一百文钱，我不禁惊愕了一下。但想起童年的情况，已经贵了许多了。

轮船要十点半钟才开。我们把船票都买好了，但离开船还有一个钟头。我们就乐得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地看看江南风物。

昏昏的运河上面，浮着无数的小航船。船上有种着花的，种着菜的，养着鸡的，养着狗的。这种纯粹地以水上为家的生涯，我在四川是从不曾见过。我在日本时，看到日本人惊奇地介绍，我也惊奇了。我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是呈在眼前了。

流浪人！真的要这种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罢？他们没有一定的故乡，没有一定的驻足处，在水上流来流去，那儿黑了便在那儿睡，那儿病了便在那儿死。他们是纯粹的动物性的，没有带丝毫的植物性。他们羡不羡慕那岸上的杨柳哟，那岸上

① 初版本此句为："俄国的革命不是列宁特洛次克弄成功的，是你老先生的功劳呢！"

的杨柳又羡不羡慕他们的生活哟?——不对,我的无聊的诗兴又要发作了。

水是昏浊得不堪,人是纯粹的动物,杨柳是枯槁了的。一篓一篓的黑煤炭压在两人的肩上飞也似的走,飞也似的走……

C指着一个年青的——怕只十四岁光景——担煤的人对我说:“这个人的面孔很清秀,很象我的一位表弟。我的表弟,家里很有钱,现在在中学校读书,每天每天都是由包车送去,包车接回;但这位小朋友却在这儿担炭!”

C说时觉得很有一番感慨的样子,其实他担炭也还不那么担得起呢。担炭的有五六对人,我们数着,别人要担三次后,他才能来回得一次。我们已经很诧异了。到后来才知道他担一次要息一次,中间一次是和一位老人对掉的。老人不消说也是担一次息一次了。

十四岁的童子和六十岁的老人,在运河边上大汗淋漓地担着煤要饭吃!——诗人!你面皮比城墙还厚的诗人,你的饭吃饱了,你立在那儿要做诗么?

自己很想把刚才吃下去的两碗面和几碗豆腐酪一并用手挖出来了。……

“轮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这不就是轮船吗?”

“唉?!”

我上了轮船还在问轮船。原来从无锡到宜兴才是不经过太湖的,我们所乘的“轮船”仅仅是在运河中通行的一对划子。

这种划子，假使不是下江人，恐怕谁也不会有“轮船”的观念罢？一只有蒸气机的在前面拖着，拖着后面的一只坐船。坐船上面也有房舱，也有客舱，也有大餐间，更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坐位叫做烟篷。我起初听说烟篷在船顶上，而且价钱最便宜，便主张买了烟篷票。但谁知走上船来一看，所谓烟篷是坐在船篷上几乎连腰不能伸的一种坐位，头上还顶着一道布篷。象这样的第四阶级实在不敢领教了。于是又才改了房舱。房舱比大餐间还要贵。原来房舱是在船的两侧的，相对的两个木板铺位上只能坐四个人，靠着后壁有一个小小的长台，四只脚是放在两边铺上的。所谓大餐间便在房舱后面，是两个房舱打通了的一个大间，里面铺位多，可以多坐几个人，所以大餐间反比房舱还要便宜了。所谓客舱呢，是在房舱前头的一个通间，比大餐间的坐位更多，所以价钱更便宜了。

我们把烟篷票退了，改坐在元号的房舱里面，我们在这船上算是做了一次元首了。不过这船上的元首实在比中华民国的元首还要不好做。五尺立方的一个房间，立的时候不能抬头，睡的时候又只是两张木板。一个门道只有三尺高，从这门进去还要下几段阶段。这与其说是房间，宁可说是崖洞呢。从这崖洞望出去，所能望见的不过是些衰败的草岸。水是昏得不象样子的，轮船走过时所卷起的潮浪把水里藏着的一些瓦砾的遗尸卷上岸头，又跌落下去。门外的过道还没有一尺宽的光景，烟篷上的先生们时而把两只火腿吊下来，把下衣一揭开，便立在门下小解。很有些明哲保身的，深怕跌下水去，连把一只脚踏在船边上也都不敢，小心翼翼地把背弓着紧紧靠着船壁，

然后洒起杨枝露来。露水刚好洒在船边上，从舱口溅进舱来可以溅在你的脸上。但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不怕你不便的就哇啦你的不便，但是他便的也应该图他自便。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在这儿要谈几句正经话了，我们中国人广行方便的程度，实在有些出人意想之外的。吃的水道下面便是粪坑，睡的枕头旁边便是马桶，东方人的超然物外的精神，真正是超之乎其所不超了！譬如就在这小小的鸭子船上罢，既是大餐间也有，为什么不安放一个尿缸，或者凿一个行云流水的圆洞呢？男的先生们怕得连船边都不敢踏，懒得连向船尾去的几步路都不敢走，他们实在是大便而特便；但是女的娘娘们却怎样呢？我恐怕就有些不便了罢？她们因为有这点不便，或者会至于一天两天也得不便。啊啊，“苦矣”，蹭蹋在烟篷的先生们的屁股底下，在脑筋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这些事，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写下去了。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再写文雅一点罢！

“这船怎走得这样慢呀？到宜兴去究竟要几个钟头？”

“足足要九个钟头。”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

“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呢。”

“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怪不得连动也不见动的一样。”

“已经要比那些木船快得多了。”

“你念过李太白的诗没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①”

“但我也读过，‘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

① 见李白诗《早发白帝城》。

觉鬓成丝'①呢。"

"啊，那是上水船呢，那正形容得四川的下水是很急的。要是下水船，在我们四川的确有一日千里之势。我最初出省的时候从我家乡的乐山县城坐船到重庆，只有三天多点的光景便到了。走旱路是要走十天的。那是大水天，船走起来真是痛快，只见两岸的山和两岸的树在左旋右转着倒退。最有趣味的是船到宜宾的时候，在那儿的城墙东面，金沙江的水从西南流来，跟岷江相汇。岷江的水是青的，金沙江的水是红的。金沙江红得就和鲜血一样，浩浩荡荡地流来，一和岷江相汇，便刀斩斧断地当下消灭了。河面立地浩大起来，岷江的青水浮在上面，金沙江的红水都藏在下面去了。但是青红两水在水面下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水面上才看见是一汪青水，但不一刻便涌出血红的花朵来了，真象在开花的一样，在开千叶牡丹。有声有色地开着，滑啦，滑啦，火火火火火，花花花花花，有声有色地开着，开着。在浩大的河面上起初只开出三五朵，渐渐开大起来，渐渐开多起来，一列一列地，一列一列地增加起来，增加起来。青的水面渐渐要被花开满了，花开满了，花花花花花花……一河都是血花。河风又非常浩大，血河里的漩涡单是直径便有四五尺的光景。我乘的是一只小船，载子又没有十分载平稳，被风横腰一吹，骨噜噜地便落在漩涡里打了一个旋转。刚好出了漩涡，又被风横腰一吹，又骨噜噜地落在别一个漩涡里，又打一个旋转。那种凄怆的状态，煞是怕人！在那儿的岸

---

① 见李白诗《上三峡》。

上，又独于是没有草木的、赤裸的山崖，呈着惨红的肉色，就好象人把皮肤剥了一样。我平生遇过不少的怪事情，都没有那时候的心绪凄惶悲壮呢。这儿的水那里会说得上来哟！”

我大吹而特吹地吹，把C好象骇倒了。他只是圆睁了好几次眼睛。但我在这儿要稍微打一点折扣，这个光景是我十三年前的回忆了，初从乡里出来的人还没有见过世面，因为惊惶过甚，或者有形容失实的地方。总之至少七成总还是有的罢？再要讲价我就不干了。

“已经几点钟了呀？”

“快三点钟了。”

“四，五，六，七，还有四点多钟；怎么办呢？一本书也没有带来。”

“写罢。”

“写什么呢？”

“写小说罢！”

“唔，写写小说。小说是要好写些，一写就跟泻肚子一样，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又来了！但是有甚么办法，我们的头上顶着的是别人家的屁股呢！）”

“那就写罢！”

“写呀！写呀！”

“昨天在往沪宁车站的电车里面。

“有两位年青的姑娘和一位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怕是她

们的妈妈)坐在我的旁边。

“电车是满了员的。

“车过大马路的时候，有位很颓丧的中年男子搭上车来，一挤便挤在年长一点的(有十六七岁光景)姑娘面前站着。

“这位中年男子把头一埋便擤起鼻涕来。不幸，或者是他的大幸，他的鼻涕飞溅到姑娘的衣裳上去了。青绸羊皮袄的脚边上带了一珠，中年男子赶快把手绢拿出来替她揩了。姑娘又把左脚翘起来，绿色的绒线鞋子上又有一珠。中年男子又赶快把一只手去接着她的脚，又用手绢去替她揩了。揩了之后，——啊，完全出人意外！这位中年男子把那张乌黑的手绢立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

“啊，他到底是在揩自己的鼻涕，还是在闻那姑娘脚上的香气呢？

“他到底是通常不爱干净的人，还是有点变态性欲的所谓近代文士呢？——

“我这个疑问无法解决，我只看见那白胖白胖的中年妇人白了中年男子两眼。”

我把那个靠壁的小写字台，取来放在铺位上，拿出我在日本学了十几年的席地而坐的功夫，便在铺位上盘坐起来写了这一篇，——什么呢——不成名器的短品。我做文章的惯病是先做好文章再安题的，我做好了，回头在前面写了“一个疑问”。

当我在写的时候，我看C也在写。他是躺在铺位上，用

铅笔在日记簿上写着的。

两人都没有话说，再写罢！

“朋友们在‘消闲别墅’吃夜饭。

“席终我去小解的时候，只能容一个人的便房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先在了。我只得在门外候缺。先来的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匆匆忙忙地走来了一个人，他不管我是在门外等什么，一手把我拦开，便一手把门柄握着了。我只得又在门外候缺。

“接着又来了一个人，又用同样的态度把我拦开了。这样接连地换了五个人，我看见又有一位穿西装的先生匆匆忙忙地跑来了。哦呀，不得了，我这回不能再讲无抵抗主义了！西装先生一来，我便先挡着他。

“我说里面已经有人，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半天了。

“不知道他是聋子呢还是不懂我的话，他把我一手拦开，不等里面的人出来，便先跑进去等候着了。

“我不禁冒了火，在门外便大声地责骂：

“你们太不讲公德！别人在门外等了半天，你们只图自己的方便！

“这位西装先生却很有点娄师德① 的精神，不怕我在外面就如何的骂，他只悠悠然洒着他的尿，一点也不作声。

“他出门来了，我的气还没有平，我还骂了他几句。

---

① 作者原注：唐朝人，有德量，能容人。

“但这位西装娄师德不唯没有作声，竟连头也不抬，忽忽忙忙地又跑了。

“我自己倒惭愧了起来。

“我觉得我这人真是野蛮，一开口就要把人得罪。

“嗳，象我这样动辄得罪人的人，无怪乎在我们的礼让之邦，要连一个洒尿的机会也得不到了！”

又写了一篇。这安什么题呢？雅致一点的是“如厕”，粗鲁一点呢是“没有洒尿的机会”。不过这样一来便会把人骇倒了。有人说屎尿等字是不可以入文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他们在青天白日之下拉是可以拉，但你在文章上写却不准你写的。为什么呢？是尊敬屎和尿吗？是和怕犯圣讳一样，犯父讳一样，不敢犯它吗？不管！不管！现在连丘二先生也都拉到了粪坑里了！直捷了当些罢，就写“没有洒尿的机会”。

我把题写好了，回头去看C时，他倒在梦见丘二了。他靠在壁上，把拿着铅笔和日记簿的两手叉在胸上，已经颓然地睡去了。他的口是张着的，脸色有几分灰青，我不禁惹起了几分伤感的情趣。

啊，C君哟，你也未免太可怜了！你本是学农的，犯不着要来做什么文人，在中国的现代要做文人，是等于自杀呢！

我想起他这一年来的失业，他在虹口小菜场上替别人做过几个月的店阿大，后来又去为教会的先生们整理过几个月的圣经。在江浙未开火以前他本是要往奉天去就一处农场的

职务的，但不幸江浙开起战来，接着奉直也开起战来，于是他的行期就和中国的统一一样，无期延期了。他要侍奉母亲，要扶助两个妹子，而他却也和我一样在上海市上做了一个无业的流氓。啊，他这半年来恐怕也有些倦于营生了罢？……

啊，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还是写！还是写！

"在上海能够起早的人，总会有这样的经验罢？

"无论在那处的十字街头，只要过往的人多的地方，在一个街角上总有一个卖饭团的人。赭红色的深桶盛着一桶热饭，只要你把铜板给他，他便捏个饭团给你。你如果喜欢吃油条，也可以叫他把油条夹在饭团的心子里。

"在这卖饭团者的旁边，必定还有一个卖臭油豆腐的人。一个铜板两个，他替你盛在碗里，用剪刀剪碎，加上羹汁，再加上佐料。这便是你吃饭团的人的清羹。

"自己的铜板只可以够买饭团的人，买了一个饭团，便捧着一面啃一面走开了。

"有的铜板还有些剩余时，便要围到这油豆腐担上来，吃得非常起劲。

"油豆腐担上大抵还放着一大碗猪皮，煮熟了的。这更是一种盛菜了。

"买了饭团，买了油豆腐，还要想吃点荤菜的人，便要来吃点猪皮子了。

"我刚从日本回家的第三天，那时我还住在二马路①的一

① 今九江路。

家旅馆里面。清早我一个人出去想买点吃的东西，我在石路和四马路① 交叉的地方，在一只街角上便看见了这两种摊贩。

“有一位穿得很褴褛的男子走来，他是黄包车夫，或者工人，我不知道。

“他走到油豆腐担上来，在一碗猪皮子里面，挑选又挑选地选了三点猪皮。

“他问卖油豆腐的人：‘格个几滴盐呀（这个几个钱）？’

“‘四个铜板。’

“‘四个铜板？吃弗起！吃弗起！’

“‘吃不起就拉倒！’

“卖油豆腐的人忙着去应酬别的主顾，说的时候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想吃猪皮的人，把三点猪皮子睁着眼睛看了好几眼，咬紧牙关吞了好几次口水，又才没精打采地走了。

“这儿有一个教训：

“世界上有吃猪肉而不吃猪皮的人，也有想吃猪皮连四个铜板也拿不出的人！”

我这笔就好象上了肥料的大葱一样，只是冲呀，冲呀，不管它好好歹歹总已经又写了一篇《四个铜板》。我素来是文思很迟钝的人，今天是怎么搅起的呢？是谈屎谈尿的太谈多了，真的上了肥料吗？还要想写呢。我昨天清晨想写的东西因为

---

① 今福州路。

事忙还没有写出来，索性在此一道写出罢！以后怕没有时候，以后怕会忘记了。

我这回先写了一个题是“两种人情的滋味”。

“我这回回上海来没有用娘姨了。

“我不用娘姨的原故，并不是在讲什么人道，也不是在讲什么经济。我固然是没有多少钱，但要在上海用人觉得比不用人还要不方便。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上海的娘姨叫‘三珠’。

“我不知道怎么叫做‘三珠’。

“他说：她们初来试用的三天是‘滚盘珠’，见事就做，异常勤快。三天做满了之后把契约一定好了，便成为‘算盘珠’了，你要拨一下，才肯动。再住久一些便要成为‘定盘珠’，你就拨也拨不动了。

“这三珠的经验我去年在上海住过一年，是已经领略过的。不过我的经验还有超出这三珠以外的。她们不肯作事情我觉得还不要紧，最令人伤心的是：你待得她们愈好，她们愈见不好起来。盗窃、轧姘头、引狼入室，无所不为。这岂不是最令人伤心的吗？

“出了钱去买伤心事，我何必做这样的傻子呢？所以我这回回来便想暂且不用娘姨了。内事由我女人料理，外事便归我自己听差。

“昨天清早我往八仙桥去买小菜，我左手拿着一个菜篮，右手拿着一张包单。

“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过十二年的一套学生装，外面套了一件破大衣，我的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鸟打帽也是一九一四年在东京买的。

“小菜平常是隔两天买一次的。这回因为要到宜兴，不得不多买一些。

“我买了两斤猪肉、一匹腌鱼、一棵白菜、两斤白糖，便放在小小的菜篮里。

“我又在一位很慈和的老妈妈面前买了一些塌菇菜、菜苔、芹菜、豌豆苗。买了一大堆，我便请她替我包在包单里。

“她一面包一面向我问道：大师傅，你在啥地方烧饭呀？

“我说：我在环龙路烧饭。

“——你以后要买只大来些个篮，用包袱包会把菜搁坏个。她很亲切地教了我一番。

“我说：好的，我随后要买。

“她把菜包好了，递给我的手里，她还说了一句：好，你明天再来呀。

“我也很自然地答应了一声：好，我明天再来。

“她和我只这样平平淡淡地谈了几句话，但我很感谢她，我觉得她在关心我。她的对于我的一点关心，我觉得是真正的人情的滋味。”

我写到这里，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一位茶房拿了一盏小洋灯下来，放在一只屋角上。这盏洋灯是和邻接的房舱通用的。昏黄的灯光照在室里反觉得更加黑暗。我不想再写了。

C也已经醒来，我把我写的东西送给他看，我希望有些地方可以惹他发笑，但他很严肃地看了一遍，连一笑也没有笑。我觉得我自己是失败了。他把不全的《两种人情的滋味》读了之后，觉得也象玩味了一下子，他又问我：

——你这才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是我把小菜买好之后走到街上去叫黄包车。我叫着一只黄包车问他多少钱？他说要四只角子。平常由八仙桥坐回环龙路是只要八九个铜板的，四只角子照现在的时价算起来该合六十四个铜板了。我哑哑唔唔地说了他一声。他回问我要几个铜板？我说八个。他一减价便跌到十个铜板上来。我更还他九个。在我们正在讲价的时候，另外又有一只黄包车飞也似的跑来了。"啥地方呀？啥地方呀？"他不住地只是问。我说是环龙路。"环龙路十个铜板侬还弗要阁啊！"他抢白了我一句，白视了我两眼，又飞也似的拉着车子跑了。所谓还有一种人情的滋味，便是这一种了。我觉得这位黄包车夫也是在关心我，但他对于我的这种关心，几乎使我流出了眼泪。

——你还是把它继续写下去罢。

——不想再写了。

——你近来很写了些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很喜欢。

——这类东西我以后想多写一点。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甚么美的好花来，但如路旁的

杂草那样，总可以迸发几株罢？遇着别有会心的周茂叔①，他是不会芟夷它的呢。

——你这个态度我很赞成。前几月我在勘校圣经的时候，我看见耶稣有一句话："你要把灯光点在斗上，不要点在斗的下面。"②他这句话，我看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耶稣教徒与非耶稣教徒，都是实地奉行着的。我们中国人，凡为有点光的，谁个不把来点在斗上呢？所以斗下的生活便愈见黑暗了。我想做一篇小说，取名《斗下的灯光》。

——唔，好个有意义的题名，单是这五个字已经是杰作了。

《斗下的灯光》的内容是甚么，C倒还没有说出。在狭隘的斗室中，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对我却另外说出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来。

——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上春，我也正尝着失业的痛苦的时候，在家里闷着怎么也受不过，便向母亲讨了六块钱来，瞒着她说往苏州去散心。我到了苏州便去买了些杂货，如象假金戒指、洋线、花针之类。我另外又买了一套短衫，便装扮成一个行商，到太湖的东洞庭山去。我在山上住了将近一个月；那儿的生活是十分朴素的。那儿有未经跋涉的荒山，有十分雄浑的自然。我靠着卖杂货为生，自昼便往四山去跋涉，晚来

---

① 作者原注：宋人周敦颐，字茂叔，为宋理学之开山祖。

② 见《新约全书》内《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便宿在一家旅店里。旅店的主人只是一位中年妇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最有趣味的还有一位张三。这张三是崇明岛的人，他原是布商，他家里是有妻室的。他在三年前到洞庭山上来卖布，便寄宿在这家旅店里。不久之间他对这旅店的女儿发生了恋爱，他布也不卖了，家也不顾了，每日只是呆在旅店里，承望那女儿的颜色。他在店里住久了，馆账一天一天地堆积起来，把他所有的布都押给老板娘子去了，他还是不想回去。后来他竟替那旅店打起杂来。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挑水是张三，斫柴是张三，烧火是张三，煮饭是张三，挑粪是张三，种土是张三，养猪是张三，割草也是张三。做什么事情都是张三。张三说：他只要在那女儿面前，无论做甚么事情他都快活。但可怜那女儿却不爱他。我在要下山的时候听说那女儿要嫁人了，我还剩下两个假金戒指，我一并送给她去了。

——她怕反而在爱你罢？

我这么问了一声，但C只是笑了一下。他的六块钱的本钱，就在洞庭山上生活了几个礼拜之后，说是回到家里时还剩下了两块。这两块钱他便拿来买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其中一本是《茵梦湖》。他爱《茵梦湖》几乎成了一种怪癖了，从初版买起，一直买到现在，版版都有。他就是从那回游过洞庭山之后，才突然嗜好起文学来。他的《烦恼之网》和其他的作品都是在那回以后才动手写的。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把一天的厌烦都丢到脑后去了。我劝他立刻把那回的事情写出来，他也满高兴地答

应了。我很希望在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中会有一部杰作出现呢！

啊，随处都是绝好的文章的资料！我们中国乡间僻境的国民生活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未经开辟的宝藏。我们中国的新兴的文艺家哟！你们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甚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

宜兴到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点到了。

黑暗，路烂，臭不可堪，这是宜兴给我的第一印象。

下船的地方听说是东门的轮船码头，黑暗中被C引我走过一条狭巷，路是看不见的，皮鞋的下面只觉得滑烂难行。路的两边怕一定有茅房罢？弥天的奇臭哟！

昏昏茫茫地跟着走进城，走进了一家旅店。刚进房门时还有人在床上抽大烟，邻室又有两台马将。我真是有好几分不高兴了。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想来倒不止宜兴是这样罢？

但是哟，那管得这些闲事情！只要有松菌和黄雀吃就好了。——读者诸君，你们怕已忘记了罢？连我自己几乎都忘记了。我们到宜兴来是要调查江浙战事的遗迹，兼带着吃松菌和黄雀的使命的。黄雀是甚么我不知道，松菌我在日本吃过，但是日本的松菌，植物学家说是日本的特产，怎么在我们中国的宜兴也有松菌呢？这是偶尔的同名，还是根本是同类呢？这个问题使我在想吃之外添了一种好奇心。于是乎我们刚好看定了房间，便回头走到一家面馆里去，想吃松菌和黄雀。

面馆门前杀了不少的鸭子，很肥很白的挂着。有两个人围着一个大木盆，盛着热水，很热心地在水里撬鸭子的毛。

C 走进店时开首便问有黄雀没有。

店里人答应说时节已经过了。

又问松菌。松菌也没有了。——啊！失掉了一大半的希望！这松菌假如和日本的是一样，在植物学上不也是小小的一个发见吗？

我们只得叫了两碗面，又叫了两碗蒸鸭的“浇头”——原来宜兴人吃面，无论是鱼是肉都是不放在面里的，另外用小碗盛着，叫着“浇头”。蒸鸭的滋味还不错。我们一面吃着，一面闲谈。我对于松菌总有迷恋难舍的关怀，便先问C 究竟是甚么形状。C说得很模糊，好象和日本的松菌终是两样。——不管是一样也好，是两样也好，我把这个小小的问题寄放在这儿，以后如有到过日本的人又到宜兴来，遇着有松菌吃的时候，在浅斟细嚼之余，请把这个问题来吟味一下罢。说不定还有一位“理学博士”的徽号在等着你呢！

宜兴的吃食店真是多，每十家街店怕有八家是卖食物的，最多的尤其是鸭肉面馆。

——宜兴人是很爱吃的吗？我问着C。

C在未答应我之前，便先叹息起来了。

——嗳，我虽然是宜兴人，但是我对于宜兴人实在是再憎恨没有的。宜兴人还是“人”吗？他们清早起来没有一个钱的事情可做，抱着一个茶壶便上茶楼。在茶楼上当了半天的神仙，接着去上馆子了。酒、面、鸡、鸭，吃得不亦乐乎。我们宜

兴人是定要吃早酒的，全城的人吃蒸鸭每天要吃好几百头。吃了又怎么样呢？上私娼家里去打马将，或者打叶子牌。打了又吃，吃到夜深了，高兴的时候在一二点钟时回家；不高兴的时候便睡在私娼家里。这样便是宜兴人的一天！明天起来又是照样的一遍！嗳！

——这是有钱人的生活，没钱总不会是这样罢？

——仅仅是程度的差异罢了！

——年青的呢？

——嗳，更难说！宜兴人是不讲究读书的。顶好的把中学一弄毕业了，便回家去当少爷。少爷跟着老爷学，抱茶壶，上茶楼，进酒店，嫖私娼，打马将，抽大烟，……这便是少爷的“大学课程”。当不起少爷的呢便当“揪脚”。唉，真丑！真丑！

——甚么叫“揪脚”？

——这是我们宜兴话。我们宜兴人说拉是揪。这种“揪脚”是打不起牌，站在旁边抱膀子的，打牌的人打罢随便赏他点子钱，他也满高兴地又拿去吃喝。这便是我们宜兴人的“揪脚”，我看真是“丑脚”呢！

C说得意外的愤慨，我也很受了意外的感触。宜兴人的精神象这样无形地消颓下去，不比五百倍杨春普① 的兵和白宝山② 的兵的骚扰还要厉害吗？

这儿明明预告着一个剧烈的阶级战争。宜兴人这么好吃，

① 杨春普，字宜斋，天津人。时任江苏陆军第十九师师长。

② 白宝山(1880—1941)，字峻青，河北宁河(今属天津)人。时任江苏陆军第一师师长、淞沪防守总司令。

他们的吃食是从甚么地方取来的呢？宜兴人又这么懒惰，他们的吃食是用甚么方法取来的呢？聪明的读者哟，你们可以知道了。一个阶级吃一个阶级。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田地里劳苦着的农民，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阶级吃食，他们的血汗熬尽了，剩着的枯骨也还要熬出油来，滋润老爷、揪脚们的肠胃呢！这样明白的一个惨祸，最奇怪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便明明有农奴和地主，一般自作的小农，是绝少绝少的。这回我到江南的乡下来跑了一趟，我也增了不少的见闻了。江南人收租我们且把苏州人来做标本罢。大地主收租先挂出一道牌出来，报告甚么时候开仓，甚么时候截止。其实他们开仓，也并不是收米谷，却要收钱。时候截止了，乡里人拿不出钱来，不仅要吃到大利盘剥，还要吃痛苦的肉刑。所以乡里人没法，在开仓之前，无论价钱好歹只赶着把自己收的米谷粜卖。在这时候收买米谷的人是些甚么人呢？不消说是地方上的地主了。他们用便宜的价钱把谷米买来，用高贵的价钱收纳租税，又用高贵的价钱把米谷卖给农人们。就这样有钱的地主层层地剥削乡人，乡人遇着年岁饥荒时，有薄产的只好把自己的薄产拍卖，没有的只好卖自己的女儿——在上海滩上当野鸡的，当娼妓的，在江南地方各大绅士家里当丫头，当小妾的，你们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呀？乡下人一年劳苦到头，挥尽了血汗还不能糊口，只好卖田、卖地、卖女儿！江南地方的农村一天一天地颓败下去的原因，诸君可

以知道了罢？地主们把农民的血汗钱榨取去，但他们除吃除喝之外不做一些儿生产事业，——在外人的经济压迫之下，除吃除喝之外，实在也没有生产事业给你做。江南的各处城市，都带着颓废的灰色的情调，其原因，诸君可以知道了罢？唉，象这样的形势，不仅是限于江南，我恐怕我们全中国都是一样罢？泱泱中国一天一天地沉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呢？

两个人在面馆里吃了一些面，又只得退回旅馆里去了。

C虽然是宜兴人，但他十三岁时随着他母亲、姊妹到了上海，他的故乡便少有来的时候了。这回的战地都在乡下，他也和我一样全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形，我们在当晚只得在城里访了几位他幼年时代的同学。到乡下的路程怎么走法，我们只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原来这回的战线，苏军方面在上海是取攻势，宜兴是取守势。宜兴在太湖的西岸，北接常州。由沪宁铁道直通江宁，南与浙江长兴县接境。浙江欲窥南京，此路最为捷径。浙军第二路的陈乐山① 便担任这一路的进攻，苏军方面由杨春普、傅象泰②、白宝山、陈调元③ 等在此防守。所谓战线便是宜兴东南的蜀山、兰右、凰川、悬脚岭、廿三湾、张渚一带了。

---

① 陈乐山(1884—？)，字耀珊，河南罗山人。时任陆军第四师师长、浙军第二军司令。

② 傅象泰，时任常州警备队第一团团长。

③ 陈调元(1886—1943)，字雪轩，河北安新人。时任江苏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当晚蒙到下榻处来商酌的有C君的父亲①和他的同学H②先生。C君的父亲主张坐船，叫我们先坐船到蜀山，在此过夜。第二天又坐船到兰右，到了兰右便舍舟登岸，踏查悬脚岭、廿三湾等地。最后到张渚，由张渚可以坐船再回宜兴。路程便这样定妥了，所花的日期怕要四天。热心的H先生便允许陪我们到半途，作我们的向导，我们当然是不胜感激的了。

一天半的车船把人弄得都有些疲倦，邻室的马将不知打到了几时，我们早已一枕黑鼾，随着中华大陆消沉下去了。

第三天

清晨我们到素面馆里又去吃了两碗素面。在刚进馆子的时候，堂官开口问我们的不是"要不要酒"，是"要什么酒"。这可见早晨进馆子的人是一定要喝酒的了。在要出馆子的时候，看见两位乡下人进来，两位都没有剪发，一位挽着一个髻子在头上，一位是吊条发辫在背心。他们手里一人拿了一个马口铁的炼乳筒，是自己打好了烧酒拿来的。这么早怕还没有到七点钟罢？空着肚子进城，便要灌那一大筒酒精！啊！这是多么沉痛的现象哟！他们是享乐呢？还是想借酒精的力量来麻醉受榨取的苦痛呢？

时间不早，C引着我在城里看了一会，看了周处斩蛟③处

---

① 即周璟(1864—1928)，字续丹，江苏宜兴人。

② 本篇中的H最初发表时指明为史寒冰。

③ 周处(240—299)，字子隐，西晋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其斩蛟事，见《晋书·周处传》、《世说新语·自新》。

的长桥，又看了C往时的旧家。有些人家的敞厅上正堆着无数的新谷，这时候正是收租的时候了。刚才喝早酒的那两位农人，怕是才送租谷进城来的罢？宜兴人收租不收钱，这比苏州人好得一点。

江南人的房屋和四川有大不相同的地方，便是多用砖土，少用木材。这在四川是恰恰相反。这怕是江南地方少山的原故罢？纯粹的砖屋，又小又黑暗，在我看来怎么也象是坟墓一样。

C在一些"坟墓"当中把我引上了城墙，这江南地方的城墙也没有壮美的观感。四川的城墙大抵是用红石砌成的，决不象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砖块的颓垣。城墙上的砖块已经被人剥削了好几层，城墙也平了。C说："都是有势力的绅士们偷去砌房子去了"。唉，也好，也好，城墙纵横是没用的东西，这些绅士们是很能利用废物呢！

立在城墙上远望，一片昏茫的湖水现在眼前。湖水受着背面朝日的光线，微微带着红色。C告诉我是"西氿"。（这个"氿"字的发音是"求"，我带着的一张地图上误作"仇"字去了。）听说是九条小河汇成的所以叫做"氿"，城东的是"东氿"，城西的是"西氿"，中间贯穿着一道荆溪。湖的彼岸远远现出一带山脉，是铜官山脉。

城墙上有两座新修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一座叫做"建设楼"，一座叫做"五凤楼"，看这些楼的命名已经可以晓得宜兴绅士肚子里的风雅了。

在城墙上走着，C一面指示景物，一面诉说了些幼年的记

忆。他说他幼年时分，城墙下都是些灌木草丛，是他们探险的地点。他们攀着藤蔓可以从城头爬下去，在草木丛中摘取种种的花果。这些草木现在都刬平了，C很是感叹不置。但这感叹和回忆，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我不能分享。在我看来，刬平了也未始没有风味，不过刬平之后只剩着一片荒凉的瓦砾场，这是未免太杀风景了。

从建设楼出城，渡过一道红色的木桥，在桥梁上题着"红桥"二字。C说这道桥本有一段掌故，是明朝一位姓周的甚么人修的。在从前是不敢拆墙的，这位姓周的从自己家里修出一道桥来，越过城墙，一直达到城外，桥的古名本是"虹桥"，后来毁了。这座红木桥是新近修的。

这个真是有趣的逸闻，这"虹桥"偏要改成"红桥"，不怕赤化①！

渡过红桥便是西氿的堤岸，满堤都是瓦砾。瓦砾堆上有些萧条的垂杨。湖畔和濠水中有些枯败的芦草。

渡红桥不远有一座临水的粗俗不堪的小亭，看来是未满一年的新筑，但是楼板已经破落了好几面，楼梯也断折了好几段了，遍地也都是瓦砾。

——这儿打过仗吗？新房子就成了这样！

——啊，那里！还有好看的在后面呢！我们宜兴的绅士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没法弄钱，只好编出些调门来兴土伐木，他们好从中取利。他们的目的那在甚么建设上呢？修的时候

① 初版本中没有"不怕赤化"四字，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七卷时改作今本。

本来是种骗局，修好了又没有人看管，当然会搅成这样的了！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新名词便叫着"新的古迹"。时代变了，目前的人大都以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城墙虽然是古迹，但在宜兴人看来怕也是嫌它旧了，所以要拆毁它，要重新修些新的建筑。但是新的建筑如不破败时又不成其为古迹，所以要它破败。嗟乎，宜兴绅士们的苦心乎！甚么都是有美处存在的，怕这些新的古迹正是近代艺术家所讴歌的"颓废美"罢？

在西氿上望了一回，又从五凤楼折进城，先去参观了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建筑还没有完工，但是木材已经旧了，各垛的窗扇都已零碎，纵横错乱地钉着些篾片和草席。楼板也空了好几处，有几处连横梁都坠了。几只瓦雀从砖壁上的横梁洞里悠悠然地飞进飞出。阶沿依然还是建筑当时的土面，连泥土也还没有面平呢。转到正面去，高大的门楣上挂着一道招牌，是黄炎培① 写的"通俗教育馆"五个字。唔，有了这样一道招牌，已经够了！通俗教育算是表彰够了的，你还要什么呢！门前一位很褴褛的老太婆在洗尿布，旁边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咬一个骨头，墙上有白墨写的字，例如毛字旁边一个非字，毛字旁边一个求字之类——唔，唔，这是通到不可再通，俗到不可再俗的了！走进馆去，有几个水缸，两个席地的铺面，一位中年的女丐在一只角上烧着早饭。唔，唔，这是多么勤苦呀！这位宜兴通俗教育馆的女馆长！

嗳，嗳，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中国的局面，甚么事情

①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

都是糟到十二万分，这是无可讳言的。但就我见闻所及，恐怕再没有比这座通俗教育馆糟得更厉害的罢？这儿并没有打过仗，也没有驻过兵，但在初到这儿来调查兵灾的人，如果没有人为他说明内幕，谁不会连连地骂几声“丘八”呢！丘八，丘八，丘八，我们中国人这两年来万口同声地都痛骂丘八，其实比丘八还厉害的，还有一些丘二、丘三、丘九、丘十呢！中国的事情要搞好，我想还要请丘八来才行！杀！杀！杀！杀！要杀得一个血海横流，我们中国或许还有些儿补救。

把通俗教育馆参观了。C又引我去参观“图书馆”。招牌是蔡元培写的。外观算还整饬得一些，但是大门是严闭着的，掩着的窗门上还加了木条钉紧了。我觉得蔡元培先生好象写了一个别字；这不是“图书馆”，的确是“图书棺”呢！

在这座“棺材”近旁有一座“法藏寺”，C说是他幼时读过书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看见大殿门口坐着一个和尚，把上半身脱得精光的，在太阳光里扪虱。我看他这个态度，正想赞美他几声超然，但这位老秃头，一看见我们便手足失措地连忙把衣裳穿好起来，跨进门阶去便连连撞起钟来了。啊，超度众生！超度众生！我实在想连叫几声佛法来救救我的性命了！

大殿后面依然还有蒙学存在。正是上第一点钟课的时候，一群小学生站在讲堂外边，由一人呼号令整队就坐。接着走出先生来，头上戴着一顶很尖的小帽，青洋缎马褂，竹布长衫，寡白无表情的面孔就和蜡做的人物一样。先生走上教台，只听见“立！”“敬礼！”“坐！”的几声之后，便点了一趟名，先生开讲起来了——

“为甚么要少吃东西。”

先生在黑板上写了这八个字，又拖长声念了一遍。

他的讲义真有趣，我几乎逐字逐句都记得，我现在把它记录下了。

“为甚么呢——是何故也……要呢——是应当也……少呢——是不多也……吃东西呢——是用饮食也……为甚么要少吃东西呢——是何故不应当多用饮食也。”

他逐字讲解了，又来串讲一遍。但我怕他最后的一个“也”字是“耶欤乎哉”的错误罢。——中国文字的好处是写在纸上便认得清爽，不然这“耶欤乎哉”的四个字，假使是从我口里听出来，会听成“噫！愚乎哉”了。这岂不是唐突了大贤？

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在等候我们。H先生、Z① 先生，其余还有几位。Z先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因为江浙战起，暑假归家便没有北上。他也答应和我们同行，并且要陪我们到张渚。新的究竟比旧的好些，这些青年的气象却又不同。

在吃中饭的时候有位蜀山的绅士 P② 先生和湖汊的绅士 L③ 先生来访问我们，两位都是瘾君子，一眼可以看出。这两位先生都是由C君的父亲介绍来的。P先生希望和我们同船到蜀山，并且要陪到湖汊。L先生说早回湖汊去准备着接待我们。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人员奉陪招待，心里真是强了好多。

---

① 本篇中的Z最初发表时指明为杨祖达。

② 本篇中的P最初发表时指明为潘有琴。

③ 本篇中的L最初发表时指明为李士嘉。

C 连连说，这一路假使由别人来调查，一定弄不出一个结果。不消说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果的了。有结果在后头的事情，是多么令人踊跃的呢！

上船的时候是十二点钟，因为准备要在船上睡，便不得不先租了两张被条拿上船去。一只小航船，篷里分作前舱后舱，后舱中摆着一张方桌，面着一床铺位，壁上有两眼小窗，这都是前舱所无的。船开后各人都怕风，前舱口上垂下一张蓝布帘子。这样的船也好，我觉得比名不符实的"轮船"还要好些。

我们同行的一共五人，H、Z、P、C、加上一个我，都聚集在后舱里谈笑起来。

听到蜀山是苏东坡取的名字，我的兴会又添了不少。我们这位老同乡在前原是想在这儿买田卜居的，我才突然记起他的《阳羡帖》来。阳羡就是宜兴的古名呢，辞句都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入荆溪，便意思豁然"① 的两句。我便跑出舱去想领略这"豁然"的风味，依然是昏黄的水，愁郁的天，衰黄的颓岸。我在船头的一个圆石凳上坐了好一会，但我的意思怎么也"豁然"不起来。我觉得我们苏大先生终不愧是位诗人呢。

上船的时候，借了一部《宜兴县志》预备在路上作参考的。翻出了一段苏东坡先生毁契还宅处的记载。这也使我很想去凭吊一下。听说地址在滆湖，不顺路。我想把这件事情来做篇小说，但是地方没有去过，恐怕做不成器了。我只写一

---

① 原文为："船入荆溪，意思豁然。"

个梗概在这儿罢。

“东坡先生看上了阳羡的风景，在滆湖旁边买了一所房子，契约都已经写好了。

“他把契约揣在怀里便出去散步，他在途中遇着一位老妈妈在路旁痛哭。

“他问她：‘你在哭甚么？’

“她说：‘我的儿子不孝，把祖传的家业卖了！现刻没有避风雨的地方，所以不由得不哭。’

“东坡先生又问明了她房屋的地址时，才知道刚好就是他才把契约写好了的那一座。他便从他的身上把契约拿出来当面毁了，还向着那老妈妈说：‘房子依然是你的，我也不要你儿子还钱了。’

“老妈妈的眼泪在眼睛里发起了光来。”

倾谈了一阵大家都倦了，航船走得很迟缓，便把同行的诸人都催入了睡乡。我只得到后面去帮船家摇起橹来。

船家是两夫妇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两人要看儿子，又要摇船，力量又不十分够，船是愈走愈慢了。后面的船一只一只地看看就赶上了我们，前面的船一只一只地又看不见了。这使我起了一种好胜心，我便拚命地帮他们划，也赶上了好两只。

——你先生是外乡人罢？

——是的，我是四川人。

——出门多少年辰了？

——十二三年了。

——回家去过没有呢？

——没有回去过。

——家里有老的么？

——双亲都还在呢。

——啊，不知道在怎样思念你呢，你快回去一趟罢！

——是的，我找了钱就要回去了。

船家的妇人和我谈起话来，以后我接着问她了。

——你们一向生意好么？

——不好呀，吃苦得很呢。

——象你们这样两块钱一天，也不见怎样吃苦罢？

——生意有的时候倒好，但没有生意的时候多着呢。

——打仗的时候你们受了灾难没有？

——我们还好，那时候到镇江去了。

我想从她口中探听些战时的事迹来，但她也说不出甚么来，我也把我那种企图抛弃了。

船到蜀山，镇上已经上了灯火。

P先生招待我们在一家菜馆里吃了晚饭，他和H好象商量了些甚么，我不曾懂得。我只看见P先生取出一张名片来写了些甚么，拿出去找人交付去了。他是要介绍甚么人来吗？但是饭吃过后却不见有人来，P先生又引我们到一家茶店里去吃茶。

菜馆和茶店都是有电灯的，但是点的却是洋灯，听说电线都被军士斫断，电灯泡也多被他们拿去了。——拿去做甚么的呢？——那些蠢如豕鹿的丘八，以为只要有灯泡便可以发光呢。

五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吃茶，其余吃茶的也还不少。在我们的邻桌上，我看见一位穿灰色军装的人和一位年青的女人在那里很欢洽地谈笑。我以为镇上还驻扎着士兵的，但听P先生说明，才知道是本地的保卫团。

茶吃了一杯的光景，P先生点燃一只纸烟，慢慢地谈起话来。他这回是特别向我说的，语调很慢，我听得几乎没有丝毫不懂。

他说："我们这蜀山镇本不在火线上，所以由战争直接所受的损害很少。不过我们这儿是到兰右、到湖汶的必由的要道，前前后后通过了不少的苏军，因此便不免受了些间接的损害。譬如军队到了要办差，要接待，这本是意中事，不过军士们很无纪律，在镇上乡下都不免有掳掠的情形。至关于人的方面呢，被拉夫的很多，被奸淫乃至被奸淫而身死的倒少有听见，因为这种事情别人都讳莫如深，不肯宣扬出来，在外面宣扬的有多少也恐怕不可靠。据人说：商桥地方有兄弟二人同行，遇着拉夫的兵士，便吓得跳河寻死。哥哥的一位熟悉些水性，乐得逃掉了，兄弟被溺死在河里。又听得人说：有位秀才被拉，他说我是秀才呀。兵士说：你今天拉了一天大炮之后，秀才还是还你秀才的。象这样的事情真是专横已极。还有人说：有一位产妇产后刚好七天便被兵士们轮奸了，但不知道的

确不的确。的确的有一件是这镇上的南街的。有一位姓查的寡妇，年纪四十岁了。她的丈夫王景阳已经早死，她自己开了一家杂货店过日，大兵到了，外面风声很紧，镇上的人大都逃走了。只有她想逃又舍不得丢了产业，想不逃又听说兵士们的蛮横，怕失了她的贞节。她想得走头无路，只得闭了门吊死了。”

P 先生娓娓地对我细说了一遍，他的声音是很沉抑的。在茶店里本来是很阴郁的空气中，又听着他说这一番话，听的人大家都很注意，都象有无限的感慨的样子。但我自己总觉得很淡漠。我觉得商桥的兄弟是懦弱得连兔子也还不如的人，他们有胆量跳河寻死，为甚么不回头与兵士们决一死斗呢？秀才被拉夫，也并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令人不平的地方。被拉了后，秀才的的确确还是秀才。骂秀才老爷的那位兵士我倒觉得说破了一个真理。世间上有多少人，稍微有点身份，便甚么苦也不想吃了，须知吃了苦后，身份还是还你身份呀！中国的兵在拉夫的时候能够专拉有身份的人，那吗我们中国就会有希望了。管他大总统也好，大执政也好，大元帅也好，大家来拉拉大炮，恐怕中国不会糟到这步田地，中国的兵也不会糟到这步田地罢？产后七日便被轮奸的产妇假使真果属实时，也要亲自听她的哀诉，才能动人。便是自缢的查寡妇也觉得有些不近人情，她临死时的那种心理从何处听来的呢？我怕她是受了污辱之后，愤而自尽了的罢？假使是这样时，这人倒很贞烈可风了。

P 先生说了好几段逸事，但他最使我感动了的一段是说

到夫子抢食的事情。

他说："阴历八月初七，大桥下到了好几只船是由第五混成旅(陈调元的兵)拉来的夫子。船一靠岸，他们便蜂拥上来，遇着街上有卖食物的便五抢六夺地捞到口里。夫子都是江北人，有些不晓得糟豆腐是甚么的，把糟豆腐抓到手里，问声这是甚么，话还没有落脚，已经塞进口里去了。见茶食的抢茶食，见豆渣的抢豆渣，他们就好象一潮饿鬼，听说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那时候天气又热，他们关在舱里两天，大小便都在舱里拉，身上的臭味真是令人不敢见驾。有的是囚在敞篷船上的，手缚手背剪着，白日受太阳，晚来受夜露，又几天没东西吃，弄得生着病的也很不少。所以船一靠岸，他们便都劫抢起来。"

P 先生一面说，一面还做些手势来形容。在他似乎很有意要说得滑稽一点，但在我听来，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了。蜀山镇上的商家受了这些夫子们的抢劫，我想所损失的总不及他们替丘八老爷办粮台的万分之一罢？这些夫子们也是人，他们受了拉，还要受这样的虐待，要这才真正是多么悲惨的现象！陈涉、吴广们也是秦始皇的时候拉的夫子，他们终竟把天下推翻了。现在的夫子里面，就只有囫吞糟豆腐的人吗？

在茶店里坐了半点钟的光景，P 先生又引着我们出去。他在保卫团的办公处去叫了一位护兵，提起灯笼照着我们前走。镇上的人都在投一些惊讶的眼光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把我们引到甚么地方去的，我只是跟着他们走。

走进一条窄街里，P 先生指着一家闭了门的铺面跟我说，这就是查寡妇的店子了。我看时也很淡漠，实在没有感受一些儿悲哀。

他们还在走，把街道走尽了，走到黑漆一团的旷野里来了，究竟是要往那儿去呢？路旁间或有两三人家由护兵的灯光照耀了出来，墙壁都是用破陶器砌成的。听说有家电影公司到这儿来摄过影片，把这儿的人家作为了贫民窟的标本。

他们正在走，途中还有低低的铁线留存着。P 先生说，这就是战时的军用电线了。

他们还在走。到底是往那儿去的呢？

Orion① 星低低地现在我们的对面。

左手有一团隐然隆起的黑影，听说便是蜀山。

旷野中除同行者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外，甚么声音也没有。风也没有。

走到了一座建筑的门前，P 先生和同行的诸人都把脚步停止着了。我看黑漆的门上有一道横匾，写着“东坡书院”四字。——哦，原来是引我来看名胜的吗？护兵叫了一阵门，叫不开，沿着墙脚绕向后边去了。P 先生却用力把门推开了，我们便跟了进去。

好象是一个薄有树木的中庭，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池子。我们从池上的拱桥走过，走进一道门槽，又是一个天井。上面便是正厅，左壁的侧门里有几位先生迎接了出来。原来这里

---

① 作者原注：猎户星座。

面是一座小学校呢。校长是一位姓R① 的先生，很诚恳地又引我们进侧厅背面的办事室里去。R先生把我请在一把上位的太师椅上坐下。正襟危坐地和我对话起来。我把来意说明了，转向他请教。他谦让不遑地总是不肯说。我说，我们这次来调查，时间本是很匆促的，地方情形不甚熟悉，言语又不通，所以觉得有种种困难。单靠我们自己直接向乡间去探访观察，恐怕挂一漏万。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要地方上的知识阶级帮助我们，或者是个人谈话，或者是私家记述，我们很想多多采纳，以补救我们的不足。R先生也很赞奖了一遍我的这层意思，但他只允许以后记录些出来，他总谦让，一些也不肯说。我看他老先生太拘执了，我就不好再勉强了。

出乎意外的是话到临终的时候，R先生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明天清早对他的小学生们讲演一遍。哦呀，这却把我苦死了！我是最怕上讲台的人，讲演得浅些呢，觉得徒费时间；讲演得深些呢，听的人又怕不懂。我讲演过好几次，便失败过好几次，听的人对于我的话总是听不出趣味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配做戏子的。这回回上海也有一两处要叫我去讲演，但都被我拒绝了。讲演得好，自然可以出一出风头，但讲演得一不好，不免也要在人面前丢一次面子。这也是一种算盘主义，所以我总不高兴在人面前讲演。啊，不料走到蜀山来，竟免不了要遭此一劫！我也学着R先生的谦让不遑，我推说事忙，明天清早一早要上船，无论如何不好承认。R先生只

① 本篇中的R最初发表时指明为姓吕。据周全平《三船记》，此人为吕梅生。

要求讲二三十分钟，最后让价到五分钟，我心里还在作难。同行的几位先生都从旁劝诱，C和H竟私下对我说：这是一种交易，你不讲演，他便没有记录给你。这时候R先生已经退出办公室去了。我也马马虎虎地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

R先生又进室里来的时候，我先向他告辞，同行的人便一同起身，R先生在前面引导着。我以为他是引我们出门回船去的，还向他谦让了好几次。过一次门便谦让一回，最后他竟把我们引到一间楼房来了。啊哈，我到这时候才明白了到东坡书院来的目的。原来P先生在饭馆里写的一张名片便是报告R先生，教他替我们预备下榻处的。殷勤的R先生竟把教职员的铺位让给我们，他们自己去和小学生们同睡去了。啊，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我想起来时的暴谩，连一句搅扰的话也没有说，又想起上楼时的滑稽的推让，不禁有些面热起来。啊，不该使他们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我这场讲演无论如何是免不掉的了。没有法子，只好准备一些。

楼上共总有四尊床，刚好够我们四人的下榻。P先生自行回他家里去了。楼的前面是一带门窗，窗下陈着两条长桌。壁上贴着许多课程表和成绩表之类。我要预备讲演的腹稿了，但不知道讲演甚么的好。我自己又一本书也没有带来，我究竟讲甚么的好呢？长桌上放着一些书籍，我在洋油灯下去检看那些书籍时，发现两本《辞源》，几册《教育杂志》，还有好几本创造社的书。我的《女神》、《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都在，有半年的《创造周报》（自二十七号至五十二号的）已订成素朴的洋装了。

找不出一个东西可以做我讲演的材料的，我心里着实有些着急。到底讲甚么好呢？想讲些文学，但是向着小学生怎么好讲文学呢？想找点苏东坡的逸事来讲，但搜索了一阵枯肠，除去“毁契还宅”的一件事情而外，甚么也不记得。我心里着实有些不安起来，好象当学生的时候明天便要受试验的一样。

——啊，我感谢你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我感谢你达尔文① 先生！

我在房中步来步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回忆起“为甚么要少吃东西”的那段讲义来，更联想到达尔文先生的一段逸事。

——啊，我感谢法藏寺内的蜡人先生！我感谢你达尔文先生！

我的讲演的题目定了，便是“达尔文先生的一个逸事”。要讲达尔文，至少达尔文是生在那一年，死在那一年的，也应该说一说才行。但我自己连自己的生庚年月也还记不甚清楚的人，怎样能够记得达尔文的年谱呢？但在这儿很感谢编纂《辞源》的诸位先生。我在《辞源》上翻了一下，查出达尔文是生在一千八百零九年，死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的。除此之外我还查出了他是以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周游世界，研究了赤道上的生物，以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折回英伦的。他的《种原论》是出版于一千八百五十六年② 。

① 达尔文(C. R.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旅行日记》等。

② 《种原论》，通译为《物种起源》。一八五六年达尔文开始将其进化论及自然选择学说形诸文字，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物种起源》出版。

——啊，单是这几个数字也可以翻出一篇大文章了！

如是如是，这般这般，我的讲演的腹稿便随着我入了睡乡。①

一觉醒来，已经是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了。相隔已经整整三年。三年前的旧事已经渺渺茫茫了，不消说我这文章是不能再续下去的，但我想也没有再续下去的必要。往年军阀私斗的宜兴，而今已经成为农民革命军的战场。假使我是有再到宜兴的机会时，这新的战痕倒很值得我来纪述。这篇到宜兴去的纪行文，就尽它这样成一座未完成的塔罢。不过我在这儿应该要加一点注解的，就是达尔文的那段逸话。

外国人在午后三点钟的时候，照例是要用茶点的。

达尔文家里请了一位新的女仆，到了要用茶点的时候，走进达尔文的书斋里去，只见达尔文先生一面敲着书案，一面口中念着：

---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正文到此结束。另有附语，全文如下：

"沫若先生的《到宜兴去》，只做到第三天为止。我相信读者诸君，一定很想窥她全豹，希望再看下文。所以记者特别写信给他，请他继续寄稿。但他的回信，是如此如此。

"……《到宜兴去》实在不能再写下去了，印象模糊，校课又忙了起来，实在没有时候再写。好在第四天以后的事情已经有周全平君的宜兴调查报告和我的《一位军神》，都在《战痕》中，我觉得也无再写下去的必要了。假使嫌其没有落脚时，就请老兄将我这封信接上去做个尾巴罢。……

十四，十，六，记者。"

收入初版本时，作者将附语删去，增加"1927，11，20作者补记"。

"Don't you eat cake! Don't you eat cake! ……"

(你不准吃点心！你不准吃点心！……)

用我们东方的话来形容时，就好象和尚在念经的一样。这把那女仆骇倒了，匆匆忙忙地跑去报告达尔文的夫人，说：

——"先生疯了！先生疯了！"

这把达尔文夫人也骇倒了，匆匆忙忙地跑到书斋来一看，达尔文先生还是在那儿念经。达尔文夫人不禁大笑起来。她把女仆的误报向达尔文说了的时候，达尔文也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达尔文先生是有胃肠病的，凡有胃肠病的人最忌吃点心，然而也最喜吃点心。达尔文先生自己克抑着自己，所以每到用茶点的时候，他要给自己一个警戒。

这是一段很好的克己的修身讲话——我在这儿用了这"修身讲话"四个字，朋友们，你们不要把这段逸事忽略了罢。这虽然是小小的一段逸事，但它的关系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他五十以后才发表出来的。假使达尔文没有这么坚苦的克己功夫，他不幸在五十以前便短命而死，我想，世界文化在进展上是要受影响的罢？

我觉得在这儿应该追补的就只有这一点。其他和这篇文章有关系的，有C君的《箬船》(将来或许要编成一小册子的)和我下面的《尚儒村》一篇。

1927.11.20，作者补记

尚　儒　村

去年十二月初一发起调查江浙战祸的时候，我同C①担任了调查宜兴的一路，所有的调查报告已经由C写出，用不着我再来费事了。

我们在宜兴，前后算费了一礼拜期间！所有宜兴乡下、太湖沿岸的战地大都踏查过了。奸淫掳掠的传闻，焚毁杀戮的遗迹，凡经我们探听得来，或实地查访过的，本也书不胜书。不过我要说一句天理良心的话：我在调查期中，除去认真地起过一次悲感之外，我对于这些所谓"江南的惨祸"，实在是淡然漠然的。我所以这样淡漠的原因，诸君，你们暂且不忙骂我是冷血动物罢！这样的战祸，自从民国以来，已是司空见惯，原不限于江南；而酿成这种战祸患原因，并且一多半是应该归罪于我们国民自己。我们中国现有军阀和他们的牙爪，不消说是禽兽不如，罪恶通天的，但他们不同一是中国人吗？我们全体的中国人，把军人的一部分除开了的，又是怎么样呢？兵队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上海《孤军》第二卷临时增刊《战痕——甲子苏祸记》，题为《一位军神（随笔）》，收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水平线下》时，改作今题。

① 初版本为"全平"。

了，有钱的请外人的红十字会来贴张保护的封条，没有钱的便趁火抢劫；兵队走了，又要到邻县或者邻村去蹂躏去了的时候，大家又放些花炮来送行。好象邻人的悲哀是值得他们恭贺的样子啊。南翔和真如等地，被齐燮元的大兵烧掠殆尽的时候，南京城的绅士不是正在准备着替大帅办凯旋会吗？

有这样的国民，有这样的军队，所酿出来的野蛮的成绩，本是在谁的意想中也能预料得出的。对于意想中所能预料的事体，谁个还会起甚么特别的感触呢？

不过我说我认真起过一次悲感的，那的确也是一个例外。

是十二月初五了。我们从湖汊走到悬脚岭去，翻过悬脚岭便是浙江的长兴地界了。

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隘口名叫东川界，那在古时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从那隘口下去便是长兴的尚儒村。全村不上一百家人，四围都是山，村子就恰好在锅底里的一样。一望都是竹林，但那几万株的竹林，几乎每根每根都中了枪弹，有的拦腰折断，有的断了头，有的穿了孔。路旁间或是些乔木，身上的弹眼无虑在一百以上。我们那天上午走到这尚儒村来，蒙一位从前在南京建业大学读过书的王家翰君招待我们在他家里。他的叔父①，一位很诚朴的乡先生，向我们说出了这么一段往事。

他说：他们村上是八月十二开火的，足足打了九天。浙军是十八退的兵，四山的苏军不敢下山来，还空放了炮弹两天

① 即王勋臣。

两夜。

在他们村上浙军只有一营人，四山的苏军无虑有一万以上的，以这样众寡不敌的势子，两方在这儿支持了许久。开火以后苏军的子弹真个是象下雨一样，昼夜都不停。但是所打死的浙军呢还不上十个人！连受伤的还不上二十个！就在这阵亡了的军士里面可惜死了一位薛连长①了。那是十八的一天，浙军已经退了，薛连长带了他手下的兄弟也退到了五里路外的张坞，但他又折转了来。因为村上的人还有多少没有退尽，他要来劝他们火速退，他要来做最后的殿军，保护退出村的百姓。——

王老先生说到这些地方，就好象要流眼泪的样子，我以下直接用他自己的话罢。他说：

“你看，这是怎样的一位好人！这在现在的军人中也就是难得的，况且还是在火线上的呢。可惜老天爷不开眼，端端这样有良心的反要丢命！他到村上来，挨家挨户地劝我们，叫我们赶快逃，赶快逃，他说：我们没有法子，奉了长官的命令，只好撤退了。我们一退，苏军一定要下山来的，那你们百姓就要吃大亏了。他这样家家去劝人，有时候作起揖来奉劝，但那晓得他在村上走着的时候，一个流弹打来，便打穿了他的胸膛呢！……”

王老先生极诚恳地，一面说，一面形容，他说得湿嗡嗡地含着眼泪，我也听得湿嗡嗡地含着眼泪。

---

① 即薛振兴(1886—1924)，直隶(今河北)人。时任步兵第四师第十三团第三营第三连连长。

的确的，这真正是一位好人，一位出乎意外的好人，我们谁都异口同声地斥骂军人的横暴，军人的野蛮，但谁知在万恶的军人中却才有这样的一位连长呢？

这位连长的坟还埋在尚儒村上，我请王家翰君作向导，去吊望了一回。一片萧条的竹林之中，一抔新垒的黄土，碑记也没有，甚么也没有。我立在他的墓前，禁不着把帽子脱下，把头低了半天。

朔风萧骚，
我来吊英雄之墓，
芒鞋穿过竹林，
远望见一抔黄土，
令我伤神。

听乡老话战事当时，
尚儒村的四山
布满了江苏的兵士，
江苏的兵士
多比那四山的松枝，
激战的辰光
真真是弹流如雨。

今日我来目睹战场，
无虑有数万株的竹木，

株株有无数的弹伤，
或则劈头断折，
或则拦腰穿贯。
更可怜路旁的乔木，
竟不止身吞百弹。
啊！少数的浙军，
在此竟支持月余，
伤者仅及廿人，
死者不盈十指。
这是浙军的勇战可嘉？
还是苏军的猛攻仅同儿戏？

八月十八日的清晨，
浙军接到了退师的命令，
全部的兵士已经退出了尚儒，
尚儒村的居民也将次第退尽。
在那时听说你也退到张坞，
但你又折回了尚儒。
你关心着村民的死生，
你要来尽最后的保护。

你走到一家的门前，
向着尚未逃避的人们奉劝，
你说："我们是奉了长官的命令，

不能不火速退兵，
我们退了，苏军定要下来，
你们也快请退呀，
快向四方去逃命！”

你带领着手兵几个，
尽在那惨淡的村上巡逻。
但谁知一个无情的流弹飞来.
竟打穿了你的心窝！

啊！你是一个模范的军人，
竟如此为匪兵击死！
你死在这僻远山间，
有谁人知道你的勇义？
啊！但是呀，你怕也不求人知！
你求的不是功名，
你求的是不欺自己！
你自己是求仁得仁，
你自己是虽死不死！

这位薛连长名叫振兴，不知他是山东人还是直隶人，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他有妻子还寄居在湖州，听说将来要搬远他的尸骨回去。

尚儒村里的人说：即使他的妻子就不来，他们也要替他改

修墓表，还要替他建筑祠堂。

就这样，我们这位义勇的连长，快要被尚儒村人神化了。

是的，他就受了神化也没有愧色。

1925年4月14日①

---

① 最初发表时，写作时间署四月一日。

百合与番茄

上

朋友C君①又有信来了。

“我现在真变为了一个市侩。我为生活关系，不能不就一职业，而此职业之名目，乃是东大农场的营业主任——其实好听些说叫主任，直说便是店里的阿大。并且现在店还未开，筹备就绪时，大概要在一月以后。

这两天我几乎每时都想到哈同路②来，无奈这阿大的责任非常繁琐，竟抽不出空。并且我前次要写的一篇小说，只写了七页，也就不能继续了。又细碎、又麻烦的事件，每日每时都堆在身上，要待我处理。这处理，好象楚项羽穿绣花针，当然是心焦而不易见效的了。

我住在吴淞路益寿里一四九一号。同住在上海，应当可以天天见面了，然而不能，至少要等五十天，店务已经顺手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至十六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三十至三十二号。

① 指周全平。

② 今铜仁路。

能抽出我自己。

仿吾这两天住在家中吗？我极想着看他。……”

这封信是初二的晚上到的，我得到信后，便想立刻去访他，但恐怕夜间不容易找着他的住所，我只得暂时遏勒着了。

回溯起来，怕是三月以前的事罢？有一天晚上，我接过一封很重实的挂号信，开封看时，是一篇创作的投稿。我自从从事于文笔以来，所得的外来函件，无虑日有四五次，外界的出版物虽也是雨后的春笋般的畅发，但我总觉得身之内外，真是非常的寂寥。我当夜把那篇创作读了之后，我这个沙漠中飘泊着的骆驼，突然在自己的眼前发现了一株青翠的树影。我的乐意便立刻嗾使了我写了一封信去回复——可以说是感谢。这便是我和C君两人的交际史的第一页。自此以后，他陆续寄了许多创作的稿子给我，寄了许多信给我，我从这些礼物中，得知他的性格，得知他的生涯，得知他只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是从一个农业学校毕业。他起初很久失业，后来他的信是从浦东寄来，他在浦东的东大农场觅得了一个小小的啖饭地了。

双十节后第四日的午后，我正和一位新从东京回来的朋友谈说地震的情形时，门环一响又进来一位新客：中等的身材，穿的是西装，戴的是鸟打帽，脸是赭黑色的，上唇微微有几分反上，眼里含着一双黝黑而灵活的眸子，步武之间微耸着肩头带有几分健气。我一眼看时以为是日本人了。他走进室里和我握手的时候，才说便是C君，我的惊喜完全出乎意外。

——“C君，这位是才从东京回来的F君。”

——“日本这回地震真是亘古未闻了。”C君开首这么说。

我说：“刚才F君在说，地震剧烈的时候，他在街上连脚步都不能站稳，只能在地上爬，看着看着，地面便崩裂了，房屋便倒坍了，四处都是火灾。他们好几天没有吃饭。”

C君说：“我们中国人受害的还不很多吗？”

F君说：“受害是难免的，现在可还没有确实的调查。最可怕的是地震后日本人虐杀朝鲜人，连我们中国人也免不了他们的狂怒。我们中国学生都不敢出街，我自己就受了好几次的危险。”

——“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象朝鲜人吗？还有别的原故呢？”

——“相象是最大的原因，因为当时有一种谣传，说地震时的火灾都是朝鲜人和共产主义者放的火。日本的甚么青年团、甚么自警团，简直成了狂犬一样。朝鲜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劳动者① 也死的不少。我亲眼看见有一群日本的劳动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两三名警察护送到甚么地方去拘留，路上遇着一队青年团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便把一大群的劳动者打死在地上。”

——“这真是惨无人道！我们中国的富翁有多少榨取来的剩余的汗血钱去救济一些狂人，倒不如买些香帛来烧化给这些惨死的亡魂了。”

C君回头又问仿吾在不在家，我说：“因为他有一位胞兄到了上海，他这几天都要往旅馆里去，说不定晚上会回来。”

---

① 日语，即工人。

C君说他隔两天要回他的南翔乡下去，他此次来上海，是因为农场方面派他担任营业部的事情，要在虹口找房子。大约十一月初旬他便可以来上海，我们便可以长聚了。他因为在四点钟前要到徐家汇去看他一位在女塾读书的妹子，我们还谈了些其他的事，约定明日再会的时期，便匆匆告别了。F君也是同C君一道辞去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他第二天来时，与仿吾两人对饮倾谈的情状。仿吾是木讷寡言笑的人，但当他一饮了酒，微微有些醉意的时候，他的谈吐如同开了闸的流泉，他的笑容就好象一枝洋烛的颓蜡一样，几乎把全身都要溶化下去。他们谈到文艺，谈到婚姻问题，从中饭时分谈到上了电灯，从中饭时分也一直饮到开了晚饭，他们还在手不停杯，口不停谈，足足把一大瓶三星牌的白兰地喝完了。我看他们也的确是很有醉意了。

仿吾他本是婚姻的失意者。他从小时便定了婚，在日本留学的十几年中时常为这件事情苦恼。但他前年回国后毅然把婚离了。听说他的未婚妻不久也就病死了，他至今也还隐含着一段悲哀，我们读过他《海上的悲歌》① 一诗的人，大概可以窥破他的心境的。最可笑的是他有一次把英国诗人道村（Ernest Dowson）② 的《Vain Hope》翻译了（便是《创造日》上的《无望的希望》③），他的诗稿上只写了一个标题，没有写明是从甚么

---

① 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② 道村(E. Dowson，1867—1900)，又译道生、道森，英国诗人。著有《诗集》、《装饰》等。

③ 载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上海《创造日》第十九期。

人译出的。我因为诗中的悲情和他自己的身份太相近了，有一天清早我发现了他的译稿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他自己做的。我也很感伤地做了一诗来和他。我的诗是：

读了我友人的《无望的希望》，
令我内心之中感受着无限的凄凉，
他说，虽是百合花的花时过了，
他要追求个幻美的处子，走去跪在脚旁，
不过他说这样的希望呀，
终只是无望的希望。

我也怀抱过这样的希望迷离，
我也追求过百合花的处子；
可如今她的花时过了，
只剩着一片片的根瓣参差，
我只如蚁地跪在她的脚旁，
永替她运积沙泥。

啊，百合花的花时过了，
薰风吹不破这寂寥的荒郊。
朋友呀，我们原只是一样的悲哀，
虽则是两样的情调。
你好在还有无望的希望萦怀，
我只得运积沙泥到老。

我把这首诗做好了，把给仿吾看时，惹得他好笑。他说明了他的是译稿，连我自己也好笑起来。——这么一场悲喜剧，时常是我们之间的一粒笑种。我们一提起来，总要笑得不亦乐乎。

C君当晚也说他自己是失恋的人。他有一篇小说：叙述一位老人在年青时候眷念一位身份不相同的女友。他在一次圣诞节的晚上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恋人，但他终不敢付邮，只永远藏在自己的匣子里；一直独身到老。每到圣诞节，他便把那封旧信取出，私自念着，沉没在一个美妙的幻想里。他这小说的内容便是他自己的已往的前尘和将来的后路。他说：他有一姐一妹和他一样，是矢志独身的。他有一位哥哥便因为结婚的失意，永远在四方流浪，周年四季，总不知道他的踪迹。但一到年底，他又飘然回家，和父母团年。新年一过，他又出去放浪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是小时定了婚，但这未婚妻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既无知识，又不肯向学。他的兄弟困于父母的情面又不能离婚，打算采取不解决的解决办法，永远不举行婚礼了。

听了他的这些话，只觉得触着了自己身上的痛疮。我自己是无话可说的人，我看见仿吾眯着两个醉眼竭力向C君劝说，要他早早替他兄弟和未婚的弟妻设法，要快刀斩乱麻，免得使有望的青年因此颓丧了锐气，免得他们到老来永受痛苦。仿吾的话是非常在理，但是在仿吾不幸的幸处，他是幼年丧失了父母的人，所以他的快刀比较容易把乱麻斩断，而他自己尚还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悲哀。说到有父有母的人，情节又是两样了。啊，旧礼制的消除，一半要在老人们自己的觉悟，为父母的人

想来没有不爱自己的儿女的，何苦为虚荣俗议的顾虑，而坐视自己的儿女永受炮烙之刑呢？

他两人喝得都有几分不能支持了。已经到了八点钟，C君还在说在四点钟前要到徐家汇去看妹子，因为他昨天没有去成。

隔了五天光景，C君又来访问。他是才从南翔来，立刻又要过浦东去的。他说那夜回寓后吐了一夜，回家更睡了两天，想写的两篇小说终竟没有写成。他赶着要过浦东，谈不多时就告辞起身了。走时，他还申说十一月初旬一定可以来沪，我们可以长聚。

中

十一月初旬他果然来了，但他信上说至少要五十天以后才能和我们见面。这怎能忍耐呢？所以我接了他的信后便想立地去看他，但我终怕在上海找路。向上海人问路就好象向菩萨求灵，他们有的全然不顾，有的还故意把你向错的方向引去。况且又在夜间，所以我也只得遏勒着等待明天了。

从哈同路上车一直坐到北四川路，在老靶子路①附近下了车。我不知道吴淞路在甚么方向，我下车的原因实在是伊文思书店引诱了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书店渔猎”是学生

① 今武进路和天目东路。

间顶有趣的一种风习。下课没事便走到新旧书店里去徘徊，不一定是要买甚么书，只是如象女人们游公园，上海人上游戏场一样，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在书店里巡览书籍，或者翻翻目录，遇着有好书的时候，有钱时便买它一本，没钱时便立着读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书。无拘束的精神，如象入了panorama① 的画室一样。才看见阿拉伯的队商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见探险家在北冰洋上探险；才看见罗马军队入了埃及的首都开罗，逼死了绝世的美女王Creopatra②，又看见太空中无数的星云在构成新星系统；人体的细胞在和细菌作战的时候，火星的人类又在策划侵略地球；Fichte③ 才在草告德意志国民的书，爱因斯坦已经在向日本人讲述相对论了④；Pompeii⑤ 的居民在火山未爆发以前正在戏场中看戏的时候，赤色军已经占领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大革命……一切实际的或非实际的，有形的或无形的，旷古的或未来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开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时而兴奋，时而达观，时而悲，时而喜，时而憎怒，时而爱慕，时而冷笑，时而自惭，时而成为科学家，

---

① 作者原注：活动画景的意思。

② Creopatra，通译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剧中人物，为埃及女王，罗马凯撒大将率军攻入开罗后，自杀身死。

③ 作者原注：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通译费希特，著有《知识学》、《对德意志人的讲演集》等。——注释者）

④ 爱因斯坦(A. Einstein，1879—1955)，生于德国，一九三三年受纳粹政权迫害，入美国籍。理论物理学家。一九二二年曾应邀赴日在东京等地讲演。著有《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广义相对论基础》等。

⑤ 作者原注：译名庞贝，被火山灰埋掉的意大利古都。

时而成为哲学家，时而成为诗人，时而成为志士。——超绝时空的灵魂的冒险，情绪的交响曲。——

但我回到上海来已经半年，上海的大小书店于我只是些破纸篓，把我的渔猎消遣久已消灭了。伊文思书店虽然我知道他的西书颇多，但我因为路远，竟连一次也还不曾来过。在电车上突然发现了伊文思的招牌，我的渔猎欲便促着我下了车。我跨进书店去，想享受我半年以来久已忘却了的一种快乐。我刚进书店里在一处书栏前立定，一位西崽便突然跑到我面前来问我想买甚么书。我说："你等我看一看再说。"他两只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会，又走向别处去了，但眼睛总是在挂着我。哈哈，你把我当成了孱手！我这天穿的衣裳是我在日本穿了十年的一套哔叽学生装，上面套了一件前年在上海缝的十二块钱的雨衣。穿这样装束的人要进西书局，怕是僭分了罢？我心中虽然感受着隐隐的不平，感受着受了侮辱，但是我也佩服我们做西崽的同胞，毕竟能忠于职守如此。

其实我有一种倾向，很有难于在太阳光中对人说出的苦处。我走入书局，有时每要冒犯一次道德上的危险。——更说明白些罢！我有时每要起一次偷盗的心肠！这书是好，但是价钱太贵了，索性把它拿回去罢！已经插在书架上的书又取在手中了。强盗！强盗！心脏跳动起来，脸上只是无端地发热。左右一顾，世界好象更暗淡了些。甚么！眼前的这一些书籍不都是一些赃物吗？艺术家、思想家把他们的心血凝成结晶，就如象大自然把蒸气凝成雨露，把光云凝成星球，这是万汇所得共有，万汇所得分受。资本家在贫苦人的身上榨取

些血汗做成了面包去，把他们换了，回头又在我们的身上来榨取面包。甚么！我何尝是强盗！这是我们应该共有的！这是我们应该分受的！我们向作者致谢就够了，我们向排印的工人致谢，向装订的工人致谢就够了，我们为甚么要向资本家低头，要另外把血汗钱向他们孝敬？书是写来供人读的，而资本家把它抢去藏在书橱里。路是造来供人走的，而山寨的霸王把它占去要人过路的金银。书贾们才是强盗。我们是应该偷的，我们是应该偷的，我们不是偷，是把强盗的赃物夺回公有。……赃物握在手中，自己对于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心总是跳动不宁，脸总是发烧不止，周围的书籍中都好象睁出了人的眼睛，房屋都象要倒了，四壁都向人逼来。……没有法子只得把书插回原处。啊，究竟是良心的裁制厉害！——其实这何尝是良心呢？习惯罢了！豢养罢了！鹰犬的爪牙能搏能噬，原是它们的本性，但受人们豢养而为人们狩山守夜。我们是太受资本制度豢养惯了，国家严制法律以御盗，我们妄造良心以自防为盗，不都是受惯了资本家们的豢养，只在为他们保全安富尊荣吗？……但是，豢养惯了的，是不能翱翔的了。立在书架前，就好象一只落水鸡，抖一抖羽毛，又只得跛行而他去。

我这种倾向不知道苦过我多少回，假使我的教养（说高尚些）如不足时，我怕早在缧绁之中吃过好几回稀饭了。其实认真想来，缧绁中的吃稀饭的人不惟不是歹人，而且才是真正的人类。因为他们的人为的作伪少，所以一般的伪人便说他们是强盗了。请到北四川路的火车站上去看那张贴出的掱手们的照片罢，犯罪的次数愈多，面部的表情愈真率。他们是天

国中的老虎与狮子的朋友。人是不怕偷，只怕不肯授。有钱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在伊文思书店中忍着气巡视了一回，可怜我强盗倾向终竟抬不起头来。白白出去好象敷衍不过，随便问了两本书：

——“Yeats的《Ideas of Good and Evil》①有没有？”

——“……没有。”

——“Nietzsche 的《Ecce Homo》②（音读如‘也克火磨’）呢？”

——“唉，口磨？……当然没有。”

哈哈，当然没有！连这两种我自己书橱里也有的书你们都不知道时，你忠于职守的西崽哟！对不住你的洋主人，你们的书店在我看来仍然是破纸篓呢！我好象凯旋将军一样雄纠纠地推开了大门出去。

下

从老靶子路向东走去，穿出了一条大街，我发现了吴淞路三个字，我真是快活。我只不知道益寿里在那里了。问了许多人，有的只摇摇头，有的只叫我南走。我从靶子路一直走到小菜场，每处巷口的名字我都看了，但总寻不到益寿里三字。幸好吴淞路还长，我的希望还不至于立刻便断。但是我已早

---

① 作者原注：爱尔兰诗人叶慈的《善恶的观念》。〔叶慈（W.B.Yeats，1865—1939），又译叶芝，著有《心愿之乡》、《盘旋的楼梯》等。——注释者〕

② 作者原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这个人》（自传）。

早起了一个决心，如再要走至苏州河岸我都找不出时，我只好乘静安寺路的电车回去了。吴淞路快要走完了，在西首走着时，我突然看见一家门牌是一五二〇号，我知道目的地已在附近，就好象漫漫长夜中听见了一声鸡鸣。啊，真不容易。我早晓得这益寿里就在外白渡桥近处，我犯不着去多走一大圈的枉路了。退走几步，果然发见了一个巷口，一家成衣店挂了许多洋服的招牌，把巷口遮住了。再向街心走几步去看时，正是益寿里的南衖。

啊，益寿里！你把我的寿命倒缩短了半日的辰光了，你这肮脏的程度，真有点象耶路撒冷的不净门。你自己的寿命或许可以多添些，你里面不是有不改其乐的贤者吗？

找到一九五一号①了。矮矮的门楣，高我不过两尺。门面的黑漆已经变成黑灰。铜环好象是铁制的一样。啊，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丁，丁，丁，里面走出了一个中年的人。

——"C先生住在这儿吗？"

——"是。"他请我进去。

两楼两底的楼房，正堂上堆着一大堆洋芋。走进楼房，一间长条房间，里面足足安了七张铺位。当门一张饭桌，四条长凳，我便在这长凳的一只上坐着。中年人叫茶房去叫C君，退回房中在前首窗下和另外一个年纪稍老的人谈论些甚么去了。默默地坐在室中，我瞥见了两只马桶。我不知C君睡的是那一尊铺位，但是破旧的程度七尊都仿佛相等，我自己不觉

① 此处门牌号码与本文开头C君来信所说"吴淞路益寿里一四九一号"不一致，疑有误。

惭愧了起来，我身上的衣裳好象还太穿好了的一样。

五分钟光景之后，我和C君同路往小菜场去。

小菜场上沿着文监师路① 一面第七个弓形门下有个菜摊，那便是C君的圣坛了。几个浅浅的竹篮放在绿色的木架上，红肥的番茄、苍嫩的莴苣、紫色的芜菁、粉蓝的花菜……我好象看见一幅 Cézanne② 的静物画。

C君之外还有两位助手，他们都笑容可掬地表示欢迎。

C君张着两臂说道："你可照顾我买些甚么吗？"

我顶欢喜吃番茄，我便买了两磅。我照他说的价钱给了，我却怕他徇情亏了他的农场——啊！这种公平的交易，这种尊贵的感情，我自有生以来只算有了这么一次！……小菜场…… Utopia③……

——"番茄准备几时吃呢？"

——"就在今晚吃，你能不能来？"

——"好，我五点钟光景来，账目等夜里结算。"

——"那吗，我好再买一瓶白兰地等你。"

不见面时急于想一见，见了面其实也并没有甚么事情。有人要说我有点孩子气，我是甘受的。

另外还买了些莴苣、两匹铜盆鱼，C君把我送到苏州河畔，我便乘上了三等车回来。默坐在车中，沉没在感兴的陶醉

---

① 今塘沽路。

② 作者原注：Cézanne(1839—1906)，法国画家。(通译塞尚，画有《女浴者》、《石膏爱神像》、《圣维多利亚山》等。——注释者)

③ 作者原注：即乌托邦。

里，我眼前的世界好象都蒙了一片玻璃。C君啊，我感谢你，使我今日的生活这么充实了。

我知道以服贱役为可耻的人，或者会鄙夷不屑你；

以服贱役为可愤的人，或者可为你做出一篇骂世的长文；

以服贱役为可悲的人，或者可为你流些伤感的眼泪；

以服贱役为可惜的人，或者可为你谋一相当的位置。

但是，C君啊，请你恕我！我总觉得你只这么就好了。只这么做一辈子的店阿大，不要更事他求。劳动是最神圣的！

打草鞋的不是庄周吗①？

磨镜片的不是Spinoza吗？②……

车过外白渡桥的时候，瞥见黄浦江中的浊流，洗涤在皎洁的秋阳光里，隐隐也带着几分内省的情调了。

1923年12月4日夜

---

① 事见《庄子·列御寇》。

② Spinoza（斯宾诺莎）本为犹太人，因反对犹太教教义被开除教籍，后曾以磨制镜片为生。

原 版 序 引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很驳杂的，有小说，有随笔，有游记，也有论文。但这些作品在它们的生成上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

这儿是以“五卅”为分水岭。第一部的《水平线下》是“五卅”以前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之交的私人生活（除开《百合与番茄》一篇多少包含着注释的意义编在这儿外），和我对社会的一些清淡的但很痛切的反映。

这是暴风雨前的沉静，革命的前夜。

没有眼泪的悲哀是最痛苦的，一看好象呈着一个平静的、冷淡的面孔，但那心中，那看不见的心中，却有回肠的苦痛。

第二部的《盲肠炎》① 便大多是“五卅”以后的关于社会思想的论争。这儿在前本预计着还有更多的写作要继续发表的，但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我便南下从事实际工作去了。

我自从从事实际工作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惟文艺上的作品少有，便是理论斗争的工作也差不多中断了。这个长时期可以说是我的石女时代。

但是石头终有开花的时候，至少是要迸出火花来的。

本篇系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水平线下》之《序引》。

① 现收入本编第十八卷。

火山爆发的时期怕已不远了。

在这部书里面具体的指示了一个 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

这是一个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转换。

但我们从这一个私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个"的变革只是"全"的变革的反映。

雀鸟要飞跃的时候,它总要把身子放低。

这儿是飞跃的准备。

飞跃罢!我们飞向自由的王国!

1928年2月4日,上海

〔**本卷注释者**:《我的学生时代》 王锦厚
其他 马德富 赵存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二卷　沫若自传　第二卷　学生时代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404
下载位置=http://book6.5read.com/300-59/diskft/ft50/27/!00001.pdg